

我的  
生活  
第三本

馮玉祥



# 我的生活

第三本

馮玉祥

三戶圖書社刊行

1944

目次

第三十一章	首都革命	一
第三十二章	首都革命以後	三五
第三十三章	赴俄途中	六九
第三十四章	在莫斯科	九二
第三十五章	五原誓師	一〇一
第三十六章	平甘援陝	一五〇
第三十七章	鄭州會師前後	二六五
第三十八章	豫東大戰	二七〇

第三十九章

豫北大戰

二四九

第四十章

完成北伐

二六四



## 第三十一章 首都革命

吳佩孚自第一次奉直戰爭獲勝，即自登三台，又和段祺瑞一樣，做起了武力統一的迷夢，賄遺告竣，曹仲三被捧上台，他更是高氣驕盈，一手遮天，處心積慮地進行着他的狂妄的企圖。此時他以黃河流域爲根據地，攫取直魯豫閩使之職，以復伸張勢力於長江一帶，指使蕭耀南佔據湖北，齊燮元佔據蘇皖贛，孫傳芳佔據福建，馮俊陝川黔軍攻掠四川，勾結陳炯明沈鴻英牽制廣東，駐兵山海關喜峯口以阻禦奉軍。這種種的佈置，都是他實施窮兵黷武政策的初步。

但是在他囁嚅逼人的佈置之中，已經埋藏了將來失敗的因素。原來此時直系的內部，也因吳之飛揚跋扈，而各懷異心，隱然分成津保洛三派。津保派彼此結合，在擁護抑吳的謀算之下，暗中活動，處處予吳掣肘，使吳難以施展。同時直系以外的各方，在曹吳的壓迫之下，也在積極地應付與對抗。關外的奉張銳意整軍經武，想着捲土重來；皖系殘餘的浙盧，處於重軍包圍之中，亟謀找一條出路，以圖自存；而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中山先生，也正在奮力邁進，進行着倒直的運動。這些，又都予洛吳以致命打擊，使其迷夢不能實現。

那時粵浙奉實行聯合，三公子在奉天會議，反直陣線的三角同盟即告成功。吳佩孚想着迅速



的予以各個擊破，首先實令陳炯明等攻擊廣州，並勾結外國勢力唆使廣州商團譁變，以牽制出發討伐北伐之師。接着又指使蘇齊圖孫合攻浙盧，於這年九月三日爆發了蘇浙之戰。『山雨欲來風滿樓』，這都是第二次奉直戰爭的前奏曲。

蘇浙戰爭的結果，是盧永祥敗退淞滬。這使得吳之武力統一野心愈熾，我素來主張和平，對曹錕的賄選竊位既深為疾惡，於吳之窮兵黷武尤痛恨已極。目擊國勢日非，環境險惡，而自顧力量單薄，孤掌難鳴，心裏有難言的苦痛。這多年以來，不斷的和國民黨朋友往還，中山先生把他手寫的建國大綱命孔庸之先生送給我，使我看了，對革命建國的憧憬，益加具體化，而信心益加堅強。其間徐季龍先生奉中山先生之命，常常住在我們軍中，教育總長黃騰白先生及其他國民黨友人亦適從至密，他們都多次和我商洽反直大計。這時眼看着第二次的奉直戰爭的爆發，一天天接近了，我一面由於內發要求的驅使，一面爲了各位朋友的有形與無形的鼓勵，誓必相機推倒曹吳，縮短這一禍國殃民的戰爭。因此除加緊訓練部隊外，尤時時注意同志的結合。

在這裏，我要提出孫審這個人，介紹於讀者，他是河北高陽人，字禹行，爲明末名將孫承宗之後，是一位老革命黨，和王勵齋張溥泉諸先生爲好友。我們曾共謀灤州起義，自那時訂交，多年來往來無間，不但私人交誼深厚，在革命主義上亦志同道合。讀者當還記得我停兵武穴時，他奉了曹仲三之命，來說我開向湘西的一段。現在我再補敘一下他的身世。他爲人慷慨義氣，豪邁

個儻。光緒二十八年，他在保定考秀才，得讀一書戶河北易縣之滿洲人，相交數日，無話不談。談到當時政治的腐敗，那人道：「我來應考是萬不得已，我是滿人，我若參加革命，誰也不肯信任我。你何苦也來弄這個？」孫聞這話，如當頭一箇青天霹靂。這回榜發，得了案首。益發覺得功名之事，毫無一點意味，從此常在茶樓酒館飲酒作樂，徜徉自得。知交好友有勸他重理舊業進取功名的，他回答道：「我是大明宰相孫承宗之後。我們祖先被清家所殺，我和清家仇比海深，誓不兩立。我此生再也不應清家的科舉了！」一天回家，於途遇一鬚髮皓白的老者，穿一身破衣，拿着鉢子行乞，但細看神情風度又不似窮苦人。因問道：「看您樣子不像個要飯的，却爲何至此？」老者見問，下淚，自說是蠶縣人氏，原是富有之家，因有同村一個地痞，是個天主教徒，忌其家財，誣告他爲義和團，致傾家蕩產，弄到今日地步，孫二哥聽說，大起義憤。請老者住到他家，好好款待。派人到蠶縣打聽是實，那教徒倚仗教勢，魚肉鄉民，無惡不作。次日孫二哥打好包袱，拿一把鋼刀，磨得雪亮，和老者說道：「走！我和你同去，我爲你一報此仇！」老者畏縮不前，道：「你是一個讀書人，如何做的這事？而且鬧出事來，誰個擔當的起！這可萬萬辦不得的呀！」孫二哥頓時惱怒起來，把手裏鋼刀向着老者亂幌，叱道：「你有仇不敢報，空頂着一個人名，還不如宰了你完事！」老者爲勢所逼，只得回到蠶縣，找到仇家住所。當夜孫叫老者在外等候，自己躡身跳過院牆，一會兒工夫，即提出一個血淋淋的人頭跳出牆來，把那人頭揚着，

聞老者殺的這人對是不對。老者嚇得渾身哆嗦，不知如何是好。孫說：「我做的事，我自己擔當，決不牽涉到你。」因寫一信給當地知縣，詳述事情始末，嚴責其縱奸害良，後來若不悔改，必有以報之。信末詳具自己姓名籍貫。連同人頭掛到城門頭上，使全城百姓知曉。自此他即出亡外鄉，投入陸軍學校讀書，畢業後任爲排長，又升入陸軍大學，繼爲第三鎮參謀官，加入民黨，努力推翻清室的革命工作。民國既立，曹仲三把他看作洪水猛獸，百般排擠，使之不能立足。他乃脫離第三鎮。心想江南爲革命勢力所在之地，或許可以相容，那知民元到了南京，許多朋友同志，又懷疑他是袁世凱的探子，對他十分歧視。他住在—位朋友家裏，一天，有人告訴他，說二三日將有人前來行刺。請他小心提防。是夜大雨，聽到有人敲門，門開，即聞槍聲。他在急亂中由窗戶跳上屋頂，連過幾個屋頭，終得逃脫，穿着隨身單衣單褲，在金陵大學後面的稻田中躲到天亮，恰巧有一金塔學生出來行深呼吸，見他形狀狼狽，以爲是賊；孫二哥向他賂述經過，請他把竹布長衫給他一穿。那學生非常同情，即脫與他長衫，衣袋中只有一元錢；亦一併送給他以爲盤纏。他出室外面，打算僱洋車到留守府，車夫見他兩腿污泥，穿一件不合身的長衫，心裏覺得蹊蹺，不肯拉他。說了多少好話，並答允給以一元車價，始至留守府找着黃克強先生。當時數道：「若覺得我有何罪嫌，爲什麼不明着辦我，而竟出此暗殺手段！」黃爲之解釋誤會，留他安心住。孫不肯，由此逃往江西，到了南昌，見了李協和先生，相見不勝歡欣，李乃贈以四萬元。

放他廬山舉牧督辦之職。(協和先生慷慨義氣，後來孫到北方，到處宣揚，以爲有眼結識如此好友，爲十分自幸之事。)從此他即弄寒了心，以爲世界上無所謂真是非，因爲人們並不能辨別。其所以由革命的志士一變而爲頹廢主義者，即因爲有這番緣由。

這個時候，他正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兼大名鎮守使之職。

且說這年——民國十三年——九月十日，我在南苑建築昭忠祠，舉行落成典禮。那天軍政各方都派有人員前來致祭。孫三哥先是派了代表來參加。過了數日，天上落着小雨，他又親自坐了汽車來。相見之後。我說：

「好久不見了。今天有什麼要緊的事？」

他說：「上次總這兒昭忠祠落成，我恰好有事，不曾親來致祭，今天我來補祭一下。」

我領他致祭完了，走出祠來，陪着他在後面義地中看着。一邊走着，一邊嘆息憑吊。他說：

「喝！這樣多！民國成立不過十多年，這裏已經躺下這許多戰士了！」

我說：「長安戰死的，河南戰死的。各方面的都已經設法灑了過來，他們爲國捐軀，落得一墓字，也算不朽了！」

「都是忠義好漢啊！都是精魂忠骨啊！」

我和孫三哥多年相契，已是無話不談的朋友，此時即笑着和他打趣道：

「他們死了，能得忠骨之稱；孫二哥，將來您百年之後，人當如何稱您？」

「那不用問，」他笑着答道：「像目前的這樣的幹法，一個不折不扣的軍閥走狗吧了！」

「您統兵數千，坐鎮一方，爲什麼甘心做人家走狗？」

他哈哈大笑起來，停住腳，說道：「我算什麼？還有那帶着三四萬人的，不也是做着軍閥走狗，莫可如何嗎？」

說着話，已走到墳地中間一座草亭跟前。卽同進去坐下。我於是正式說道：

「目前鬧到這個局面，我想稍有熱血良心的人，沒有不切齒痛恨的。我所轄的雖然名叫三師三混成旅，但實際還不到三萬枝槍。處此境地，未可莽撞。但我們必須努力，把這一批禍國殃民的混賬東西，一盤腦兒攪翻，不然的話，如何對得起自己？如何對得起我們創造民國的先烈！」

「換章老弟！」孫二哥十分懇切的和我說：「您若是決定這樣幹，我必竭盡力量相助。此外還有胡笠僧岳西峯他們，也定然願意和我們合作的。我們以負責去接洽。」

我故意說道：「您提胡岳他們！他們如今有了祿位，有了金錢，怕不見得肯和我們幹了罷？」

「這個大大不然，我知道他們，比趙清楚得多。他們現在河南，實際上是鬱鬱不得志，對曹吳的作法，早已深惡痛絕。何況他們都是老革命黨人。更何況他們和您我有如此交誼。橫豎直率馬上就要幹了，我們有的是好機會。我們先佈置一個頭緒，待機行事，必有把握。」

當夜詳商良久，說定由他去和胡笠僧他們接洽，待胡那邊來了人，再商討第二步辦法。談着話，我的隨員在旁邊給我們照了一張像，作爲籌議事情的一個紀念。孫三哥即於當天歡天喜地的走了。

大約過了兩個星期，胡笠僧那邊派了岳西峯來。我在旗幟會裏會見他。我們已經熟識多年，此番相見，更覺得歡慰。坐下來。寒暄數句，他即低聲要我屏退左右，并起立把門關上，我知道孫三哥接洽之事已有頭緒，却看他如何說話。兩人坐定，他即開口道：

「有幾句話，今天要和您細細一談。您是一位創造我國的革命者。尤其在陝西河甯的時候，我們在您的領導指揮之下，爲國崇效力。我們會同過多年生死患難，想您一定能夠推心置腹，完全相信我們。我們今天就說革命黨的話，開門見山的說，您說好不好？」

西峯是個熱血赤心的朋友，說到這裏。把眼睛望着我，十分懇懇的繼續說道：「今天見了您，我心裏是說不出的興奮，我常常想，我們在家裏，不短吃的，不短喝的，出來做事，就爲的獻身革命，救民救國。可是而今事實却大大相反。我們不但不能造福人民國家，反倒做了禍國殃民的走狗，唉！唉！我們太喪了良心，太喪了良心！」說着淚如雨下，鴛鴦不止。

我一時也非常激動，因說道：「您這幾句話是心窩裏掏出來的，說的太好了，太好了。我還有什麼話說，您來的時候笠僧弟說了些什麼呢？」

笠僧的意思是完全聽您的命令。只要您肯帶着我們打倒這般禍國殃民的東西，你說怎辦，我們就怎樣辦。原先笠僧對您這邊的情形還有些不了解。這回孫二哥去了之後，我們纔完全了解了。現在笠僧特意派我來接洽一切，只有一句話：就是絕對聽您的，毫沒半點含糊。」

我說：「西峯弟，您既如此說，我們公是公，私是私，我也有幾點意思，要和您開門見山的談一談：第一，吳佩孚爲要打倒異己，爲所欲爲。對奉戰事目前已至一觸即發的地步，這種戰事，我們誓死反對。吳若有命令給您們那邊，您們萬萬不可接受。第二，我們須利用形勢，相機而動。將來我們若果成功，必須迎請中山先生北來，主持一切。他是中國唯一的革命領袖，我們應當竭誠擁護。否則我們就是爭權奪利，不是真正的革命。他的建國大綱您讀過沒有？把這個細細讀一讀，才知道真正的民國是怎回事。第三，紀律是軍隊的命脈，有之則生，無之則死。我們既拿定了決心，此後即當嚴整軍紀，真正做到不擾民不害民幫助民衆的地步，否則我們決不能成功！」

我鄭重的把話說完，他都一一答允，說回去就完全照辦。並且要求派送人員到南苑來進我們的教導團。後來一共選送了一百數十名學生前來入學。國民軍第一軍中有第二軍學生者即是此故。過了幾天，胡笠僧本人也來見面一次。預先約好了時間，在晚上九點鐘，他秘密地來尋。他說：



「機關主義說的那三條意思我們都完全依從，尤其請中山先生主持大計的一條，是再妙沒有。不過我們隊伍的素質，卻是清楚的。在火線上拚命，還可以亂七八糟的拚一氣；若是派冷進城，必定不能謹守紀律。那時若出了事，我怎樣對得起人民？我只有自殺一條路。至於打仗時，您不要顧忌着那裏險，您就派我上那裏去。您只管給我命令，我們願意蹈湯赴火！」

我說：「向老弟，你有這幾句話就夠了！」

經過這幾句接洽，以後經常奔走兩方者，在胡笠僧方面，有劉允丞先生等；在孫二哥方面則有王勵齋先生，隨時不斷的往來，聯絡日臻密切。這時教育總長黃膺白先生常來南苑爲我們講話，前已言之。有時講演完畢，就請他同坐，閒談時事。黃爲人有膽有識，熱血忠誠，日子一久，越談越是親密，甚至無話不說。一次談到賄選和曹吳的禍心，相對歎歎。他把大腿一拍，說道：

「而果要有辦法，我一定跟着你幹！」

於是我說：「請您嚴守秘密，我們不久將有大作爲。那時請中山先生北來主持，您等着吧。不久就將來定要請你幫忙的。」

他聽說此話，歡喜極了。

這時我駐在南苑，除勸練部隊而外，仍按照我的本色，作些利益地方的事情。其中最使我發

生濃厚興趣的，就是栽種樹木。將南苑隙地，劃成若干區，分配各營種樹，所種樹類不一，一區專種桃樹。一區專種李樹。一區專種梅樹，等等。技術方面，請了一位韓安擔任指導，樹苗下土，澆上馬糞，後來都長到八九尺高，蔚然成林。尤其是孫連仲所種的一區核桃樹，大約由於培植得法，到第二年四月間顯得特殊繁茂。一片青蔥翠綠，好不美觀。自南苑經大紅門以至永定門大路兩旁的地方。我派由第二十五旅旅長宋哲元負責栽樹，所買樹種皆八尺高，二寸粗，入土二尺半，每顆只價八大枚。頭年冬三九天氣栽植下土，次年春天即發芽，比春天時栽植更要好些。現在這些樹都已成林，每顆至少可值百元錢了。栽種樹木，必須有專家指導，否則難有成績。在批平，六月天氣移栽六七尺高一二寸粗的大樹。也照樣的能活。我在南苑租住李星閣的屋子為寓所，院中沒一顆樹，遷入時已是四五月，大家都以為不宜於栽樹了。我不管這一套，買來八顆槐樹，每顆三元，栽訂下去，結果七棵全活，只死了一棵；這一棵怕也不是因為時令關係死的。六月間栽植葡萄亦可活，我也嘗試過的。我所領教的所謂專家，只是不識字的粗人，並無科學的訓練，不過經驗豐富而已。

戰爭的發動在一天天緊迫了，但我們隊伍因被歧視，器械還未配備齊全，那時政府由意大利辦來比士尼步槍，還有大砲和子彈，都是大量的，我派總參議蔣鴻鴻過去見陸軍總長陸錦，接洽領械。蔣回來報告說，在陸錦那裏等了足足四個鐘頭，陸總長只是不見。陸總長在幹什麼呢？他在

和田維勳鑄着烟燈，談公說古，沒有完結。和田維勳本是民十師，我在陝西時開調出去的。一個團長（屬井岳秀部），此時已升爲旅長，爲大口齒伶俐，常善於包結，在插大煙一點上，又是陸總長的同好着。這回必定又是他從陝西帶來上好烟土奉獻，所以陸總長才那麼歡喜，我身居陸軍檢閱使之職，當派兵接洽要事，陸總長竟扭頭不見意，而和那個旅長無所事事，笑談終日，高幹部洩露秘密，曹錕的倒臺，大半因爲他的幹部過於荒唐之故。

蔣鴻遇既白去，繼，我只有再上請領的公事，幸蒙曹仲三批准，令發三千枝步槍，十八門陸砲和幾百萬發子彈。那條子是曹錕親手批的。我以爲有了這個，便不愁領不到器械了，那知一次三次的去領，照舊領不到手。誰也想不到有此情形，使我心裏發煩。有天我召集全體幕僚會議，有的堵着口不開，有的談別的事。我問蔣鴻遇說：

「器械領不下來，究竟是怎麼回事？眼看着就要打仗了，我們怎麼辦？」

「先前我怕您生氣，所以不曾對您說。現在您既然問我，我不能不說了。這個您還不明白麼？」他用手比了個圓圈說道：「癥結所在，就是因爲缺少這個。現在軍械都歸李六掌管，不送上錢去，說什麼也是領不出東西來的。」

「得多少數目呢？」我問。

「至少得十萬。」

我想這錢到那裏去露？軍需買玉璋坐在旁邊，這時就說：「只要檢閱使答允，我可以設法。西北邊防督辦的名下每月應領五萬元的經費，雖是拖欠甚多，但近來頗積餘了一些，不到十萬的數目，少的也有限。可以補足起來。這時什麼也不用管，把槍領了下來再說。」

我說：「好呀，你快去湊去。」又和蔣鴻遇說：「這回您可真要領下來，不是說着玩的！」

十萬元湊齊了。蔣鴻遇便從李彥卿的門路把錢送去，下午四點鐘送錢去的人回來，當日六點鐘便接到李六的電話，叫派人領器械彈藥去。我在隔壁聽着電話，恨的我牙齒咬的格格作響。第二天曹仲三在居仁堂召集會議，我到的時候，別人都還未到。曹見了我，笑嘻嘻的從台階上迎了下來，說：

「煥章，你這麼苦，還給我送錢，我實在太過意不去。」

我纔知道得錢的不只李六一人。這混賬總統也得了的。大總統左右全是這類狐羣狗黨，公開的大幹軍歌餉錢的勾當，而賴不恥恥。李彥卿在城內蓋一住宅，一花就是四十萬，試問那裏來的許多錢！

器械已經補充齊全，一切也都準備妥貼，我照常不動聲色，只等着時機的成熟。先是這年八月二十四日江浙戰爭爆發，這就是第二次奉直戰爭的序幕。奉張因急要聲援勢將

敗北的浙盧，即在熱河冀東一帶向直軍發動攻勢。九月十三日京奉線交通斷絕，十六日朝陽方面也開始動作。吳佩孚王承斌奉曹仲三電召，於十七日到北平，十八日即對奉張下了討伐令。吳佩孚自任爲討逆軍總司令，王承斌爲副司令，彭壽莘、王懷慶、曹錕和我分任第一、二、三、四路司令，張碩來爲援軍第一路司令，胡景翼爲援軍第三路司令，如此等等許多名目，當時報紙上都有記載，不必一一贅述。可記的是吳佩孚在四照堂召集會議，親下命令的一幕。那晚被邀參加的人員，有他的參謀長、總參議、陸軍部長、海軍總長、航空署長、代理國務總理，以及派有任務的高級將領及其他有關人員。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電燈明如白晝，廳中擺一長條桌，挨挨擠擠地坐滿六十多人。扶桌坐了許久，纔聽到有人大聲的報告道：「總司令出來啦！」嚷着，吳佩孚已經搖搖擺擺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條白色褲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綢子的夾襖，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戴着「鈕子」也不扣。嘴裏吸着一根紙烟。他走到廳上，即盤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往後桌，那種坐法，宛似一位懶散的鄉下大姑娘。於是口傳命令，念道：「奉張大逆不道，殺我人民，奪我土地，殺我主權，我武功。」還有什麼「次張撻伐，除此元兇」之類。不知道是他預先擬就，還是他臨時隨口胡謔的。聽來總如佛道的經咒。聽到中間，這燈忽然滅了，半廳纔現出亮。王懷慶和我坐在一處，附着我耳根低聲笑道：「不吉！不吉！這趁不吉之期。」我笑而不言。於是吳佩孚捧着燈去矣。至此已入命令的正文。第一路任務如何，第二路如何，其據

軍各路又如何。命令下完，吳即站起來說道：「沒有了罷。我們就這麼辦罷。」此時海軍總長連忙站起來說道：「報告總司令！命令上沒有提到海軍，我們的艦隊怎麼辦？」吳答道：「哦，海軍沒有提。在命令上添一條罷，你們自由巡弋，以防意外。」航空署長又站起來道：「還有我們空軍呢，怎麼辦？」吳又哦哦連聲，說：「也添上一條，你們隨時準備，相機出發。」又有張家口騎兵將領起立請命，吳答：「在古北口外活動。」接着兵站負責者等人員亦起立，吳搔了搔頭，不耐煩的說道：「這樣儘着往下添，還成個命令嗎？你們不能等着以後再商量嗎？今天就是這樣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纔一團的散了。這樣重大的事，辦的如此輕率兒戲，吳之幽默，滅裂，往往似此！這裏所寫的不過千百條中之一條而已。

在這個當兒，我打聽得北京警備副司令之職尚是虛懸，我特意向曹仲三推薦了孫三哥。曹不以為意，即由保定調孫三哥到京，任為警備副司令。後來孫三哥見了我笑道：「你特意把我弄來給你們開城門是不是？」我聽了他這話，也不禁笑了。

奉軍進攻，共分三路。直軍也使派三路迎敵。吳佩孚自己任第一路，沿京奉線前進。王懷慶任第二路，出喜峯口，我則任第三路，經由古北口以趨熱河。吳佩孚這次派我，表面是說古北口這一路關係重大，非勁旅不克勝任；實際是因此路途遠險阻，接濟困難，意欲陷我部隊於絕地。但還不放心，除派王承斌同行，對我監視而外，復令胡笠僧率部相隨，囑咐他：「如我有何異動，」

雖就近解決。吳的用心真陰毒，在他要用我爲他拚命的時候，仍然蓄意要把我們消滅。可是他萬也想不到胡笠僧會把這話告訴我；所以他的陰狠，實是利令智昏而已。

命令既下，即須準備出發。爲了給養的問題，我和王懷慶特去找吳商議。吳的意思早就宣佈，此次出兵，概不設兵站，糧秣餉項，統由各本軍隨地籌辦。我說：

「這話恐怕行不通罷。路途這般遠，這般難，假如還要自己籌餉辦站，那不但妨礙了部隊的作戰，並且擾害地方，鄉紳百姓全會被這一着得罪了。」

吳很輕鬆隨便的答道：「兵站是用不着辦的。你們只管走到那裏吃到那裏，不但自己省却許多麻煩，地方上官紳也是萬分歡迎的。」

我問這是什麼意思。吳答道：「這還用問麼？地方上官紳誰不願意接辦官差？他們花了五個，可以報十個大發財源的事，誰也惟恐搶不到手。你只管開拔，不要顧前思後的。我在湖北河南都是這種辦法，地方上歡喜，我們自己也省事。」

我說：「擾害百姓的話且不說罷。我走的古北口這一路，完全是荒僻的地區，往往一百里八千里的沒有人烟，我們向那裏辦糧去？您說的辦法就說別路可行，我這一路也是萬萬不成！」

聽至此，兩方僵坐，毫無辦法。顯然的，吳這些辦法，全不脫禍國殃民的作風。好像他和國家人民有深仇一樣，於國家人民怎樣有害，他就怎樣辦，我和王懷慶出來，王仰着頭嘆口氣

道：「我們這是死路一條啊！」

吳佩孚對於我們的餉項續絀不加理會，但我却不能不開拔。俟到九月二十左右，他派了人到解州寺來送我，意思是催我們出發了。我們始準備動身。從九月二十一起，我即令部隊陸續開拔，到二十四日開拔完竣。我派了營步兵留守後方。委蔣鴻遇爲留守司令兼兵站總監，辦理後方的切事務。我原從河南招募一批新兵，約一萬餘人，編爲三個補充旅，由孫良誠、張維璉、蔣鴻遇分任旅長。所領槍械不敷分配，每旅只槍數百枝。這時藉着訓練的名義，着令留駐北京，以爲應援。一切安排妥當，我始起程。在我出發的前一天，想到顏惠慶先生是一位好朋友，想把我們即要實現的計劃和他談談，即去找他，我試探地說道：

「國家到了今日地步，政治鬧得如此黑暗，賄選賣國，無所不爲，而今奉直軍還要自起內戰，都不過是爭權奪利，禍國殃民，這種局面將來怎樣結束呢？」

「真是難事！」他做出同情的樣子隨聲附和着。

「我們總要共同想個辦法，以謀挽回，袖手坐視總不行的，若我們將來有了辦法的時候，打算請你出來幫忙。」

我這話是明明告訴他我們即將舉義了，顏先生却模稜兩可，不說一句有關痛癢的話。談了兩個鐘頭，話老是不能深入，顏先生是一位老外交家，說話如此不着邊際。我覺得這不是革命外交。



家的態度。若革命外交家，則頭腦敏銳，遇事痛快的一言而決，不當如此圓滑。我和黃膺白先生接洽，也是這樣說的，他的態度何等明快。我和顏惠慶先生王儒堂先生都是多年交誼，往來甚密，正想一與之接頭，因此番顏先生態度如此，所以索性連王儒堂先生亦不去說了。到後來班師回京後，始臨時約了王先生出來。

我們先頭部隊開到深平，我自己也住到懷柔。從懷柔到古北口，到密雲，大路兩旁都是果樹，此時正結了實，紅的果子滿樹纍纍，看着真是美觀，真是可愛。那時我們部隊整整過了三旅，而路旁菓子却依然滿樹。我過的時候，許多百姓夾道而立，嘻嘻的看熱鬧。我們問他，菓子短了沒有？百姓說：「是您帶的隊伍過境，那會摘吃我們的菓子？」又說：「弟兄們看見菓子長的好看，我們就請他們吃，弟兄們說：要錢我們就吃。我們說：都是樹上自己長的，要錢做什麼？怕你們吃了多少！他們還是不吃，」談的歡歡喜喜。我覺得這是兵們自覺的紀律，很可欽慰的。

在懷柔住了幾天，吳又派人催行，我乃進至古北口，住在楊令公廟，據傳說昔楊令公奉了朝命征遼，只給他很少的兵卒，他說敵衆我寡，懸殊太大，勢難收功。朝廷不理會他的困難，只說你去打一仗再說。他率旅前往，便被包圍，極力鏖戰，糧盡援絕，結果還是全軍覆沒。他自斃喪師辱國。只有自縊而死。我這次行軍，想到楊令公的遭遇，不禁感觸萬端，因寫了一付對聯。

以木書刻，掛在廟柱上，聊寄我之感懷，那聯文現在已記不清楚了。

在古北口住着，段祺瑞派賈規亭送來一封親筆函，大意是表示不贊成內戰，籌贖還政府尤希望我有所自處。接着張樹聲劉砥泉又介紹一位張作霖的代表馬某來見。馬說奉方殊不願與孫爲敵，只要推翻了曹吳，他們的目的便已達到，決不再回關內進兵。我便很坦白的對那代表說：「我已經和北京方面幾位將領有所接洽，只要你們的隊伍不進關，我們的計劃必能順利進行，推翻曹吳，是不成問題的！」

我在房裏說着話，聽着外面狂風怒號，河水急流，士兵正在忙着準備他們的晚餐。在這種極緊張的夜晚，我聽見我們談話的聲音是如何的莊肅。我拿着中山先生建國大綱，說了幾條重要的主張，「這是我們中國唯一革命領袖的辦法，您以爲如何？將來我們事成，擬請中山先生北來主持大計。這一條你們是不是贊成？」馬君答道：「這完全不成問題。一切悉聽你的主張，我們無有不贊成的。」

我乃重複道：「一是請中山先生北來，二是你們隊伍不得進關，只此兩條就成，別的都不要細說了。希望你快回去轉達，切勿食言，現在是怎樣商定的將來就怎樣實行。我這兒已經備妥當，不久即有主和息爭的通電發出。」

當晚他們趕程回去了。

此回相偕同行的有吳佩孚所派監軍王承斌氏。王學孝伯，陸大畢業，爲人深沉誠厚，寡言笑，但對於奉吳之命相隨監視，但對吳佩孚的所爲却不滿意。我的一切舉措，全不瞞他，什麼話都坦白相告，他一方面同情我們，一方面却並不肯參加活動，幫助我們。但總決不肯破壞我們，把我們的計劃洩漏於吳。我也聽其自由，不予強迫，兩下各行其是，彼此瞭解，如此而已。他的這種態度，我已覺得難能可貴。可是嚴格的說，我並不能贊成他。我以爲個人的關係和國家的關係不能混淆不明，公私應當分清清楚楚，或則他當反對我們，破壞我們；或則就應當參加我們的活動，共同推舉曹吳，二者必須站定一方面才是。可是他竟兩方都站，兩方都不站，模稜其間。不辯是非。孝伯如今不在了，想到此等有用之才，無所成就，委實惋惜不置。當時奉方與孝伯（王孝伯是奉天人）亦有所接洽，承認他對此事爲預謀。可是後來曹吳既倒，張作霖竟令張宗昌李景林佔據天津，把他驅逐出去。這是失信食言的舉動，使我十分不平。後來我更不能與奉合作，這件事也大有影響。

我從古北口鎮駐到灤平，即秘密發信給胡景翼派代表前來會商遊師日期。等了數日，鄧寶珊奉派前來，我便召集各處代表在二級棚中舉行會議。張之江、李鳴鐘、劉都芬、劉燾、鹿鍾麟、朱哲元等位亦均由各處前來參加會議。結果規定隊伍總稱爲國民軍，因爲我們這次革命，是擁護中山先生主義，並歡迎中山先生北來，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黨名叫國民黨，所以我們的隊伍也

就取名國民軍。一路以來，部隊行進如流水一般，官兵無不歡欣鼓舞，至此益發精神振奮，大罵曹吳禍國殃民，我們非回去打倒不可。人人意識到此番作爲的意義和自身責職的光榮與重大。

那時參預總統府機要的人員，許多人與我們取得聯絡。吳在前線的情形，隨時都有人給我報告。洛吳敗訊，在我們開會議時即已聞知；但未證實，不敢深信。乃致電於吳，報告我們前頭部隊已抵達承德及沿途糧餉難濟砲彈潮濕的困難情形，同時並探問他的消息。隔了一天，即接吳的參謀覆電，有云：「此間形勢危急，不有意外勝利，恐難挽回頹勢。」根據此電可斷定吳戰不利之訊，確實無可置疑。我即抓住時機，立刻下令，命胡等僧率領開赴喜峯口及通縣的軍隊，星夜南下，攻佔京奉路之軍糧城灤州一帶，截斷京漢路直軍之聯絡，並防阻吳軍西歸；命鹿鍾麟率部兼程返京，會同孫良誠張維璽兩旅，開往北苑，再與蔣鴻遇旅會同入城；命李鳴鐘率兵一旅直趨長辛店，截斷京漢京奉兩路交通；又命已抵承德的張之江宋哲元兩旅，限日班師。

佈置妥定，我即親率劉郁芬首途返京，走到灤平，遇等僧的代表劉允丞先生，我即拿出首都革命的計劃，請他代表等僧在上面簽字，以昭鄭重。次日抵高麗營，那晚刮着大風，天氣極冷。黃膺白先生從北京趕來相見，詳談政府散漫泄沓的情形，和吳在前線放縱之事，京漢線軍民擁塞，弄得車輛倒錯不開，吳怒而扣押司機，難民悉被鋼禁於悶車中，扣在站上數日，整車整車的飢餓而死。種種鹵莽暴行，令人聞而髮指。當晚共商政府過渡時期的辦法，規定組織攝政內閣，

又把如何迎請中山先生之事具體計劃一番。談到深夜十二點，黃先生仍然冒着砭骨的寒風，先回北京去了。

二十二日鹿瑞伯到達北苑與蔣鴻遇等會見，分配了工作任務以後，當天晚上八點鐘即率部由北苑出發，十二點馳抵安定門，孫二哥早已接到通知，即令守兵大開城門，迎接入城。首先接收全城防務，同時把全城電報電話線盡皆割斷，一切應做之事，都在一夜之中神不知鬼不覺的辦個妥貼。第二天早晨，北京全城貼滿國民軍的安民佈告，通衢要道上也佈滿了纏着「誓死救國，不擾民，真愛民」白色臂章的國民軍崗兵。人民走到街上，看見這些情景，都閃着驚疑的眼光，不知道這些事實究竟是如何出現的。

這次部隊回京，所以能夠如此機密神速，多是鹿瑞伯辦事妥慎周到之功，古北口會議之後，鹿返駐在地密雲，即每日令部隊練習行軍。或五十里而回或六十里而回，總是向西往北京走，有時徒手；有時全副武裝，一頭走着，一頭於路旁打野外；有時剛剛支起帳棚準備露營，忽又收拾一切重新趕回駐地。每日如此，使部隊時時準備，使居民天天看慣。故奉命班師之日，不但地方人士不以為意，士兵們亦多不知情。鹿率部到達北苑後，照着命令在此開設法先運二團人入城。他每次派兩連人，作為進城取東西的模樣，暗進明出，進去的多，出來的少，數次之後，城中即陸續聚了一團人。這一團人於奉命進城之前，於如何佔據全城，如何分配工作，如何割電線，佔

電話，等等技術辦法都已有完密的計議與練習。到晚間大隊入城，乃以混成營爲單位，每一混成營輜重以至火仗俱全，掉一個身，以輜重等在前，以步兵殿後，鹿親自帶隊前行，以防不測。一營入城，給以命令，帶第二營續入，城中每個路口都先已分派目兵或便衣隊招呼，使不致走錯路程。這件大事，未耗一兵一彈辦得妥妥貼貼，井然有序，原不是偶然的。鹿爲河北定縣人，名鍾麟，字瑞伯，曾爲第一混成協學兵，那時第一混成協的學兵是有名的「龍虎班」，教官皆陸大畢業生。鹿在此三年，於戰略戰術及戰術知識有特殊研究，後來任爲第三十九旅副官及第四混成協營副。在四川時始來我們第十六混成旅爲營長。民五在廬房任軍法官，爲砲兵營長及團長，升旅長，又升師長兼北京衛戍總司令。爲人謙下勤勞，好學不倦，對國家人民一秉忠心，智勇穩練，職任繁劇，與我共事多年，真是作職有作職的辦法，作事有作事的辦法，乃國家棟樑之才。

二十三日我到了北苑，知道城中的事情業已辦妥。這時胡等僧和孫二哥也都來了，第二天便召開會議，商議正式組軍之事。當決定推我爲中華民國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登僧和孫二哥爲副司令，分任第二第三兩軍軍長。這時雖已收復首都，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但知道洛吳尚有十幾萬可供驅使的部隊，他必然不甘屈服，而作最後掙扎。正當會議未散的時候，果然接到報告，說吳佩孚已從前線撤回一部勁旅，正在回攻楊村。因又念及山左督軍鄧士琦此時所處地位至關重要，倘若被吳拉攏，則至爲可慮；若我們能與之聯絡，則吳佩孚前線受敵，立可使

之潰亡。鄧士琦爲段祺瑞派系的人。爲了應付當前軍事上嚴重的困難，孫二哥便臨時提議，請段祺瑞出山，以示與皖派聯絡，俾使魯督鄧士琦出而截阻直系援軍北上。大家亦以爲一則目前困難非此不能打破；二則中山先生是否北上，尙不可知。一時只看見了軍事的成敗，而忽視了政治的後果。孫二哥這傳提議，竟得全體一致的贊成。真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那知由於這個臨時動議，竟斷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

會議席上，又據前晚與膺白先生談的組織攝政內閣之事從頭商討一番。胡孫二位說：

「許多事都請得司令全權辦理，不必一一和我們商量。事實上我們是分散各處，各有任務，難得聚會一次。若定要事量而行，反把大事掣肘了。」

我說：「這却不然。內閣的組織，事關重大，必須大家從長議決；再則今天諸位都已聚會，正該就此問題好好討論一番。」

當時決定：曹吳賄選禍國，當然不能容他繼續行使總統的職權，於是向他提出三個條件：一，下停戰令；二，免吳佩孚本兼各職；三，請他自願退位。國民軍入城後，他的衛隊與曹世傑的所部都已由孫二哥派隊繳械遣散，此事已不成問題。於是便商議攝政內閣的組織，其中陸軍總長和參謀總長二職，最費研究。我的意思，以爲無論段先生是否出山，均請用先生北來之幕，必不可作罷。爲表示此點誠意，並貫徹吾等初衷，此二職必得以老革命充任之。當時孫二哥因

提李協和先生曾爲中山先生總參謀長；李書城先生曾爲黃克強先生總參謀長，故決定請李書城爲陸軍總長，李協和爲參謀總長。因孫黃是中華民國的創造者，大家對此議均贊同。內閣人選既定，我們都覺得十全十全。其中沒一個我的私人，亦無胡孫一個私人，完全是本着「天下爲公，選賢與能」的意思決定的，攝政內閣於十一月一日成立，由黃鄂充任國務總理，全部關員的分配如下：

外交總長	王正廷
財政總長	王正廷（兼）
交通總長	黃 鄂（兼）
海軍總長	杜錫珪
陸軍總長	李書城
司法總長	張耀曾
內務總長	王永江
農商總長	王迺斌
教育總長	易培基
參謀總長	李烈鈞



內閣的名單發表，不免人言嘖嘖，說這回內閣人選，陸軍，參謀，財政，交通，都是南方人，整個內閣無一個不是南方人。曹吳倒了，成了南方人的天下了。將來北方人還吃飯不吃飯呢？其時竟有人鄭重其事的來見我，對我大說一頓。我回答他們說：「國事當選賢用能，無所謂南方人北方人。俄國人是北方人，日本人也算是北方人，你去請他們來不好麼？眼光如此之小，請您回去再仔細想想看。」記得有好幾位被我說的紅着臉走了。

對於攝政內閣，我上了五個條陳，以爲施政的方針：

- (一) 打破僱傭體制，建設廉潔政府。
- (二) 用人以賢能爲主，取天下之公才，治天下之公務。
- (三) 對內實行親民政治，凡百設施，務民隱。
- (四) 對外講信修睦，以人道正義爲根基，掃除一切攘奪欺詐行爲。
- (五) 信賞必罰，財政公開。

這攝政內閣雖是過渡時期的政治機構，但成立後，却做了一件富有意義的事，那便是修改清室優待條件，驅逐溥儀出宮。

在中華民國的領土內，甚至在中華民國的首都所在地，竟然還存在着一個廢清皇帝的小朝廷，這不僅是中華民國的恥辱。（稍明事理的人，此時無不以留着辮子爲可恥；如今留着溥儀，

即不啻爲中華民國留了一條辮子，可恥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時刻企圖利用的禍根。民六討伐復辟的時候，我即極力主張掃除這個奇怪的現象，剷除這一個禍根，可是當時竟未如願。這次入京，便決心以全力貫徹之。在商得攝政內閣的同意後，便令鹿瑞伯去執行。他帶了幾位衛士進宮，問溥儀道：

「你到底願意做平民，願意做皇帝？若願做平民，我們有對待平民的辦法，若是要做皇帝，我們也有對待皇帝的手段！」

溥儀趕忙答道：「我自然應該做平民，無奈許多人跟着吃我，他們迫着我在這裏，要不然，我早就走了。」

瑞伯說：「既是如此，就請你立刻遷出宮去，從此做一個良善平民。」

當日溥儀就帶着他的嬪妃和需用的東西遷出宮去了。所有宮中的財物，都由吳稚暉莊永寬李石曾等名流組織一保管委員會接收之。事後有人造謠，說馮某攫取了多少故宮寶物云云，對於這種輕薄的謠言，我都無庸辯解；我想李吳等諸位先生都是正直名流，如真有人攫取了財寶，他們豈肯接受保管左物之責，平白分受別人的罵名？烟筒中冒煙，雖亦可使人眼迷，但不過一會工夫，仍現出清白的天空。這個謠言，終久也就自己消散了。

溥儀被逐出宮以後，段祺瑞從天津致我一電，說我在北京一切的措施，他都以爲錯誤，惟有

驅逐溥儀之舉，很覺得有些欠妥。我真不明白段先生是什麼居心，我想，莫不是會感做過軍諮府大臣，磕頭磕上了癮，定要留着溥儀給他過磕頭癮麼？當時我就提筆親擬了一個電稿，我說我此次班師回京，可說未辦一事，祇有驅逐溥儀，才真是對得住國家對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後世而無愧。從這裏可以見出段之倒曹吳，是出於皖直的睚眦之見，完全為私人報仇雪恨，何嘗為國家人民設想一點？

在北京措施政事的當兒，我同時調遣部隊分赴前方，當派國民三軍往保定，解決曹世傑的十六混成旅。派一軍二軍的一部，迎戰吳佩孚的主力於京奉線。張之江劉郁芬蔣鴻逵等都在楊村附近與吳佩孚殘部發生激戰，張之江等沉着進擊，戰况劇烈。正在打的熱鬧，我另派谷良友部抄敵後路，吳部不支，數旅破破爛爛的隊伍完全覆沒。當俘虜數千人，獲槍無算，俘虜中有一旅長名潘子和，解到旃檀寺來見我。我從高階台上走下來，與之熱誠握手，并送以一千元的養家費，備極優待，這時孫二哥已進到保定，乃續派修麟開新兵一部及張自忠舊兵一小部協助他將十六混成旅全部解決，另有鄭金聲部——鄭為我老朋友，自勦率隊自綏遠來歸，我即收編為第三師。吳佩孚看見情形如此，知道大勢已去，大哭一場，上了輪船狼狽地逃往南方去了。

當前方戰事激烈的時候，孫連仲馮治安奉命率部駐豐台附近，準備作各方策應。不想天津英軍，為要延續曹吳的統治，存心擾亂，忽然闖進我們的前哨線，兩下起了衝突。我聽了馮治安

的報告後，便對他們說：

「先盡力和他們講理，實在不聽理喻的時候，不惜與之一拚！」

事實上那時曹吳的倒台是不可避免的，英兵雖然藉口挑釁，故與我們爲難，但在我們嚴密的防範之下，究亦無從施其伎倆。

在這次戰爭的過程中，我得到這麼幾個經驗：

- 第一、對於敵我的實在情況與處境須有透澈的認識。古兵家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又不知己，每戰必敗」的話，是一點也不錯的。在這次戰爭中，我因聯絡周詳，對各方面的情形都頗爲明瞭，所以雖以較薄的兵力，也能戰勝素稱雄厚的吳部。
- 第二、將領對於所部的作戰能力，須有相當自備。這次孫二哥帶着三軍前往保定，一到定興縣便與敵人接觸，一方打着，一面却沉不住氣，覺得自己力量單薄，不能支持，着急的電報如雪片一般飛來。我這時一因隊伍太少，無法抽調；二因綏遠馬福祥態度不明，須派隊守備。接他電報後很爲躊躇，但增援畢竟是緊要的，於是我就勉強派修麟開的兩營派了去。可是這兩部分援軍開到那裏，並未起任何作用，保定的曹部便解決了。若是孫三哥對於自己已有相當自信，不是這樣的速電告急，我即可從容把增援隊伍派調他方，豈不要收更大的戰果！
- 第三、截斷敵後，在我國舊戰術上很是講究，用之得法，確可決定戰役的勝敗。這次楊村之

廣，正面的攻擊雙方勢力幾乎相等，但等到谷我友率部抄到敵後，吳軍便很快的潰敗。因為後路一斷，彈藥糧秣的接濟，以及消息命令的傳達，都發生了阻礙，無論什麼勁旅，處此懸狀，都不免發慌，戰鬥精神也經喪失，還有不慘敗的道理嗎？

第四爲將領者不明戰術，專憑勇氣，鮮有不失敗者。這次被派往攻唐山的一路，未得預期的勝利，使我很是訝異。因爲此路敵軍，全係由前線撤退的敗兵潰卒，早已喪失鬥志，迎頭一擊，如摧枯拉朽，必收極大戰果。但爲什麼竟不能得到預計的勝利呢？等到鄧寶珊先生回來，報告那邊的作戰情形，才知道完全是將領頭腦過於簡單之故。原來笠僧先生部下的將領，講究的是肝膽義氣，吃苦耐勞，衝鋒陷陣尤稱勇猛。但其中沒學過戰術率兵術的人亦確實不少，因此部隊過了一千人，他們往往無法指揮。這次在唐山車站截擊敵軍殘部，他們看見站上停着一列（由兩列併成）兵車，上面滿載潰兵。當即派了一營人前去繳械。敗兵已無鬥志，情願繳械。但他們就不知道派人將車頭上的司機先行監視，只顧三三五五地爬上車去忙着收槍。就在這時，敵軍的敵軍官長即命令司機開車出站，把那列車拖到二十里以外。我們上去的不過三四百人，而敵兵則不下三四千之衆。結果上車收槍的友被人家全數繳槍或槍殺，沒逃回一個。又有一次，他們沒等把部隊分配妥當，大批的敵兵已由前方撤退下來了。當時無可措手，兩方面即混到一處，也認不清那是敵人，那是自己，弄得混亂不可收拾，後經鄧寶珊用盡方法始把自己人整頓調齊。結果竟損失

了很多。幸虧當時敵軍在潰敗之餘，無心作戰，否則他們這一次便不免全軍覆沒了！

我們部隊到了天津，吳部槍砲彈藥大量拋棄，統統堆在新車站。張之江派人前去收存保管。引起笠帽部隊的不滿。他們久居陝西那窮僻地方，一旦看見新式槍砲即不免紅眼。後經張之江竭力解說，才算誤會冰釋。足見訓練缺乏的隊伍，畢竟難於控制，一遇利害關頭，便越軌行動。若非張之江應付得好，豈不鬧出笑話？這次國民軍在天津，未出半點亂子，地方上秩序井然，也都是張之江的功績。

天津局面既已穩定，段祺瑞即速來數電約我到天津討論政治機構改進的問題，當時我因中山先生已在北來途中，故覆電說須等中山先生到天津的時候，我再去不遲。過了沒一天，段祺瑞又派了一位曾爲陸軍部軍醫司長的羅某來促我早日赴津。我想如果堅執不去，必因猜疑而生誤會，若先去一談，一則可示我坦自之懷，二則也可以歡迎中山先生的來津，覺得未嘗不可。遂決定赴津，即一面覆電說準明日去津，一面召集將領說明去京的原委。

次日我動身去津，火車行至楊村，忽由後面另來一車，開的飛快，致撞上我們的車，一時震盪頗簸。不啻天翻地覆。我的行軍桌翻倒了，韓多峯摔倒地上，熊斌他們坐在頭等車上，把頭也撞破了，我當時正在鐵閘子車上的行軍床上躺着，所以一點也沒有受傷；就是再震的厲害些也不會怎樣。後來打聽才知道這回意外，是曹吳餘孽幹的鬼域伎倆，可笑他們心勢日拙，白費了一番

### 心計。

與段先生見面，他表示的非常誠懇。事先他已在離他的住處不遠的地方替我預備了一處寓所。此時就請我到那邊去住。一日，請李景林、張學良、楊宇霆、張宗昌、梁鴻志等大家吃飯，飯畢先照一相，便散坐着商議時局的整頓，這夥傢伙，在曹吳未到，大敵當前的時候，誰都表示得光明磊落落，但這時事過境遷，當時的諾言也就拋到九霄雲外，全不承認，又重新勾心鬪角，只從個人私利着眼了。他們都懷着鬼胎，在言談之間，對於真誠歡迎中山先生北上的國民軍，不免常常流露岐視之情。其中吳光新坐在席上，老是把頭低着，一言不發，過了好一會兒，忽然抬起頭來冒冒然說道：

「孫岳是個共產黨！我們大家都要小心他。」

我知道這般小子的居心，在他們的心意，凡是誠意歡迎中山先生北來主持國政的人，都當加上一個共產黨的頭銜。我就滑稽地說道：

「你把孫二哥看得太高了，他每天要吸二兩大煙呢？有這樣的共產黨麼？」

這話說完，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地隨便談笑起來，每人都帶着一副副面具，聽不見半句真話。大家這樣糊扯了一頓，便算結束了一場會議。其時外間關於我的謠言很多，不是說被刺，便是說被扣。我爲了消釋這些無聊的揣測，不多幾天便回北平去了。

在天津，最使人氣憤的一件事，便是王承斌的被追出走。首都革命的計劃，王本可算是一個預謀者，如今張作霖竟違背不進兵關內的諾言，把王用武力驅走。豈非是十足的馬賊行爲！張作霖那次到天津住在曹家花園，門口的崗兵，都和義和團似的拿着長槍大刀，槍長二丈，刀長一丈，一對對十數對兩邊站立，排成行列。那種氣派真叫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如此人物怎樣能與共談國事！

我回到北京不久，段祺瑞張作霖都先後到了北京。段在北京即對國民軍崗兵拒而不用，另以唐志道所部二千人爲其衛戍。這種舉措，也使我極不明白。段就了臨時執政，黃膺白先生即辭掉了總理之任（執政就職之日，他應當將黃高高捧出，然而相反，竟使黃立於第二行人衆中，人人見之爲之不平）。於是一批批安福系餘孽都連翩入京。瞪着眼珠，急於想在新政權裏分些贓品。局勢急轉直下，演變至此，糊糊塗塗混下去，豈不是爲強盜馬賊當夥計？如此一想，不由的我对新局而萬分消極。

這時，胡笠僧在彰德府証和李倬章打得激烈，胡左一電右一電的催我撥調援兵，與岳維峻鄧寶珊兩位商量，他們都不肯去。一日番鄧二位跑來見我。我說：

「笠僧請兵甚急，你們兩位爲什麼不去應援！」

藹答道：「我們不去！那方面的事小，我們此時有更大的責任！」



「什麼更大的事？」

「處置張作霖父子是件大事！今天晚間我們就預備暴動，把他父子倆捉住槍決。以快人心，而截禍亂！日本人已替我們探聽清楚，他們這回入京，帶的兵不多，只要總司令允許，我們馬上就去動手。」

我聽了頗爲吃驚，當即和他們說：

「這事無論如何不能實行！就算你們能把他倆捕獲，京外奉軍必然激起異動，演成混戰之局，那時不等兩方分出勝負，日本就會趁機佔東三省。日本人幫忙，決不會懷好意的。」

我這樣的說了，他們仍然固執地堅持原來主張（以爲奉軍多爲合之衆，若收拾了張氏父子，則奉軍將領之識大體者必然願隨我們走云云），直到深夜三點多鐘，才慢慢把他們說服。次日即接洽專人請他們準備開赴河南，去應援胡笠僧去了。

我既已決心擺脫當前烏烟瘴氣的政局，便對張作霖說明我精神不好，要上山休養的意思。張作霖跳起來說：

「你可不能走！我若讓你走了，我就是混賬王八旦！」

他雖然這樣表示，但我說什麼也不願幹下去了。回營後即召集將領講話，說明我此次不得不入山休養的衷曲，並囑咐他們務要服從中山先生的主張，貫徹所志，繼續爲國家效力。是日張作

霖時來訪我；我於回看了他之後，便往京西天台山中去了。

此時我滿腦子裏裝着一套「謙謙君子」的道理，覺得高揖羣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風度。同時胡孫等雖與我志同道合，莫逆於心，然政治的認識亦殊不充分。其他朋友如徐季龍、黃膺白、劉允丞、王鳳齋、焦易堂、李石會、王承斌等諸先生，雖過從甚密，亦畢竟未至無話不說的程度。故自己只有好的理想，而未能根據現實環境，拿出良好辦法。至今思之，猶覺當時才能不夠，有負國人期望之殷，深為愧恨！

## 第三十二章 首都革命以後

首都革命最初的目的，原是要掃除軍閥勢力，打倒賄選政府，擁護中山先生主義，實現和平統一的主張。但在軍事勝利之中，沒有能夠建立革命政府，結果僅是給予當時最兇惡的軍閥曹錕吳佩孚一個致命的打擊，或能減去異日革命上不少的阻力。除此而外，這次革命的意義已在奉系軍閥與皖系政客爲私人勢利的合作之下斷送了！

段祺瑞這回初到北京執政，誰都希望他有一番新的覺悟，能把他自己身上的大瘡和蝨子剷盡除絕，使國家人民少受些弊害。誰知上台不久，就證實了：不但舊有的蝨子未除，反倒加了臭蟲；不但大瘡未割，反倒加了疥癬。官僚買辦，二花廠，三花廠，等等全都來了，成天搶官，搶權，分贓打啖，鬧得昏天黑地。同時他又宣言「外崇國信」，承認金佛郎案，維護帝國主義的特權，以對中山先生的取消不平等條約相對抗；一面召集善後會議，俾軍閥官僚政客買辦分贓掘利，以與中山先生的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相對抗。種種乖謬措施，總要使中山先生縱肯毅然來到北方，亦無法進行其爲國爲民的革命方策。

我看看前途一團漆黑，沒半點光明的氣象，遂決定趨入天台山，以示消極。此地係在民國六年

討閱復辟之前我會住過，前面已略略提及。天台山不甚高，路是緩緩地上去，雖不闊，亦不陡，走着不感吃力；東北上直通到香山。廟中屋子共有三四十間，所有門窗都以珠紅油漆，很是美觀。和尚有三個，一個老和尚，一個大和尚，一個小和尚。老和尚規矩甚嚴，起居功課都有定時，開時不許下山，兩個徒弟都很受約束。廟中工人，都是老和尚「娘家」的親戚，還都樸實勤勞。三位和尚，都是我的熟人，相見很是歡洽。那天在後面山上，看見石工鑿石，我問他什麼，老和尚卻不肯說。後來大和尚告訴我，說是老和尚做的墳墓。我覺得好笑，心想這和尚真是自私，又想成佛做羅漢，又要留戀塵體。廟後有一個老爺廟，或稱老佛爺廟，殿門關着。叫他打開看看，回說每年三月三日方開，平時不開，這麼一說，引起我的好奇，越要打開看個究竟。後來開了，裏面什麼也沒有，只有個乾巴肉體，頭歪歪的望着北京。問這是什麼人？和尚附在我耳邊低聲說，「這是順治皇帝」。我笑了一下，明明又是和尚搗鬼，不知從那裏打聽得順治有世宗之說，就造出謠言，愚弄百姓。山後就是遊街塔，居民極苦，住屋破敗不堪。那時天氣已經很冷，家家都無棉襖，只拾柴火，把炕燒熱睡覺。找他們談話，無不愁眉苦臉，唉聲嘆氣，不到鄉間看看，百姓的困苦，真想像不出來的。

我在天台山住着，原是不打算見客的。但每天來訪的人陸續不斷，我也不能拒絕。其中奉系皖系以及國民黨的朋友都有。他們懷着不同的意見，同我提出不同的主張，都是勸我不要消極。

鄧寶珊、汪兆銘、和吳稚暉先生等來訪談的次數最多。他們來時，我總在帶着兵們在山上開墾，一段段都開成二丈長三丈闊的田地，極是肥美。他們見我幹這個，引爲希奇之事。我說：「這樣好的地，和狗却棄而不用，真是太可惜了。我現在開出來，給他們看看。」黃膺白先生也常常來。我和他談，我想到外國去走一走，考察考察，長些見識，回來說話做事，也可有個準兒。黃先生却不贊成，說如今不是時候，其他國民黨朋友都不同意。部屬也常來相見，鹿瑞伯每來請示今後的做法，我總是告訴他說：

「你們第一要聽中山先生的招呼，其次要和李協和先生多多見面談話，還有胡笠儉孫禹行諸位，必須常通聲氣，結合在一起；這三件是大事，其餘你們商量着辦就是。」

我每天按時讀書，讀的是書經詩經，以及羣書諸要一類，嚴格的說多是一些廢書，不切合時代和社會的要求。

後來段祺瑞派人來告訴我，說我們的部隊都已另新編制好，任我爲西北邊防督辦，請我到張家口去。本來我爲陸軍檢閱使即兼有西北邊防督辦的這個名義，現在只留下這個。陸軍檢閱使的名義便無形中取消了，綏綏一帶雖是苦寒之地，但那時我却極樂意去。第一中山先生曾派汪兆銘和吳稚暉孫哲生等先生屢次到山上勸我不要消極；其他各方也函電交促，勸我出山；而我出國遊歷的計劃亦爲各方勸阻不能實現。第二我厭惡這個政治中心——烏烟瘴氣的北京，極想遠遠的離

間，效法張晉侯避居富寧的辦法，到那地僻人稀的區域裏，十則可以藏拙，二則或者更適宜於我的避免參加內戰的心願。主意既定，即離開天台山。這時候天氣很冷，大約是民國十四年的春初吧。

下山以後，先料理軍隊的事。那時我們國民軍第一軍共改編爲六師：李鳴鐘一師，鹿鍾麟一師，劉郁芬一師，張之江一師，朱哲元一師，鄭金聲一師。這原先是五個旅，擴充成師；外加鄭金聲一師。我的治軍理想，原是重質不重量，貴精不貴多。但西北幅員太廣，不有足夠的兵額，即難於分配，如甘肅，必得有一師方可維持無虞；察哈爾綏遠亦各需一師，鹿鍾麟時爲北京衛戍司令，非有一師之衆不能勝任；而南苑駐防的隊伍亦不容太少。六師之外，右敬亭石友三各編爲一混成旅，外加砲兵兩旅，交通隊一團。人數約在十五萬左右。人數既已擴充，長官士兵的教育不能不加緊努力。特組織了軍官教導團，交通教導團，騎兵教導團，砲兵教導團，鐵甲車團等教育機構。更於南苑設訓練處，內分步騎砲工輜重等科，任熊斌爲總監，劉驥爲參謀長，曹浩森爲副參謀長，鈕錫生爲總參議，分負考察監督之責。

這些編制上的更張，當然由陸軍部決定，那時陸軍部部長吳子堂，屬於奉系的人物。吳子堂一心要和我們的國民軍作對，在陸軍部會議的第二天，他即提議取消國民軍的名稱。那次是段先生主席，劉定五先生爲國民軍代表，劉坐段右，吳坐段左。吳最先起立發言，說同爲國家軍隊，

不當另立名目，國民黨名義現還聽其留着，究竟有何用處？……說了許多拐彎話。劉定五先生聽不入耳，當即予以駁斥。劉說：

「今天多麼重要的會議，有許多經綸大事須得商決，爲什麼上來就要扯個名義不名義的題目和國民黨搗鬼？國民黨的名義自有其光榮的意義，應當尊重保留的。沒有國民黨，這回那來的段執政？是誰打倒曹吳的？是誰驅走溥清皇帝的？若必取有子不要母的辦法，國家的紀律如何伸張？你們上次搗鬼已經把段先生搗的要不的，現在你還要搗鬼，你和段先生究竟有什麼仇恨！」於是指罵他不像一個部長，簡直是奉軍的馬弁，吵的個不亦樂乎。段先生見情形不佳，就把定五先生拉到內室裏去喝茶，說：「今天是第一次會議，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我們還是喝茶好。」第一天會議，即如此結束。但國民黨的名義畢竟還是取消了。自此改編如前，統稱爲西北軍。這次吳子堂一上台就拿國民黨開刀，實種下了後來的惡根。

我既爲西北邊防督辦，以張之江爲察哈爾都統，李鳴鑾爲綏遠都統。不久，又發表我兼任甘肅督辦，我乃派劉郁芬代理之；又派蔣鴻遇爲肅辦，開駐寧夏，並保舉薛篤弼爲甘肅省長。任那鑑三爲綏遠民政廳長。

我到了張家口，第一件積極辦理的事情，便是修築由包頭到寧夏的汽車路。這條路沿着黃河，極是荒僻難走，土匪隨處出沒。沿路有一種雉鷄草，叢生，非常高大，都是幾千年來任其留

着，從來沒有免除過。自石嘴子到流沙河一段，尤其艱難。當時派石友三帶着一旅人任其事，費了極大勁，吃了極大的苦，直鬧了四五個月才算竣工。與此同時，我又呈請任命王鏡瑀先生爲包寧鐵路督辦，打算把包寧間的鐵路也修築起來，王鐵老的爲人，清廉不苟，督辦此事，最爲合宜。可是王過去曾參過交通部一案，因此交通部面對之極表恭敬，稱爲深慶得人，而實際則很之刺骨，處處掣肘，什麼也不叫辦，什麼也辦不動。鐵瑀先生和我嘆息道：「你派我做這個事，恰好派錯了人了。」這一條重要的鐵路，竟因此沒有動工。我老以爲個人的事和國家的事無關，然而結果如此，可見我知道的太少了。人心真是不可解。中國的政事，恐怕大半壞在這個人事的關係上。應當是對事不對人；而實際則恰好相反，偏是對人不對事。這種病根隨處可見。到而今也不能免。

張之江爲察哈爾都統，對於地方政治，很肯努力。在處境艱難，部隊那樣困苦的時候，他還節省出一筆款項來，在上堡地方建築一座鐵橋，原先那是一座木橋，夏季水漲，車馬行人往往出險，鐵橋築成，他險爲夷，旅行大感方便，因此地方上很是感激。

我在張家口住着，曾修築一個新村，由馮治安張自忠兩人負責，帶着他們的隊伍修築的。此外又蓋好了一個誠源旅舍，因爲這裏來往的旅客很多，平時他們都住俄國飯店，價錢極是昂貴，我爲減輕他們的消耗，特築這個旅舍爲他們食宿之地。



這時各方面的朋友都三三五五的來看我，大約國民黨朋友來的最多，許多闊別多年的，許多聞名而未見過的，這時都得到會晤的機會。那時所謂新製社會科學，只在萌芽；三民主義在舊政治的壓迫之下，也未普遍的公開於世，因此社會人民對於新興社會政治的知識，都很簡陋。我那時讀書，尚未脫傳統的窠臼，在此方面自然也不能例外。尤其許多術語和名詞，我簡直弄不清楚它的概念；而中國舊有的政治哲學，深入我的腦筋，使我對於黨派的組織不免懷着成見。記得有一次于右任先生來看我，他和我詳談政黨政治的道理，我們已是無話不談的朋友，故我不揣鄙陋，老實說出我的意見。我說：『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我是竭誠敬佩的，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我也是擁護的。但是國家政治，總還是選賢與能的好，若定要結黨成派，在我看來，總不免有私而不公的弊病。我現在還不能贊同。』于先生不和我駁辯，只笑着說：『請你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請你入黨。』這以前，在天台山時，有一次汪兆銘和吳稚暉先生來看我，談起打倒帝國主義的名詞，我也提出了質問，我說：『常聽到說打倒帝國主義，我總覺得納悶。人家欺凌吾國，我們反抗它，這是應當的；但是何必還要進而替人家去打倒皇帝呢？』我那時的知識有多高？連帝國主義名詞的概念尚不懂得！當時吳汪二位都對我掩口而笑，現在想來，我自己也覺得好笑。

鮑羅廷和加拉罕也先後由人介紹相識，常來找我說話。每次都由陳友仁先生擔任翻譯。我們所談的，主要是關於革命，宗教，以及取消不平等條約等等一類問題。我和他們說，中國的目的

只是爭取自由平等，誰能贊助我們達到這個目的，誰就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接觸，越來越親密，越談越接近，於是我的思想和許多政治方面的見解也慢慢起了變化。因此我請他們二位介紹，從蘇聯請來三四十位顧問，步騎砲工等各項專門人材皆備，分在我們訓練班中任教。兩方均無條件，只爲幫助我們完成國民革命。他們來後，幾時覺得不適宜，卽幾時辭去。隨來脫去，沒有拘束。有位總顧問，中國名字叫倣江，曾參加歐戰。同時又在我們幹部中選派了數十個學生赴俄留學，此時鮑加二位與中山先生也來往頗密，這自然是因為中山先生主張並倡導三大政策的緣故。

這時由北京傳來的消息，說中山先生的胃病漸漸的加重了。當時我離開北京到張家口時是通電辭職的，因此不便去拜看他，只請李德全帶着我的親筆信約汪兆銘太太陳璧君去謁見。這時中山先生送給我六千本三民主義，一千本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我便全數分發給各部隊，令官兵列爲正課，悉心研讀。在教導團中，我和李德全分任三民主義一課，按時讀給學生們聽，使彼此都能獲益。此外，我也經常規定時間召集重要的官長在一起，一段一段的輪流摸著讀。對中山先生學說和主義，我們才第一次有了更深一層的有系統的全部認識和了解。大家對整個政治思想才開始有了體系。當時我們全體官兵那一種歡迎鼓舞，興奮難制的情形，實非筆墨所可形容的。此時我自承已爲一黨外的中山主義的信徒，全體官兵亦莫不如此。不久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噩耗

傳來，官兵們無不震痛。國民黨全體皆纏黑布，持服七日，以志哀悼。自官長以至日兵伙伕，皆無例外，又通令各部隊，以三民主義爲官兵必修之課，以加緊收灌輸之效。北平方面，我致電鹿鍾麟，說國民黨部隊，卽是中山先生的部隊，云云，故關於喪事一切保護守衛之事，皆鹿負責率部照料。有一次，孫哲生先生同好些其他的國民黨朋友來到張家口，我特設宴歡迎他們。在致詞的時候，一說到中山先生的死，我不禁一陣心痛，熱淚簌簌的落下。過後朋友都很詫異的說：

「馮先生和中山先生並未見過面，何以情感如此深厚？」

的確我景仰中山先生幾已二十年，信使往還者已多年，但我一直沒有得着見他面的機會。這正是我私心中引憾的一點。可是我從敬仰中對他所生的一種敬愛之情，決不因此而稍有不同。我總覺得自己在精神上和他長在一起，從他跟前我得到啓示與鼓勵，使我循走大路，不致墮越。最使我感激的，是在當時淫佚驕奢殃民禍國的北洋軍閥集團中，他竟能深刻的認識了堅強挺立的我。累次派人來，送信來，予我以種種的指導和鼓勵。尤其一次專派孔庸之先生送給我手寫的建國大綱，徵求我的同意。並叫我加以增減，這種知遇之感與特別瞧得起之情，是叫我無法不深深感激，而永遠不能忘記的。現在一代的偉人死了，特別認識我知道我的人死了，我怎能不傷痛，不流淚呢？

張家口接近外蒙，相距不遠。外蒙國民黨也常派人到張家口來看我。他們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委員長丹巴多爾基先生和他們的陸軍部長都會來我處訪談過。有一次，我和他們說，外蒙古長久獨立着，和中國不生關係，恐怕總是不好的。爲整個中華民族計。爲蒙族自身計，我以為應該早日取消獨立，歸復祖國，他們反問我道：

「你對於目前中國政府的一切措施，是不是都能滿意呢？」

我說：「那當然不滿意！」

「接着！」他們笑着說了「你自己看着就不滿意，我們怎麼願意擁護呢？若是中央政府真有好的氣象，我們自然自動的取消獨立。我們取消獨立的條件是很簡單的，就是要求中央政府真做到清廉，真正實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信約！」

這以前在南苑的時候，有一次我招待外蒙代表巴丹增先生，他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

這時班禪到了北京，內外蒙古的人民有很多往來北京去參見他，三百五百也有。一千兩千也有，每一批經過張家口，我都預備車輛護送。蒙古的王公們依舊保持着滿清時代的體制，隨侍的奴僕受着非人的壓迫和虐待。和清末時如那次我在朝陽所見的情形沒有兩樣。我看了這種情形，心裏非常難過。覺得是中華民國領域內的一個怪現象，正像溥儀前在北京自坐小朝廷一樣。當時曾向段執政拍去一通長電建議取消王公制度，伸張人權平等的原則。但是這與他本人的權利毫無關係，自然未蒙採納。

自首都革命而後強頑的直系軍閥勢力被摧毀，同時南方的革命浪潮一天天洶湧澎湃起來了，全國——尤其覺醒了的中下層社會，無形在久壓之下慢慢抬起頭來。一時民衆運動空前的活躍，全國民氣空前的高漲。到這年——民國十四年，劃時代的五卅慘案終於在上海爆發了。這回帝國主義者亦探探地顯露了他們兇惡猙獰的面目，把我國的工人學生羣衆殘酷的加以屠殺。這暴行，引起了全國民衆不可遏制的憤怒，促使全國民衆一致的覺醒，工人學生罷工罷課，各業商人也一律實行罷市，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全國各地到處普遍地激起了反帝的高潮。我對這次事件的反應，曾有一通電致全世界基督教徒，籲請他們主持正義，予中國民衆以援助，因為我知道大多數教育裏純正的英美朋友都是同情我們的；一面在張家口召開反帝示威的民衆大會，以與全國的反帝運動相應和。同時更成立了幹部學校，在北京創辦了全是學校，以收容這些因參加此次運動而被學校（尤其基督教會學校）開除的大中學學生（這些青年學生，後來實送到英美德俄各國留學的很多；也有送入陸大的，大半都有很好的造詣，成爲國家有用之材）。我的這些舉動與當時壓迫民衆甘爲帝國主義者鷹犬的軍閥們的行動成爲明顯的對照。帝國主義者因此對於張家口的舉動十分注意，對我尤極仇視，竭力造作種種謠言之播撒離間，企圖予我們以打擊。爲要使社會不致受愚，並宣傳革命的理論，我特敦請陳友仁先生在北京辦了一個民報，中英文都有，主張與態度，完全以中山先生的遺教爲依據，以達成反帝的任務，此舉即是當時與國民黨相結合的一

備步驟。

帝國主義者對於我的攻擊造謠，可謂無奇不有。比如有個名叫布施勝治的日本小子，這時寫了一本書，說我已與蘇俄訂立密約。這密約多少章多少節，若干條若干款。都寫的清清楚楚，簡直是千真萬確，實有其事。這個謠言竟使國內國外很起了一番波動。後來民國十七年我到了南京，這小子跑來見我。我問他說：

「那時你對我捏造那謠言，今天還有臉來見我嗎？」

「請你原諒，是人家以兩萬元代價僱我寫的，看在金錢面上，我不能不寫。」說着，他尙對我深深的鞠躬。

「你真是把讀書人的臉丟完了！」我恨恨的說。

他却微笑着，滿不在乎，完全是那種無恐的浪人神氣。我本想多教訓他幾句，又覺得大可不必了。

我除公開的反對帝國主義者的行為而外，還有幾件直接打擊外人在華利益的事情，也是造成他們仇視我的原因。有一位英國人，在察綏一帶創辦一個合記公司，專門經營牧畜，養的羊最多，約有二十萬隻，都很高大雄壯，牧羊者全是僱用的中國人，每人領牧二百頭，六人設一個頭目，六個頭目以上再設個大頭目。使用中國人的勞力，佔有中國人的土地，吃着中國人的水草，

却大賺其中國人的錢。這種不法的舉動，究竟有什麼根據？究竟什麼條約上給予他這種特權？但多年以來，却無人過問。以往中國官廳不是不知，而是懼於外人之勢，不敢干涉。我到張家口後，一直不知道有此一事。後來他公司裏有一華籍職員，向居重要位置，但為人很有血性和良心，因為五卅事起，激於義憤，乃自動的來我處，將此事秘密告發。我派人調查屬實，即毅然把他們的羊全部沒收。此事大出該公司主人的意外，直控告到外交部。但並無任何條約的根據，他們的使館也沒話可說，只好自認晦氣。這回所沒收的羊，肉皆給士兵們吃了，皮則全數製為軍衣。

京綏路上改革貨運辦法，也是得罪外人的一件事。原先京綏路上貨運的慣例，凡是外國商人運貨，只須拿着貨運憑單，向稅關納稅一次，即直達目的地，不用再納；華商則遇關必納，層出不窮，手續極為繁雜。這是一點。再則外商仗着洋威，不知憑什麼就獲得貨運的優先權，有貨儘先運出；華商的貨物却在站上堆積如山，許多日子運不出去，若一旦被雨，便不免霉爛毀壞，損失不貲。我查知了這些情由，深覺不平，即找路局負責者，與之另定規例，一反其道，盡先輸運中國人的貨物，把外商之貨屈居其次。結果是翻了過來；華商的貨物先一車一車的運走，而外國人的貨却滯阻不能暢運了。我以為此事辦的最為合理。因為一則京綏路是中國的鐵路，中國人自當享有優先權；二則中國國民經濟，處處受外商壓迫，不能抬頭，國家理當盡力扶助提倡，以挽權

利，而塞漏卮。外國商人對於此事如何恨我，我也不能管他了。

有一次，有個日本武官要到賜兒山遊歷，託人徵求我的同意。我的答覆是准許他去。他從賜兒山遊歷回來，又來見我。我問他說：

「你這次遊歷，有什麼感想沒有？」

不料他很輕薄的回答道：「我見到賜兒山一帶的情形和幾十年前的高麗差不多，因為那時高麗的山多半沒有樹，這賜兒山一帶，也是沒有樹！」

我聽他這話，是有意要在我面上侮辱我國，居心可惡，不能容忍，我便說：

「最近我有幾個朋友從日本回來，和我談起來，總說日本簡直是個妓女國家。我倒不很相信。那幾個朋友之中，有的寓所和你家是街坊，並且還和你家中人熟識，他也見過你母親，說你母親長的很好看，和韓姐兒差不多！」我怕他不懂我的意思。又補上說：「你母親現在和妓女完全一樣，雖然我知道她不是！」

我說了這幾句話，翻譯却不肯照譯，說：「這不得罪人嗎？」我說：「他有意侮辱我們國家，我們就怕得罪了他嗎？何況我們不是爲自己得罪他，我們是爲國家得罪他，我們也不是願意得罪他，實在不如此，這卽自己良心難安。」

終於逼着翻譯照着譯了。那武官說：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你才說的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因為我說賜兒山和高麗一樣呢？」

「是不是，你自己想一想好了。」

結果他很不痛快的走了。後來許多人來勸我，說我不當這樣結怨於日本人。還有一位駐察哈爾外交特派員包士傑特別爲此事來找我辯論，說我對日人此語未免太過。我說：「你沒有深思一番，若會深思，必嫌我的話還說的不夠。三國上述諸葛亮舌戰羣儒，薛琮謂劉玄德乃織蓆販履之徒，出身微賤，而孟德爲曹相之後，索出貴冑云云，諸葛亮聞而大怒，立刻起而以牙還牙。薛琮罵劉備，諸葛亮爲何生氣？金聖嘆批道：「對奴罵主。」辱其所事之主，尙且不許；人家侮辱咱們國家，咱們若是甘而受之，對得起咱們的國家人民麼？你不懂得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禮尚往來的道理，如何辦得外交？」這樣不客氣的說了一頓，當時唐悅良亦在座。

還有位日本駐張家口的領事，也是一個狂妄荒誕的傢伙。有一天唐悅良和包士傑兩人滿頭是汗。氣喘喘的跑來見我。我以爲出了什麼大事，問他們爲什麼這樣的慌忙。他倆說：

「剛才我們同日本領事在一塊兒吃飯，他喝醉了酒，發起脾氣來，把我們辱罵一頓，罵得很是不堪。特意跑來向督辦報告。」

我說：「你們說的這話真是特別的狠！他只一個人，你們是兩個人，罵也沒有你們嘮多，打也沒有你們手多。若出了事，我替你們担當。爲什麼白白的受他一場罵，喪自己的顏面，辱國家體統呢？現在你們要趕快回去，還罵他一頓回來，否則你們沒臉子來見我！」

他二人聽我如此說，果然回轉去，罵了那荒唐領事一頓，那領事也只好瞪着眼，沒有辦法。外交官代表國家人民，若是不知自尊自重，隨便喪禮失言，如何要的？日本政府選派武官外交官到中國，都是這一派無品無學的人物，想見他們國家的政治文化並不見得怎樣高明！

這位日本領事因爲駐在張家口，和我們少不得常有來往。他使喚他女人如畜牲，常和我說他的女人很會唱歌，叫他女人抱了琴出來，唱歌給我們聽。每有客至，他女人亦必跪地相迎，那種卑賤神態，完全和奴隸一樣，其餘人看着難過。「爹千斤，媽二兩，日本女子受男子這樣的壓迫與蹂躪，我看他們文化比起中國來，差的太遠了。這簡直是野蠻國家的現象，我常常可憐日本女子，想着他們何時才能脫離男子的壓迫，跳出奴隸的地位，享受人的權利呢？」

還有一件事，也使我認識了帝國主義說教者的嘴臉。使我知道他們之中有些對於弱小民族的同情竟然是假的，當慘劇的五卅慘案發生後，我對於全世界基督教徒主持正義的呼籲，既如石沉大海，沒有引起什麼有力的反響，後來有一位坎拿大人名叫古約翰的來看我。他是我的多年老朋友，在常德時就已相識，每年都要見面幾次。那次我又提到五卅慘案的事，我問他說：「您說英

國人在中國這種行爲到底對是不對？」

「那些亂黨胡鬧，怎麼不應該開槍打？」他毫不遲疑的這樣回答。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按住了激憤，向他說道：

「古先生你再說一次！我要求你不要說英國人的話，我也不說中國人的話，你我都是上帝的兒子，今天咱們說一句上帝兒子的話；英國巡捕拿着槍向中國徒手工人學生胡亂射擊，這種行爲到底對是不對？你憑着良心再回答我一次！」

他說：「他們都是亂黨，開槍是對的！」

我就站起來，走到他跟前，我說：「我和你相識了這些年我可錯認了你！我倒要看看你的心肝，是不是生錯在肋膊窩？」說着，我就拉開他的胸口，在上面推了幾推：「我要把你的良心推到中間來，你再說一次！」於是我就沉下臉，指着他的鼻子大罵道：「你這是昧着良心說話！我被你騙了，你是冒充教徒！你其實倒是帝國主義者最兇惡的走狗！」從這次以後我再也不願意見他。

帝國主義者的兇狠殘惡，泯滅天良是一回事，但我們固步自封，自甘落後，不能日新又新的往前進取，求發展，也是不能否認的，在張家口住着一個名叫梅瀨生的德國人，他原是汽車司機的出身，因會做生意，賺了錢，娶了一個中國女子爲妻，生了五個孩子。他用他女人名字，在張

家口置了產業，大規模的經營園藝。有一天，被邀往他家去參觀，使我大開眼界。常聽人說京北如張家口一帶，因氣候苦寒，種菜種瓜都不能肥大。這話聽來似乎有理，所以我頗不置疑，但我這次在梅順生家裏所見的情形，却使我大為驚異。他種的菜和瓜，不但並不瘦小，而且反比任何地方的都格外的肥大。有一種西葫蘆每個重有七八十斤，大如桌子，菜也出色的肥嫩，有一種龍鬚菜，豐厚繁盛，至為可愛，種有十幾架葡萄，搭的那架，橫豎成行，宛如工筆畫一般，那肥厚的葉子都向着一邊，整整齊齊，絲毫不亂，好像經過細心排列的一樣。果子晶瑩剔透，纍纍成串的掛着，真是紙紮的也不能如此美觀。我看了這些以後，覺得很有感觸，這位梅順生先生，和我們中國人住在同一的地方，享有同一的氣候，他不為成見所囿，努力與自然鬥爭，結果種出的菜蔬和瓜果如此肥美；我們中國人却因循苟且，不能進取，反造出氣候不宜的藉口，以勉強自慰（素來聽說張家口一帶，初九天氣即下雪深達三四尺，使人以為寒冷不可當，實則張北下雪平常不過尺許深，氣候也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嚴寒）：兩兩比照起來，我們這樣不爭氣的習性，如何對得起列祖列宗！如何對得起天地造物！見了梅順生的成績，我們應該如何警惕，努力，痛自鑒策，以求迎頭趕上先前國家的文明！梅先生的家庭情形，也是很值得我們自省的。比如他的孩子們，五歲的有五歲的桌子椅子，七歲的有七歲的桌子椅子，玩具以及一切用物，均視其年齡而有不同，又聘請了五六位先生，分別教授英文、德文、法文、和各種科學，一個開汽車出身的人，

能如此努力有恆，如此注重兒童教育，我們還不應該慚愧麼？外國人並不是四個鼻子八隻眼睛，他們為什麼能作到如此地步？還不是肯實幹，肯研究，有恆心不懈意而已。後來這位梅先生患了一種「沙麻症」即是尿石，回到德國醫治，割去了一個腰子。癒復之後，又來中國，二十二年我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的時候，他還送我開了花的鐵樹；我上次送他的蘋果樹苗，此時已經結了果了。過了一年，他的病復發，不及醫治而死。他的太太原在領事館充任書記，在梅赴德治病時患丹毒而死。現今他五個孩子只有兩個在中國。

在張家口住久了，想到各處走走，一則問問民間疾苦，二則看看駐軍，考察各地的政治。

那位德國園藝家梅順生送我三個七八十斤的大瓜，都如桌子一般大，這回出發，我即把瓜帶着，每次對民衆講話，我總要提到這回事，藉以鼓吹努力生產，注意科學的道理，我說：「你們看看外國人在這裏出這樣的大瓜，我們自己種的爲什麼那樣瘦小可憐？可見是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就是我們自己不知努力，不知研究辦法，以致凡事都落人後。」那些人民看見大瓜，都極驚奇，有的還不大相信，要走來用手摸摸，看個明白，有這個實在東西擺在眼前，比空口說白話有力的多了，所至之地，民衆很受刺激。

到平地泉，正是夏盡秋初之時，天氣漸冷，柳葉兒半青半黃。我曾作詩道：「葉兒青，葉兒黃，同胞餓的肚子慌；葉兒黃，葉兒青，同胞身上凍的疼」云云。蘇聯的朋友覺得有些意思，特

意把他譯成俄文，寄到俄文報紙上發表出來。由此檢看部隊。那時騎兵旅長王鎮淮部因為分配馬匹的事，和蘇聯顧問發生意見。因為新買到一批馬，王旅長分配各營；蘇聯顧問過於熱心，對其分配，出而干涉。王很不樂意，報告於我，我說：「蘇聯顧問只能負責訓練方面；這些行政的事，他們不應過問的！」於是總顧問任江先生大不高興，藉故說歐戰時曾被毒氣薰壞，體力不濟，要請假回國修養。任江走後，換來一個亞里山大林為總顧問；其他顧問之中亦有更動。

到了綏遠，在省城住了數日，把應有的任務料理完畢，有一次召集綏遠督統公署的人員閒談，問到此間近百年來的好文官好武官，壞文官壞武官的姓名及政績；又問及本地的古蹟，請他們詳細開一單子給我。記得他們所開古蹟之中有「昭君墓」「康熙甲」二件，昭君墓就是杜甫詩所謂：「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的那個青塚，至於康熙甲的故事，據云是康熙年間，土默特作亂，康熙御駕親征到此，土默特乘其不意，出兵奇襲；康熙皇帝本沒有防備，慌的未及穿上盔甲，便倉皇退走，後來土默特之亂雖平，但這副盔甲始終留在此地，沒曾攜回，到後來便成爲一個古蹟。此次還把當年王海門大哥，在此間作戰的情形，詳加詢問，也得了一些材料，又將大瓜演說幾次，這時石敬亭一族人辦有一個苗圃，很有成績，所種柳樹，尤爲講究。從綏遠即到包頭，包頭濱着黃河，土地肥美，農產豐富，從黃河下來的貨物，皆由此上火車，所以是個很好的地方。如果包寧鐵路修成，能夠直達寧夏，那時益加發達。這地街道古老，買賣殷實，風土

情形還保留着百年前的面目。市上布疋木器都是國貨。有一種羊皮筏子，是件新奇的東西，我從來沒有見過。在此我曾購小輪船試航，黃黃的水，不過二三尺，可是沒法看的清楚，小輪走着走着，就擱了淺，曾試多次，結果還是失敗，又有朋友梁式堂、谷九峯、王鴻一諸位先生等提倡在此開墾，從內地運了許多農民前來。因為此間土地極多，只是缺乏人力，結果倒有相當成績。

包頭那時剛剛設縣，沒有城牆，僅修了一層土圍牆，我在東關外以一千六百元代價買置了一所房子，打算在此長住下去，並籌劃建築營房和墾植種樹的事。因為這時我立下決心，無論如何是不參加內戰的了。避免內戰，力主和平統一，是我歷年來持政的根本原則，這次我毅然擺脫北京的政治，退而就任西北邊防督辦；又從張家口避居包頭，埋頭於墾植整訓之事，都為的要貫徹這一個初衷，這是非常明顯的，但是單憑個人的意志，畢竟不能憑空決定行動；無如整個局面攪演變化，一步步緊逼而來，使我們的初志終難貫徹，到頭我們還是被迫着捲入了漩渦。

首都革命以後，吳佩孚狼狽逃竄；到了漢口看了看，覺得各方面都已不能有什麼辦法，乃不得不不到岳州，蟄居不出。後來他的舊部關玉琨、張治公等，於倒戈之後，殘部歸胡笠僧收編。但河南的局面，仍是不能穩定。此時關張等重整旗鼓，盤據洛陽，受了劉鎮華唆使，共同向胡笠僧進攻。一場惡戰的結果，關玉琨劉鎮華都相繼做了國民二三軍的敗兵。劉鎮華所保舉的陝督吳新田，不久也為國民三軍驅走，孫二哥便繼任為陝西督辦，這次國民二三軍雖然取得了豫陝二省為

其根據地，可是笠僧却於這年（民國十四年四月十日）患了疔毒，不小心，竟致中毒而死，笠僧是個好學不倦，俠義精誠，處處以國家爲前提，而富有革命性的人物。他的不幸死去，於國家實是莫大的損失。國民軍全體官兵掛孝三日，以誌哀悼。笠僧死後，河南督辦由岳西峯代理。岳西峯爲人青年有志，但當了督軍之後却一天天矯傲懶惰起來，政事固不聞問，對於軍隊訓練之事，他一概也不去注意。有一次于右任先生自告奮勇，和我說，他願意到河南省去看看岳西峯，糾正糾正他的錯誤。我自然希望他有一行。及至于右任先生到了河南，剴切的勸勉了一番；岳西峯很表示振作的決心，興奮的說道：「從明天起我一定積極訓練隊伍。」于先生見他如此勇於改過，十分的高興，問他道：「明天打算幾點鐘去看隊伍呢？」

「早晨八點！」這是頭一天晚間約定的。可是到了第二天，右任先生大早就到操場等他，一直等到十一點鐘，還不見他的影子，派人去探問，他還沒有起床，右任先生乃大大失望而回。只此一點，便可看出笠僧死後的國民二軍，是沒有多大前途的了。

此時奉張違約入關，肆無忌憚的擄奪地盤，他既使李景林張宗昌分督冀魯，又沿着津浦路南下，伸張其勢力於安徽，且有直取廣東之意；這時並派人來找我，說我們國民軍可以河南河北山東爲根據地，而伸張勢力於廣西。我回說：「國事如此，你們還是想着這一套，究竟是什麼居心？這個不但我不幹，並且勸你們趁早也打消這個主意。」他當然不肯聽我的話。



孫傳芳見他貪得無厭，不禁大爲恐怖，即聯絡直系殘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向之猛攻。那時姜榮、馮玉祥、孫剛剛進入蘇皖，尙未立定脚跟，又因其軍紀大壞。百姓視之如虎狼，人人怨怒，終孫傳芳這一打，手足無措，毫無抵抗的退回徐州。孫乃乘勢進逼徐州，奉系的勢力終被驅出蘇皖。於是孫傳芳便以直系新興將領，自命不凡，掛起了蘇浙閩皖贛五省督軍總司令大旗，盤據了長江下游。

孫傳芳進攻奉軍，原曾約好岳西峯一致行動的。據下徐州而後，岳即獨力去攻直東。此時奉軍新敗，岳部南北兩路雖然都順利地取得了預期據點，進迫濟南，可是他的部下陳文釗、田維勤、王文蔚却於此時反戈，使他不得不倉卒撤退，攻魯之功遂此敗於垂成。張宗昌仍然安撫着山東督軍。這倒戈的陳文釗等部本是直系的殘餘，胡笠僧大肚包容，願意將他收編。我當時遂以爲不妥，曾寫給他一封信，懇切的規勸他。但笠僧堅信他自己能夠以至誠相感，可無流弊，終把他們收編下來。其實陳文釗等無信無義，只爲升官發財，若是笠僧不死，或者還可相安無事；他既去世，岳西峯又荒惰不理正事；此次等他攻魯，即被他們掣了後腿，翻了跟頭。蓋因河南四面皆有鐵路，號稱爲四戰之地，事發，即四面受敵，再也無法立足。岳西峯出發攻魯時，我曾以此意剴切告知，令其格外審重；岳竟不以爲意，終於二軍大吃虧苦。

帝國主義者是唯恐中國不亂的，乘着我們國內不能穩定時，竭盡所能，大肆其挑撥離間的技

領。那時奉系軍閥自以爲羽毛豐滿，一意攻城略地，擴張勢力，以遂其不能壓足的野心。日本帝國主義乃從而扶助之，鼓舞之，藉可作起風浪，坐收漁利；不久中國即造成一個混亂的局面。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日本舉行秋操，約請國民軍和東北軍前去參觀，我們國民軍選派軍官七八人。以韓復榘爲領袖，東北軍方面領隊者則爲郭松齡氏。兩方面人員到了東京，同住在一處。却說這位郭松齡雖然身奉系，爲人却極是忠正而有血性，目睹國內情狀，國際處境，對於張作霖驕橫恣縱，殃民禍國的行爲，久懷不滿之心。一天郭松齡復榘密談，說有一件希奇特別的事，不知可不可以相告。原來這次他被奉派到日本之後，日本參謀本部就有一位重要職員跑來訪問，問他這次來日本是否還兼有代表張作霖與日簽定密約的任務，他茫然不知所謂。那位重要的職員也就起趨的走了。但郭却把此事放心不下，百般探聽，才知道最近奉方擬以承認二十一條爲條件，商由日方供給奉軍軍火，進攻國民軍。這個密約已經完全商洽成熟。最近奉方致電日本，說簽字代表已經動身，即日可到東京，正式立約云云。恰巧郭於此時來日參觀秋操，日方即以爲郭是奉張派來的簽字代表。其實簽字代表乃于冲漢，遲到了數日。郭松齡查悉了這件害國殃民的陰謀，一時激於義憤，不可遏制，便毅然把全部密約條文，對韓復榘坦白說出。當時他憤慨的說道：

「國家危殆到今日這個地步，張作霖還不惜爲個人權利，出賣國家。他這種幹法，我無喻如

何也不能苟同的。我是國家的軍人，不是某一個私人時走狗，他若真打國民軍，我就打他。」韓復榘回到包頭，將此事向我報告，請示我的意見。我說：「這事情關係太大，不要輕率的亂做主張，最好請郭先生寫個親筆的什麼東西，派兩個親信的人送來，兩下從長商酌一下，方顯得鄭重其事。」韓復榘到天津不久，郭的參謀長同他的弟弟郭大鳴便來到包頭。他們帶來了郭所擬具的親筆條款，共有四五項，大意是：

一、張作霖勾結日本帝國主義，擅訂禍國條約，以圖進攻國民軍，此事他誓死反對。  
二、奉張進攻國民軍時，他即攻張。他的部隊改用「國民軍第四軍」或「東北國民軍番號」。

三、他願率部出兵，專門開發東北，決不與閻關內之事。

四、河北、熱河、擬請劃歸李景林。

在條文後面，他已經把字簽好了，對於上述條款，我除建議他的部隊改稱「東北國民軍」外，其餘都予以贊成；另外我又寫了「嚴軍紀，愛百姓，就是真同志。」的幾句話，交給他的代表帶回天津去了。

郭松齡的代表剛剛回去，忽然張作霖也派了一位軍長許蘭洲到包頭來看我。這次張派代表來，是因爲楊宇霆、姜登選在蘇皖被孫傳芳打敗，要求我幫助他去打孫傳芳，再不，就幫着去打

湖北。若是我答允，他表示對我便不諒解。我看這種山大王的辦法，實在把戰爭當做兒戲。當時我便寫一封很長的信，對他的要求嚴詞拒絕。讓許蘭洲帶了回去。信中大意是說，你不顧信義，不顧國家與人民，惟知爭奪權利，擴張自己勢力，這種作法我是無法贊同的。你用楊姜一般心浮氣燥，不學無術的人，胡衝亂闖，作威作福，此回失敗也是必然的，事到今日，你還是不知悔悟，還是要擴大內戰。我真是替你惋惜。我以為你此時趕快退出關外，痛自反省，另立些新的辦法，真正為國為民做一番事業，方有好的前途。這封信，當時各報紙均曾刊載的。

許蘭洲走了沒幾天，東北國民軍反戈討奉的戰爭便爆發了。

這回的討奉戰爭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發動的。揭幕是郭松齡拍發了一個通電，列數奉張禍心，請其下野，以謝國人。措詞極為痛快淋漓。原來他從日本觀操後回國，即住在天津的法國醫院裏。等到他的代表從包頭回去，報告我對於他所提各項已經同意簽字，他即出院，到灤州召開一個軍事會議，當即把幾個表示異志的高級將領加以逮捕，交給李景林拘押；並將曾任安徽省督辦的姜登選捕獲，執行槍決；把隊伍迅速編成四軍，晝夜回關外挺進。駐守山海關的張作相部，首先被他擊敗。乃由湯河進佔秦皇島，追蹙張學良的敗卒，長驅直入，向葫蘆島進迫。張作相汲金純兩部分隊伍，完全被他解除武裝。接着張作霖固守錦州之兵亦被他擊潰，於是勢如破竹，佔據新民屯，越過巨流河，直迫大名屯。張作霖自顧一敗不可收拾，已感無抵抗之能力。奉

垣要人看見形勢不妙，亦多紛紛遷避。這時奉系軍閥老翼的攻破，郭部亦操左券；只是指顧間事了。可是事情往往出人意外，郭松齡剷除軍閥的大業，終於功虧一簣，而歸於失敗！這原因，一方面是李景林的違約異動，一方面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出兵干涉。

當郭松齡發難之初，李景林是參與密約，積極贊成攻奉的人。但等到郭軍長驅出關之後，李景林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挑撥離間；一以打不破權利觀念，定要劫持河北地盤，竟在此一髮千鈞時候，引起了對國民二三軍的衝突。原來平漢沿路的防線。在首都革命之後，本即劃歸了國民二三軍。貪得無厭的張作霖，見利忘義，自食諾言，入關後將河北一下擺奪到手；李景林就駐到那裏飛揚跋扈，日事擴張勢力，把二三軍不放在眼裏，定要擠他出去。孫二哥一因陝西地方困苦，給養不能維持，二因張作霖曾有驅逐王承斌出津之事，前仇難釋；三以逼於李景林的壓迫，不甘讓步；於是乘奉軍內部發生裂痕之時，派令鄧寶珊徐永昌率領國民二三軍聯軍進攻保定，企圖規復河北地盤。我在前面已說過，國民二軍缺乏訓練，三軍亦太嫌散漫，他們革命的熱心是有的，但缺少革命的方法；作戰的勇氣是有的，但缺少作戰的方略。我雖然以爲河北仍應歸二三軍，李景林可往熱河；打倒張作霖之後，再商量別的問題。但此時我仍屢次致電陝豫，說我與徐松齡已有密約，若有動作，必須商酌而行，萬萬不可造次。可是他們大利當前，即不顧大局，對我們的密約，完全不肯承認，竟一意孤行，冒昧的攻擊保定，但攻戰多時，不能得手。此時李

景林怕引起更大的誤會，曾把據守保定的隊伍自行撤出，但二三軍却認李軍是殿敗被迫而走。於是派隊追擊，不肯罷手。此時我派張之江帶着三旅人，集中豐台待命，本是準備必要時應援郭松齡。孰知李景林竟又誤會我們是應援二三軍的，蓄意要解決他，憤激之下，於是把郭松齡交押的軍官一律釋放，積極部署，必要大幹，終與國民二三軍發生了正式衝突。

國民二三軍鄧徐的隊伍與李景林正式接觸之後，便不支敗退。鄧徐戰敗之餘；吃虧很大，轉回頭來，把怨恨全加到張之江身上；責備張之江道：

「你的隊伍既已集中好了，爲什麼還袖手旁觀，不去進攻天津應援我們呢？」

張之江說：「我並沒有接到進攻天津的命令。」鄧徐則以爲這時候應速增援，不應還再等待命令。

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已經誤會重重。空言再也無法釋去前怨；我的力避內戰意志，至今終也沒法避免。這個莫明其妙的戰爭就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天天擴大起來了。許多大事，都是從小事鬧出來的，許多變亂的釀成，亦往往受某一小事的影響，而致無法控制，無法收拾，國民二三軍鬧出了亂子，自己不能下得台盤，反把我們也拖下了水，與李景林掀起了惡戰。郭松齡倒奉之功敗垂成，一面固然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出兵干涉，但是國民二三軍之不顧大局（郭徐皆革命軍人。因張作霖張宗昌李景林在天津時種種飛揚跋扈，爲害人民國家的作爲，心中留下不滅的惡印

象，故必要打之，所持之理何尚不對，但應當有個權衡。李某林之違約異動，致使我們部隊不能應援，也是不可抹殺的原因。

爲要策應國民二三軍在青縣慶戰的部隊；張之江毫無作戰準備，就率部倉卒進攻楊村。本以爲用不了多大的兵力就可解決事變，把僵局挽回過來，孰知李某林早經請德國顧問秘密構成了異常堅固的陣地；同時，還有日本人替他籌劃作戰，替他活動諜報工作，（那些充當暗探的日本人，曾有被張之江捕殺者，日使館雖提出抗議，但不予理會，也就罷了）致張之江對楊村左攻右攻，激戰多日，總攻打不下。

張之江既多日毫無進展，我便令他暫停進攻，靜待援軍到來；即把鹿鍾麟宋哲元李鳴鐘各部以及騎兵調了一部分上去，激戰三日，卒由韓家壑攻入，李軍大敗，向天津以南退往德州一帶。我們隊伍就佔據了天津。此時任戴擊沿津浦線南退山東的李某林的任務，本令由國民二三軍負責，但他們動作遲緩，竟未得預期的效果，致李的實力得以保存；後來與張宗昌聯合，并力攻津，死灰乃又復燃。

張之江到達天津，戰亂之後，地方秩序紊亂，當然必須停留幾日，整理一切。但是這種應有的行爲，也引起了許多謠言，竟說我已委張之江爲直隸省督軍，河北地盤又要被我們國民一軍佔奪不成了。

此時我已到張家口，劉竹波和龔汝林兩先生跑來看我，要求我必要保舉孫二哥爲直隸督軍，說：「督軍或是省長，都須我們的人。你知道孫禹行爲什麼來了？他是餓壞了，要找總司令給他飯吃呀！」於是迫着我立刻給段寫了親筆信，我自捲入了混戰的漩渦，心裏無時不在難過；此時看看他們如此心理，尤覺不可忍耐。我被迫的無法可想，只好避到屋外去溜圈兒。他們又去迫我的參謀長劉菊村。我從外面回來，菊村跑來找我，說：「他們是攔不下這個念頭的了，怎樣？還是寫給他們算了吧！」我無可如何，就把教段的信寫了，保舉孫二哥爲直隸省督軍兼省長，交給劉龔二位帶走。可是孫二哥的督軍還沒發表，國民二軍的電話，却又一次二次的來了。原來自天津攻下，岳西峯的幾個代表即到北京住着，包圍着國務總理許世英先生，索要地盤，定要個直隸省的首腦位置；並不許許俊人先生發表孫二哥爲督軍（否則即謂安福系挑撥離間），說「國民軍吃個餓子也得分給咱們二軍一條腿；吃個蜜棗也得有咱們二軍的一份」段執政沒有辦法，就對他們說：

「委孫禹行作督軍，是你們總司令的意思啊！」

他們聽了這話，所以才左一電話，右一電話的來催迫我，要我替他們設法。我想傷亡的許多官兵還沒有過問，大家却胡亂搶起官兒地盤來了！一面萬分的痛心，一面又只得保舉鄧寶珊爲直隸幫辦。其實鄧何嘗是做這等事的人？都是一般無恥政客搗出來的鬼。當日情事，至今思之，還



是覺得難過，使我無法寫的去。

再說郭懋臣率軍越過新民屯，進至巨流河的時候，前鋒距奉天省城僅只六十里路，張作霖已經逃走，準備着通電下野了；這時日本方面派了人來，見懋臣說：

「眼見東三省的政權馬上就是郭將軍的了，歷年來奉張和日本所訂的條約，還望郭將軍予以承認才是。」

郭斷然的回答道：「那斷斷不能夠承認了，我就因為張作霖和你們訂立禍國條約，這回才與兵打他的！」

日本方面碰了這個硬釘子，知道郭懋臣不是個容易玩的人，若一旦讓他拿到東三省，他們既得的權利必將不能保持，於是極力勸說已經逃走的張作霖轉回奉天。

張作霖說：「我的兵打光了，拿什麼回去幹呢？」

「我們幫你兩師人！」這是日本方面的答覆。

得了這句話，張作霖欣然轉回瀋陽。隨即日本方面出動了八十架飛機，把白旗堡附近三十里炸成一片焦土；又以南滿鐵路附屬地不得干犯為藉口，阻止郭軍向前進；更以日軍喬裝奉軍，由郭軍左側加以壓迫；同時黑龍江吳俊升的援軍也已開到，向郭軍後路猛抄。

郭軍突然四面受敵，無法支持；而郭氏夫婦所居的村落，因日人曾一度前往交涉，把路程地

形探的明明白白，至此便引導着吳俊升的騎兵進入該村。郭懋臣猝不及防，即時被擒獲槍殺了。

這時郭軍後路魏某之部尚在山海關，聽說前方部隊潰敗，非常恐慌，於是我和嚴斌劉菊村等商議，派人送給他兩萬袋麵粉十萬元現洋，藉以接濟他安然退出危險地區，希望他仍能繼續懋臣的精神，再圖奮鬥的機會。那知他離山海關後，不走天津，竟繞道一直轉到保定，歸到孫二哥部中，這事又誰料想的到呢？

這邊張之江的隊伍剛剛退出天津，李景林和張宗昌的直魯聯軍即隨後攻來。國民二三軍抵禦不住，節節敗退。張之江處此形勢，唯有率隊轉回天津；一戰方把張李打退。原先張之江在津，因為軍紀好，愛百姓，很受地方士紳的歡迎。及至李景林捲土重來，就銜恨於心，對地方士紳報復。第一個吃虧的是國貨商場朱則久先生，以親近國民軍為罪，把他逮捕，處以十萬元的罰金。凡與國民軍——甚至一個伙夫有來往者，無不捕去。重刑拷打，索詐財物；不知迫死了多少人命。他們弄得了錢，即在天津實地置產，蓋造洋房，以為淫樂之所。

在這一次惡戰之中，我所感受的苦痛，是沒法說述的，第一、郭懋臣先生為愛護國家，激於義憤，而興討奉之師，一面與我有約，一面與李景林攜手；我們是以打倒奉張為第一目的。可是國民二三軍不明這個大義，不識這個大體，只說郭的發難是奉系的內亂，不承認我們的條款，

只顧鹵莽的幹將起來，把局面弄到不可收拾，使我提腳不動，使我與郭的約定不能實現，條約等於撕毀。結果懋臣敗死。我何以對人？第二、二三軍爲要規復河北地盤，申雪心頭積怨，出而進擊李景林。但我們與郭有約，與李景林便是友軍，二三軍亦不當打李；我們一軍更不當打；但一個漩渦捲來，却竟不容縮腿。如此反友爲敵，以私廢公，弄出了一場莫明其妙的戰爭，我們又何以自處？第二、二三軍的好朋友與我共甘苦共患難，同以革命爲志。但他們許多人却爲環境所移，舊的觀念不能屏除，犯的毛病不能改革，不知切實着重訓練，真爲愛國愛民而努力，以致不肯放棄私怨，必要乘機打李，而部隊素質如何，不問把握如何，只顧去打；打了起來，不能收拾台盤。再說我們一軍自己，亦因我自己不學無術，雖經多年的訓練，許多人對於識大體明大義，爭利不前，赴義恐後的德行，仍是缺乏得很，當張之江打下天津之時，許多平素有學問的朋友，亦竟不能放棄權利思想；這個爭路局，那個爭關稅，自己人各不相下，告狀的信電如雪片般向我飛來。這種種情形，都是我意想不到的，我真是覺得太痛心了，太喪氣了！

我若不是爲了避免內戰，貫徹和平主張，我爲什麼跑到那樣窮僻的察哈爾去？但是事到這田地，我究竟是爲自己，抑是爲國家？這種莫明其妙的戰爭，循環無窮，裏打到那天才算了局？這樣的退而自思，一切的痛心難過，都使我歸結到自己學識不足，辦法不夠的一點上，我必得跳出國內的漩渦，出國去好好考察學習一番。同時希望大家都能痛定思痛，毅然悔悟，趕快化除仇

怨，停止禍國殃民的內戰。

這個主意既經自己決定，我也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即將西北邊防督辦和甘肅督軍之職分交張之江李鳴鐘署理，毅然發出主和息爭的下野通電，抱着滿懷痛楚惆悵的心情，由平地泉取道外蒙，悄然赴俄去了。

當我在途中的時候，奉張、直吳、和張宗昌李景林直魯聯軍等軍閥集團的大聯合陣線已經結合成功，又以直魯軍攻津爲引線，對國民軍施行大規模的圍擊了。

### 第三十三章 赴俄途中

在平地泉，我把出國手續辦好，一切應辦之事，都準備妥貼，動身的時候，石筱山等許多朋友前來送行。他們對於我的遠遠離去，都十分難過；以爲怎麼如此匆促，說走就走呢，我

說：「目前這個戰事是無邊無沿的。我一走之後，也許可以釜底抽薪，讓他們少些興頭；從我自身着想，我也必得到國外去看看，增長些見識學問，回來之後，再同大家一塊兒好好的奮鬥。」

從平地泉出發，走的是張家口到庫倫的大路。是公路，固然平坦康莊；不是路，也一般的平坦康莊；途中未遇一條河，也少見一株小樹，三千里路全是一望無際，黃沙漠漠的遼闊平原。過戈壁沙漠，車行極是舒坦，途中常見一種野羊，活潑肥大，萬千成羣往和汽車賽跑，別地從未見過。牛羣馬羣亦最常見，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遺風。這一帶沒有房屋，所見唯一一種帳棚，即是毡幕，稍有高坡的地方，卽堆以石頭，掛以紅布，蒙古語名爲「烏敦」意卽是所供奉的神祇。因爲他們的文牒，還沒有達到雕刻偶像的程度，故只有如此簡單地供奉之。快到庫倫的時候，經過汗山，想來大約卽是可汗之汗。這一個山長約四十里，高約六七里。山上生滿蒼鬱蒼翠的樹木，

都是幾塊粗的大樹。我看見這裏忽然有這麼多的大樹，覺得很奇怪，就向當地百姓探問原故。據云，昔康熙親征蒙古，有一次打了敗仗，就到這山上的樹林裏藏着，等候援兵，後來援兵來到，擊敗蒙兵，遂得奏平定朔漠之功；爲要紀念這段史蹟，清廷特以蒙古某王子爲守林的官，年薪四十八萬兩，專門請他保護這山上的林木，不許百姓砍伐。數百年來相沿成習，樹木迄無損害，所以才有今日的這種樣兒。可見並不是這一帶的氣候土質不能長樹，沿途所以缺乏林木者，恐怕還是人事的關係。漠北這一帶，歷代以來，都是戰場。史記載，漢高祖困於白登。白登即在今日大同附近，由漢晉宋至元以迄明清，無代不於此間有殺伐之事。居民死於戰禍，房也燒光，樹也伐盡，又加百姓對樹木不知保護，不知種植，樹木自然有絕跡之勢了。所以我說漠北少樹，還是人禍使然，和氣候土壤沒有多少相干。過汗山時，見山上冒烟，知是樹林着火。據說，這火往往經年不滅，因爲一種迷信的關係，人民都不肯上山去救。似此情形，這裏絕無僅有的一座樹林，也有不保之虞了。

離庫倫還有幾十里路，即遇蒙古國民黨的委員長丹巴多爾基和蒙古軍官學校的許多人員前來歡迎。我下車一一握手道謝，同行到庫倫城內，被招待住在他們蒙古政府所預備的一所房子裏。那是一所木頭建築的洋房，裝有地板和壁爐。那壁爐是用厚灰泥塗成，燒的很好的松木劈柴，名爲「瓣子」。室內陽光充足，溫度也很適宜。

這次在蒙古共住三十多天，於研究黨義和學習俄文之餘，對蒙古政治社會各方面情形也作了一個大略的考察，現在所留的印象如下：

第一關於政治，是採用一黨專政的政治，政治實權握於蒙古國民黨之手。我居留庫倫的時期，和他們的委員及其他中央要員過從很密。一般的說，他們都生氣勃勃，努力於政治工作，很有一種新興的朝氣。有一次他們黨政兩方舉行聯席會議，特意邀我去參加。會場是小小的一座屋子，只可容三十餘人，結果到會的却有六十多，於是有的坐椅，有的坐凳，有的坐在凳襪子和椅凳背上。會議從上午八點開到下午四點，討論的問題很多，發言者很是踴躍。在這八個鐘頭中間，大家只用了一次飯，每人兩片黑麵包和一杯紅茶而已。據說他們日常生活都是如此簡樸。問他們何以這樣，回答說：「因為我們正在建設時期，民力有限，唯有努力撙節，始可成功。」這使我想到大禹治水，非飲食卑宮室的故事，不禁非常感動。這種精神在今日的我國尚缺乏的很，我們應當慚愧的。

政府對於建設，此時已頗有成績，只就房屋一項而論，滿清統治了蒙古數百年，除了建築幾座愚民的工具——廟宇，便是一些窄狹黑暗的土房，此外再無建設可言，蒙古國民黨當政後，在很短的時期內，便為平民建築了夠用的整齊木房，平時可供舒適地居住，有事時又可用作人民的會場。

此時他們已經擺脫了中國的統治，而實行獨立。我認爲中華民族是強個的，長此分裂，殊可惋惜。我問他們的獨立是否可以取消，他們回答是獨立可以取消，但須中國有真正的人民政府出現。後來我在赴莫斯科途中的一個車站上，遇到一個赴俄參觀的西藏代表。他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足見蒙藏脫離中國而獨立，固然各有其政治背景，但我國政治未上軌道，不足以獲得蒙藏人民的信賴，却是個主要的內在因素。這一點，實在值得我們警惕和勉勵。

其次談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萬人。在滿清長期統治之後，今已減少至五十萬人，滿清利用喇嘛教以統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須當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須當喇嘛；僅有一人可爲娶妻生子的平民。當喇嘛者有紅黃緞子穿，又可坐享優厚的俸祿。女子沒有充當喇嘛的福氣。但又難找得相當的配偶，於是都做了內地人洩慾的對象。因爲由本部內地來的文武官吏及軍隊商人，都以道遠不能攜帶家眷。他們都可以在這裏找到臨時太太。一方面是七八個蒙古男子僅有一個妻子，一方面是一個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內地人爲她的臨時丈夫，事實上形成一個亂交的社會。同時男女衛生都不講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後，唯有聽其自然。當時活佛即患梅毒，爛塌了鼻子。據說目前檢查結果，蒙古青年十七歲至二十五歲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歲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這種現象是太可怕了；若聽其繼續存在，馬上就會有滅絕種族的危險！那次和蒙古國民黨的朋友談及這個問題，他們把這一點也作爲他們脫離中國而獨立



的理由。他們說：

「你看，中國政府就這樣防制我們，使我們即要滅種，使我們民族無法生存，你看我們怎麼還能和你們在一起？」

我詫異道：「你這真什麼話？這明明是滿清政府防制你們的，怎麼說是中國政府？我們中國內部的人民，不是和你們受滿清政府同樣的壓迫和虐害的麼？」

其時蒙古喇嘛教領袖即是活佛，名哲布尊丹巴，在過去，活佛的地位等於專制時代的皇帝，一切生死予奪之權都歸他一人掌握，他可以爲所欲爲，沒有任何的顧忌。每年各地的王公及其眷屬要來朝拜一次；王公的眷屬中有年輕貌美可佳活佛中意的，活佛便有權強姦留在宮內，與他們做不歡喜佛。王公們一則恐慌他的淫威，二則恐怕也色精久成習，視爲當然，對此橫行，絲毫不加反抗。這位活佛因淫慾無度，不信惠有花柳病，爛場了鼻子，而且鬧得身體虛弱遂於極點，兩眼漸致失明，甚致坐著不動時，也須人扶持。

廣倫附近的太廟，我都曾參觀過，活佛的宮裏那時出賣各項東西。我買了兩個大瓷碗，是在西藏的，每個價只一元，宮裏每個屋子都污穢零亂，處處表現着愚民害民的作風，無半點知識可言，無半點新氣象可言。座前有一種特爲朝拜者設備的磕頭的板凳，前高後低。磕頭時突然的向前一撲，站起來，又突然的一撲，大約是五體投地的意思。我覺得如此作體操，於身體倒有些益

處。又有「轉經藏」玄虛妄誕，更爲可笑。

革命後的蒙古政府對社會舊有制度及習尚，頗有一種大刀闊斧的革命精神，一方面打倒了活佛的權威，一方面努力於破除迷信的工作。社會上頑固分子，即喇嘛階級。雖然仍舊保持着他們的宗教信仰，但大多數青年都已不受其害；其已爲喇嘛者，亦多已遺俗棄各理生業。同時新政府對於破除迷信的工作極是努力。初時當然頗遇阻力，但政府不顧一切，經過一時期快刀斬亂麻的幹法，收效已大有可觀。我們中國凡事都講中庸，談改革亦是因循遷就。結果變成妥協，謀國者慎重考慮以將事，不願過於急進致引起舊社會之反感。這種苦心，我們自當體諒。但是爲使舊勢力安定，而致社會上之垃圾污穢，仍其舊，則青年主人們必以爲謀國者無改革之心，新的中國將永無出現之望。這是失策的。此種權衡，却萬不可於意。清湯斌在南京只留文武廟，其餘一切佛道寺廟均概廢除。這種好的精神，至今反而少見。我國自革命以來只有廣西還做出不壞的成績，其餘各地均都比不上。曾文正公言求學之道如燉肉然，一上來當以猛火燒之，基礎立後，再以細火慢慢的燒。我以爲談改革，談革命，亦是同樣的道理，那時是民國十四年，此十餘年購，蒙古的情形想必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了。

軍事方面，蒙古行的是徵兵制，現役兵當時有步兵兩旅，騎兵四旅，軍械嶄新，服裝整齊，與俄軍大致相同。聘有俄國顧問，訓練時從旁指導。士兵教育很注重歷史知識的灌輸與民族精神

將發揚，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的豐功偉績，使在每個士兵頭腦裏打入深刻印象。所謂軍歌音調遲緩雄壯，歌詞亦皆係對於民族英雄崇拜。其步法緩慢莊重。亦殊足表現蒙古人的精神。那時的陸軍軍長是一位舊正公，有一位將軍則爲新國民黨。我住處的崗兵皆蒙古青年，與之談話，覺得他們的知識水準頗高。

蒙古風俗以騎馬爲最可取。馬是蒙古人民主要財產，家家都養着很多的馬。蒙古的馬草與內地不同，一二尺長的將乾的馬草，以手握之，縮成一團，一放手，便又照原樣舒開。因爲有這麼良好的草飼養，所以蒙古的馬都特別雄壯。蒙古人無論男女都是騎馬的好手，當草豐馬肥的時候，一個個強健的男女在廣漠的草原上馳騁如飛，很有一種古騎士的風味，他們因爲善騎，日常生活多在野外，少在屋中。看望親友，辦理事情，這家到那家，二三百里往來都是騎馬；跳上馬背，一鞭如飛，極是有趣。我在蒙古街上看見朋友相遇，一邊談着話，一邊就蹲下大便，無論男女都是如此，雖然他們都穿着長袍，蹲在地上解手，別人看不出來，但總不雅觀。初時頗以爲怪，後來我想到這種習慣，怕即是野外生活所養成，因爲野外是找不到廁所的。

因爲馬多，蒙古人都喝「馬奶」，客來了，也先以馬奶相敬；並且還有人歡喜喝發酵後味道酸酸的馬奶。近來從俄國留學回去的青年男女漸多。這種不合衛生的習慣，想必也可以革除了。

蒙古人吃肉的辦法也很新奇。他們把一塊一塊切碎的肉放在煮滾的水裏輕輕地涮一涮，拿出來就往嘴裏塞；那些半生不熟的肉上有時竟還帶着鮮血。他們以肉爲主要食糧，當兵的也每人每日發給二三十兩肉，（往往手持大段帶骨的肉，在開水中涮一涮，帶着血吃）而把一二兩麵包當鹹菜吃，大概整天吃肉的原故，所以牙齒都特別好，據說蒙古人的牙齒在世界上可居第一位；張家口、河南吹之，江浙又次之，美國人的牙齒最壞。他們這樣的拚命吃肉，故而吃茶便成爲他們日常生活一件大事。吃完飯後，便要痛飲一番熬煮的發紅發黑的濃茶。一次三二兩，連茶葉一併吃掉。據他們說飯後不喝茶一定要生病；他們認爲喝茶有醫藥的功用。他們喝的茶都是漢口九江等地運去的茶磚。內熟茶在蒙古是筆很好的生意。自今我國的茶在世界上地位日漸低落，我們應以科學的方法設法改良，加工精製，以挽回既失的利權。

我在蒙古居留期間，食的方面還沒有感到很大的不便，但吃水却成爲一個問題。庫倫人都是吃河水，河水雖很清，但至爲污穢。除此種河水而外，再無他種水可吃。雖經濾清，總不能濾淨。現在庫倫的街市河渠，經新政府的整治當已清潔多了，但吃水一事，還須謀改良。

蒙古人喜歡穿綢緞，尤其喜歡穿紅黃紫三種顏色。綢緞皆我們內地出品，在此銷路至旺。過去我們中國的綢緞馳名世界，唯以故步自封，不知改良，至今出口數量顯然已大大減少，就是中國的老爺太太小姐們也多喜用外國的人造絲及毛織品了。這是可悲的現象。我們應該努力提倡國

貨，還須力謀絲綢質料的改良；我想以中國蠶絲的優美，不難恢復原有地位。

蒙古人住的房子，叫做「蒙古包」。有全毡的，有是半毡的，也有不是毡的。大者能容一千多人。平民的房子裏不很清潔，富有者則尚齊整。室中多設爐桌，亦坐亦臥。這與日本的習尚有點相似。於是日本人就借此造謠，說蒙古族和他們是同胞弟兄，和中國人則同曾祖人所以他們反倒親些。又蒙古民歌聲調悠揚緩慢，日本人亦說和日本民歌相同；我聽着倒有點像我們中國的秧歌。蒙古人家門口多懸着寫有經文的各色布條；屋內置有藏有經卷的能轉動的圓箱，往來的人推轉一下，卽如讀經一遍，希望藉此得到他們所祈求的幸福。

他們的喪葬最爲奇特，人死之後，不和內地人似的很隆重的用衣棺裝殮，却把死屍拋在野地裏，讓野狗去吃，若野狗不肯吃那死屍，他們就認爲極不名譽的事，卽須念經求饑，不是說他本人不好，便是說他祖宗有損陰德。在我們內地，有樹木可製棺材，有廣大的土地可資埋葬，亦有埋於石岩中，役於水中及山溝中者；蒙古無樹木，又沒深山大水，天氣嚴寒，土地凝凍深入五六尺。要挖掘，亦挖掘不動，故造成這種喪葬之俗。新政府成立，設法運輸木料，然仍不能爲棺槨之用。蘇聯有廣大的火葬場，誰家死了人，先盛以薄板植木，而後投入火葬場中焚化之，葬場形如墳壘，棺入其中，電火卽燃，幾分鐘內化爲灰燼，將骨灰盛木匣中，上立號碼嵌像片，置於木龕中，同時開追悼會哀悼死者。我以爲這種辦法，較之着風水而佳，就是比埋在土中，佔了有用

之主，亦進步多多了。蒙古有此喪葬怪俗，所以蒙古的野狗極是兇惡，若人醉臥在地，必有被野狗吃掉的危險。聞蘇聯朋友談及，曾有二俄人酒醉後回家，爲時已晚，走至野外遇野狗，即被抓倒吃掉。這種野狗到處多是，皆吃人肉的專家。因爲他們平常吃人肉吃出味兒來了。

蒙古政府充滿新興的氣象，攝政權的人大都是有朝氣的青年。年輕的委員長丹巴多爾基，年齡還不到三十歲。聽說和他同住俄國留學的同学，一行若十個人。都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現時在蒙古政府服務的敏澤林，便是其中的一個。他們都具有嶄新的頭腦，勇氣勃勃，在俄國學成歸國後，便領導起國民黨幹了這一番在蒙古史止對時代的革命大業，真是值得人們欽佩的。

丹巴多爾基在民衆中的信仰之後，來夫夫不如從前了。原因是他錯娶了一個由北平到庫倫演戲的女戲子爲妻。此女子奢華浪漫，在新蒙古社會中無人看得過去，以爲她決非正經人。這事僅關個人的私德，倒來算不了什麼大事。但社會上一般人的看法，與當事人的觀感却不相同。當事人或者認爲婚姻自由，別人無權過問，可是一般人則以爲其品行浪漫，行爲有虧，於是在政治上減少了人民對於他的信仰。這個大有可爲的革命青年，逐漸地竟變成一個不能施展的人物。有些人說丹巴多爾基對於主義的信仰以及其革帶的精神，已經一年不如一年，不知是真是如此。抑是一般人因他的婚姻問題對他減低了信仰而生的批評。

庫倫是銅被壓迫民族的聚會處所，這些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領袖，時常集會討論反帝的一類事

體。社會一切活動，都多少與革命有關。有一次那兒開了個聯歡會，在會場演了一齣叫做「第三國際之夜」的新劇，我看了很受感動，覺得富有教育的意味。那次聯歡會上游藝項目很多，歌、舞、跳舞、各式各樣都有。出演者包括了東方每個民族有安南、緬甸、新疆、西藏、阿爾泰、內蒙古、印度、高麗、台灣等處人。他們以其本鄉本土的技藝，在那裏大顯身手。故每個節目都富有地方色彩，我從未見過聽過。有兩位阿爾泰女子，都只二十歲左右，表演舞蹈。腰部左右扭動，活躍之極，種種姿態，都足可活潑血液，健強身體，與我們國術的用意是相同的。會場之外有一大房間，出賣茶點，飲食潔淨，招待周到，各民族人民熙熙攘攘，一團和氣。可是沒有十個人不稱帝國主義者麼麼麼，每一談及，則咬牙切齒，帝國主義者張牙舞爪，高高居上，在其腳下的被壓迫者則無時無刻不謀打倒之，推翻之，以爭取自由與人的幸福；今日不戒待明日，此地不戒到那地，他們不把吃人者打倒，是死也不會甘心的，想到這夜的經過，的確是一個充滿快樂與希望的民族聯歡會。

在庫倫駐有俄國公使，爲鐵匠出身，個兒高大，是一個很有學問的外交家。我有幾次和他討論關於蘇聯的政治組織及制度憲法等項的問題，他按照蘇聯地圖及蘇聯組織系統圖等等替我講了三四天，詳說革命前及以後情形，使我獲益不少。我在他家吃過幾次飯，菜很豐盛，餐料極有講究，每次都是由他和他的太太陪着。有一天我要求參觀他們的廚房和臥室，他不好拒絕，我在廚

房中看見一位老婆婆，繫着圍裙，忙着操作，我問是何人，說是他老太太。我看她穿的衣服比他太太差得很多，面色也不如他太太豐滿，同時我在另一位住在庫倫專門幫助中國革命政府發送軍火的蘇聯朋友的家裏吃飯，也遇見同樣的現象。這裏給我很不好的印象。太太年青好看，就擺出來陪客；老娘年邁，有了綫紋，就藏之房中，使之操作。這真是「東家短，西家長」。聚了媳婦不要娘了。我以為無論如何，婆婆總比媳婦年老。年輕人在廚房裏做飯，當比年老的敏捷而能勝任。如果說太太陪着客人吃飯是一種禮貌，那麼做完飯後再換衣服來陪客人也不算是件失禮的事。聽說歐西，尤其德俄等國的普通民衆都有這種習俗。我總覺得這事不合理。他們的社會如果再進化一步，決不會使衰老的父母替兒子媳婦來勞碌操作，而讓兒子媳婦坐享安閒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自己的老尚不知敬奉，又安能敬奉別人之老呢？我曾細思此事，覺得不如中國的文明。豈是我的傳統觀念麼？

在庫倫還住着俄國的幾連騎兵。一次在他們操練的時候，我被請去參觀。別的倒沒有見出什麼優點，就見他們的騎兵有驚人之處。他們上一個很陡的山坡，很快的便躍馬而上；下來的時候，如疾風驟雨似的馳來，非常的神速。飛馬上山，我們也可做到，從下山亦驟馳如飛，我們就斷斷不能了。所謂哥薩克騎兵甲於天下，真是名不虛傳！我也曾往他們兵營裏參觀。營房的地板擦得很乾淨，一切內務也大致小觀；只是室中有一種特殊的臭味。這種臭味，我想是俄人特有的



「我們的弟兄到貴地，用現法在街上買東西，找回的零頭，七角八角的，都是你銀號裏發的，不見現的票子，怎麼帶到別的地方去呢？你看這事怎麼辦？」

他就笑了。說這是沒辦法的辦法。請我的軍需和他的軍需去商量，必定可以設法的。我們隊伍剛入湖廣界，總要和當方避免鬧意見才好，所以也只好由他去了。原來他對於外來的軍隊却是很客氣的。

王振亞是前清的舉人出身。他鎮守使署有着幾營人，幾營的官長，都是他的子姪充任。我真不明白他是在辦國事，還是在辦家專，過了二年，王振亞即被他的鎮守副使駱衡斯殺，財產亦傾蕩無餘。這種結局，是必然的，一點都不足怪。

三月初頭我又接到進攻常德的命令。隊伍沒出發，胡英和周則範卻又鬧攻澧縣，不久又忽退去。我即率部跟蹤至澧縣，緊臨澧而進向常德，此時最感困難的，就是運輸的問題，由澧縣到常德，路不盡是稻田，所走的就是彎彎曲曲窄窄的田埂，再無大路可循，從後方把蒸好的饅頭烙餅運到前方，至少得兩天的工夫，趕到了目的地，食糧都已發霉，餉錢的不堪入口了。我常常想，不但開發富源，繁榮農村，必須發達內地交通，就是國防着想，建設全國的交通網，也是刻不容緩的急務。遍地都築起鐵路，暫時當然不易辦到，但修築公路，倒並不是一件難事。如果全國公路網完成，那對於經濟文化，以及軍事方面起將如何的作用？不可是還必須自己辦。

車製造廠，自己開汽油礦，否則還是替多利少。）這時我就立下決心，要在我國人的能力範圍之內，進行這事。後來我到盛利用王美修路，極力提倡開築公路，都是這時的刺激所促使的。

途中，我接到署理常總鎮守使的命令。到了瓊澄，即委郭鑑三先生爲瓊澄縣知事，鑑三先生名長耀，爲河北鎮海縣人，自幼飽讀詩書，生長於農村，深知民間疾苦，在太醫院學醫，卒業後任三十四團第三營軍醫長，後於綏遠調到廳房爲我們第十六混成旅軍醫官，是我早年最佩服的一位師友。我請他爲親民之官，料他必能勝任稱職的。他在瓊澄兩年，果然政績卓著，很得人民的愛戴。到後來他卸任的時候，人民都燒香，放爆竹歡送他。他在任上，頗有些可記的事：因爲醫學很好，他坐堂問診的時候，看見告訟者面黃肌瘦，或是有病的樣子，他就把訟事擺到一邊去，給他們診治，細細問病徵，而後開了方子，請他們照服。和他們說：『你的官司是沒關係的事，還是身體要緊，你應當快快躬身體養好。』鄉民常感苦痛的就是無處問醫，現在這位知事大人自己要替他們醫病，心裏怎不感激？仁義所被，久而久之訟事也少起來了。他又常常下鄉走動，看見那家有女孩纏着足腳，他就坐在那家門口不走，見了那女孩的父母，就千言萬語的談說纏足的害處，一定要把人家說的服了心，把他女孩解了纏布，他才罷休，又提倡戒賭，戒烟，也是挨家挨戶的去說道理，這樣就不用戒令，真說道理，所以各項事都辦的特別有效果，還有一件事，我有一位本家孫子，從家鄉跑來找我，我是素來不肯用本家，用鄉親的，除非真是貧者能

着。鑑三先生那時正要赴任，就把我這本家娶了去。我請他好好管他，不能放縱他。那知鄧到任上，就放他做科長。鄧的做法太清廉，使手下人大感失望。一天，鄧在屋外散步，聽到屋子內幾位科長在談天，說像科長這樣的弄法，只是他自己博一清官的名聲，我們將來連褲子都落不着。鄧聽見這話就是我那個本家說的，當即毫不留情，把他趕走。他到長沙，又冒用我的名義。在省長那裏弄一個警務長的官兒，一放仍是放到臨邊。他派武瑞威的去接差事，還請你把我接走，我自自有本事來坐官，看你還敢管我不敢。鑑三先生看見他來了就說：「像你這樣不學好的青年，不管你是走的什麼門路，可這真反正不要你！」毅然決然的把他押解出境，決不因爲是我本家的緣故，而對他有絲毫姑息。這種公正聰明，有胆有識的作爲，實在叫人敬佩。——這都是後來

的話，敘過不提。

那正是炎熱的夏天，我率部向常德行進，一路甚感困難。一日行至距常德二十里的桑山地方，大家停下來歇午，我那時因出汗太多，在山脚下找到一座小茶舖，有個天棚，異常涼爽。我把兩張桌子併擺，鋪上被單，躺着乘涼。一覺醒來，忽然四肢不能轉動，兩臂尤其感覺痠疼，急忙找軍醫來看，吃了藥，出了透汗，才慢慢見好。後來有一次我在溪西一帶視察，在確山縣西十二里的一個小村上休息，和當地一個老人談話，那村有兒子否，他指着旁邊一個痲子，說：「那不是。」問他怎麼殘廢，說是大汗之後，在溪前睡覺，吹了過堂風，腿過來就腫痛，一直沒有

那一天住在格克圖；我們未到以前，已有人把旅館預備好了。我因要察看本地各方面的情形，就擱下二個遊天。參觀了軍人住宅，也看了農人的各種活動。那兒整個是農工的世界。坐享其成的有閒階級，以及對勞動大眾壓迫剝削的種種黑暗現象，都是看不見的了。那兒的駐軍，每一連設有二座列寧室，爲二種俱樂部的性質。這完全是爲灌輸主義及對士兵施行政治教育的處方。我會和二個士兵問及其關於申山先生、張作霖、吳佩孚等人的過去歷史及今日爲人和主張，都能對答如流，極是熟習。可見他們對士兵政治訓練多麼注重。在此地又參觀紅黨與白黨作戰的遺跡，彷彿很久，亦使人不勝感想。

從恰克圖街上馬金斯基還是坐汽車在路上過海的時候，遇見一位布利亞特蒙古的老百姓。他帶着二頂帽子，樣式與滿清時代的紅纓帽相彷彿。我請翻譯把我的話翻給他說：

「你這帽子好像是個舊時代的官帽，爲什麼還戴這個？」

那個老者回答道：「帽子雖然不好，可是我們本地自製的貨。我們不買外國貨。」當時談話安詳，態度謙和，很有學問與修養的樣子。我想到我國的上層社會，雖然國困民窮，却非外國貨不買的情形，不禁使我面紅耳赤。

這一路橋正在修築公路，不遠處有一座未成的橋樑，不遠又有一座新修好的。築路上入絡繹不絕於道。

過了河，便到上烏金斯克，已是夜間十一點鐘了。當地各機關人員都到二十里以外來歡迎。據說：兩天以前接到消息，便到城外等候歡迎。我們說覺得很對不起他們的熱誠友誼和相愛之意。這兒的住宅雖然多是土築的屋子，但是家家戶戶都有玻璃窗，窗前燈陳放着美麗的花草，很是情幽雅潔，街上也很清潔，不像庫倫那樣這裏一堆糞，那裏一堆拉雜的污穢不堪。上烏金斯克附近樹林中都是有電燈，沿途裝有電話，已經一天一天在現代化了。

到上烏金斯克的第二天正是五一勞動節，這在蘇俄是很重要的。一個紀念日。當地政府來函，邀我參加他們的紀念會，並參觀閱兵。那天天氣和暖，兩天前途有三尺多厚的積雪，此刻已化為泥水。街道低窪的地方都有積冰，泥濘遍地，頗有些難行。據說這裏只有冬夏，沒有春秋。那時天氣方由嚴寒轉變緩和，所以積雪便很快的溶化了。

大會是在布利亞特蒙古政府領導之下召開的。他們最先請我向羣衆講演。我說完後，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女工上臺台講話。她講的話，翻譯爲我詳細轉譯，大意說：

「今天是五一節，我們今天很欣幸她能夠在這兒歡天喜地的觀會。可是在這同日子，帝國主義國家的勞動大眾的紀念會可不能像我們這樣自由與快樂，他們的會場會被軍警搗亂，他們身體會被軍警毆打拘捕。」

據說她是一個洗衣服的工人，却說出這樣富有煽動力量的話來。她說完後，又上來一個十四

五歲的女孩，這女孩講的話也很能感動聽衆，講得大家摩拳擦掌，異常興奮。

會畢開始游行與操演，女工在前，男工在後，工人過完後是軍隊。我和他們的主席團同站在樓上參觀，行列在軍樂洋洋的聲中，一排一排地經過，很是整齊莊肅；每逢走過發誓台的時候，台上檢閱委員就向他們發問：

「你們預備好了沒有？」

「我們已經預備好了，我們聯合全世界弱小民族，打倒帝國主義！」大家如雷似的答應着。這樣一問一答的過去，空氣非常的熱烈和緊張。

這次使我最難忘記的，是幾千個木工、鐵工、泥瓦工等工人也按着隊伍的步法，很整齊的參與操演。我們訓練六個月的新兵也不如他們的成績。更希奇的是有一千多女工，頭上戴着紅布或者花布，褲腳捲到膝蓋，袖子捲到臂膊以上，也同樣挺起胸脯，很雄武地在列中走着。我見了這種種情形，忍不住的眼淚如珠一般的下落。徐季龍先生問我怎麼回事？

「人家的國家是這麼一種情形，我們的國家却演着淒慘的醜劇；人家的女子是這麼一種情形，我們的女同胞還在纏着小腳！想起來我怎能不流淚！」

「請馮先生進去喝茶吧！」大家都勸我說。

我抱着滿懷興奮與悲痛的情緒，離開了參觀台。

分列式結束之後，我就約請布利亞特蒙古政府中央委員們談話。據說：布利亞特蒙古的併入俄國版圖，據俄史記載，是在康熙年間，那正是俄國專制時期。他們民族被看作下等人種，受了俄政府種種限制與壓迫，比如不准當兵，不准設立學校，不准進城活動，不准穿用俄人的衣服，結果只允許他們修廟信佛當喇嘛，這個不但不加干涉，反予以種種鼓勵，以保持他們永規不復的陳腐古舊的生活，十月革命以後，他們身上的枷鎖便完全解除了。他們組織了布利亞特政府，也成立了特魯希利亞特人而設立的政治學校和軍官學校，以一個民族的平等資格成爲蘇俄聯邦的一份子。他們政府的委員大都屬於農工階級以及精神勞動分子。他們的社會是非工不食，凡是不參加勞動的，不是絕對不能立足的。我想這正與我國的情形相反。那時在我國，是工人無權，農人無權，進步的知識分子也無權；社會上的權力者不是封建餘孽，便是買辦資本家；或者是叨祖宗及父兄之餘蔭而坐享其驕奢淫逸生活的老爺少爺；在我們中國社會止是「一人當官三輩爺」，行的是現代國家中最奇怪的制度。

從海參威到上烏金斯克火車須行六天六夜，由上烏金斯克到莫斯科，也須化去六天六夜的時間。這是很長的途程。鐵路我在上烏金斯克住了三天，便由這條鐵路向莫斯科出發。火車分頭二三等，蘇聯政府特爲我掛了一輛頭等車。我不願坐頭等車，要求改掛三等。我的顧問說這是政府的命令，不能改變。但我堅持不肯。結果是用了折衷辦法，改掛了一輛二等車。

上車的時候，布利亞特的軍隊和學生都到車站歡迎，男生四五百，女生二三百，人人個個大膽大手大腳，整齊齊的站在那裏，如鋼鐵一般。看他們的皮膚頭髮，眼裏嘴唇，無不和我們中國人相同，但我們中國青年却多柔弱，未能到此健康地步。我接受着他們那種熱烈誠摯的友情，心裏感到萬分的難過和萬分的慚愧，又添熱熱淚奪眶而出。

當尚未上車，正在候車室裏坐着的時候，遇見了一個穿黃袍子的喇嘛，我和他攀談，問他是不是活佛。他說：

「是的，但已不准繼續收徒弟了。」

「你是不是真心虔誠信佛呢？」

「那裏是真心信佛？真心信佛的是豬羅！」

他的回答使我十分詫異。在我國佛教勢力還是很大；甚至留學生之中也有不少信奉佛教的，他們如果聽了這位活佛的話，豈不覺得作何感想？

沿途各站都有駐軍排隊歡迎。烏木斯克是沿鐵道附近各大城市約定歡迎的總地點；各省的軍政黨三方代表，都趕到這兒候迎。我下車致禮，看見了那些政府人員都是衣服油污，拿着器物；有一位代表背下揀着一柄鐵錘，樣子像個油廚子。他向我致歡迎詞，講了一個多鐘頭的話，極有條理，極有熱情。我問翻譯：



「他幹的是什麼？」

「他是省黨部委員，幹的是歡迎團。」

「他挾着鐵錘幹什麼？」

「他在工廠裏做工，鐵錘是他的工作器具。」

「這大不像省黨部委員的樣子了。」

「蘇俄目前就是這種風氣，人人以做工為榮耀，以穿髒污的衣服為可敬。假如一個人衣服穿得太整齊乾淨，反倒被人恥笑。被人攻擊，不白資本家，就是罵他新官僚。」

我聽說了後，對蘇俄當局埋頭苦幹，建設新國家的情形，於驚奇之中深致無限的敬佩。「資本家」，「新官僚」，只是兩個人人引以為恥的名詞，維持了全體人民的工作精神。

忘記是在一個什麼車站上，上來了一位蘇俄的軍區司令，這位老先生已經六十多歲。我因為他身負軍事重任，想由他處更深一步的瞭解蘇俄。經顧問替我們介紹後，我與他長談起來。我問他許多問題，他都詳盡相告，最使我覺得奇異的，是他告訴我他不是共產黨員，我說：

「你不是共產黨員，政府怎麼會叫你担負這樣重要的軍事行政責任呢？」

「我本來是舊俄的老軍官，現在政府所以肯昇我此職，一來因為我有三個兒子，都是共產黨員，政府對我頗能信任；二來蘇俄行的是徵兵制，假使非黨員便不能充任軍官的話，便不免引起

國民許多的疑難了。」

他以為這是蘇俄政府手段高明之處，說如此即可借他向百姓宣傳，說政府並不一定重用黨員，非黨員的我們也一律重用，無分軒輊。我聽了，甚是興奮。

後來他又說及一九二二年美日聯軍進佔西伯利亞的情形以及蘇俄得到最後勝利的原由，他說：

「國際的聯軍配備和士兵的訓練都很好，作戰能力也不錯。西伯利亞已經被他們佔領了廣大的城區，但蘇俄紅軍所以卒能把頑強的敵人驅逐出境，第一是宣傳工作做得好，我們用飛機散放傳單，赤裸裸地揭露了敵國資本家進攻蘇俄的野心和一般官兵為資本家效死的非計。敵軍的下級官佐和士兵看了這些宣傳品皆很受感動，漸漸都不肯出死命作戰。第二是紅軍採取了致敵死命的游擊戰術。那次國際聯軍在西伯利亞布置了六千里地長的一道戰線。這條過長的戰線，他們無論如何也難以顧及週到。紅軍埋伏在戰線兩旁，抓着適當的機會，便隨時予他們一個猝不及防的襲擊；同時，對於他們的運輸和接濟也巧妙地給予許多阻礙和破壞，使他們隨時隨地都可遇到襲擊，於是敵軍陷於一種恐怖氣氛中。顧此失彼，疲於奔命，無法可以克復他們的艱難和困苦。這兩方面已夠保證紅軍最後勝利的取得；再加上紅軍吃苦耐勞，戰鬥意志堅強，對於主義有深刻認識，以及到處都有廣大民衆的協助和合作；於是帝國主義者的聯軍便不得不在重大損失，無法支

持的情況之下，退出俄境了。

軍區司令的這番談話，給我莫大的欣喜，真是巧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上了。

過烏拉山後，沿途各站都有不少的小販。他們販賣的都是全國各地特產的工藝品，我覺得這偏辦法很好，我想我國各地精美的土產也很多，像宜興的陶器，無錫的泥塑，濰縣的手杖，掖縣的滑石等等，都是能引起中外旅客們心愛的物品。如果把全國各地這些工藝品運到鐵路各站販賣，豈不增加很大的銷路！但這個事體不是僅憑百姓的力量所能辦到的，而當時我們政府正忙於權利的爭奪，又那有心力管這些閒帳呢。

沿途各站都準備着熱水，旅客們可以隨意取用，不出水資，旅客下車喝水，都自動排隊，按照秩序先後取飲，好像有人指揮着似的，絕對沒有爭先恐後的現象。在我國，當火車進站，剛剛停下的時候，旅客們便一擁而下；等到火車行開，又拚命的往上擠，那種你推我擠，紊亂紛雜的情形，與這兒秩序井然的現象一比較，真令人生無限感慨！我看這不是一件小事。完全表現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與精神，決不是政府的功令軍警的打罵所可做到的！

## 第三十四章 在莫斯科

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正午，我們一行人到達了莫斯科。經過五六天因頓的火車生活，一下車，便覺得耳目一新。在車站上歡迎的人員很多：步兵騎兵，都人強馬壯，武器鮮明；蘇聯政府人員個個顯得精明強幹，富於朝氣，其中最多而且最使我注意的，是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的中國男女青年學生。他們約四五百人，齒齒齊齊的排列在那兒，都有一種英俊有為的樣子。他們手裏捧着小旗，狂熱的高呼着：「中國國民軍萬歲」的口號，使我極是感動。他們貼的標語各式各樣，諸如歡迎國民軍領袖之類，不在別國留學多學機械、學工程、學礦務、學醫藥等等，蘇俄留學生則專學革命。這般有骨頭有血性的知識青年。後來回國後，流血汗，拚性命，為國家，為民族而英勇的奮鬥，有紅色光榮軍、鐵拳，有的方為國家的棟樑，那時我想到他們的責任與使命，即為之十分興奮。照相的把我圍團圍攔，重重層層，十分擁擠；也有拍攝活動影片的，拿着各種各樣的標件，真是從未見過。隨後有代表致歡迎詞，我也略說了幾句客氣話，答謝他們。在站上擾擾攘攘，足足鬧了一個鐘頭，我們才走到街上，街道很寬闊，很平坦，很清潔，處處整齊活潑，井然有序，我們坐着汽車往蘇聯政府預備的歐羅巴旅館去；汽車是蓬子車，蓬子並

沒放下來。我和徐季龍先生同坐一車，風馳電掣在平坦的街上急馳。走到半途，徐先生的帽子忽然被風吹掉，車走的太快，來不及停車拾取，滿以為這頂帽子是失了，要買一頂新的了，孰知我們到了旅館裏，沒過十分鐘，警察就把那頂丟失的帽子送了來。這樣優良的警政，很使我們羨慕。

歐羅巴旅館是一座堂皇富麗的大廈。蘇俄政府爲我們預備了豐盛的飲食，招待的極是殷勤，我在張家口住的是土房，我一生也未住過這樣好的大樓，心裏老覺得不安。想自己找一家較小的旅館去住。招待的人一定不肯。我想着國內正與軍閥苦鬪的朋友與同志，對着面前講究的菜飯實也無法下嚥。於是自己上街買些羅葡大蔥回來佐膳。招待者不明白我的意思，以爲我是怕花錢，見而暗笑；一再申說這是他們政府預備的，不用我自己花錢。我說不是你說的意思，你不懂得我，再三糾纏，始允我辦。

在旅館住了幾天，我便遷到查理村去住，蘇聯政府爲了我參觀與考察的方便，特派烏斯馬諾夫先生爲我的顧問。烏顧問曾任過加倫將軍的參謀長，很有學問，談吐也好。他本來學習文學，後來投到算隊裏當兵，那時還在帝俄時代，他在軍隊中宣傳革命，不遺餘力，長官屢次警告他，威嚇他，但他不聽，仍然堅決沉毅地幹下去，曾多次入獄。以後入軍官學校，繼續深造，求得很高的學問，我們在查理同住，他每天給我講一點鐘的辯證法唯物論，每次總在郊外的樹林下上

課。這是戰研究新與西學的開始。同時，我還請了一位繪畫教師，那位先生很年青，每日談話的幾三千里地火車趕來給我上課，沒到時間即在屋外徘徊，到時再入我室。畫的很好，但教的未甚得法，雖然如此，這一方面因為他的誠懇教養，一方面滿我自己用心學習，所以我對繪畫，頗有甚入門的心得。讀書繪畫之餘，有時也到附近的工廠或礦廠裏做工。我想在居俄期間，也能夠自食其力，並能比較真正的和工農的生活打成一片。

我到莫斯科的時候，政府派了四位士校階級的朋友為我名譽保護人，其中有二位，每日跟隨着我在外面四處跑，自實在太辛苦，另有二位狀猶現，向俄新稅地的塔處，我就送給池五廿元，過兩兩天，此仇卻被撤換，打聽之後，我知道因為他受了我的錢，被俄人告發，捕去送黑房去了。為此事使我甚不安。可見人家一面激着對俄，一面更有考精與黃劑之制。我搬到渣理村鄉間住後，四位名譽保護人亦同往。他們都穿着便服，泊天站在不讓別人看見的地方，夜間爬在樹上，蹲在屋頂上。有一夜他們捕獲幾個小偷，都是帝制時代的親貴，有曾任宮中禁衛軍者。昔時好吃懶做，養成了習慣，現時社會改變了，不能做工，只有偷竊度日。我覺得他們警戒的辦法，好幾俄國站崗，老是站在門口，成天二鬼把門式，進出行禮，實在失了此事的本意了，可惜不能改革。

我在渣理村住的屋子，原是一個汽車夫的私宅，完全是木頭製造的，此時由國家收買了去，

屋中僱用一女工，每天上工，他脫了衣服，褲腿捲到膝蓋上，用一塊破麻布擦地板，大規模的擦，渾身用力，把地板擦得潔淨無塵。我問她何以如此賣力。回答說因為警察每星期要來檢查一次，擦的不乾淨，將受處罰。我就笑了，這是很重要的事，我國警察那能管到這種事？因此，我想到規條、法律、章程等等，我國皆應有盡有，都不缺少的；所缺的就是這樣認真的實行，就是缺少任勞任怨的人，切實的執行。若能事事負責，處處實行，則十年二十年之努力，亦必能使面目煥然一新。

居俄的時候，和蘇聯政府的主要人員差不多都見過幾次面，第一個會見的是外交委員長齊趣林，我到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就到旅館裏來看我。隨着我又和徐季龍先生去看他。相見寒暄一番，無非告訴我旅館中派有人員招待，歡迎我參觀各機關團體，多多指教一類的話。會談之間，也會談到中國的問題。他對中國的情形，尤其回教的情況，相當的熟悉。

第三國際負責人也會面談過一次，我現在已經忘記他的姓名。好像他曾被通緝，或者現在已經死去了。那次我們談了三個鐘頭，對於歐洲近勢和東方各民族革命的問題都談得很詳細。他留給我的印象，是說話很有條理，態度異常的誠懇，雖然說到後來。他因談話過多，不免顯出疲乏的樣子，但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談下去。

蘇聯人民政府主席加列甯是農民出身。我和季龍先生按照約會的時間去拜訪他，看見他兩目

深陷，滿面黃鬚，穿着一身半新不舊的西服，動作言語無一不是農民的風度。他那時已經五六十歲了，還很矍鑠健康，他和我們詳談蘇聯革命的過程以及那時解決土地問題的方策。當他談話的時候，先還好好的坐着，一會兒就在他坐的椅子上跪着一膝，一會兒走到桌子邊，兩手握著，有時兩手托腮，撐在桌子上，有時不動的搓動着，任往一談二三個鐘頭，完全是鄉下老頭兒談家常的派頭，深切活潑，隨隨便便，沒有一點官架子。後來詳談蘇俄建設的各方情形，及所遇的困難，又問及我們關於五卅慘案和首都革命之事，我們也一一詳述一番。

他的辦公屋子是在二層樓上，那天樓底下坐着很多的老百姓，男女老少，各色各樣的人物都有，我看見如此熱鬧，覺得奇怪，下樓的時候，我問其中一位老農夫：

「你們在這裏做什麼？」

「我們要見加列寧。」

「見他有什麼事情？」

「我有一隻耕牛病了。我要請加列寧替我想方法另外借給我一隻牛。」

我又問另一個抱着孩子的婦人，她回答道：

「我的孩子病了，現在雖然好了一點，但是病還沒有脫體，我要請加列寧替我想點辦法。」  
「我」連問了許多位，他們都以自己的困難，來求主席設法解決，這在我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可是主席一延見他們，也有派秘書等人員一一代爲接見，他們所要求必都予以妥帖滿意的處理與解決，我當時大受感動。我們的總統或國務總理那能如此耐煩？他們時時擺着官僚的架子，他們視百姓如奴隸，百姓怕他們如虎狼。相互之間，永恆的保持着「治人」和「治於人」的關係，彼此隔膜，不相親近。百姓只知道替他們納糧服役，官吏則孜孜於搜刮與淫樂。像加列寧似的和老百姓親愛如家人，彼此生活打成一片，中國的人民那裏夢想得到呢？我以爲我國官吏最須效法這種精神。

一天約定和人民委員會主席阿里克夫談話，他住在帝俄時代皇帝住的舊皇城裏。皇城門口和裏邊警衛森嚴，我們的車子到了門口，警衛者迎接着，先向裏面打電話請示，後才放我們進去。這次我們談了兩個鐘頭，他也是談的蘇聯革命的情形。我把中國革命的現狀說了一個大概。

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原是德國籍，在德國因革命失敗，逃亡至俄，據說他是蘇聯的「中國通」。他對中國各方面問題很下了一番研究的工夫。他也住在皇城裏頭。他的書室在樓上，書架上擺滿中國書，室中陳列着許多中國的小擺設。第二天他請我和季龍先生吃飯，飯前他拿出他所珍藏的一隻嶄新的中國水煙袋（他用做一種擺設），要求我們吸一袋水煙給他看看。他也覺得中國水煙袋極有研究，世界各國都趕不上，言時甚表興趣。他的談鋒甚健，對問題不厭反覆詳細的討論。有一次到中山大學訪晤他，季龍先生和他談到斯大林在某次羣衆大會講演，宣稱蘇聯與日

本的關係已很親善，將更進一步的敦睦邦交云云。季龍先生把此事向他提出質問，兩下起了激烈的辯論，季龍先生說，蘇聯既願與中國站在一條戰線，攜手奮鬥，便不應在中國正當進行革命力謀打斷日本帝國主義所加的鎖鏈的時候，而與中國的敵人日本講什麼親善，說什麼敦睦邦交。日本是東亞的強盜，蘇俄為何要與強盜爲友？拉狄克說，主義與政策不能混爲一談。政策與外交手段又有不同。他說主義是一回事，政策是一回事，外交手腕又是一回事。季龍先生說，便是這樣，你們也當給我們一個信兒。現在如此辦理，我們國民黨的三大政策怎樣向人民交代？第一天他們辯論了兩個鐘頭沒有結果，第二天再見面，又辯論了兩三個鐘頭，愈是辯論，愈是激烈，愈是不得解決。看樣子他們真像要打起來才能罷休；季龍先生心裏不服，尤其慷慨激昂，義形於色。我於此事極佩服季龍先生，真不愧爲愛國家愛真理的有心人。他對問題嚴肅認真的精神，真是少見的。

伏羅希洛夫是蘇聯海陸空軍的委員長。我訪會他的時候，提出一些關於蘇聯軍備的問題請教。他詳談我所詢問題，說話有條有理。人們都見過他的相片，大臉大口，濃眉大眼，渾厚而有精神。他的服裝和普通士兵一樣，只領子上符號不同，算是全蘇聯最高軍事領袖的特別符號，他的飲食也和普通士兵一樣；日常生活，非常簡樸，真正做到與士卒同甘苦的地步。後來他也問及關於我們國民軍和軍閥們苦鬪的情形，與國內政治的一般形勢。他說，中國是一個有偉大前途

的國家，只要堅持主義，努力貫徹，沒有不成功的。陸海空軍委員會所即在大街上，門前看不見崗兵，崗兵站在門裏，老立着正，不許稍息。這樣的辦法，和中國的情形正相反。我們衙門，站崗的都擺在外面，好像唯恐人家不看見一樣。有的兩個，有的四個：張作霖的崗兵老是六個八個，格外顯得耀武揚威。

蘇聯出版事業由國家經營。國家印刷出版的書籍，供應全國，日以萬千計。這機關歸他們的教育委員會管轄。教育委員長那時是盧那卡爾斯基。這人很有語言天才，會說幾種回國話。當蘇聯剛剛推翻帝制，革命基礎尚未鞏固的時候，帝國主義者聯合進軍圍攻，希圖破壞其革命政權。在南俄土耳其斯坦地方，有反革命農民軍興起，也將發生戰事，顯然的，那時的紅軍無論怎樣堅強，是不堪再加上這邊一隻敵軍的壓迫了。軍事當局看着危局已迫，而又無法擺脫這個難題。這時候盧那卡爾斯基自告奮勇，要求派他到那裏去：他自信可以用理論去說服這頑強的敵人，取得兵不血刃的勝利。許多人都認為這太危險，恐怕他徒遭犧牲，他仍然堅持着去了。經過了多少困難，始得到達；一到敵人那邊，果然便被逮捕起來。他見了敵軍司令官說，我有幾句話，等我說完，你再殺我。乃與之侃侃而談，痛陳他們革命意義與價值和對於弱小民族的利益。那司令官初尚不聽，不等他說話說完，便要殺掉他；終因敵軍參謀長的緩頰，盧氏乃得盡陳他的理論，他說了足足四個鐘頭。那司令官心已動搖，便對他說：

「你如果能說服我們全體官兵，那我們就贊成你的意見，停止進兵的計劃！」

全體官兵召集好了。他剛剛站上講台的時候，羣衆對他感情極壞，冒罵叫囂，秩序大亂，甚至有舉起槍來做槍決他的樣式的。但他講了一點鐘後，羣衆漸漸安靜了；講演完畢，全體官兵都傾心贊佩，異常堅決的舉起手來，願意與蘇聯革命政權攜手共同奮鬥。天大的一場風波就這樣漸漸的平息了。

我有幸聽他親口暢談這次事件的經過，心裏感到無上的興奮。

托洛斯基也曾會談。那時他方在病癒之後，住的屋子很是講究。他是個極有才能的政治家，那時已經快五十歲，相貌奇偉，談吐也不俗氣，處處顯出堅毅果斷的神氣。我們談了三個多鐘頭的話，都是關於革命方略一類問題。我對此類道理，那時毫不熟悉，爲要藏拙，我不大開口，只聽徐先生與之暢談。我素來聽說托氏是一個奢華風流的革命家。但我並不因此而藐視他。我以爲聖賢是聖賢，英雄是英雄，不可並論。魏無知介紹陳平於漢高祖，高祖以其品行不端，欲拒之，魏曰：你需要的是英雄，不是聖賢。我若介紹伯夷叔齊給你，於你何補？高祖乃悟。列甯當初信用托氏，恐亦此理。我想在生活習慣上，列甯一定和他弄不來。他住那麼好的屋子，那樣奢華的享用，茶碗點心拿出來，都與衆不同。列甯在當時看的憤麼？但畢竟重用之，列甯真不愧爲革命領袖。

那時斯大林住在黑海養病，不在莫斯科；僅只給我一信，說等他病好，再行約會。我很想和他見面談談，可是始終不會見到他，引以為憾。

又見到列甯夫人，那時他爲教育委員會副委員長。又有列甯之妹，亦同時見面。列甯夫人莊重懇摯，說話不慌不忙。那次她贈我一部列甯全集（二十六冊），和一座列甯雕像；那像看去如銅質的，不想掉在地上竟打碎了。（列甯之妹亦贈我同樣一份）

蘇聯是個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上一切設施與制度，都是爲平民着想。比如飲食，那時肉類，鷄、魚和其他珍貴的食品，定價非常昂貴；生活必需食品，如麵包、牛奶、白糖、食鹽之類則大量出賣，價錢非常的低廉。在莫斯科生活，每人每月有十元的費用就很舒適的過日子。這在其他國家的都市裏萬萬辦不到的。有兩次，我們從街上買來麵包，剖開來裏面有半截煙捲。初時不懂什麼緣故，覺得不衛生，拿去告訴警察。警察處罰了那家麵包公司。此後即未再有此事。想來皆因做的太多，工匠不小心，所以把煙捲頭弄了進去。這項麵包公司，都是大規模的製作。這樣，人工柴火等等皆較經濟。若家家戶戶自製，則一萬家人家，即需十萬個爐灶，一萬個人工。所費爲如何？凡事都是集體化爲佳，是我們應當學習的。衣服一項，也是如此。爲平民預備的，已經製成的衣服，價目極賤。如果要穿考究的衣服，必須自己到成衣店裏特製，價目可就貴得駭人了。

蘇聯行的是保護稅制，爲要限制私人過分的享樂，對於入口的奢侈品徵極貴之稅。比如爲私人享受的福特汽車。每輛要徵九千元的稅；爲公共用的大汽車，則徵很低的稅，甚至不徵稅。

那時蘇聯政府還在禁酒，但俄國人民好酒成性，在禮拜日仍有很多人跑到野外樹林裏喝酒。他們對於音樂有特殊興趣。在風和日麗的天氣，坐在蒼鬱蒼翠的樹林中，一面喝酒，一面奏樂唱歌，確也可以消除一禮拜來工作的疲勞，可是在街上時常發現倒臥地上的醉漢，三三五五所在都有；這就未免過於沉溺了。

蘇聯雖是一黨專政，但對於非黨員毫不歧視，對於黨員亦毫不偏袒。黨員和紅軍犯罪，反較非黨員或普通人懲處更嚴，往往加倍治罪。我在莫斯科的時候，他們的經濟副委員長和總務處長兩個人因購買黃金，有舞弊情事。（若以爲共產黨中不會有貪污之事，那是錯誤的，但不問的是他們嚴究不貸，並不認爲究辦了就失黨的面子）這事若是普通人做的，至多不過處以無期徒刑，但因爲他們身爲官吏，又是黨員，所以都執行槍決，並把他們的罪狀公佈於全國。這樣公正嚴明，執法如山，人民怎不信服？反觀那時我國政府，却上下欺騙，狼狽爲奸。所謂「官官相護」，同僚們姦弊犯罪，彼此心照，擠擠眼就寫完了事；主官亦「掩耳盜鈴」，裝作不問不聞，雖有彈劾之例，但對於有權勢的人則輕易不敢相加；即使偶提彈劾，也輕易不發生效力；甚至可修改

條例，以將就祖護之；如此紀綱不攝，法令無從執行，吏制鮮有不盪敗者。

蘇聯政府官吏待遇，最高的每月不過二百三十元，最低的也有七八十元。完全本行大官不過多，小官不過少的原則，雖然還未完全平等，不分軒輊，但已經相當合理了。工人的待遇却特別優越，我住在歐羅巴旅館的時候，和旅館裏的一個女工閒談，我問她每天工作多少時間，每日多少錢的報酬。她告訴我：

「我在這兒每天工作八小時，每月得四十五元的報酬。我在這兒服務已有二十年了。在帝俄時代，每月僅有三四元的工資；革命以後，政府提高工人的待遇，便增到現在這個數目。在工人之中，我的報酬還算是最少的。這完全是法律給我們的保障，政府給我們的福利。」

「你原先僅有三四元的收入，怎能維持生活呢？」

「過去的苦況簡直不堪回想了，家裏父母子女，幾個人完全依賴我的收入過活。那時候那能說得上是生活，完全是在飢餓困苦中掙扎！」她停了一會兒，又很愉快的說：「現在我們好了，現在我們不但能夠維持舒適的生活，而且還可以餘下錢，閒暇時候還可以看看電影，跳跳舞！」

我訪問其他工人，他們也都對現狀表示滿意。蘇聯政府如此爲人民謀利益，人民怎不熱烈擁護呢？

那時莫斯科各方面都一天天向新的路上邁進。我參觀了他們的許多機關和工廠，由一位會說

中國話的女子做義務導、飛機製造廠和航空學校，設備極完全。我以為鐵廠、鋼廠、飛機廠，這些重工業都是立國的根基，少了一樣，即如一個人少了一根骨頭，即站不起來。我國要在世界上站立起來，還得大大努力。

蘇聯的步兵學校和機關槍教導團我也參觀過。教導團團長是個英武壯健的軍官，年紀很輕。他原是木匠出身，後來參加革命，以積功升為連長；畢業陸大後，便擢任該團團長。因為他不是少爺出身，所以深知士兵的艱苦。他的太太原先是一個縫工。此時入了文理學院肄業，年齡和她的丈夫相仿，為人活潑聰明，招待客人很殷勤週到。

我參觀他們的兵棚的時候，正赶上他們在吃飯。我也做了一次不速之客，和他們同吃了一頓飯。他們吃的是一盆洋白菜湯，內有一大塊牛肉，每人都可吃到三四兩肉。很富於養料的。我想我國的士兵，在吃的方面未免太苦，別的方面尤可忍受，吃的太苦，即影響健康和精神。若能每人有兩個雞蛋，三四兩肉，就可以供應身體的需要了。只要能節省其他方面的消耗與糜費，這並不是難辦的事。

飯後我和士兵談話，他們都有相當的政論常識。他們對中國的情形很熟悉，知道吳佩孚是以英帝國主義做背景，張作霖不折不扣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每連都有一所紅色列甯講堂，這是專門對他們講解主義和傳佈政治知識的所在。



參觀他們的陸軍大學，我發現學生的領章，有許多會充任軍長師長和軍醫軍需。我問他們既已擔任軍隊中的職務，爲什麼又來上學呢？他們說，他們多是工匠出身，作戰經驗是有的，軍事知識却很欠缺，軍佐們甚至把命令都弄不清楚。政府爲要補救這個缺陷，特在陸大成立了一個特別班，把他們一批批地調來受訓。我想我國很有採取這個辦法的必要。我們軍隊裏的官佐，多半出身貧家，連普通啓蒙教育都沒有受過；高深的軍事知識，更是說不到了。在可能的範圍內，對官佐士兵的教育雖然竭力的講求，但成績究竟有限，有時仍吃官佐程度太差的虧。我們政府也應採取這種辦法，分批調訓，提高全國現任官佐的程度，以彌補其缺點。

我也參觀了他們的農業部。我如鄉下老兒進城一般，遇事一一細問，得了很多關於農業方面的知識。他們爲了改進農業，特設農業教育館，專門講求種植的科學方法。他們本來行的是三期制；將一塊地分作三坵，每年只種用一坵，輪流休息。他們很重視我國的農業技術，比如換種制。我國實行已久，如今他們已棄三期制，而改換種制，（如年年在同一塊地方種西瓜，第二年即不長瓜）館中經常的召集農民聽講農業常識：如害蟲益蟲，益鳥等等，亦都細說，以灌輸科學知識。

又有農民招待所之設，是專爲招待各地來游莫斯科的農民的。農民因訴訟或其他的事情來到莫斯科，都有住招待所的權利。所裏的伙食取價很廉，在外邊花一元錢吃的飯，在所裏只需花兩

角錢。我曾在那裏吃過兩次飯，真當得起物美價廉四字，所中辦的極完備，甚至做狀紙代打官司的律師也有；爲平民謀利益，卽當如此無微不至。

莫斯科的博物館很多。石像、油畫、歷史、革命等博物館我都參觀過。石像博物館裏，以石像爲最多，有許多畫像、皇帝、皇后、神父、和帝俄時代的大將都有，技術都很高超，真是維妙維肖，和真人站在那兒一樣，我問館裏的一位當事人，這麼一張畫現在能值多少錢；他說：

「這種畫在帝俄時代能值一萬盧布，甚至十萬八萬，現在已經不值錢了。」於是他告訴我這些畫只講究技術，而內容毫無意義，他說：

「現在值錢的必須有技術，而更有意義，比如，曾有一幅描寫帝俄時代農奴生活的畫子，畫着三個六七歲的農奴的孩子，骨瘦如柴，拉着一輛裝滿柴草的大車，那種困苦吃力的樣兒，活跳的現在紙上。把地主的暴虐不仁，深深反映了出來。皇帝覺得這張畫子有煽動革命的嫌疑，把那畫家捕獲入獄。但那張畫却饒倖的被人保藏起來。一直沒有毀壞。革命成功，這張畫便成了最名貴的作品。現在能值三萬盧布。」

據說那張畫的技術，並不特別高明，可是因爲立意好，又有這樣一段歷史，便博得大眾的讚賞。由此知道繪畫一道，技術固然重要，但更須能夠表現時代與社會，方爲不朽。

革命博物館陳列的都是關於革命的事蹟，從帝俄時代起，所有關於革命的報紙、雜誌、畫

報、泥土塑成的囚禁革命黨人的特別監獄模型等等。都按照年代，一一陳列在那裏。所有革命英烈，都塑成石膏像，受萬衆的瞻仰。列寧的生平事蹟，也以實在物品表示出來，以至他被刺殺時刺客所用的手槍及槍鎗裏剩餘的一粒子彈，都很有秩序排列着。還有鮮花裂的列寧像，數日即一換，一羣羣的男女學生絡繹不絕地前來參觀。我想這些實在物品所表現的革命歷史給予他們的知識教訓及薰陶暗示，當比讀許多革命歷史要強勝幾倍。館中職員都由女子充任，個個態度和藹，極有學問的樣子。

紅軍博物館那時正着手布置，還沒有完成，但那已經佈置好了一部分，即足夠人讚佩的了。每一次戰役紅軍進擊或退却的情況都繪成很生動的畫圖，張掛壁間。紅軍的槍枝，服裝以及傷兵在醫院裏的情形，也都以實物或模型陳列出來。這多麼的具體活現的革命紀事，這是多麼激發人們的革命情緒的博物館。

博物館之中，尚有一所民族博物館，將全世界及全蘇各民族服裝用品及生活風俗等一一製成模型陳列出來，使參觀者如讀一本活的地理歷史書，真是有裨。

克魯泡特金圖書館是克氏生前的住宅改造而成。那條街在他死後改名克魯泡特金街。一進門首先便看到克氏的宗派圖。樓圖上說明他是帝俄皇室的正宗，也是貴族的一支，我看了這個宗派圖，覺得一個人的意識固然是環境決定的。但個人也決不是處在完全被動的地位；個人的意識

夫可以衝破環境的束縛，而向前進步。克魯泡特金的思想學說，他那熱烈的革命情緒，都不是貴族的守舊社會裏所能生長出來的。

又看見過莫斯科水庫，工程極偉大，供給莫斯科全城三四百萬居民用水。汲水、澆水等等設備至爲精妥。還有專門管拉垃圾物的工廠，怎麼提油，怎麼化燬，都用機器，工廠聽說也極偉大，可惜沒有得暇去看。

我第一次在莫斯科聽戲，爲蘇聯政府所邀請，一位兵工廠的管事者陪同去的，那管事者是個大樞子，和鹿瑞伯相熟，因他到中國，鹿曾招待過他。那天演的是描寫英人在宜昌槍殺中國人的故事。劇作者是一位曾經在中國住過的俄人。表演得很成熟，佈景尤能逼真。一隻大輪船的模型也巧妙的搬到舞台上，碼頭上有修脚的，賣毛巾，賣耳扒者；他們後來都下台向觀衆兜售，很有意思，劇情極生動，帝國主義者驅使買辦，買辦驅使工頭，工頭壓迫工人的種種情形，都赤裸裸揭露出來，擺到觀衆的面前，使每個觀衆的心裏都燃燒起反對帝國主義者的怒火，而對被壓迫的民族寄予深厚的同情。這齣戲演完，還演了一齣歌劇，歌詞我雖然不懂，但聲調頗爲粗俗，動作也是亂行亂鬧，我亦大能夠欣賞。那兵工廠的管事有一位太太，滿嘴塗抹口紅，耳上戴着很長的珠寶耳環。我問他她是不是共產黨員，他笑道：「我不知道，最好你問她自己罷。」翻譯名克拉夫，亦在旁大笑，恐怕是革命後他鬧的什麼皇室小姐之類。有一次他請我吃飯，客廳佈置得很講

究，那椅子特別舒服。他告訴我。他把佈置七八間客廳的錢集中起來，辦了這一間客廳的傢俱。工人有夏令會的組織，每年有兩星期休假，每天吃五頓，或天打球，泗水，隨意游散或閱讀書報；此外無別項工作。著作家亦有夏令會的組織，都由政府款待，住在昔日王公的別墅內，圖書齊備，招待週到，亦吃五頓。那天同參觀的有于右任先生，我們對此事都不勝其欣羨之情。于先生說，在我國，只有在要作對聯祭文，要打通電時才想到文人，平時那個管？不但不管，還要用種種方法威迫利誘之，否則逮捕槍殺之，使他們不能為真摯正義說話。他們真正愛國家愛民族愛人類，工作統盡腦汁，但是手中無武力，無槍械，無金錢，那個把他們聽在眼裏？于先生說的是實情話。直到今日，一般文人還都在生活困難，帶着一大羣家小，搬到這裏，搬到那裏，收入微薄，需要的書報也辦不齊全，那裏有心寫出什麼巨著來？

每逢星期日，野外樹林中最為活躍熱鬧，到處人們熙熙攘攘，音樂歌唱，如在天國樂園中相似。人民辛苦工作了一星期，實在需要這樣的半個機會玩玩笑笑，以暢胸懷，於精神身體與工作效率，都是不可少的。

我在張家口時所聘的總顧問任江，為人誠懇坦白，後因干涉騎兵教導團分配馬匹之事，辭職回國，我在莫斯科見到他。他為中將階級，任訓練總監之職，見我極親熱，處處予我們以幫忙。我因左肋下感痛，想到醫院看看，即被導入院。身體全部都經仔細檢查，文照及光線檢不出

病之所在，以爲是勞累過度，叫我多多休息。後來又以爲係牙齒有病所致，故又入牙醫醫院檢查，亦沒查出什麼病。在牙醫院中，見其牙病模型種類之繁多，證明蘇聯人民牙齒不及中國人的遠甚；恐怕是因爲他們喜歡吃糖果之故。

我曾參加過幾次集會。一天軍委會副委員長杜恰哈爾夫斯基通知我，他們將開一航空委員會，約我去參加。那來到會的不滿二十人，會議極有精神，極有秩序，大家有話即說，無半點拘束與喬假。真是着重內容，而不重儀式。其所行規例，與中山先生民權初步所示者略同。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還開過歡迎會。東方大學學生包括東方各民族，中國學生亦很多。致歡迎詞者名片山潛，日本人，已五六十歲。他以英語講了兩三小時。會散之後，看看問問他們學生的生活。因爲都是些落後民族的子弟，日常生活習慣各有不同。比如抽水馬桶，許多學生不但不會用，連看也沒看見過。有的教了多日，還是不會用；更有一位學生見水灌出，卽大爲一驚，嚇的往外奔跑，幾乎跌倒。差不多每一事，都需人指教，中山大學特送我與季龍先生「名譽學生」的頭銜。自來只有名譽校董之類，名譽學生之稱，還是第一次聽到，真是革命的辦法。至今國內留俄同學會仍認我爲會員之一，卽因爲我有此一段事之故。

中山大學學生常來看我，和我談學生界黨派情形，大約有共產黨，準共產黨，國民黨等等；彼此亦有摩擦之事。那時三位谷先生——谷正綱谷正倫——都在，我們會談過很長的時間。又會

看到我熊斌先生送來留學的二軍三軍的學生，都在某也補習軍事，很是用功。其中有一個學生因爲看見當地男女之間沒有拘檢，他就摸解了，一次，看見一位女子露出胸乳，他就上前伸手撫摸，被那女子打了兩個巴掌。我聽見人家說及此事，不禁的笑了。我以爲這可以給他一個教訓，人家男女解放並不是這樣解放的；真是好笑！

又到列甯格勒參觀軍官學校，有專爲高麗人，台灣人而設者，也有日本人；其中有從我國北平保定去的。一次請我講話，即由他們爲翻譯。他們把民族國家的界線都已忘記了，相處如一家人，十分親熱。聽說現在他們多有回東北活動革命者；當初他們在蘇聯受教育，受訓練，即是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復興自己的民族，這回我也帶了些學生來，其中有一蒙古學生，姓白，現已回蒙古任師長之職。

有一次逢節日，莫斯科舉行閱兵典禮，亦約我參加，我亦被邀立於列甯台上，看他們操演，參加者男女都有，軍樂洋洋，步伐整齊，縱橫分列，變化種種，極是純熟。他們一排排由台下經過，台上的人即問：「你們預備好了沒有？」答曰：「預備好了！」「預備了什麼？」答曰：「預備了什麼。」又問：「爲什麼預備這些？」答曰：「爲打倒帝國主義！」種種問答，都很有意思，會場空氣活潑而又嚴肅，使人深受感動。會散之後，又參觀列甯墓。門內門外各有軍士站崗，極其肅靜。棺材是玻璃製的，可以看見列甯遺體；其尸經過防腐手續，故栩栩如生。那

時政府有計劃，擬改用石製，以垂永遠，現在想已完成，後面城根有許多革命同志的墓，亦都講究的很，聽說來參觀的每日以數千計。蘇聯真有宣傳工夫，連一個尸骸也不放鬆，用作了宣傳的工具。試問每日這許多人來參觀，所收宣傳的功効有多大？墓上，即皇城門樓上有鐘，能打出國際歌的調子，聽着極有意思。

走出列甯墓，許多花園圍着看我，四位保護人不肯，但無法阻止。他們說：「我們要看看中國國民軍的領袖爲什麼不可以？」四位保護者不能阻攔，若任其擁來，又覺得不妥當。乃把我引到皇家旅館的花園坐下，喝茶休息。羣衆要見我的，三三五五請進來，和我握手，談長道短，都是些普通人民。他們極關心我們的時事，問我張作霖何時可以打倒，吳佩孚如何場台等等，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我國革命的熱忱。我在這花園中坐着，看見對面紅場上許多牌坊，還有古廟形式的屋子。那兒供有耶穌像，亦設於玻璃罩中。有些人民前去禮拜，跪着與耶穌接吻。可是上面却大書標語，曰：「宗教即是鴉片煙」。可見他們政府反對宗教，但並不壓迫人民不信，完全聽其自由，政府只是從旁勸導而已。

莫斯科公園極多，簡直是一座挨着一座，其中有立棚瓜架，有葡萄架，有樹蔭，有許多的椅子。椅子坐着都很舒適。南京陵園當初亦有如此辦理的意思。但距城太遠，能夠享受的人畢竟太少，這個應籌建在大街附近，要多種樹，多設座位，始是爲大眾謀利益的辦法。



我到公園中去坐。常常看見有白髮蒼蒼的老人東走西走的討錢。我們都覺得奇怪。以爲蘇聯是共產主義的國家，怎麼還有乞丐？又朋友們出外時鋼筆常常被人竊去，心裏也覺得不痛快。其實那時蘇聯方在革命之後，社會上各方面尙未就緒，人們依其理想憑空猜度，認爲蘇聯必是天堂，什麼陰暗方面都不會存在，及看見實在情形，就不免失望。這只能怪他自己沒思索。蘇聯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是從舊社會演變的。那些舊時代的皇室親貴們，剛剛被打倒，他們享福慣了，懶怠成性，不願意工作，或是沒能力工作；不作乞丐盜賊，有什麼路走？我想蘇聯連頭建設，無論那一方面都在突飛猛進，臻臻日上；這些現象，在今日應當就看不見了。

在蘇聯常見蘋果樹，皆高達二三丈餘，枝葉繁茂，纍纍的果子直搭到地上，十分可愛，那種蘋果較我國北方各省及煙台產品爲小，脆甜無比。蘇聯天氣嚴寒，竟能產出這樣美好的果木，真是難得，我國氣候溫和，土壤肥厚，而園藝不發達，想起來覺得可嘆！

蘇聯街上那時最多的是馬車。路是用四五寸厚的石頭鋪築而成，馬車走在上面，至爲平穩。車夫都是黃鬚子，凹眼睛，樣子看去大致相同。騾車却少見，人力車絕對沒有，我以爲路必須用右鋪築；洋灰或土築路，都不能耐久，車輪用木頭亦太笨，亦須設法改良，這些都不是難事。

列甯格勒是帝俄的故都，也是工農革命的發祥地。我於七月二十日由莫斯科到那兒，小住了六天。

由莫斯科到列寧格勒，鐵路是一條直綫，沿途並不繞道，經過繁華的城市。通過綠林錯列的原野，火車由莫斯科筆直的開到人煙稠密的列寧格勒。不僅連列寧格勒的鐵路毫不彎曲，列寧格勒的街道和河路也是筆直的。人定勝天，列城的建設確可以作為證明。

三十一日十一時到達列寧格勒，下車後便偕同來迎的海陸軍將校去參觀他們的海軍，我把每一部分士兵。每一隻軍艦，都仔細的看過，潛水艇、魚雷船、無敵艦也經過詳細的觀察。電氣事業進步得真快，將來必有用電力指揮機艦，駕駛飛機的一天。潛水艦上的砲不須人去裝彈發出，只要人用手指把機關一點，彈藥箱裏的砲彈便自動的移入砲膛；再一點動，砲彈即自動發出。現在電力的應用，即已達此地步；將來精益求精，前途將不可思議。

掩護列寧格勒的海濱要塞砲台我也參觀過。列城距芬蘭很近。芬蘭的逃兵往往循海道逃來列寧城。到了冬天，海水結冰，兩岸之間坦如平地，交通更便。要塞的工程很是偉大，但裝置的大砲還都是帝俄時代的遺物。也許為要保持軍事秘密，故意不讓我們看到新設的砲位吧！

那兒巍巍雄偉的皇宮，此刻已成一般人民的遊覽之所。皇宮中一切規模陳設，都原封不動地保存着，一如舊日光景，尼古拉第二的臥床，辦公的桌子，吃飯洗澡的屋子，大彼得時的臥床，靴子以及飲酒用的斗（大如四十斤的大斗，恐得再用杯舀取），都擺在那裏，任人觀覽。皇宮裏面貴重的古董，俄皇日用的金製器具，都在古物保存所裏保存着。我請保管人員把那些東西拿出來

看了一看，金色燦爛，使人立刻想像到俄皇窮奢極華的生活。

帝制時代專爲囚禁革命黨人員而設的水牢，也和古蹟保存着。那水牢防備嚴密，看形勢，略如北平南海的瀛台。

列城也有幾所博物館，陳列的東西倒不算少，但並沒有什麼出色的地方。

我在列城也是住在蘇聯政府預備的旅館裏。星期日的早晨，我看見四五百工人，聚集在大禮堂前的空場上，都帶着槍枝，從事軍事訓練。據說這是工人自動的組織，工人每逢星期日都要分別從事軍訓的。

列甯格勒的工人休息所是一所王宮的別墅，我去參觀的時候，那些正在休假期中的體力或精神勞動者都滿面含着愉快的微笑。

從列甯格勒乘車到路加站，再從路加站換乘小火車，便到達蘇聯砲兵幕營地址。我在那兒會見了他們砲兵團團長和政治代表，而後又到砲兵射擊場，參觀他們的實彈打靶，靶場有幾十里寬闊，場中已有幾處破塌的地方，據說原來修築的極平整。指揮官用電話及砲彈指揮射擊，從很遠的地方一按機關，表示敵人的所在，砲兵便按一定的速度發砲，過遲過快都打不着目標。他們完全是實彈演習，一天便可消耗許多砲彈，每次演習要連續幾個月。這種設備完全的靶場，在我是第一次見到；這種大規模的演習在我國也是從未見過的。我們的大砲是從外國買來，彈藥也是

從外國買來。本國既不能製造，砲兵便很難有實彈演習的機會，就是偶而演習一二次，也不過打個五六發，就算了事。如此訓練，射擊的技術那能鞏確優良呢。

在列寧格勒參觀了幾日，便轉回莫斯科。

這時張家駒送了人報報告我們國民軍同張吳聯軍正在南口打得激烈，某方又無端約在大同截斷國民軍的後路。我聽了他們的報告，坐臥不安。同俄國朋友談了幾次，商請他們接濟些彈藥，俾可再接再厲的奮翻下法。不久改接到國民軍已從南口退却的消息，我接到這個痛心的消息，無論如何不能再在莫斯科住下去了；同時又知道國民革命軍已從廣東出發北伐，我便同許多朋友以及顧問烏斯馬諾夫等商談回國的事。經過幾日的籌備，於八月十七日的晚間便上了火車，與留居三月的莫斯科告別了。

這回回到蘇聯的，除徐季龍先生而外，尚有劉瓚、柯其華、張光榮、李興中、任右民等，他們或隨同我到莫斯科參觀，有的入學校，入工廠從事學習；隨從人員還有趙亦雲、陳天秩二位，時刻在我跟前。

## 第三十五章 五原誓師

我在留俄的三個月內，接見了蘇聯朝野的許多人士：工人、農人、文人、婦孺以及軍政界的領袖；從和這些人的會談以及我自己對於革命理論與實踐的潛心研究和考察的結果，深切的領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鮮明的主義與參加爲行動中心的黨的組織不可，在我留俄的期中，我自己和國民軍全體官兵，都正式登記加入領導中國革命的國民黨了，當我們國民軍與軍閥集團在南口浴血鏖戰的時候，國民革命軍也在廣東誓師，出發詔關，實行北伐了。當時全國各地瀰漫着革命的雲煙，而我們困蹶數月，彈盡糧絕的國民軍，此時又有放棄南口向西北退却之訊，石筱山代表國民軍全體將領到庫倫，連電促我歸國，在此情形中，勢已不容我再在莫斯科逗留。我同顧問烏斯馬諾夫等幾位朋友討論，他們也都贊同我回國的計劃。於是略作準備，立刻動身。

啓行前的一切準備，都是顧問烏斯馬諾夫代辦的。爲防備日本帝國主義或其他方面歹人的暗算，我們極力保持行蹤的祕密。此次我們未乘專車，僅在西伯利亞東行列車的後面掛了一輛客車。上車之後，沿途各站都不下車，深恐被人知道。這樣靜悄悄地離了蘇俄；和去時的熱烈情形大不相同，車在廣漠遼闊的原野中穿行而過，所見惟有一望無際的麥田，濃蔭夾道的樹林；還有

各種芳菲美麗的花草，迎風搖曳；也好像在歡迎我們的歸國。

列車很長，我們的車掛在最後，每逢到站，我們掛的車正好停在站外。此時我也常常下車，在野地裏轉轉走走，以恢復身心的疲勞。有一天車停在烏拉山西的一個大站上，我正在野地中間步的時候，護衛我的四個戈別烏（即暗探）催我趕緊的上車。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事。回頭即看見他們拔出手槍，迫令一個人也上了車，原來他們發覺那人身帶手槍，形跡可疑，所以要弄他上車盤問。他們問那人道：

「你是做什麼的？」

「我是政治局戈別烏！」那人回答道。

「你既然是戈別烏，爲什麼把手槍露在外面呢？」

那人回答不出理由來，於是將那戈別烏的隊長找來，當即把他送回莫斯科，加以處分並重新訓練。這樁疑案總算了結。經過這件事，我纔知道蘇俄於每個站上，每列車上，都派有很多的密探。他們和普通乘客完全一樣，也是穿着便服，也是買票坐車，嚴密地偵緝各種情事；尤注意軍人行動，若有越規行爲，立刻逮捕嚴辦。西伯利亞鐵路上十幾天的長途旅行，所以輕易不發生意外者，都因偵察嚴密，報告確實的緣故。這種嚴密的辦法，是蘇聯的政治精神與黨的紀律的表現。我在莫斯科時曾聽說他們清黨之事，每一黨員都經嚴密的考察，凡言語行動有不合，即被洗

刷，結果被洗刷者佔全數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被洗刷的黨員有由岸上跳河自殺者。

靜悄悄的到達上烏金斯克。我們掛的車便停了下來。爲迴避站上的人多眼衆，我特意到車站北面一個大樹林裏去休息。一切出發庫倫事宜，如接洽汽車等，仍由烏斯馬諾夫他們去籌備。我在樹林裏住着，看看書報和公文，或和朋友們談談話。那時中國駐上烏金斯克的領事爲毛以亨，此時以事他往，負責人爲科長戈定遠。戈先生浙江人，高個兒，三十多歲，說話極有條理，我住的樹林裏距領事館約有十里之遙，戈先生一日三次，親自步行，送飯給我吃，飯盒菜罐足有三四十斤重量，都是他自己攜拿，不用差役，免得被人注意，以一文學生，有此耐勞吃苦的精神，覺得真不容易，那時正在八月天氣，中午時候頗爲燥熱，但樹林中倒十分涼快。

這次隨我同行的有劉伯堅，（留法學生，轉入蘇聯東方大學，五原審師任爲政治部副部長）李興中，（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後由參謀長升至軍長）任右民（隨我爲英文書記，曾爲我代表見中山先生），何其鞏（爲我祕書，後任至北平市長），趙亦雲（隨我爲工兵營學生，善攝影），李連海（本軍學兵，送蘇聯學砲兵，後畢業陸大）和烏斯馬諾夫及他帶來的一位黨代表，另外還有一位顧問，一位翻譯官和一些衛兵，汽車找妥，我們一行人便即離開上烏金斯克，向庫倫進發。這一條汽車路，當上次經過還沒有架設完成的橋樑，現在都已修造的完完整整，匆匆三月的光景，情形已大不同。『努力就是文明』，這句話真是不錯！

到了庫倫，仍住在我上次住過的二道巷寓所。我們國民黨軍在此設有辦事處，張允榮（曾爲十六混成旅書記長，擢任副官長）同陳繼淹（二十鎮學兵任副官由高級教導團畢業陸大）兩位原都住在那兒。我們到時，張允榮已走，他因接到我回國的消息，同時又知道南口退却，故趕往包頭，一方面把我的行跡告訴他們；一方面探看那方面的實況，預備回頭來給我報告。這個聯絡的任務，似乎並無什麼困難，其實殊不容易。因爲從庫倫到包頭這條路，可以說從開天闢地以來沒有人走過，苟非敢於冒險。不畏艱苦之人，簡直會膽喪氣沮，無法勝任，張允榮却自動的欣然而去，真是個熱血赤心的革命者。

我們在庫倫住了兩天，因爲對於國民黨開會的儀式還不熟習，我便和劉伯堅、何其鞏、李興中、任右民、烏斯馬諾夫及祕書顧問翻譯等從事練習。有一次練習開會時，烏斯馬諾夫站起來，很鄭重地說：「開會這是革命工作之一。大家不可隨便嬉笑」，說了幾句。當時我尚不知有何所措，後來才有人告訴我，有一回正當開會的時候，何其鞏輕率談笑，頗有視爲兒戲的樣子，劉伯堅是個嚴肅的革命青年，對何之態度，視爲應當糾正，於是把此事告訴了烏斯馬諾夫，因此惹得他說了這番話，這完全是何其鞏的錯誤，當大家鄭重其事的練習開會時，他豈可輕狂發笑？此等處大可看出當時人們的心理；而劉伯堅與烏顧問的嚴肅不苟的精神，尤值得我們佩服的。

我們在庫倫準備好了汽車糧秣，便即動身赴包頭，此時漠北氣候夜間已很寒冷，衣服方面也



略作籌備，往包頭去的這條路，最快也需七晝夜，若走的慢，就說不定要費多少時日。汽車行走本當很快，可是我們動身的這一天，就走錯了方向。往包頭應該往南走；但行經之處全是一望無際的平原草地，毫無標識可以憑記，因此最易迷失方向，引路人不知不覺指引汽車向正西到阿爾泰的路上開去了。午後一點鐘出發，車行極速，儘快開駛，直到五點多鐘才發覺方向走錯，及至掉轉車循原路走回，到那岔路之地的時候，已是夜間八點鐘了。那晚即在這岔路地方住宿。其地有一條小河，不見人煙，無法找得住處，大家便在河畔露宿，略作安頓，更找了些乾牛糞作燃料，燒了茶來吃，我忍着滿身疲勞，蟄伏在車上寫了日記，和大家或坐或談。所謂「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此時這裏氣候已經寒冷。我穿着皮褲，還是凍得受不了。天空晴朗高爽，佈滿了燦爛的星斗，冷颼颼的秋風吹着。嚴霜已開始下降。曠野中死一般的寂靜，什麼聲音也沒有；只有草中唧唧的秋蟲和河中淙淙的流水應和着，奏着和諧而悲涼的音樂。我和隨行的朋友看着天上的星斗，那是北斗星，那是北極星，如何依據星的部位辨認方向，大家喝着用牛糞燒的熱茶，靜靜地圍坐着。後來烏斯馬諾夫忽然問我說：

「馮先生，你的部隊這回在南口一敗塗地，投降的投降了，潰散的潰散了，現在你帶着我們回去。究竟怎樣辦理呢？」

我很自信的回答他道：

「只要我們能邁着兩股，有個三二百人，我就可以有辦法。就算跑到山上去當個山大王，我也一定有把握將原有隊伍慢慢招集起來。」

他聽了我的話，十分興奮，微笑地說道：

「不但可以遇到三三百，我們一定可以遇到成千成萬的人馬！」

當晚直到大家疲倦得不能支持，纔各人胡亂找了一個地方躺下；有的躺在車上，有的躺在車下，有的索性就躺在露天之中。這一晚，恐怕誰也沒有入夢。

我們九月十日從庫倫動身，第二天纔離開這留宿一宵的岔路口，找到了向南的正路往包頭出發。於路上又遇着許多羣黃羊，每羣三四千頭或成萬頭，不知道我的汽車是什麼東西，一路搶先恐後的追跑。有幾位看着有趣，就開槍打，並開着汽車追趕，但是跑的飛快，無法趕得上。聽說曾有外國旅客團追趕牠們，因速度太快以致翻車出險者頗多。我曾想過牠們的生活，這裏一片平地，究在何處做窩？晚上宿在何處？何以繁殖力如此之大？我想牠們全仗着跑得快的一付本領，以才能生存。在白天路上有兩個難問題：一是喝水找不着水源，二是吃飯找不着食糧和燒煮的地方。但到看見有放牧的家羊，就知道不遠處定有人煙，於是下車找着那人家向他們買羊，用牛糞燒煮，蒙古朋友宰羊的方法很妙，在羊的胸口上刺一刀，便伸手在脊骨上一推，那羊立刻死掉。手法便捷，可惜我們沒有學會。可見蒙古同胞自有他們的文明，我們吃飯時候，常有婦人騎着馬

來，後面跟一個孩子，也是騎着一匹馬，他們走到跟前，就眼瞪瞪的呆望着，看我們吃飯。我們就找他們談話，問問地方的風俗民情，一會兒工夫，他們即掉轉馬頭，教那馬放開「大把」（四蹄放平），狂奔而去，宛如我們騎自行車一般。

十二日啓行不久，途見王鎮淮（第二十鎮的人後隨我由參謀升至旅長。）宋式顏（軍官學校學生甚精幹）。黃中漢（軍官學校學生，由參謀任至宋哲元部參謀長）等乘着汽車，迎面而來，因為各走一邊，兩下錯過。及後看見，方把他們攔回，乃問他們三位何往。回說打算到上烏金斯克去，因為隊伍退却，秩序大亂，簡直不能收拾，必須另想新的辦法才好。我勸他們跟我回來，共同設法，於是他們掉回頭，與我同行。由此可見大軍受挫，人心動搖，簡直成了土崩瓦解的局面，他們都是很有知識能力的人，看見局勢如此，即各人打各人的主意，想自己的辦法，恐亦實有不得已者！

雖然走了二百多里，平原一帶廣闊可數千里，遠處看見南面前方又有一輛車在走，恐怕也是熟人，於是忙着叫喇叭招呼，及至趕上，乃是于右任先生，相見極是歡喜。我問他到那裏去，他說打算取道庫倫往海參威，再繞海道赴廣東。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究竟受了什麼刺激；他不肯說，後來聽別人轉述，才知道他這次到了包頭，看見我們部隊渙散狼狽的情形，實在已至不能維持軍紀的程度，他在包頭與鹿瑞伯的衛隊榮光與鄒同住一個教室裏，那些弟兄在饑寒交迫

之中煎熬得無法可想，部隊精神已經不能顧全，一天，他放在桌子上的一隻金手錶，竟被一個士兵進來一聲不響地拿了就走。他說，「這是我的錶！」但那個兵却不管，依然揚長而去。他問在場的一個下級官道：

「這是怎麼會事？我們部隊怎麼變成這樣了？」

那下級官抱歉地說道：「于先生，請你原諒一點吧！我們隊伍從南口撤退，整天挨餓受凍，人心已經渙散得無法收拾了，老實的弟兄尙能忍受，那刁滑一點的，爲要活命，什麼事做不出來？這是狗急跳牆，有什麼法子呢？」

他一看部隊已經到了這個地步，還可以有什麼作爲？於是他就靜悄悄的由後門上了汽車，離開包頭來了。我明白了這些原因，素知于先生富有革命精神，我們多年相契，我誠心的敬佩他。於是極力勸他和我再回去；烏斯馬諾夫也從旁勸說，告訴他馮先生只要有五百枝槍在手，就定有辦法。他聽我們一說，也覺得高興了，於是又借同趕路望包頭前進。沿途我們隨同衆人尋檢牛糞以爲燃料；買着羊，就放在汽油桶中煮而食之；若遇到蒙古包，無論裏面多麼髒，也要蹲到裏面去，寫寫字，作作詩，——于右任先生的詩興更是濃厚，成天的詠吟着。

走入內蒙的邊界，再往南便是綏遠地方，綠色草原漸多，到處都看見牧放的馬羣和羊羣。馬牛羊便是蒙古人的財產，他們還是過的牧畜生活。

這一帶隨處都可以行車，因為隨處都是平沙漠漠，一望無涯，所以一不小心，就會把路走錯。尤怕沙堆多的地方，一座座有如墳頭，高四五尺，六七八尺，汽車在上面簡直是無法走動，若遇沙深之地，必須用幾條氈毯，墊在沙面，大家下來推着車往前走，氈毯一步一移，輪流往前替移，車也一步步往前推行，宛如北方接新娘子下轎的方法，艱難的情況，真比「難於上青天」的蜀道還要艱難。沿途喝水，沿着前清設有驛站的地方，都可以找着水井，若能循着驛站走，喝水不成問題；一脫開驛路，就沒有辦法，并不甚深，都只有四五尺左右，其所以不能多鑿井者，是因為人煙稀少，沒有人工的緣故。清康熙遠征於此，大肆殺戮，人殺盡，屋燬光，如此大劫，迄未恢復，否則這一帶必不致如此荒涼。

再往前行，就遇見從包頭參加會議回來迎我的張允榮。見面之後，他詳談包頭會議的情形，因為張作霖，吳佩孚，李景林，張宗昌，褚玉璞等驍軍以帝國主義勢力為背景，集中全力攻打我們國民軍，第二第三軍都先後失敗；掉頭又打一軍。南口失守後，勢力窮促，又加一退就是一二千里路下來，西北這一帶如此荒僻，士兵如此疲敝，大家當然不免懊喪。在會議時候，大家免不了掉自訴槍彈缺乏，人馬不濟的意思。那時張之江為督辦，他為人耿直老實，因見大家都說困難，訴窮苦；要錢，要彈，張弄得急了，就說：「今天是要命有命，要錢沒錢！」這是一句北方的土話，不應該用來對部屬說，因此大家聽了都不高興。在席者有趙守鈺先生，他見此情形，就笑起

來，問他笑什麼，他說道：

「你們忘記是幹什麼的了！我們是革命，革命就是克服困難，不是坐享安逸舒服。若是百事順遂，毫無困難，還要革命做什麼？我們現在處境當然不順，可是並未至絕望之地。往西有甘肅劉督辦，薛省長，那末大的土地，難道我們真的餓死凍死？二軍三軍也都在那邊，力量上也很有可觀，總司令又打俄國回來了，我們克服了困難，前途立刻就是光明。何必這樣懊喪！」生靈還是老的辣，趙先生久經風波，把的穩大舵，幾句話又把在席的人說出勁兒來了。接着張允榮又把南口失敗的原因，韓、石暫投晉閻的經過以及官兵的飢寒交迫和渴望我回來的情形，一一詳談；又知道佟麟閣孫連仲劉汝明等都率部開往甘肅，已過五原。張之江鹿瑞伯都已見面，鹿瑞伯則帶着隊伍駐五原等我。這天晚上我們便在往綏遠的一個叉路口上住下；我坐在荒野裏，細聽張允榮報告這次令人痛心的經過詳情。

當時我決定先赴五原。第二天，汽車沿着陰山山脈前行，往往整日不見人烟。有一段路全是土疙瘩，宛如坎地一般，汽車上上下下，顛簸不堪，幾十里路都是如此，車子很吃了虧。再過去就是戈壁沙漠，數十里路皆如乾涸了的河道，不是亂石，就是沙土，幾輛車上的人都下來步行。車子開不動，大家合力推行；推過一輛，回頭再推第二輛，每天最多走十幾里。夜間總是露宿，冷是冷，但比第一夜爲舒服。因爲越往南行，天氣越是暖和了，一天，在一民家買得一點小米。

熬成稀粥，大家都吃得眉開眼笑，覺得比吃燕菜還要高興。

過了沙漠，漸漸看見有丈把高的小山。岩皆皎白色，上面嵌着黑色星點，映着日光，閃爍耀目。在泰山亦未見過這樣的石頭。途中還遇數個大廟，廟中極污穢。蒙古喇嘛都穿着紫色的皮袍衣褲，戴着皮帽。找他們談談地方的風俗民情，有人代爲翻譯。其中一喇嘛自言其弟兄四個，三人當了喇嘛，在家者一人，名爲黑人。他娶一女子，以牧畜爲業。他們三位當喇嘛的弟兄回了家，即與弟媳同睡一炕。所談種種，都愚昧可憐，使人聞之痛心。都是教育文化落後的過錯，必須力求進步，始可使民族立足於世界。

又走了一天，遇見宋哲元來迎，相見十分歡喜。他談在前方作戰及沿途退却情形，彼此都很難過。他汽車裏帶着許多西瓜。在這沙漠乾涸之地，頗連困頓之時，竟得有西瓜吃，大家無不喜出望外。產西瓜之地，距此約有四日汽車路程，故本地人多一輩子沒有吃過西瓜。我們剖開大吃。益發覺得香甜。在塞外西瓜要到九月才得成熟，和直魯內地情形完全不同；在內地，到這時候，西瓜的成熟期差不多早已過去了。

由此再行，每日天未明即走，到天黑始住，很是忙迫，而所帶汽油是否夠用的問題尤其使人心焦。十四日午後一點，距大青山約一百多里之際，遇鹿瑞伯、鄧哲熙、過之翰等，已得着宋明軒的通知，帶着一連手槍隊，前來迎接。大家見面，悲喜交集，手槍隊官兵們見了戎，多不自禁

地流下淚來，一如良家忠厚子弟受了人家的欺侮，一朝見了父兄的面，卻不免悲從中來一樣。我只好一一安慰之。並與談革命大勢，中外英雄的故事，以及救國救民的道理。講了一番，他們即十分奮振，我與宋、鹿、鄧等同車，於途中詳述一切，大家都極興奮。

大青山爲陰山山脈，山勢高聳，在古代漢族勢力最盛時，此地爲漢蒙交界之處。山上出一種野羊，名爲大青羊。其毛厚而且長（約有八寸），較狐皮猶佳。羊出山頂，每逢刮大風的日子，羊迎風立於山顛，毫不畏冷。這種極好的出產，可惜今日已經日見稀少，行有絕種之勢了。大青山有一山口，名爲烏卜郎口，地形至特別，兩邊高山陡立，中有一口，可行汽車。若無此路，則交通完全阻斷。黃河年年成災，我想若將此口道鑿深，引導河水由此經沙漠，直由黑龍江出口，則河水三分之一有了出路，一方面可灌溉大漠，成爲肥沃土地；一方面又可免除黃河水災，其利益爲如何。有人說，如此艱苦工程，怎麼着手？那麼我要問他：「巴拿馬怎麼開成的？蘇彝士運河又怎麼開的？」烏卜郎口南端出口，便是烏蘭腦包。有二軍三軍五軍六軍的官長士兵在附近一帶村莊零零落落的駐着，聽說我到了，都出來迎接。他們的頭髮都好久沒有剃了，蓬鬆地散在頭上，個個人滿面風塵，可是排成隊來，却仍然非常整齊。

那天下午到達五原。空落落的一個土圍子，人煙稀疏，荒涼冷落得趕不上內地一個較大的村鎮，當日和一軍朋友見面，三軍孫禹行二哥那時亦在此，五軍方振武，六軍弓富魁，二軍亦有幾



位朋友，都一一會見。大家各談別後情形，他們一致推舉我就總司令之職。隨即開會，正式公推我爲國民軍總司令。我義不容辭，當即發出一個自我校勉與獻身革命的誓詞的宣言。這文件較爲重要，故將原文照錄於此：

「在辭林是江湖武夫，萍蓬戎馬，昧者罕聞，惟不自識好動圖數國，德奈身軀短淺，對於革命的方法不得認領，所以飄然野，法國遠遊。敢至達到蘇聯，看見世界革命，起了萬丈高潮，中國是世界的一部份，受國外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壓迫，革命運動早已勃興，又受世界的影響，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即由此而生。於是我們明了救國的要訣已經由他開闢了道路。中山先生說的好，行易知難，我既是知道，自然是刻不容緩的馬上幹起來，又因最近中國的國民軍退後，受壓迫比從前更厲害，我的熱血沸騰起來，情不獲已，遂辭職回國，與諸同志上革命戰線，共同奮鬥。我這是沒有辦法而去，有打辦法而來，徒的時候不是潑然鳴高，來的時候不是應聲東山再起。現在當備國之始，有些必要的話，掬誠以告國人。我是在江家的家庭中，父爲九江，貧無立錫，完全是無產階級的。自幼失學，及長入伍當兵，逢着庚子年，八國聯軍攻打中國，結訂辛丑條約。我受了極強烈的刺激，憤政府失敗，改革的思想於是萌芽。後來受了革命的影響，也形成了推倒滿清的志願，辛亥武昌起義，我與張之江、李鴻鐘、張樹聲、韓復渠諸同人，到了洪金銘，施從雲、白亞爾諸烈士舉兵



我特寫述出來，好使國人對於我有明確的認識。有人罵孫中山先生，說孫中山算是有點革命癖，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就要革命。若是他的兒子孫科當了大總統，他也要革命的。在他人以爲這是罵孫先生，其實孫先生的偉大，正在在此。一個革命者，不要看見統治者作的不對，就得要革命，無論他是親也好，長官也好，站在民族前意義上，這些個人私情，一概都顧不得。吳佩孚張勳閉嘴所抱守的綱常名教，儘可由學究們放在紙堆裏保存，不能拿到二十世紀。民主國裏每人。但是有一層，我雖然作過幾點革命導議，我卻沒有鮮明的革命旗幟，因為我對於革命，只有籠統的觀念，沒有明確的主張，革命的意義，革命的方針，在從前我都沒有考察，所以只有一二點改革的革命，而沒有徹底的辦法。我也赤裸裸的說出來，好使國人知道我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是革命，出原故到底是怎么回事。就革命的觀點說過去，若說這中國革命者，是一個中流砥柱者，我都不配。至於馮克斯主義，列寧主義與世界陣論的話，更是懶於討論。不意當時有執說我亦化訂，現在隨處來，真是惭愧。當時的馮任群，那裏能夠在赤化訂，不但罵我的不如亦化是什麼，就是我自己，亦不知道什麼是赤化，罵我的人，也說不出根據來，只說不該與蘇聯親善。我想地球帝國主義，明明不帶條條壓迫中國，制中國的死命，只有蘇聯自動的取消不平等條約，以平等對待我們民族，自是引起我們的好感，使我們彼此親善。若對於以平等待我的人，即與蘇聯之親善言，反法把時奴禁待我們國家，這是何等亡國心理。這是要窮國人明白的。至於

吳佩孚亂造謠言，說我與蘇聯結了什麼密約，尤其荒唐之語！我向來痛惡賣國賊與外國人結密約，豈有躬身自蹈之理？蘇聯把種種不平等的條約自動的取消了，那裏有再結不利於中國的條約之理？況且我個人的性格所在，絕不屑作這種鬼祟之事。如果有什麼密約，也不能久於瞞人，甚麼密約，甚麼條件，何以絕無所聞？若說蘇聯幫助中國革命，有所懷疑，要知道蘇聯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壓迫者並扶助弱小民族為己任；主義在此，什麼不利於人的事都作不出來。吳佩孚肚子裏此誰都明白，他明白馮玉祥不是一個結密約之人，無論如何作不出這種事來的。他又知道漸亦化離的很遠，夠不上戴這帽子，而他偏要說什麼密約，又是什麼討赤，完全是騙人來共同反對國民軍，以洩他的私忿，大家不知道隨聲附和，實在上了他的大當。吳佩孚先是號召的所謂討賊戰爭，後來忽而變而為反國民軍的戰爭，國民軍退天津，退北京，一再讓步，誰知你越讓，他越攻，軍閥何以如此呢？軍閥本身實在無此力量，乃是帝國主義者在背後主持，因此我們要想戰勝軍閥，必須先要打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壓迫之甚，幾使中國不能生存，工人農人及一切受苦難的人為什麼這樣窮，這樣苦？就是帝國主義所給的。帝國主義的各國，強迫中國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於是中國有租界，有租借地，有海陸軍駐紮權，有航權，有領事裁判權，修鐵路開礦山，把持中國的海關，強制中國行協定關稅，壓迫剝削，不一而足。例如抽關稅，只能

獲百抽三五，使中國國庫少收入，整理財政無從着手，而最大的害處，是在阻礙工商業之發展。

制中國經濟之生命，使他們的貨物壟斷輸入，使中國的原料賤價輸出。於是中國每年進口貨超過出口貨，其數在三萬萬兩銀子之譜，賠款及外債，本息償還，單是在關稅兩稅項下撥付的每年款是九千八百萬元，至於他們在中國經營的礦山輪船，各種工廠，各地銀行紙幣所吸收的大批現金更是無算。又因關稅不自主，不能保護國貨發漲，致使洋貨壟斷中國，吸去的現金何勝計，如此中國只得窮困，而且窮到死的地位。帝國主義的侵略把中國弄窮了，又用政治經濟滲透於中國，東交民巷的公使團提何等強橫，稍微明白中國軟弱的，沒有不效道的，他們對於中國的內政動輒加以干涉，如法蘭西大沽事件，干涉國民軍，即是一例。其最利害的是利用中國軍閥壓迫民衆，又唆使軍閥互相戰爭不已，以鞏固其在華之權利。遂使民國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戰禍。已經被他們弄窮了的中國，又加上十幾年的戰爭，於是農人、工人、商人、學生、機關職員、新聞記者、兵士及一切的民衆窮的窮死，其原因都出於此。苦痛的來源已經求出了，我們要解除這深切的痛苦，惟有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與革命同志們共同担負這個使命。現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孫中山先生的遺囑，進行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所有國民黨一二兩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議決案全部接受，並促其實現，今後將國民軍建在民衆的意義上，完全爲民衆的武力，與民衆要相結合，軍隊所在的地方，工人組織、農人組織，均當幫助，并聯合其他民衆團體，共負革命的責任。同時對於學生、教員、商人、機關職員、新聞記者及各階級之利益均

極力顧全，意義是在解放中國被壓迫之民族，以與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軍閥之壓迫，使工人不受剝削，農民不受窮苦，商人不做產，學生有書讀，教員及機關職員都有薪水發，新聞記者不發生命之危險，與及其他人民的痛苦均能解除，至於政治主張，我是主張一個國民黨黨員，又是國民政府委員之一，一切由國民黨決定，國民政府主持，我惟有與諸同志用集合全體的力量履行就是了，謹此宣言。」於民國十五年九月十六日。

籌備妥善，即於九月十七日十二點鐘舉行就職誓師授旗的典禮。會場設在城內縣政府新廣場上，臨時我上台，台底二丈見方，頂一丈見方，高六尺，坐北朝南，于主任先生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資格為授旗的黨代表，各軍連營長以上的到會很多。

這天天氣極好，但漢北氣候極冷，于先生頭髮蓬鬆，鬚鬚黑多白少，長及腹部，戴着一頂新半舊的黑色學生帽。上穿夾襖，下穿棉褲，外罩一件黑色皮大衣，腳上玄色魚頭布鞋，白布襪子，都已變成灰色。到會的官兵們的服裝五顏六色，有的破鞋破襪，有的穿着破襪而沒有鞋子。衣服破爛不堪，領章肩章全都沒有了；帽子有的為奉軍的皮帽，有的為直軍的布帽，器械皆不全，槍上有的沒有槍帶，有的沒有刺刀，亦有無子彈帶者，真是七零八落，破不着一個整齊的人。會後聚餐，大家一菜一飯，以白開水為湯，菜是大鍋菜，連大鍋子置於桌上，要吃的就自己動手去盛，名為「革命飯」。當日種種的情形，大略如此。

宣誓就職，並發出通電，即着手組織總司令部（共爲兩部兩廳八司兩處）。常卽任鹿鍾麟爲總司令，何其震爲秘書長，李興中爲參謀處長，陳連富爲糧官處長，徐廷藩爲軍務處長，宋式顏爲軍械處長，過之翰爲軍需處長，張吉埔爲軍法處長，張允榮爲內防處長，薛篤弼爲財政委員會委員長，此外，又聘烏斯馬諾夫等爲政治法律顧問，任石敬亭爲政治部長，劉伯堅副之。同時選派黨政工作人員分赴各軍，成立政治處，担任全軍黨務政治訓練宣傳工作，並從事民衆工作，以收軍民合作之效。一面租作佈置，一面印計劃總方略。究應由南口攻北京抑應猛攻陝西而後出潼關？李大劍先生派人送給我密件，建議我們出長安會師鄭州，我們加以研究，乃決定採用李先生計劃。當定方針爲「固甘援陝，聯晉圍豫」八個字。

軍隊於潰敗之餘，局促窮荒，糧秣匱乏，飽一餐，餓兩頓，人人而有菜色，南口退却，交通損壞，後面又有敵兵緊迫，官兵行李衣服不及攜帶，完全丟去，退的時候天氣尙暖，轉眼秋深天冷了，大家還穿着單衣，逼在眉睫，不容遲延的問題，就是如何使官兵得着飽暖？病者傷者又如何處置？餉項一節簡直不名一文。兩部分隊伍，爲幾塊錢之事往往爭執動武，又當如何解決？總司令部成立後，首先把全部力量集中辦此，本地有土著王英，他的父親王老先生，前一二二年我曾見過，外號叫做王瞎子，個兒高大，那時已八九十歲。老先生原爲河北順德人，說他在原籍因賭輸錢而致虧累，一說因殺人逃命，十八歲時流亡到五原，種田度日。他見地方貧瘠，可堪黃河

相距如此之近，心心念念想利用黃河之冰，以裨益耕植。費了很大的心力，挖掘溝洫，每道寬數丈，深數尺，都有一定。樂成之後，水利大興，農事日盛。後來外國留學回來的水利專家來此察看，亦說其築洫工程深合科學原理。政府見他是個奇才，曾予獎狀。傳到他的兒子王英，已有地數千頃，羊羣無數。王英見我們艱難困苦，乃贈羊數萬頭。我們對此「雪中送炭」，極是感激，乃以羊肉爲軍糧，以其皮子爲軍衣，無給官兵，一律穿此帶血的皮統。官兵所以不致凍餓而死者，實有賴於此。現在王英已爲敵作僇，然而我看他不是甘爲漢奸之人，必有人逼之，方走上這條黑路。又有陳殿民者，原在南充時曾在我們兵營的馬號中做過事，後來派到包頭，以開墾種樹爲業，和地方百姓感情融洽，處的極好。我即派他辦兵站。因得人民幫助，成績至佳。一百姓幫忙功自成」，真不是一句假話。其姪陳萬元，至今仍在我們處做事。

劉郁芬那時爲甘肅督辦，薛子良爲省長，知道我們此間困苦，薛特送來十萬元，爲我們的給養之資，棉衣等約五千五千的由黃河以船送來，錢固不夠，被服亦緩不濟急，然而已經不容易得來。劉爲人厚道忠誠，循規蹈矩，雖有過於穩健，不敢冒險之病，實在亦頗有能力。薛爲人才長心細，我界以政治部長之職，很有辦法。又王鐵老在包甯鐵路任上，陸續領款，積有數萬元，此時亦全數送來。說時勢如此，鐵路尚不知何日始可修成，你且挪此錢爲革命之用吧！他人多趁火打劫，將公費挾逃，我收下此款，念及他老人家一生清廉，持家儉苦，故提出兩千元，給他木木



辦法，以作爲家用。他太太却將錢送回，拒而不納，並且附了一封信，說貴軍方舉義旗，處境困苦，務請留爲軍費，革命成功，人人都蒙幸福云云。聽說許多道理。總司令部中人入敬佩，連外國顧問亦十分欣羨，以爲是中國真實人物。其信後由鹿體麟帶往蘇聯，王鐵老一生廉正，其家屬亦有如此者！王死後政府特爲立傳給卹，備極褒揚。

糧食問題的解決，最不容易。因爲地方貧瘠，一下住着許多人，那裏籌辦法？而部隊急待開拔，擬分三路，先撥長安，而後出潼關，會師鄭州。如此艱巨任務，總不能餓着肚子行軍。時有蕭某爲臨河設治局局長，自告奮勇，說他和臨河士紳極有交情，但須我寫二十付對子，交他拿去，必可籌糧萬担。我聽了他的話，研墨辦紙，整整寫了一夜。寫得手凍要裂，方才寫成，他叫落什麼款，我就寫什麼款。那時我一筆五八字。還不知今日整齊，可是對子交他拿去，他却一去數月沒有音訊。後來劉鎮華部敗退，長安之圍已解，他纔打電報給我，說糧食已辦齊，叫我先匯十萬元給他，以備運糧。我覺得好笑，復寫說：我若有此錢，即不勞你去辦糧了，你還是快把我寫的對子拿回來吧。此人係石友三介紹來的，曾爲省議員，因才頗佳，及後我到鄭州，宋哲元由西安來電保他爲縣長。我說這人言過其實，不可重用，後來他不知怎麼弄到西安市長。至今仍有不可用者，但觀其行爲，實在可惡的很。

詳子長送來的十萬元，我撥作士兵被服之用。包頭方面的部隊，需棉衣尤爲急迫，此時張作

霖封鎖我們，把通內地的交通加以斷絕，布疋之類都到不了包頭五原。弄得沒有辦法，把市上的布疋購買一空。其中大都是本地的粗布，拿來製棉衣裹子，士兵們穿着，花花綠綠，彼此相視，都不禁苦笑。

軍隊既是如此困苦，我個人的生活，自然也無不問。包頭縣長書務此時送我一桌酒席，意思大約是犒勞我。我把席送還，不敢享用。後來見面，我忍不住問他：你這種行為，豈不是巴結長官。你是那裏來的錢？憑你這樣做，就不是愛惜人民國家！又五原縣長劉必輝，也是見我飲食太苦，一天特意送給我二隻鴨子。他只看見我天天吃鹹菜，而不知道士兵們天天吃不飽飯。這次我實在對他不起。每隻鴨子回敬一軍棍，打了他一十軍棍。我覺得他是毀我。其實劉為人謹慎樸實，不是沒有他送鴨的用心，就我個人言，則他很可感佩。然而我處之處理，亦有不得不然的苦處，實非得已。後來我在察哈爾抗日，他在察哈爾又任縣長之職，其有政聲。

時司令部有副官倡朝棟，赴包頭辦事，被土匪綁去。察信索槍四十枝，款二十萬勳贖，否則毀票。我接到此信。心想應派人去談判，愈將被其所挾，故即把信撕去，揚言這：我們是在這裏革命的，我們不是在做官發財。我們的錢繳槍枝從薄薄命正還不夠，我們那裏有錢拿去救他？又說從前楚霸王綁漢高祖之父以挾高祖，高祖同他說，必欲烹，請分我一杯羹。古人於其父猶如此，我對你們的勒索更可不理了。經此處置，土匪覺得白費一番心計，對這副官的看守也就



何，待遇士兵如何。有一種認真的官長，雖處極難之境，亦仍然能夠保持舊有精神。比如董玉振部，一路經過各地，照常步伐整齊，唱着軍歌，毫無紊亂的現象。我到包頭檢閱時，他率部來迎，連裹腿都打得一模一樣。當肚子飢餓，身上寒冷之時，軍容仍能如此，實在不是容易的事。董之長處即在於小處留心，大處明白，做事腳踏實地，一絲不苟，故此次特升董玉振為旅長，後來送入陸軍大學深造，今仍在孫桐萱部任職。

劉汝明勇敢堅毅，為傑出將才。此次在兩口苦守，敵人大炮如雨，他任的指揮室亦被打塌數處。他仍然在牆隅拿着電話從容指揮。劉為人沉默寡言，不善交際，對部屬極為愛護，故人人親近他，服從他。此次有董燕甫等數部都撥歸他。

朱哲元沉着勇猛，尤能切切實實的練兵，故將整頓下來的各部官長（有官加無兵）悉數歸他，整編為第一師，預備補充新兵，從事訓練。

方振武也是一個能幹有為的將領，對軍紀尤不肯絲毫苟且。他率部隊退到綏遠的時候，因有一兵吃了百姓的西瓜未給錢，那百姓前去呼冤；他查明屬實，當即把那兵槍斃。有人會說這是小事，何至有槍殺之罪，其實不然。此種處如輕輕放過，人人玩忽，全部紀律必將無法維持，此為軍隊性命根本之事，不容寬情姑息的。我們軍隊退到綏遠，有些部份紀律多有廢弛，士兵隨便取用百姓東西，往往有之。時凱鑑三為綏遠民政廳長。一次他就和鹿瑞伯宋明軒說：

「我一天處境無論如何艱難，奮有軍紀總須維持，擾民的事萬萬不可有！」

鹿宋極以為是，打起精神，親自帶領隊伍查街；查出兵有擾民之事，立刻分別情節輕重，予以應得處分。如此數日，兵風漸改，快就快起來。到了時候，則更紀最注重，否則變亂叢生，必至不可收拾。此等處為將領者須有堅毅不苟之心，隨時提防，嚴加整飭方可。古人所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一兵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前云云，是戰門治軍者的

金柱玉律，應該時刻引以為戒。一兵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前云云，是戰門治軍者的

左振武字叔平，為國民黨黨員，原為張宗昌舊部，以張宗昌種種辦法和行為，他看不入眼，

故通緝於我，願與我們共同奮鬥。我即委以國民軍第五軍總司令之職。第六軍司令為呂富廷，綽

號曰老犬，原為山西將領，其為人慷慨義氣，好朋友，喜交際，同時亦嗜酒煙。他們部隊素有

「坐下來不站起來小人之風」，即是在打仗的時候，村東村西，鎮南鎮北，都是他的隊伍，領伙

人實給養，人數極多，趕到打仗時候，去個十數百。故談不到秩序紀律。欲其按步就班，真正達成作戰

命令，則不能勝任。後分路截擊，則亦可做到。在軍中戰線上，中山代表只是「一團

可少，未可等閒視之。後分路截擊，則亦可做到。在軍中戰線上，中山代表只是「一團

氣辛苦，每戰必有石友三派派數人，景况很是蕭條了。因患想後口，石友三派派數人，景况很是蕭條了。

別時包圍了，正當石友三派派數人，景况很是蕭條了。因患想後口，石友三派派數人，景况很是蕭條了。

編，均陸包圍。他們之出此，乃形勢所迫，實亦出於不得已。我在誓師之前，即決定要去看看他

們。時張之江離五原前赴寧夏，聞我回國，復由寧夏乘民船循河趕回。經過四個月的塵戰，他過於辛苦，神經有點衰弱，又加旅途勞頓，在船上又受了些寒，因此患眼斜口歪之症。見我後，他報告一切，大哭不已，我安慰他道：「多少人有多少人的幹法，不必失望，中山先生只是一個，他一樣的幹出激烈的事業」，振爲人至誠懇，乃鄭重勸我道，「我聽說你打算到包頭去，若真有這話，我以爲你萬萬不可去。」我問什麼緣故。他說道：

「今天的事，是人心大變，大變人心了！」

我說：「之江兄，你的話太好，我十分感激，可是各人所見不同，我已決定去看，你不必爲我多慮。」

這天大約是九月十八九，鄧鏗三先生到場，我們即在誓師的那土台談話。我左說右說，說了二三個鐘頭，過後又以本地土紙寫給我一封信，剴切陳詞，要我打消去包頭的計劃。我回說：

「包頭我必須一去，那裏沒有什麼不可去的，我們投身革命，即要犧牲自己，以報國家，若是畏首畏尾，什麼事都別想幹得成了。還是請你安心醫病，不要再爲這個事勞心費神了。」

過了一天，石友三却自己坐着汽車到五原來看我。我正在司令部所在的大殿前院帳棚中坐

着。右見我半分表示懺悔，撲身跪到地上，大哭起來，我把他扶起來，和他說道：

「過去的事，一概不談。我們從今天從頭幹好吧，你先回去點驗部隊，過兩天，我就到包頭去看！」

右友三很是感激。面談一切經過後，即回包頭整調隊伍。許多人冷眼着着，都表示驚異。以爲石友三原在包頭是不做二不休的幹法，誰也不敢從他那裏經過；現在居然自動跑來，表示懺悔，如此的誠心向善，真是意外之事。張之江以此覺得我去包頭不會有何危險，故亦不敢動阻了。

數日之後，我即動身到包頭去。路上很不好走，道路出奇的壞；人民過於窮苦，散兵游卒又多，弄得沿途都是土匪。有些胆大的竟然對着我的汽車開槍，我也沒有理會，只令汽車疾馳而過，並未出何意外。路經一名叫「皮斯堡隴」的地方，外國傳教士在此有特殊的權勢。其中有美、意、法各國人。他們爲宣傳基督教，冒險至此。百姓不識字，他們教之讀書，又教以牧畜種種方法，使之樣樣都會。於是地方上舉凡一切政治，經濟，法律，文化以及宗教之權，都掌握到他們手中。更有些甚至有強大的自衛力量，自備軍械，配備槍枝彈藥，以防禦土匪的進攻。儼然自成一個小國家。地方官一則沒閒心管這種事，二則對外人也有點害怕，故一直聽之不聞，形成各自爲政的局面。對於此類情事，我以爲一味的蠻幹固然不對，可是像這樣的聽其聽出傳







約他同在汽車中坐談。他從褲子筒裏拿出蔣總司令給他的委任狀給我，使我不致懷疑，很感慨的和詳談其過去。在清代時候，他以參加革命黨被捕，和牢獄頭目弄得很投契，那頭目就把他女兒許給他；他家中原有未婚妻，後來革命成功，即與兩個女子同時結婚，洪憲時袁世凱送給他兩萬元，故又加入籌安會為六君子之一，鼓吹帝制。袁死，走頭無路，乃到南方，仍是被人鄙視。此刻打算到蘇聯去留學，藉以充實自己，我就用「君子之過也，如月日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一番話安慰他，他很感激。此時他還有鴉片嗜好，在汽車中我聞到他滿身鴉片煙的氣味。

又有張曠生先生，也是一位黨員，原在察哈爾辦教育，頗有名望，也傾心革命，此時到包頭來見我。我請他到察哈爾發動，和他說：「張作霖不久定要襲擊包頭，同時壓迫商啓予出兵攻我。到那時，希望你可以出來破壞鐵路交通，並且在中途截擊他。」張先生甚為留意，回察哈爾後弄得很是得手，糾集了千把枝槍，頗有一番作爲；可惜因是文人出身，對隊部不善訓練，後至河南被繳械解散，他亦離隊他去。

最感覺迫切的是政治輔導方法。一則新敗之餘，精神渙散；二則革命主義急須灌輸，不僅舊有的紀律與精神要恢復，更要進一步使之成為有主義有信仰的革命部隊。總司令派組成，各部成立了政治部，加緊此方面工作。我自己每天集合各部講話，一班班親自考察，同時請薛子良及政

治部同志編了許多歌詞，如民族民權民生等等，以加強士兵對於三民主義的認識。當時我針對現實，提出三個口號：一是軍隊政治化，二是打破官僚習氣，三是拔除陽奉陰違的惡根。因為我覺得從前一般軍人受傳統教育的毒，都持着不干涉不入黨的觀念。以此不問政治上的是非，只爲私人的武力，這是自袁世凱以來，一般軍隊的惡根。我們現在開始參加神聖偉大的國民革命戰爭，此等舊日的惡根必須徹底剷除。我在五原包頭竭力宣講這些道理。駐甘各部隊則派請鄧鑑三，沙明遠等分赴隴東隴西各地，前去講話，以收政訓之效。

至於政治部，則有劉伯堅主其事，集合幹部學校學生分任之，幹部學生在張家口時本來爲數不少，都是五卅慘案時爲反帝而來投我，都是大學或高中學生，以廣東湖南籍爲多，此時多已走散，所餘不多，編好之後，即交於劉伯堅加緊訓練，劉每日爲之講三民主義等，我亦按日解說國民革命史，期於短期間成爲政訓工作之幹部，劉伯堅係蘇聯東方大學畢業，爲共產黨黨員。辦事極有精神，對於部屬，雖守分一刻鐘的時間，亦要查問其如何度過，並填表報告之。他自己每日工作十八小時，整日孜孜不倦，真是夙食俱廢。故工作有特殊成績。部屬同事間對之深爲信仰敬佩，我不能因爲他是共產黨，就抹殺事實，說他不好。是爲是，非爲非，劉確實有熱心，有毅力，有才幹，有卓著的工作表現。我即無法不欽佩他。

這時各方面常有秘密文件帶給我，都是反蔣在綢子上或是縫在衣服中。到手後，須用鹼水浸



我在包頭將部隊一一整訓開拔，再回到五原時，已經是舊歷九月的天氣。塞外秋風，吹在身上，已覺得砭骨的寒冷。此時從廣州出發的北伐軍，已經勢如破竹的取下武漢。正分兵兩路，與軍閥聯軍搏戰於武勝關和江西一帶。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等方加緊合作，以圖最後掙扎。大時代的到來，使我們這方面的任務日見迫切。我們已不能夠再多用些時間來慢慢訓練部隊，所以各部隨時整訓，隨時開拔，共分作十路，由甯夏以入陝甘，先解長安之圍，而後出兵潼關，以與北伐軍合師於中原。我待各部開拔完竣，一切料理就緒，亦即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早晨離開了五原，向革命的大道上行進了。



又，宛如草片一綫，所以我決定取道出關，分竄十路，進撈陝西，以解西安之圍。

我在五原等部隊派遣完畢，準備了三個大概，亦即出發。途中和正鐵老同坐三輛汽車，循着汽車道向甯夏進發。我們第一天住在隴河，第二天到磴口，因為汽車損壞，在磴口逗留一天，第三天到達平羅，第五天即安抵甯夏。這一條包圍汽車路，完全是石友三督率部隊修築而成，工程頗為浩大。石友三爲旅長時，很能吃苦耐勞，也頗有血性志氣，孰知不到十年，他爲環境所移，隔了一大堆的姨太太，染上了許多惡習，並且有一個時期竟與日本人也有勾結。這種變遷，誰也料想不到的。三四年前，他不斷的寫信給我，我每次回信都和他說，你若能翻然悔悟，努力抗日，就是個有志的男兒，否則，別的話你都不必說，你我從此斷絕往來。我對於他的這些勸勉鼓勵，不知究生多少效力。

從五原到隴河，沿途的土地很是肥美。適於種植。古時在西北屯田，多在這一帶地方，可惜現在人煙稀少，已成一片荒原。人們一直不重墾殖，以致大好田原，白白地荒廢了。王英的父親，是這裏一帶唯一的一個努力墾荒的人。他的事蹟前章已經敘及。他原籍河北大名府，十八歲出來，身邊沒有一文錢，只穿着一件遮身的小褂來到這遠遠的河套。幾年的工夫，他開闢了幾千頃地，掘築了幾十道河渠，使荒原變成膏腴之地，到他中年的時候，已成爲冠絕河套的唯一富翁了。他的身材高大，活到八十多歲。這樣的人若生在外國，當早已成爲譽滿世界的大人物，輻軍

爲之頌揚，文士給他作傳。」定壽動得婦孺皆知了，可惜他生在中國，一生了不得的事業，竟被湮沒無聞。

浩途和王鐵老同坐一車。鐵老爲我講歷史，談古事，往往微言大義，使我生無窮趣味，得許多教益。當時他所講的故事，我至今沒有忘記。有一個是說燕國使者到楚國送文書，楚相當夜起篝火覆，侍者在旁邊捧着蠟燭相照，因爲蠟燭太低，楚相覺得不便，但也不願開口，就隨手書「高舉燭」三字於紙條，以示侍者。文稿既經草成，這個紙條無意中夾了進去，封入文書中，燕國使者攜文書回國，燕王打開來看見這個紙條，不懂什麼意思。那時燕是弱國，楚則強大。以爲楚國來此三字，必有用意，不可漠視，故立刻集合羣臣，細加研究。大家研究的結果，都認爲是燕國吏治太黑暗，內政不修明，楚國不便直說，故寫此三字以示諷喻。「燭高火明」，顯然是規勸我們掃除黑暗的意思。我們應當接受其善意，力圖整刷才是。於是大家詳議所以改革之道。有的說，我們只會空說，而不實做。有好辦法好規章而不能實行，這是大弊病，應當改革。有的說，我們只知自私自利，而不能天下爲公，不能切切實實的爲人民謀利益，這是大病，應當設法改革。有的說，我們不能發揚學術，發揚文化，這也應當改善。有的說我們苛捐雜稅太多；有的說：我們沒有注重武備；有的說，我們在上者過於奢逸；有的說，我們不能選賢用能；有的說，我們不知發展農業。把弊病一一揭舉出來，分門別類，分配專責，定出辦法與計劃，下令切實施



行。三年而後，燕國國乃大治。至此燕國乃向楚國道謝其厚意，送大批金帛財寶前往。楚相不明白其故，暗使人去問燕使。燕使說出一「高舉燭」的字條，楚相方憶及舊事。楚王至爲興感，謂人曰：這是一件無意的小事，然以燕國謙卑，有從善之心，有革新之志，故以此而大治。若夫矯做之國，怙惡不悛，諱疾忌醫，豈克臻此！這真是一個富有教訓的故事。在廬山時我曾和蔣先生談過，蔣先生亦非常高興。鐵老又談他爲四川灌縣知事的一段舊事。他有一次往謁藩台。一等二四個鐘頭，總不傳見，那時拜見上官，例須在號房納銀八兩，名爲「規矩」，否則不予傳達。鐵老此次爲了「規矩」，仍不傳見，就去質問門房。門房道：「你納的規矩只有一份，還有叔老爺嬭太太二份沒有納，故不接見。鐵老憤怒起來，說道：「我是個翰林，跑來做知縣。我是個冤柱官，我不納這些外錢。」門房道：「你不納，就見不着我們藩台」。鐵老說：「見不着，我不見就是了。」這時叔老爺出來，氣勢兇兇問爲何不納，說這是規矩，不可打破。鐵老一定不納。於是即下爭吵起來。正吵着，裏面即高聲傳見，叔老爺避去。鐵老自以爲得計，那知見了藩台，說了三句話，藩台即舉茶杯，下人高呼送客，八兩銀子，只換了藩台三句話。原來所納銀兩少，則藩台見面說話也少，此亦成「規矩」。滿清吏治黑暗一至於此！真是令人驚詫。一路上鐵老所談大多此類。這裏不一一記述。

到臨河，看到蕭振瀛築的新城，工程不壞，城內一切設施，亦頗有可觀，想見他很吃了一番

辛苦，我想知道一點百姓對於他的批評，問了幾個本地人，因為他們早已知道我是誰了，所以無論如何，也沒得到他們的真實意見。這時因為缺乏糧秣，兵站長正在這裏請求人民幫助，設法張羅。

第二天從臨河出發，後面追來一輛汽車，報告我一個連長強迫百姓換馬，因而被他的旅長槍決之事。要換一匹馬，看起來似非什麼大罪，可是軍紀必須嚴明，騷擾百姓的事情尤不可有！我們是新敗未久，正在努力整頓，肩負擔着艱巨神聖的使命，更要嚴格地維持紀律，方不致隕越。

沿路所過的地方都是黃色的砂土，無論是山坡或是平地，看不見一塊樹木，看不見一塊青色的草地，實在貧苦的很。途過三聖宮地方，看見那兒的情形也和皮斯堡隔相似，純為天主教的勢力範圍。寨子的範圍很大，寨門以內兩行大樹矗立，建築都很堅固，牆外湖水，四週都是樹木，青葱鬱鬱；在此窮荒之境，益發顯得如同另一個世界。寨中街道整齊清潔，房屋很為適用，約有百十戶人家，並設有學校，沿途像這樣的寨子，頗有幾個。附近人民的一切事情，都操在外國之手，此間外人皆比意國籍，見到一位五十多歲的外籍女子，據她自己告我，是十八歲來此地，至今三十多年了。我說：「你真是勇敢，有志氣。」她答道：「我們外國女子不像你們中國女子，也不像你們中國男子。……」我問她的話甚麼意思。她說：「我們都讀書，都信奉天主。」

有愛心；又都有強壯的身體和兩隻天足。因此我們不怕路遠，不怕危險，不怕困苦，那裏都好去。你們中國女子，不讀書，纏小脚，更不知愛國家愛世人，照傳統禮教永遠不能離家一步；就是男子，也都老死於家鄉，卽有遠志的，禁不起宗廟一番勸阻，妻子牽衣一頓哭泣，也就大志全消了。馮先生，您說是不是啊？這是不是中國的實在情形啊？」她問我談了許多話，我都一一記下，使我感到刀子刺心一般的激動與難過。臨行的時候，鄭重致謝她同我說的這些好話。這些邊疆地方，無論如何是我國本土，我們以其僻遠窮荒而棄之，然而外國的女子却來了，開闢得如此整潔美麗。我是一個中國人，如何能不感覺慚愧呢？

離磴口不遠，有一道流砂，所謂流砂，須加說明：比如在北面有一砂堆，經風吹送。一會兒工夫，這堆砂就慢慢移到了南面。這些砂堆子，移動不定，故名流砂。汽車在這種砂地上行走，或以木板鑿孔，一段段鈎連，鋪於地上；或以氈毯墊地，否則即深陷於砂中，無法開行。我們汽車行過這道砂塊，極是困難，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慢慢渡了過去。到達磴口，已是下午六點。

磴口位於黃河之邊，原屬阿拉善旗管轄。居民不過數十戶，一半是蒙古人，一半信奉回教，漢人也佔相當數目，漢回蒙三族雜居，地方十分窮苦。我因要對人民講話，車子也須修理，在此停留了一天。在街上對民衆講演三民主義，又和蒙人及回民作長時間的閒話，訪問本地的風俗人

情及其疾苦，彼此之間，都很歡喜，我於此地調設縣治，令吳某任縣長。吳爲人聰明幹練，曾爲工兵營長，因此地太苦，非有能力者不能辦事，故調此職。（但後來任澄縣兵工廠總辦，即漸漸學壞）此間原來所派之兵站人員爲一初級官，既無成績，又得罪了本地人民；此時特換派一中級官任其事，閱歷知識較高，辦理的好多了。這時黃河已將結冰，天氣越發寒冷，我怕後到的部隊會遇困難，對於兵站的事，又特別計劃了一番。這一路負兵站總責的是開承烈。（曾爲左路備補軍頭目，排長，隨我爲兵站總監最久。後來曾任濟南市長）他們爲辦兵站的事，可是那時一文不名，這種巧婦也無能爲力的無米之炊，的確也難爲了他。

磴口以西，出產一種肉瓷容，銷運廣東南洋一帶，年達十幾萬元，其根生砂土中，莖粗一寸，高八寸，隨處皆是。別處沒有見過。後查本草，方知此物性熱力大，爲至佳之補品。這兒還產一種甘草，粗的約可一寸，味甘性熱，產量亦豐。中國地大物博，真是隨地都是寶物。我越想到國家政治的腐敗，越是難過；越看見地方物產的豐富，越是鼓起了革命的勇氣。

從磴口出發，道路崎嶇，行走越發困難。我想到前前後後，這麼多的士兵，身上寒凍，腹內不飽，在這麼冷的天氣裏，跋涉如此艱苦的道路，夜間沒有屋子住，都在野地露營，心裏不禁時刻懸念。是日下午三點鐘，纔到了石咀子。其地爲寧夏門戶，很是險要。出產豐富，尤以煤爲大宗。有紳士鄭梅峯，擁有煤井數座，爲當地一大富戶，約我們到他家休息，進餐，他家房子

寬大暢朗，樣式也很講究，他除了煤礦而外，還有很多的鹽池和鹼池。那天晚上，他款待我們吃飯，辦了雙魚，雙肉，雙雞，雙鴨的酒席，這一桌豐盛的菜肴，一定破費了不少的錢，使我吃得很不過意。據說，這位鄭先生頗受地方人士的愛戴，辦了許多公益事宜，樂善不倦，絕非那種爲富不仁之流可比，所以很可佩服。我以爲內地財富是無限的，像石咀子這種地方，看去極其貧苦，但只要肯幹，也可致富若此，我們必須注意開發土地之財，否則真是對不起祖宗。

我曾在石咀子周圍察看了一番，我設想後面留駐綏遠的部隊開完，敵軍很有跟蹤回我們追擊的可能，若果然如此，則這一帶地方便有構築障地，以資拒守的價值。因此便在附近詳加踏看，那兒當爲防禦障地，那裏應作攻擊障地，都大致規定了一下，以爲日後不虞之備。

過了石咀子，就入平羅縣境，這兒與石咀子以東的情況便顯出大不相同。人煙稠密多了，氣候和暖多了，地方有一種生氣勃勃的興盛氣象，不再是那種荒涼貧瘠的樣子。兩地相離雖不遠，可是竟形成兩個世界。

平羅地勢也很險要，可稱寧夏北部的門戶。時縣長名王耆賓，他兄弟王耆林與我是朋友。從前我在二十鎮，駐新民府的時候，他爲駐吉林二十二鎮砲兵營軍需長；後來因爲賭博虧累，開小差跑了。民元時候又投我處作事，後來有人保薦，就任此間知縣之職。事先他知道我要來，特意坐着騾車跑出很遠的地方迎接，相見之後，我問問地方上的情形和民間的疾苦，他都一一詳述。

一路來地方大貧，食糧最是困難，到了平羅，看見地方富足，一切都有辦法了。談了一回，我便先走，一路找本地百姓們談談話，不多一會兒工夫，就進了城，一直到他縣衙裏歇腳，看見上房裏住有女眷。我當是他的太太，便請見見王大嫂。不料有人攔阻我，告訴我，那是他新娶的姨太太，他太太不在此地。我又知道縣衙中管事者是他新太太的父親。種種辦法，都叫人不能放心。於是各處打聽，結果查出他的許多劣跡。單就徵集馬草一項而言，即有許多弊病，他亦不能自圓其說，這樣艱苦緊張的時期，他又到任不久，竟不知潔身自愛，勤奮辦事。反而肆無忌憚地幹起這一套來。實在不能寬恕。他從前曾爲了一個案件連累他的弟弟幾乎抄家，現在不知後悔。我和他雖是老朋友，亦覺得無法袒護，故將他撤差，以示懲戒。

次日上午十一點鐘離開平羅，下午三點便抵達寧夏。到寧夏的這天晚上，就接着劉郁芬轉來孫良誠的告捷電，說我軍於廿七日早四點解了長安之圍；劉頌華已經率部逃出潼關了。接到了這個消息，大家都覺得非常痛快。我爲軍事的勝利喜，亦爲被困八月之久的長安百姓及二三軍慶。這回勝利，關係於國民軍北伐者至爲重大，比如下棋，得此一着，全局都有了辦法。當即分別電告中央，及其他各路軍。在這裏，我要將此次軍事情形，略述一下。

長安解圍的先着，是平定甘肅，甘肅不能平定，即不能解西安之圍，亦不能出潼關，故當先說甘肅的勝利。

劉郁芬以師長兼任甘肅督軍，孫良誠和張維璽同在他這一師中爲旅長，薛子良爲省長。劉是個厚厚道道的人。政治恃薛子良，軍事則恃孫張爲之輔助。那時盤據甘肅的隊伍極雜，大家各據一部分實力，或受張作霖的唆使，或受吳佩孚的委任，郝虎視眈眈，集中視線，注意着劉郁芬。他們有的主張靜觀時變，隨風轉舵；有的主張積極動作，攫取地盤；態度雖有緩急的不同，但那一個也沒忘掉抓住時機，擴充個人的勢力。其中受吳佩孚愚弄最甚者，當數張兆甲和孔繁錦；其次還有吳新田。他們都受吳佩孚的委任。張兆甲據隴東，吳佩孚委他爲甘肅督軍；孔繁錦據隴南，吳佩孚委他爲省長，所以他倆態度最爲積極，急要下手，到後來孔把隴南的防地讓給了吳新田，與張兆甲集合力量一致動作，一個從隴東來，一個從隴南來，以蘭州爲目標，向劉郁芬猛烈進攻。

時我方早有準備，蘭州附近的陣地構築得相當堅固，埋設地雷，安置鐵絲網，一切設備，都按照新式戰術構成。孫良誠勇敢善戰，張維璽足智多謀，兩人都具有一種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的精神，沒有一處不親自察看，妥爲防備；又加上一團團長趙席聘富有實際經驗，長於築壘與埋設地雷，此回亦大得其力。由於工事的堅固，官兵又能上下一心，奮勇抵抗，張兆甲和孔繁錦猛攻多次，又加幾次夜襲，均未得逞。張孔急切不能得手，而損失太大，只有分途退却；張退平涼，孔退天水，暫時都防守不進。於是孫良誠向隴南追擊，張維璽向隴東追擊，沒費多大氣力，

即將張孔解決。孫良誠的性情是務徹底，不妥協，他把張兆甲的部隊殲滅的殲滅，遣散的遣散，腳踏實地，毫不將就。張維璽的性情比較柔和一點，一戰把孔繁錦擊潰，將其部隊稍微整理，全部改編。

當蘭州危急的時候，受劉郁芬直轄的尙有駐寧夏的丁鎮國一旅。丁爲回教朋友，其時見南口失敗，蘭州受敵，因而徘徊觀望，心懷叵測。孫良誠調令其來援，他遲遲不肯受命，而忘記他是國民黨起來的，他的胡屬受本軍教育至深，不受其愚。於是孫良誠致電丁旅各團，令不管其旅長如何，只顧自由行動。電到，有陳新民等團即棄其旅長，進兵往援蘭州。張兆甲，孔繁錦之敗潰，即得其力。這一下使丁鎮國白費心計，至今無顏見國民黨朋友。

却說孫良誠攻下平涼，我即令其進兵入陝，以解長安之圍。他接奉命令，便率領部隊，向咸陽方面推進。這時劉鎮華的司令部設在臨潼，長安被他部隊四五萬圍的水洩不通，一個偵探也進不去，城內的人也出不來。這時田玉潔駐三原，涇陽一帶，先受吳佩孚的委任，後又受了劉鎮華的委任；黨拐子駐在鳳翔，也暗受吳劉兩人的收買。但在行動方面，他們是只爲實際利害打算的，利之所在，什麼事情也願幹；否則，誰的命也不聽。所以他們只在一旁，袖手作壁上觀而已，真心實意謀救西安友軍的，其時僅有鄧寶珊一部。鄧爲人雖慷慨好義，但人單勢孤，力量不夠，故奮鬥多時，亦空有解圍之心，並未收解圍的實效。



孫良誠率部到達咸陽，便佈置一切。向長安圍城軍猛烈進擊，左攻右攻，苦戰約有一月，犧牲甚大，並沒有獲得顯著的進展。其所以不能得手，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一，孫良誠部不過萬人，劉鎮華圍城軍則比他多出四五倍，彼衆我寡，懸殊太大；第二，孫部連年轉戰，已甚疲敝，此次守禦蘭州，攻佔平涼，未及休息整頓，又接着長途跋涉，來解長安之圍，困頓之情，可以想見。而敵方則養精蓄銳，以逸待勞。攻擊日劇不易；第三，蘭州西安間相距太遠。道路不便，又值大雨連綿，交通更是困難，以此糧秣不能接濟，彈藥極感匱乏；第四，他進攻之初，原希望西安城內被圍的楊虎李虎部隊可以響應反攻，裏外同時動作，以收夾擊之功。可是城內部隊被圍過久，都成疲兵餓卒，已失却反攻的力量，而他們在圍困之中，內部又不協調，有的雖仍堅持苦撐，不甘屈服，有的則被敵方威迫利誘，頗有主張投降求和者；第五，他又估計田玉潔，黨錫子以及其他方面友軍見他發動攻擊，必可聲援相助，可是實際他倆穩坐不動，徒作壁上觀。有此幾個原因，所以攻圍數十日，未獲成功。

我在五原的時候，便洞悉孫良誠在前方的情形，乃令劉汝明，孫連仲，方振武，馬鴻逵等部前去增援。同時又知于右任先生到陝，極力奔走，但沒有名義，活動頗難，故又加委于先生爲國民軍駐陝總司令，並委劉郁芬爲駐甘總司令，以加重他們調遣的權力。後來到磴口，又委孫良誠爲前敵總司令，方振武爲前敵總指揮。經過這樣的佈置，顯得頗有頭緒。可是援軍來的太慢，此

時孫良誠的部隊在前方，苦戰不下，因為雨下的太大，道路梗阻，運輸困難，實已到了糧盡彈絕的地步。而敵方却又新運到一批某方供給的子彈，積極企圖反攻。孫良誠處此困境，無法支持，勢已非退不可。這一天孫與俄顧問薛福林商議，以為後退固然不妥，但形勢如此，不退已經不行；乃決計退却。命令已經寫妥，送達命令的人已經走出門外。正在這個緊要關頭，孫良誠忽然靈機一動，蹣着脚大哭起來。他想：

「總司令現在已經離開五原，正在路上走着，各路大軍也正在分頭進發，不知何時才可入陝；二三軍不知何時才可解圍。此時我若一退，必致影響全軍士氣，武漢方面北伐軍亦必受大影響，那時整個國民軍完了，革命大業也受挫了；這樣要緊時機，我怎麼能退？我甯可死在這裏，也不能輕退……」

於是將原定計劃完全打消，立刻把送遞命令的人半途截回，將所書命令撕毀。部屬看見他如此慷慨堅毅，極為感動，於是重新鼓起勇氣，振作精神，苦撐下去。孫良誠這一舉，關係於國民革命業績者實在太大，誰也不應忽視的。

馬鴻逵接到援陝的命令，老不開拔，及至我到磴口，致電問他何故不開拔，詞甚嚴厲，他方調動隊伍向咸陽慢慢進行。走了很久，纔到咸陽，又復停兵，總不過河，和孫良誠言明，他只能供給槍彈，不能出兵相助。孫良誠便和他說：

「這樣也好，你就供給我們二十萬發子彈吧。」馬答應了他的要求，撥給他二十萬發子彈。他的部隊得到這批子彈的補充，士氣大爲振作。這次解長安之圍，馬鴻逵雖未作戰，但其物質上的幫助，亦是很得力的。

增調援軍中，又有某部，走到長武邠州一帶，也是遲延觀望，不肯前進，究其所以如此，也有相當苦衷。因爲他的部隊，在南口作戰，犧牲太大，槍械彈藥，一直沒有補充齊全。此時加入前線作戰，猶疑顧慮，自所不免。可是國民黨軍誓師北伐，那一部分都是疲敝之餘，艱苦奮鬥，困難是彼此相同的；何況救人之急，如同自救，當前線如此緊急時候，他却不顧大局，只管自己打算，未免有些說不過去。在這一點上，後來別人對他還都能原諒，唯有身當其衝的孫良誠，却因此十分惱恨，無論朋友怎樣爲他解釋，孫良誠總是瞧他不起。

方振武後頭緊跟着開來的，是劉汝明的部隊，劉汝明後頭，還有孫連仲的部隊。劉孫兩部援軍，總共不到八千人，分作兩次開拔。孫由包頭開寧夏，劉由寧夏奔向平涼，前後相差不到兩三天的工夫。孫良誠在前方苦撐了數日，劉孫援軍都先後開到。即在咸陽會師一處，彼此見面，不禁悲喜交集。悲的是別後彼此都受了不少的挫折。喜的是經過千辛萬苦，又能在一處，相共患難。於是詳商作戰的計劃，決定劉汝明向左路，孫連仲向右路；兩面包抄繞襲，孫良誠則由正面出擊。三方面同時發動，勢如疾風驟雨，使劉鎮華部無法招架，劉即下令退却。恰好那幾令錯

送到孫良誠之手，因得洞悉敵情。於是加緊猛攻，一戰即衝入劉鎮華司令部，使之潰不成軍，狼狽退出潼關；我方獲得了巨大勝利。俗語說：「打架要親兄弟，作戰要父子兵。」這話真是不錯。此時勝局已決，原先觀望不動的各部，也要上來立功了。孫良誠對某部之滑頭取巧，極爲不滿，當即攔截其不許渡過渭河，鬧了不小的別扭。

這回長安解圍，孫良誠功勞最大，他以久戰疲敝之部，完成這一艱巨任務，爲國民軍北伐，立下穩固的勝利基礎。實在值得欣慰。故北伐中，孫良誠功助實居第一，誰也不能否認的。

長安之圍既解，對於陝西的焦念之心，大覺寬慰了。我便在寧夏住下，從事部隊的移調。並且訓練新成立的部隊。原先在五原撥交宋哲元的軍官，此時將旅團營連長一一委好，正式編爲一師，即委宋爲師長。每至早操之先，由我親自點名訓話。有些人不明白我的意思，對我說：

「您這是幹什麼呢？這些官長，既沒有兵，也沒有槍，算的什麼隊伍？」

我說：「你們不要着急，回頭前方紛來槍枝。後方補上員兵，馬上便可成立新的勁旅。」

我雖然這樣說，大家還是懷疑。宋哲元自己也不敢相信，將來真的能夠成立正式隊伍，可是不久孫良誠等將繳的槍械從前方送來，蘇俄幫助的槍砲亦經運到。當即補充兵員，很迅速地便把

一師整齊地成立起來了。

寧夏爲西北重鎮，馮鴻賓爲此間鎮守使，是同教中有學問，明大義之人。其部隊我亦檢閱點名，官兵多姓馬，別姓不過占百分之一二，全是同教子弟，又有新兵隊，都無槍枝，亦每日按時操練，精神頗佳。我每天儘可能利用時間，親自整訓部隊，尤注意官兵的革命教育，除每晨朝會演講三民主義而外，又編有革命精神問答書，發給各部誦讀，答問，藉以提高部隊的政治水準，有刀須磨，有槍必擦，有部隊必須勤加訓練，這是我毫不放鬆的。

此地有道尹姓邵，原爲本軍司書，由書記軍需升任此職，對事尙能小心謹慎，只是政治知識差些。我每到一個地方，照例喜歡探聽些當地掌故，以爲談助。我到寧夏，就問邵道尹曾聽說這裏從前有些什麼好官和壞官。他回答說：「還沒有打聽過。」我說：「不知道志書上有沒有記載？」他道：「志書上沒有。」我向地方父老問悉，民國前有山東滕縣人高善哲老先生爲翰林出身，任此間知府，上任時候，兩匹驢子，拉着一輛轎車，裏面坐着他老太太，他自己跨在車子外邊上坐着，在任數年，所有自己穿的鞋襪，全是他老太太給做。這裏所築秦渠唐渠清渠，工程草率，致黃河年年成災；高老先生着手改造，每日帶些乾糧及待批閱的公文，打成一個小包，揣到野外草棚中坐着，監導民工築渠，一連五六個月，不問風雨從不間斷。渠成，地方年年豐收，原野一片江南風光，真是萬家生佛。民元鼎革，他罷職歸田，百姓跪送數十里，依依不捨，此爲寧夏百年

來最好之官。後來我到泰山住會與高老先生見面，那時他已八九十歲，身體很康健，猶能作蠅頭小楷，每日服烏雞丸，夜眠推腹，常令其孫到泰山摘柏葉泡茶爲飲料，以此爲其養生之要道。他自掛冠家居，教子課孫而外，努力地方公益之事，深得桑梓之敬愛，現已逝世一年多了。

寧夏宋爲西夏國。漢，回，蒙，旗雜居，以回教勢力爲大。我以爲回回只是一種宗教的派別，不當視爲一個特殊的民族。回教，佛教，耶穌教，天主教同是世界的宗教，各民族自由信奉；但信奉那一教，可不能就成爲那一族。中國人信奉回教，不當稱爲回族，正如信奉佛教耶穌教，不當稱爲佛族，耶穌族一樣。人們不明白這個道理，硬要把信奉回教的人，加一個回族的名詞，時間一久，積非成是，信奉回教的人自己也承認了。如此生出種族界限，互相歧視，真是無謂的很。其實在回教沒有傳入我國以前，所謂「回族」的人民還不一樣是中國人嗎？這回我把這個道理和馬鴻賓詳談了一番，他也表示了承認之意。

回教禮拜寺在這裏極多。回教徒最潔淨，晨起沐浴而後才做禮拜，禮拜五次，要沐浴三次。沐浴是沐。浴是浴。兩不相混，沐，洗頭；浴，洗身，查辭典中，沐浴二字的註釋，亦是如此。另外還有兩次，是洗鼻子和下身。我們北方普通人民，有一年難得沐浴一次的，比起回教徒的辦法來，實在顯得太不衛生了。我也在回教的禮拜寺中沐浴了幾次，設備很是便利合用。法用一木桶，高懸，桶底鑽有許多小孔，用時擰動關頭，貯在桶中的水，便如雨一般的淋將下來，噴滿人

身。現在歐美各國有淋浴之法，和這同一原理，我覺得這比普通澡堂裏，許多人同時擠在一個熱水池中洗澡，清潔衛生得多了。我對回教朋友，極力讚美其澡身的習慣和方法，他們都很高興。除愛清潔一點外，回教同胞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很多；第一，人人虔誠奉教，忠孝仁。此教訓深入人心，第二，風俗勤勞樸樸，人人皆有職業，無游手好閑的人。寧夏遍地種煙，回教吸煙者萬人中難有一人，這都是事實，我們不能不佩服。

護軍使衙門建築很堂皇，裏面的佈置設備也富麗闊綽。城內有一條街，也全是馬雲亭的房產。回教人民，彼全皆以「老表」相呼，但似此衆貧我富的現象，不免使人覺得礙眼，後來馬仲英率部到寧夏，憤而將其使署及房產全部放火燒燬了。

這時有清室端王住此，這人就是主張練義和團事者。義和團失敗後他被充軍至新疆。民國成立，仍不能回北平，即寄寓於此。這回我會和他見面，已經很是衰弱了。

寧夏地方富庶，原野多稻田，東南方面出鹼；稍遠處尙產鹽，都是大青鹽，寶藏有無窮財富；只因交通不便，人民資本又太小，所以業務不發達。若政府能幫助人民，大規模的從事開採，運銷全國，必可抵制外國鹼而有餘。此地又產「枸杞」，曾見北平，保定一帶所產者，不過尺把高，粗祇一指，這裏的樹却高達一二丈，小的亦有五六尺。此物行銷西南各省，視為貴重的補品。西南一山之隔，為阿拉善旗。我特劃為縣治，希望能夠在地方上築民渠，以興水利。若能

像高善哲先生一樣的認真辦理，則蒙古平原，將有數萬頃肥田出現，即不能成爲農區，亦可成爲牧區，那時西北荒原必大大改觀。

我在寧夏約住二十多天，十二月二十日早晨，即向平涼出發。在路上，汽油用完了，無處購買，後來設法買了一桶煤油，勉強對付，竟也支持了半天。惟煙太大，煤油能代汽油，這是第一次嘗試。過寧安堡不遠，汽車忽又壞了，我留下幾個人看着修理汽車，自己換了一輛車趕路，後來知道那車損壞的原因，是因爲夜間沒把水箱裏的水放出；那時雪夜寒天，水箱即被凍炸裂，用人真不是容易的事。這回一是坐車者不懂道理，二是開者沒有責任心，不然那會有這等亂子？

越過固原，這是陝，甘，蒙，回交壤的重鎮，清代設提督於此。民國九年地震，猛烈震動達五分鐘之久，全城成爲一片瓦礫，死傷至多。這回我所看見的固原城，還是到處斷壁殘垣，滿目荒涼。我住在城西小客店中，同本地回回父老，談了些從前左宗棠來此一些平回亂的事，大家還是很帶情感。

從寧夏到平涼，一路深溝絕壑，險勢天成。馬路爲張兆甲等所築，工程過於草率。高高低低很是難行。只算比沒有強些。我沿途且走且修路，汽車行駛還得十分留心，否則必出危險。這一次曹浩森（日本陸大畢業。爲國民軍參謀及參謀長多年）他們坐的一輛車，便因車夫不慎，以



經翻車，跌到二三丈深一個山溝中，曹先生受傷最重，在平涼醫院住了很久，才慢慢痊愈。

那時大雪之後，途中積雪已被掃除，但遠山近野，仍是一片耀目的銀白世界。汽車在積雪滿枝，槎枒夾道的柳樹中迎風疾馳，饒有一種意趣。那些柳樹，都是昔年左宗棠在此地主持着栽種的，可惜現在無人保護，被居民砍作柴燒，沿途所見的，已經零落稀疏，行列不復整齊了。過了好長一條深山狹谷的險道，平涼便豁然在目。時馮治安部駐此，安樹德（孫良誠部旅長）爲此間鎮守使，鄧鑑三爲道尹，他們都出城相迎。進城之後，住張芑甲宅，高樓大廈儼如皇宮。一鎮守使，竟如此闊綽。坐定，馮治安和安樹德等來報告當地軍事政治各方面情形。知道有一軍械庫在此，便對他們說：

「你們回去，把庫裏的槍械細細點查。凡能夠用的，另外開一個清單拿來看。」

他們走了不大會工夫，忽然聽得城裏西北角上「轟通」一聲，彷彿暴雷似的，室中門窗玻璃都震碎，屋上的瓦也跳得多高，全城爲之震動。我們都不知道出了什麼亂子。最初還以爲是地震。我一面派人去查問原因，一面卽和王鐵老到門口探看究竟。一會兒一位外國牧師抱着頭滿臉流血，驚慌出色地跑了來，口裏叫道：

「了不得！一定發生了戰事啦！」

因爲這天是聖誕節，他們正在做禮拜，忽然大響一聲，一根木椽由屋頂打入禮拜堂裏，把堂

中打個亂七八精，東西打壞不算，還有多人受傷，他們以爲是我到，戰事又發動了。接着有許多父老，亦哭泣而來。其中有一商會會長，也是嚇得口紫面烏。對我唉聲嘆氣，問是不是發生了戰事。我着實向他們安慰了一番，不久派去的人回來，據說是西北城角地洞裏，原藏着大量火藥，馮治安部有六個號兵，常在那一帶練習吹號，看見那兒露出火藥引線，有一小號兵玩火，不謹慎，竟把火藥燃着，頓時爆發起來，造成這場不小的虛驚。話雖如此說，但我自己猜想，恐怕還是一個陰謀。因爲張兆甲是平涼本地人，他這次被孫良誠打走，當有多少餘黨，殘留在地方上，這事定是他們幹的。不然何以恰在我來的時候爆發？何以如此之巧？假如我連半個鐘頭進城，就正好碰着，這事完全是馮治安，安樹德等疏於警戒所致。久戰軍隊，往往如此大意的。後來我和王鐵老在街上往來散步數次，人民知道並無戰事。方纔放心。

平涼這一帶，地處西北邊陲。風氣蔽塞。人民對於革命的道理，還十分隔膜，又加張兆甲等多年盤據，在地方有根深蒂固的勢力，其黨羽多受吳佩孚委任，潛伏各地，人民難免不受其影響，因而興風作浪，爲革命阻力。我一到這裏，即看重此點，用種種方法，從事於民衆工作。除文字及口頭宣傳而外，又開了多次軍民聯歡會，由政治部編出許多新戲，都以帝國主義必須打倒，軍閥勢力必須剷除，民衆力量最爲偉大，革命主義終必勝利等等的道理爲主題，內容通俗，形式簡單，每次演出，都很受觀衆的歡迎，經此一番宣傳，收得不少的功效，不但使人民對革命

日漸了解，且使軍民打成一片，互相幫助，親熱的如同一家人一般。自民元以來，此地卽少受政治的波動，這一回總算把革命的浪潮灌注了些進來，留給人民一些難以消滅的印象。

在平涼接韓復榘從包頭來的電報，報告張作霖調動軍隊，進擾我們後方，他留守包頭，已經頗感威脅。我一面作必要佈置，一面當卽令其開拔。此時前前後後的部隊，都在一種艱難的境遇之中，有的傷兵病兵太多，無法處置；有的槍彈都缺，急待補充；有的無衣無食，將瀕絕境；要糧餉，要彈藥的電報，如雪片一般飛來。每一封展開來，都使我神經感到緊張，心裏感到苦痛。在我們前面，是一個每年百三十萬元收入的窮陝西；在後面，是一個更爲窮荒的甘肅。這種種難關，如何打破？攔在我肩上的重責，又如何擔當？身處此境，不由我不心焦如火，眠食難安。一天我把文件批閱完畢，走到屋外練了一套柔術，手裏拿着棍子，在廊檐下來回的轉着，滿口裏唱着河南墜子，西皮，二簧，和秦腔之類，藉以遣散積悶，小聲兒唱了一兩個鐘頭，覺得心頭輕鬆了些。這時王鐵老正在旁邊坐着，對我說道：

「事情有辦法了！」

我問何以知道。他說道：

「平日只見你整天的愁眉皺眼，批閱着文件電稿，個個人都向你耍東西，要餉項，把你弄在夾板縫裏過日子，沒法兒處理。長此下去，心身都受不了，假若病了，怎麼得了！今天看見你能

這樣開脫排遣，事情就有辦法了。你應當每日行之，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經鐵老如此鼓勵，我就天天在公餘之暇，唱歌散步以資休息。如此精神方覺輕快，身體也少受損傷。一路來我們的生活極是簡單，住宿是隨寓而安，食則大鍋菜；白菜，豆腐，粉條雜羹一起，名爲「革命菜」。那個吃，那個自己去盛一碗，無人照應。衣則隨身一套，難得更換一次，以致弄得滿身蟻子，甚以爲苦。

過往的部隊到了平涼，我都一一點名，驃馬，槍枝以及彈藥，亦都按單點驗，應當改編補充的一一予以改編補充，使之整整齊齊。凡部隊開上前方，都要經過此間。經過此間，都要如此辦理。又每天舉行朝會，各軍軍長以及各路總指揮，也都一樣的排班點名；點到誰，誰就立正答「有」。每次開會，王鐵老總是站在我旁邊參觀，看見此種精神，於是誇獎說：

「憑你的精神，張作霖吳佩孚都打倒了，他們對於高級將領，是以賭博妓女來聯絡；你却對他們點名。點到誰，誰就立正乎到，像對普通士兵一樣。而他們也那樣的敬肅敬事，一毫不苟。拿這一點兩兩比較就知道誰勝誰負了！」我答道：「我們現在八字還沒見一撇兒，不要太說好了罷！我們實在還不夠的很，我們還要多多的努力才行。」

平時每天朝會，都由我親自講一段三民主義；出操之前，又講一段革命史，或是總理遺教。每天都是如此，從不間斷。有一夜我夢見孫總理，他和我拉手，十分親熱和藹。他告訴我說：

「唯有真正的愛護民衆。方可實行三民主義；因爲三民主義完全是爲民衆的。」

那時我和鐵老同住一屋，同睡一個熱炕，一路行軍，都是如此；醒來之後，我就喊着鐵老，把夢談給他聽。鐵老說：「你的心一天到晚放在革命上頭，到處都掛着總理遺像，到處都講總理的遺教和主義。朝於斯，夕於斯，口而誦，心而唯，你一定會做這夢的。孔子常常夢見周公，也是這一樣的道理。」

有一件事是最叫人傷心難過的，就是傷病的弟兄，長途行軍來到平涼，有些人走不動，半途上搭便車；那時天氣太冷，久坐不動，脚部都被凍得失了知覺，每到一個地方，找店投宿，就急的着火取暖。那知脚部久凍，一觸火氣，立刻皮肉泛成烏紫，凍爛不可收拾。如此而凍斷了脚，成爲殘廢者，不下二三十人，這都是士兵缺乏衛生知識，官長又大意疏忽的原故。我查悉這些情由，急着分派人員，攔前截後的去向各部隊關照，令沿途注意此事；落店後，常先以冷布擦脚使暖，不可急於烤火，那些斷脚的弟兄，遭此無妄之災，真是可憐極了。

這時劉定五先生從西安到平涼來看我，劉爲陝西省長，新舊學問都有根柢，爲人正直耿介。民國十二年國務院開會，以案餉事，他與財政部長大吵一場，前面已有記述，可見其爲人之一斑。這回見面，和我詳談西安被圍八月的經過情形。那時城中軍事首腦爲楊虎，李虎二人，楊李都和他同住一處，八月光景，未嘗稍離，每至形勢危急，處境艱困時候，劉卽爲他們講講史記和

綽號，把些歷史上的英雄義烈的故事，講得有聲有色，以振楊李之氣，堅楊李之心。又因被圍太久，境狀太難，弄到後來，軍紀頗有懈怠的地方，亦賴劉先生極力向楊李等申說民衆必須愛護，父老必須敬重，軍紀必須整飭的道理，使地方秩序得以維持。西安之圍方解，楊李極爲頌喪，大有再也不當軍人的意思，劉又再三勸勉，使之振作精神，繼續爲革命效力。西安被圍八月，始終屹然不動，劉定五先生的功勞實在不可泯沒。

平涼附近有一位縣長名王子元，陝西三原縣人，原籍山東，爲人很有學問，做事踏踏實實，又能勤勞耐苦。那時大軍源源過境，由寧夏至平涼一路，糧草最爲艱難，唯獨王縣長辦的整齊齊，使過往的大軍，得到莫大的便利。王縣長並沒有三頭六臂，何以能夠辦的特別好？其故即在於他能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他的難處，人民都視如自己的難處。那時恰好大雪紛飛，糧草徵集之後，運輸方面更是困難，而王縣長自己既能苦幹實踐，又得人民的切實幫助，難題終都迎刃而解。所以地方官若真能愛民親民，什麼事都好辦，否則什麼事也辦不好。又平涼東北有名董子岡的地方，產糧最豐，相傳其地一收，可供三年之用，普通地主之家，每家有屯糧達數千擔者。糧郡屯地窖中，因黃土極厚，非常乾燥，故不溼不潮，不冷不熱，可以久屯多年，不致收壞。那地方甚是寬大，地形也特殊之至，山溝往往闊達五六七八里，人站兩邊，相呼可聞，然而下來一走，却是很遠。這裏糧食，每元可買三十斤，比別處便宜數倍，完全因爲交通不便，故有這個現

象，所以不收成災，豐收亦成災，有人提倡交通救國，恐怕不獨此地爲然。

一天，聖誕節，大雪不止，我有點感冒，正在房裏坐着，忽然我的顧問烏斯馬諾夫派他的翻譯送來一隻大鳥，說是剛才打獵回來，把這個送我，作爲聖誕節的禮物。那鳥週身白羽毛，展開翅膀，長達數尺，平常不大見過，據說名爲「地鵬」，聞及本地人謂即所謂天鵝地鵬之鵬。我覺得他不該如此做，就和翻譯說：「我請他來當顧問的，不會請他來打獵，這是一種珍貴的鳥，把他打死，如何對得起我們國家，他以一個外國人，未得地方當局允許，就擅自打獵，我們的法律也不能容許。」

於是我把鄧道尹和縣長請來，問其何以不管外人在地方擅自打獵，請他們查出法令，去和烏斯馬諾夫交涉，讓他知道國有國法，軍有軍紀，不可隨便玩忽的，烏斯馬諾夫聞而十分慚愧，問怎樣才是，我說：

「第一，得認錯，第二，不得命令不能自由行動，我們是革命軍隊，此等處萬萬不可大意。」

許多朋友覺得我處置的太過分，使外國朋友失了面子。我說：

這個不然，我們是革命軍人，不能因爲給人留面子，就連國法軍紀也不要。我們不能獨外，他犯了錯，我自必有糾正他的責任，若不然，我何以對國家與人民？這是大關鍵，不可絲毫放

鬆。」我如此一說，有些朋友就覺得很對。我們一路行軍，缺乏一架無線電，和兩湖方面的國民革命軍難得通消息，極感不便。我把此事和烏斯馬諾夫談及，請他設法辦一架，無論買或租或借都可。可是一直沒有下文，不知道是沒有辦成抑是他根本沒有去辦，至今尙覺納罕，我平時看見他發一次電報，總要經過四五次的翻譯，我問其是何道理，他說國際無線電人人都可以收，必須經過多次手脚，纔可以保守秘密。我看見他用豆字代莫斯科一詞，又以狗字代豆字，又用樹字代狗字，又以十字代樹字，如此一譯再譯，別人接此電文，莫明其妙，這種機密辦法，已成一專門學問，比之我們隨便僱一錄事或書記任之者，不可同日而語了。

我來到平涼，本想多住些日子，把後方部隊澈底整理一番，而後再到西安去，因為此時于右任先生已在長安，一切事情都有他負責，我可以放心。誰知事有不然者，其時陝西在大亂之後，境况艱難，恢復秩序，真不容易，最成問題的，就是駐軍很多，爲了糧餉的問題，幾個首腦鬧着意見，急待解決。第一就是孫良誠對方振武不滿，不許方軍開向渭河以南，追擊敵軍，這前面已經說過；第二，就是劉汝明率部到了潼關，在地方上弄了點錢，給兵士辦了些鞋襪之類，而孫良誠部出力最多，吃虧最大，却沒得一點實惠，因而彼此之間，頗感不快；第三，各方軍隊急需糧秣，而陝西太窮，于右任先生無法應付，于先生和他們說：

「當沒有解圍的時候，你們的部隊，餓的沒法，跑到孤兒院裏去借糧，最後只剩一袋了，全



院的孤兒，向他們跪求，他們才沒有把那一袋借走，現在陝西的人民，也已經窮得和只剩一袋糧食的孤兒相同了，你們給他留下這最後的一袋糧罷！」

軍隊方面聽了這話，非常氣憤，李虎就說：

「誰是孤兒？我們的官兵才是孤兒！我們現在正是爲絕糧的孤兒設法，使他們不致餓死！我們一直以來，熱血拚命，從不後人，現在不能不顧我們死活！」

他們爭持不下，意見越鬧越深，使得我再也不能在平涼停留下去。因此只好提早些赴西安，免得問題鬧大。從平涼出發，取道涇川，沿途道路極壞，一邊走着，一邊修築。到了涇川，看見人民捐獻糧食，非常的踴躍，原因是這裏得了一個大好的豐年，也是因爲交通不便，不能向外運銷，故糧價出奇的便宜，麥價每元六十斤，白麵每元五十斤，其他雜糧更是價賤，因此之故，兵站上收買徵集糧食，便很容易。四鄉人民運送的糧食，堆滿了幾座土房子，柴草也堆積如山，我和百姓談話，他們都說：

「今天最重要的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事，我們出些糧食，不算什麼。」

他們把糧食紛紛運到縣政府裏去，肩摩踵接，絡繹不絕，中國的人民，真是可敬可佩，只要官吏軍隊真正爲大衆謀福利，他們實在是不惜犧牲一切以助之的。（也許因爲這些糧食來得太容易，那天我往看屯糧的屋子，見麥子撒滿地上，左右前後，隨處都是，人們踐踏，狼籍不堪，我

看了十分難過，乃召集負責人員；大加申斥一頓。

從涇川到長武，是我民國二年時候走過的路，一路走着，如逢舊友一般，處處都覺得熟悉，處處都值得察看。到了長武，已入陝境，聞附近有古碑，有人約我去看，我因當時無此閒情，不會去看，失掉機會，引為可惜。聽說其中有褚遂良等所書者。這時此間有一般隨隨便便的部隊，一會兒說是二軍，一會兒說是三軍，今日向地方要錢，明日向地方要糧，為非作歹，人民苦之。我令童玉振負責解決之，童旅長費了很大的麻煩，才把他們遣散改編，辦的很是完善妥當。大亂之時，敵人為害人民者往往有限，反倒這些掛羊頭賣狗肉的軍隊，更為可憂。

由長武至那縣途中，宿在一家小小的村店中，因為我們隨從簡單，人民都不相識，這一晚旅途勞頓，我和王鐵老睡得很早。剛剛躺下就聽到有人敲門，操着甘肅口音，連吵帶罵，進入店中，立刻向店主大發威風，極是橫蠻，使人家不知怎麼辦才好。我叫副官不要干涉他們，看他們究竟鬧些什麼出來。他們帶着三匹馬，自己闖入店中，那馬拴在門口樹上，就把樹皮吃個乾淨。店中只得三間房，人已住得很擠，他們就和我同屋同住。他們漸已知道我是什麼人，慢慢老實了起來。我找他們談話，自稱是二三軍的人，是為送信，經過此地。於是我對他們好言勸說起來，我說人民以血汗供養着我們，我們的責任就是保護人民，為人民謀幸福，誰要欺侮人民，我們就和誰拚命，我們為什麼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就是因為他們苦害我們的人民的原故，你們的

父、母、兄、弟、姊、妹是百姓，你們的親戚、朋友、鄰里也是百姓，你沒有出來當兵的時候，也是百姓，我們怎麼可以欺侮百姓呢？這樣的和他們談着，他們竟痛哭起來，由衷的表示了懊悔的意思。可見兵隊都是好的，只因官長不負責任，使失教育；又加耳濡目染，養成惡劣習氣，而不自知。只要把他們的良心加以揩拭，他們就立刻知所悔悟了。當日他們沒有等到天明，就動身走了。

第二天到達邠州，這就是歷史上所謂太王居邠之邠。歷史寫周太王在此，羌人前來侵凌，太王事之以幣、帛、犬、馬、百般委屈退讓，都不得免；後來知道他們所要的是他的土地，於是太王遷往歧山以避之。我覺得這是後人的附會，拿我的意思揣度，定是當時周太王勢孤力弱，對羌人的侵略不能抵禦，不得已被迫而走，後人爲要替其所鼓吹的謙讓的美德說教，乃故意將事實加以歪曲，所以盡信書不如無書，我們讀書於此等處必不可失察。

在邠州我住縣政府中，就近查看班房和監獄，看見內情的黑暗，令人寒心。監獄在縣府旁邊，牢子不許犯人躺坐，在地上潑些水，使之結成厚冰，又故意把窗戶堵死，使氣不能流通，黑暗如活的地獄，入其中者無不卽病。班房即在縣衙內，其中囚犯青年老人都有，問他們犯的是什么，有的是因爲官府徵車，而自己無車；有的因爲官府要草，而自己沒有草，因此被扣。牢房是一種裝着木柵的狹籠子，每房一丈見方，最多只容得二十個人，却囚着六十多個人互相擠着。人

羣中放一個大尿缸，大小便都在其中行之，桶中尿鏽厚及數寸，臭氣薰天，令人窒息。據一位曾坐過班房的告訴我，每至犯人無法受得了，若偷着就木隙門呼吸一口新鮮空氣，牢子即以鞭對木櫃狠打，罵着說：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子們在這裏吃啥！你發什麼胡塗，還要呼吸新鮮空氣！」

犯人明白其意，有錢的給以十元錢，說：「你辛苦，這個請你吃茶，」牢子放開笑臉說：「你的好意思。我不能不受。」於是放他到外面來；那裏桌上擺着茶碗和花生盤，犯人剛剛坐下，就聽見嚷着說，「巡房！查班！」於是又急急的被拉入籠中。查班的走近看見，又是對着籠子一陣鞭子抽打，大罵一頓。牢子就和這犯人說：「只有我的不行。還有有他的一分。」於是再拿出十元。這些都是配好的一套。想呼一口新鮮空氣，竟如此之難，我看見這種情形，心裏痛如椎刺。我以為牢子們所以敢於如此，完全因為縣官不去查看，并明明知道，而心照不宣。我把這位代理縣長找來，問他何以掩耳盜鈴，不加改革。他說積重難返，一時沒有辦法改革。我就把爲我預備的縣府中的幾間上房讓出，請那些犯人去住。同時請那個縣長和我同去打掃牢房。我和他親自把那幾個缸抬出，叫他嗅嗅那臭味，問他如此凌虐人民，良心覺得慚愧否，並令趁早切實剷除積弊，不得再有怙惡不悛的情事。

這種暗無天日的情形，不只邠州一地如此，我連着經過長武，永壽等數縣，都是大同小異。

有更可惡的一種，便是一個平白無辜的百姓，可以被衙役瞞着縣長，任意拘押起來，從而加以詭詐。這是整個的吏治問題，原非臨時整頓所可了事的。但身為縣長苟能正直不欺，勝任盡責，則亦必能弊絕風清，收到局部改革之功。

邠州以東有一個縣分，縣中設立縣黨部，負責人員從長安派去，都是些十七八歲的青年，空有熱情、不明事理，對於革命主義，只是一知半解，而無切實具體的認識。他們以為革命一起，人民對於國家就可以解脫所有應盡的義務，不必再負什麼責任。於是他們一到地方，就向人民宣傳，叫人民不完糧，不納稅。有軍隊過境，要糧草，要車馬，他們又向百姓宣傳，反對攤派差役，反對徵發軍用物品。自以為如此才是為勞苦大眾謀幸福。弄得過境軍隊吃喝無着，苦痛萬狀，於是釀成軍隊和黨部兩方面的衝突。結果那些黨部青年，被駐在當地的二三軍大打一頓，被逐出境。我到邠州後，因為我是西北黨部代表，他們兩方都來我處告狀，互相以反革命的罪名相罵。我以為軍隊擅自毆辱黨員，固然不好，但因為那種幼稚錯誤的宣傳，致陷軍隊於不利的現象，黨員們亦不能辭其咎。當時黨員中有年長老成者，約我前去講話。我到那裏召開一個規模很大的軍民大會，向民衆發問道：「軍閥禍國殃民，應該不應該打倒？」答道：「應該打倒。」「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們，壓迫我們，使我們民族國家不能翻身，不能抬頭，應該打倒嗎？」「應該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必須打倒，究竟誰去打呢？」答：「主要還靠軍隊。」「軍隊沒飯吃沒

「衣穿；沒有糧草馬匹，可以打仗麼？」答道：「不能」。於是我說：「只靠軍隊，是無法完成革命工作的。必須人民與之合作協助，才可以完成，才可以成功。這樣的問答數次，又經詳細的講解，大家才恍然大悟的明白了過來。那天到會的人很是踴躍，我站在一個戲台上大聲講話，把嗓子都說啞了。末後我問一個老人，我說的這番道理，究竟對是不對，比你們以往聽的那番道理如何。他笑着回答道：「他們說的那個痛快。糧也不出、草也不出、也就不用革命了！」說的大家都笑起來。當時會場空氣，極是融洽，事後軍民之間的隔閡打破了，黨與軍之間的意見也化除了，一場風波，才算平息。我知道像這樣的糾紛別地也同樣存在，所以特意編出數十個問答，說明軍民合作的必要，送請政治部採用，廣為印發，俾使黨政軍民之間，不致再有衝突情事。因為這問答小冊，體裁通俗，說理明白淺顯，故頗收功效。

和上述一事類似的，還有一件黨政衝突的事。一天我接到劉郁芬呈請辭職的電報。我不明白什麼原因，覺得奇怪，問他有何困難，何不說個明白。原來甘肅省黨部負責人爲宣俠父和延國符二位。他倆辦有一個報紙，對政軍各方首腦，濫加詆毀。五原誓師之後，大家多已正式入黨，而他們還是身白不分的謾罵，已經入黨者、他們罵爲投機份子；那些沒有入黨者，則罵爲官僚軍閥或反動份子。無論寫文講演，一律持這樣的論調。劉郁芬每出席會議講話，他倆總要起立辯駁謾罵，簡直使劉無法自處，劉自己把他們的言論寄給我看。別人也紛電陳述他們的言行，指責爲什

麼不把力量對付敵方，偏要在自己陣內搗亂？省黨部負責人，豈可如此幼稚，如此荒唐！於是我即以西北黨代表的資格，把延君（宣君已認過）自蘭州押解了來，數日後纔釋放。其實兩個人都是聰明有爲的脚色，只是對於政治無具體認識，缺乏實際的磨練，故不能顧大體，明大義，循走正確的道路。我想兩位今日回想到當年的作爲，自己亦必啞然失笑。

由邠州過來，到永壽縣，經過一個大深溝，看見水源充足，而周圍全是荒土。若能把那水流稍加變動，即可使附近荒土都成肥田，然而官吏不重民生，人民自己無水利知識，無興辦水利的能力，以致水源白白流出，大好土地亦都廢棄無用了。我一路和王銑老談論興辦水利的事，以爲水利一事關係西北民命；第一得有錢，第二得有人，第三得有安定時間，少一件亦不易爲力。談着心里又是難過，又是興奮。前行到了乾州，也和在那州一樣，參觀班房和監獄。縣中有一所模範監獄，表面上辦的很是不壞，頗有一種嶄新的氣象。我在此停住數日，二軍，三軍都派有代表來；鄧寶珊先生亦來，我一一接見談話，問問他們的困苦，說說三民主義，又把如何整頓軍紀，又如何愛護人民以及過去失敗原因，今後使命的完成等等問題，切實加以討論。連天聚晤，都是以這類迫切問題爲談話中心。

時楊虎和于右任先生等連電催促，我們即動身赴西安。車過咸陽，田玉潔和蔣老九等二三軍朋友來接，其時他們仍受吳佩孚，劉鎮華的愚弄，沒有完全斷絕關係，我和他們談話，處處予以

暗示，希望他們知所改變，不要入於歧途。過渭河不遠，于右任先生和許多朋友前來歡迎。其中有各界民衆團體的代表，排着行列，極是整齊嚴肅，我一一握手，在街外坐着談了一會，當即開車進了闊別多年的長安城。



## 第二十七章 鄭州會師前後

我到長安，仍是住在舊皇城民十一年時我所建造的督軍署中，省政府另設他處，此地已由于右任先生改名爲紅城。（後來石敬亭同志爲陝西主席，又改名爲新城。）首先來見談的就是于右任先生。他和我詳談陝西軍政黨各方情形，討論今後治標治本的對策和辦法，于先生頗有所顧慮。我就請他以駐陝軍總司令名義負責辦理一切，只管放手作去，我決不干預。至此，他方擬出一個方策，和我斟酌決定。方案是極周妥而切合實際的，可惜還是老毛病，沒有兵權在手，沒有好辦法，各方面都陽奉陰違，不肯照辦。最顯著的就是二軍三軍如田玉潔麻老九等許多人，對之完全不聽，使全部好的辦法好的條款，都成廢紙。也曾召開一次會議。各部分首腦都趕到場，我鄭重的說明當前的狀況及調整一切的決議與方案，他們當場一口不開口，好像完全不成問題似的。可是散會後他們回去，誰也沒有笑臉，算能照着辦的，是極少數中之少數。那時候革命方在發動之初，我們的景况又太艱苦，軍閥張吳等正在作最後掙扎，百般的設法煽惑挑撥，因此之故，大家都有一種觀望不前的心理，只是虛與委迤，看不出誰有什麼誠意。

我到長安不久，各方面相繼派遣代表前來見面。中央派來的爲郭春濤和鄧飛黃二位同志來，

隨後簡又文先生亦來，他們都是派來我處擔任政治工作的。蔣先生的代表爲彭程萬先生，民元時曾爲江西督軍，李協和先生和他相知，故亦有兩介紹，記得那天在西安城東北角地方接見他，我們曾作長談，他談蔣先生人格如何偉大，爲人如何有作爲有魄力，將來必如何有爲云，至今我還不忘。我派一傳令員照應他，替他打了一次燈籠，他即賞以十元大洋。而那傳令員不識抬舉，不肯受他的這錢，並且質問他道：「我也革命黨，你怎麼可以這樣污辱我？」第二天彭先生見我，和我談及此事，誇獎我們說：「我很佩服你們國民軍，怎麼訓練出這種精神和紀律來？」我說：「他們窮得襤子也沒的穿，不想能夠如此，或許也有人不能這樣做的。」其實這是潮流所趨，青年人都和舊時代完全不同了呢？彭先生爲日本士官學生，爲人深沉，不苟言笑，以後在江西也曾見過面，唐孟藩先派來一位代表，我已忘其姓名，爲俄國留學生與劉伯堅爲同學，是位共產黨，我請他講演，他當場請聽衆出題目，希望聽什麼，他即講什麼。一講就是兩三個鐘頭，學問好像極其淵博。閻百川先生代表爲南桂馨，我優加款待，希望他回去可以盡力說閱先生早日發動，共同爲革命奮鬥奮鬥；那知回山西後，只說西安情形如何亦化，連城也叫做「紅城」，把閻先生說得躊躇起步。劉驥、熊斌等各位此時也都成中央代表，來西安接洽一切。代表一多，頭緒複雜，他們中間便不免有些鬧意見的事。我向來是個不講情面，實事求是的人，但至曲直不明，是非莫辨的時候，也只好聽之而已。

關於當時此間黨務的情形，略舉數事以說明之：

此時各方代表及軍政黨各方人員常常聚會。提出一切迫切問題或是最新發生的事故，大家討論討論。有一天一位國民二軍的何旅長從他部隊駐防的藍屋和鄆縣一帶來，很憤慨的報告一件事，說他們部隊分駐西安附近數縣，農民對於納租納稅都嚴加拒絕，每逢徵發給養，必受當地農民協會的反對，農協在黨部的主持之下，非常兇橫不法，往往不得地方行政長官的同意與准許，就私自擅行捕人殺人，有幾個鄉鎮長就這樣莫名其妙的被他們用軋刀腰斬。說著他就拿出省農民協會發給各縣農協的一封信來，上面說，本黨有生殺予奪之權。你們看着地方敗類，該殺的只管捕殺云云。上面蓋有省農協的圖章，一點不假。我看他們這個辦法，將來還不知要出什麼事，當即把原信送給于右任先生查看。于先生即把省農協的負責人找來，問此信是不是他們發的。那位先生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把信端詳了半天，才慢慢囁嚅着說：

「圖章確是真的，命令可不是我們發的。」

據他說、農協的關防放在房內桌上，不知道什麼人假造指令，偷蓋了關防。農協會的關防怎麼無人經管，任便人家去竊用？鬧出事來，那個負責？這話就說的十分叫人驚訝。于右任先生也很是焦慮。請他負責趕緊更正，并使以後不要再有同樣的事件發生。第二天省黨部開會，各方面的人都出席，討論到這件離奇的公案，有幾位黨部青年，非常激昂慷慨的發言道：

「不管農民協會也好，什麼協會也好，那人當殺，就可以殺掉他；只要沒殺錯了人，管什麼法律手續！我們革命，不能怕殺人；怕殺人，還談什麼革命？」

又有一位青年朋友說：

「有他們軍閥殺人的，難道沒有我們殺人的？張作霖他們殺死邵飄萍林白水，我們就不能殺人嗎？」

他們說得理直氣壯，像真有那麼回事一般。我當時忍不住狠狠的駁了他們一頓。我說這裏有駐陝司令，有省政府，若有你們管這類事，還要他們做什麼？正因為軍閥革管人命，我們才起來革命。革命必須有紀律，有組織，革命不是以暴易暴。這種事，今日看來好像成了笑話，但在當時竟是只有他們的作法才算正確。有些人甚至罵我無革命勇氣，不敢大刀闊斧的澈底做去，其可笑如此。

以後開會時候，常常免不掉爲這類事彼此衝突。青年朋友總纏着工農革命，說這個不是，說那個不對，罵張三反動，罵李四封建。另一方面則說：工農革命，不是黨革命軍的命。革命軍隊沒有飯吃，難道讓他們餓死？就是你們不管他們死活，你們也不能任意殺人。總之，這些青年是熱情有餘，勇氣很大，只是如列寧所著的一本書所指說的：幼稚病太深，實在不能擔當大事。

有一次一位婦女代表秦德君女士來見我。她是西北大學某教授的太太，要求我給她們女子參加宣傳的工作，我說：

「諸位女界先進出來獻身革命，願意努力宣傳工作，我是十二分的佩服，十三分的歡迎。目前的情形，不只普通民衆對革命不了解，對主義沒有認識，就是一般官長也不免如此，官長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比民衆不懂，更其妨礙革命。你們既然熱心宣傳工作，我想建議你們分出緩急，先向官長們作一番宣傳。他們都是男子，你們站在婦女的立場，儘可以把所有關於婦女問題的革命理論，向他們作一番宣傳，使一般男子的腐舊腦筋，傳統觀念，可以改變改變。」

他們同意了我的提議，於是每天集合部隊官長講話的時候，總要留一個鐘頭請婦女協會的先生來宣傳革命理論。頭一天，一位女士說女子也應該讀書，痛罵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謬論，慢慢談到自己的婚姻問題。第二天秦女士來講，也是先說了一番男女平等的道理，然後說自己婚事的經過。說的道理同人云亦云，絲毫沒有真知灼見，而所談婚事，又只是自誇如何詆罵父母，如何反對丈夫，如何脫離家庭和離婚的一套。他們共有二三十位，多是一些年青女學生，說來說去，總是那一套，當講話之前，又扯雜捏場，你推我拉，不肯走上講堂；甚至低着頭，掩着口，嘻嘻哈哈，種種態度，都使聽衆不能發生敬重之心。聽衆往往弄得不耐煩，對之搖頭瞪眼。我聽了多次，只有一位王女士講得較有內容。（這位王女士後來和劉伯堅結婚）其餘簡直沒一個講得通的。我覺得她們過於幼稚，怕以後弄不出好結果，所以講了幾次之後，即令停止。我以爲她們主要的還該充實自己，硬自己能生活技能，自己能夠獨立生活，同時虛心地切實地學習，不徒講

表面，不隨波逐流，比空談革命重要多了。這際主觀的努力而外，社會的扶植也是必要的。

西安街市上到處貼滿了婦女協會的標語。標語之中，嚷得最熱鬧的就是「打倒賣妻良母」的一條，一日王鐵老到街上走，看見此條標語，覺得奇怪，回來說：「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我告訴他說：「我也不懂。」在那時，王鐵老固然是個老腐敗，就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也是常被人家目爲封建頭腦的。但我不見他們腳踏實實的做事，不見她們莊莊重重的讀書，討論問題，更沒有見過她們拿槍打靶，到醫院去照應傷兵，她們所會的，就是罵父母，罵丈夫，討厭兒女，討厭家庭，動不動就離婚！以這些爲自己不落後與真革命的條件，我實在不敢苟同。我想她們所企求的，也許是說婦女不僅要做一個賢妻良母而已，除做賢妻良母而外，更要取得與男子共同擔當社會與國家的義務與權利。她們的標語應該寫：「婦女們到軍隊裏去！」「婦女到工廠去！」「婦女到政府機關去！」等等之類，而不應當提出「打倒賣妻良母」的口號，使一般人以爲他們主張妻不應當，母不應良，她們所擁護的倒是「惡妻壞母」的主義，我不懂爲什麼必須做惡妻壞母才是革命，因此對於她們所提的口號也不能同意。有時婦女協會中有代表來找我談論婦女問題，我就老實說，我只知道無論男女，此時都應該共同努力爭取民族國家的自由和獨立，必須民族國家有了自由，而後方談得上個人的自由，必須相當的犧牲自己的自由，而後方能爭取到民族與國家的自由；否則必入死路。而且革命是實幹實作的事，不是空口說白話，唱過調，新可委動的。

都要兩腳踏地，吃苦耐勞，堅毅不拔地奮鬥。若只是飄在雲彩裏，一任自己愛惡，胡思亂想，那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那時的前進婦女也和一般的青年革命朋友相似，多半是些空想家，多半是些浪漫主義的革命家，我說的這些話，當時自然不能使他們聽着入耳。

但把話說回來，上述種種錯誤與幼稚的行爲，固然無可否認，但在當時革命的初期，也是必然不可避免的。

我到西安不久，和于右任先生遵照國民政府發下的命令，設立了政治分會，同時籌劃了幾個星期，慢慢把駐陝司令部也成立了起來。一切組織與規章定妥之後，于先生向我要人幫忙。我即派李興中爲其參謀長。從此關於陝西政治方面的事，均交請于先生全權負責，遇着有什麼困難，我再從旁相助，他沒有兵權在手，辦起事來未免常常感到棘手，而大軍雲集，地方過於窮困，難關是打破一道，又來一道，彼此若不通力合作，是無法辦事的。

我們所感到的困難，主要的是在財政方面。這時成立了一個財政委員會，由薛子良爲委員長，主持一切。但現狀過於窮困，所謂「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委員會成立後，也還是一籌莫展。此間被劉鎮華圍攻八月之久，省城以外的地方，早被他搜刮得乾乾淨淨，省城以內，在圍城期間，單說餓死的就有三萬多人。富有者以油坊裏豆渣餅充飢，一般人民即以樹皮草根果腹，到豆餅和樹皮草根吃盡了的時候，就只有倒斃之一途。地方糜爛到這個地步，一時萬難恢復。可是

大軍由五原甘肅不斷的集中到這裏來，士兵中一百人中有九十九個是穿的破衣破鞋，面帶菜色，同時政和黨兩方面也在急迫需錢。費用如此浩繁，怎麼彀劃經營，才有辦法出來呢？

但是隊伍必得出潼關作戰，要出潼關，必得發給一點路費，這是不能動搖的事實。部隊出潼關，自靈寶陝州一直到洛陽，形成一條深溝，南有秦嶺山脈，北有黃河天險，中間這一段路多是荒山野土，連人烟也有限的很。就算不顧革命的紀律，硬着頭皮，向經過的地方搜括，也絕不能搜括什麼到手的。然而什麼事都可將就，大家都餓着肚皮，怎麼能夠行軍作戰呢？

財政的困難阻擋在我們前面，如同銅牆鐵壁，絲毫也不能撼動。薛子良一籌莫展，常常被逼得要喝大煙自殺。幸得于右任先生常常勸慰，大家才勉強撐持着。最後實在無法可想了，只得借了四百元大洋，到山西運城辦了些紙張，拿來以右印印了一百萬元的軍用券。票面寫着國民聯軍的字樣，以備民間日後可以兌換現款。此事由薛子良主辦，三萬四萬分發給出關的各部，以為開拔費用。這實在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雖然再三的向地方宣告我們的苦衷，一再的聲明待革命成功之後，一定如數收回，這樣的結果，在西安附近地方，行使起來已很困難，一出陝州，人民就多拒而不肯。

沿隨海綠西進的部隊，與武漢方面軍隊在鄭州會師後，不久即打到開封。此時孫良誠和石友三在前方紛紛來電說，從武漢出來的前友軍都用的現大洋，各地人民無不歡迎，唯有我們却一塊現



大洋也沒有，只是拿軍用券和人民洶氣，就算勉強用了，也處處受人民的白眼，使人民對我們部隊起惡劣印象。同時爲革命奮鬥的軍隊，犧牲流血都是一樣的，爲什麼待遇如此不同？試想我接到這樣的電報，心裏是什麼味道？我只好覆電安慰他們說，富家子弟出門，自然盤纏充足，貧家子弟那有辦法？犧牲流血自然是相同的，但我們從窮困的西北打出來，他們却來自富庶的南方。來處兩樣，貧富也就不同了，你們想待遇一致，那還須相當的時候。你們向我發這種牢騷，我有什麼辦法，只可轉陳中央罷了，雖是說的脛焦舌敝，究竟只是空話而已。我知道他們實在處境太難，不得已才向我訴苦，否則他們也不會平白開口。於是我又三令五申的囑咐，說所至之地，若友軍住村東，我們即住村西；友軍住城中，我們即住鄉間，免得士兵看見人家情形眼紅。

對部隊是這樣的辦了，對人民却無法可想。一方面用的是白花花的大洋，一方面却只用廢紙，如此比着，無論怎樣解釋，也不能引起人民的好感和信任。於是票子慢慢由一元落到七角，由七角落到三角，最後弄到一文大錢也不值的地步。那時北伐軍已經打到南京，甯漢分家已經開始，我請武漢政府設法相助，武漢方面不理；向南京請求幫助，南京也無暇顧及。他們各爲自己的問題苦惱着，管不到別人的事。後來此項軍用券商由鐵路局收用，始漸有起色。

我們在夾板縫中掙扎，弄的焦頭爛額，軍食軍餉毫無着落，自總司令以至自兵都是以「革命飯」吃個半飽不飽，衣服褲子一概沒法添製，如叫「花子」一般。各部自前日退後，轉戰數省，直到

此刻，自然死傷甚多，兵額多不足數。我們一軍在河南招募補充兵員，以費用匱乏，非常艱難。日日三令五申，還是辦不出成績。槍彈的補給，亦是沒有辦法的問題。新兵無槍，只好每人發給一把大刀，刀是當地定打的，比北平所製品質差得太遠；又打大鑄鐵鉞和大斧，作爲兵器。每日朝會議論，總是說着「三粒子彈打到山海關」的口號，其實只是口號罷了，事實上怎麼辦的到？此外傷者病者沒有醫藥，殘廢者沒有人抬扶；死者連棺材也沒有，只以布袋裝着埋葬，名之曰「革命棺」，言之真堪痛心。

物質方面的困苦無法解除，整頓與訓練我却片刻也不放鬆。此時陝西境內許多部隊都有「站起來小，坐下來大」的弊病；這就是說，他們一部實際不過三五百人，但在領餉項槍彈的時候，却總浮報成三四十人，這原是一般缺乏訓練的部隊的通病，但我不能容許這種不整齊的現象存在，乃着實的加以一番整頓，我看出一般將領都有一種精神上的缺點，就是經不起大的勝敗。他們得一小勝，即躊躇滿意，驕傲自持起來，遇一次挫折，又立刻垂頭喪氣，再也不能振作。這種勝驕敗沒的現象，原也是軍隊的通病。但我們在南口敗退之後，方在力爭新生命以擔當重任。故我於整編訓練之中，特別加意於此項的糾正，除將古今中外偉大英雄的奮鬥事蹟，向官兵作普遍與深入的宣傳外，又印發「革命精神書」及「九一七新生命」二種，使官長士兵加工誦讀。

我所住的紅城前面，有一廣大的空場。所有駐西安的部隊如魏鳳樓馬鴻逵等都都在此加緊訓

練，每日天尚未明，就舉行朝會。談話之後，繼以問答。先和各級官長問答，問畢，復令各級官長向其士兵問答。朝會完後，操演開始。此如某日親自爲刺槍外其他有劈刀、打拳等等。即先教官長整個動作，官長會了，即由他領開隊伍，細細教與士兵，而後一一檢看。這時已經八點，吹號停操，即在操場上與官長士兵共同吃早飯。自總司令以至自兵都是吃的一樣的菜，一樣的飯。完全實行同甘共苦軍教條。飯後，操練重新開始，自測距離，利用地物以及各種戰鬥動作均一一教練，也是先教會了官長，而後由官長去教士兵。一切功績實行的兵會者官長先會。之教練，因爲部官長多不會操，並廢棄徒重形式與統制式的教練。到十點半吹號，召司務長送開水來，喝開水，又操。直到下午四點鐘，方得散隊。停止操練。惟留營長以上官長，細問其所部一切實情狀，有何困難，發生何事，病者傷者多少，病況傷狀如何，而後分別派人去問視傷病。從操場回來，我即率中級官以上到大講堂，聽講戰術及政治講演，都請由專家名流分別擔任之。講至晚八點，卅開信電。十時始睡，每日都是如此，看見官兵精神及技術顯著地一天天不同。其中馬鴻逵一部原不大整齊，初加訓練時，官兵甚以爲苦，但兩三月後，他們都習慣了。同時進步飛快，氣象日見振作。一日，有會爲靖國軍旅長小名高景娃的前來見我，時值我們朝會已經開始，他即站在牆根下看着我們教練，從朝會起，一直看到下午四點，先還站着看，到後來蹲着，又後來背靠牆壁坐着，可是看得入神，總是不走，及至見了我的面，和我說：

「你這麼大的年紀，做這麼大的官，還是這個幹法，你們真是革命軍隊呀！我們平常只當做刁官就是享福，那兒夢見過這個？我們真是土匪隊伍呀！」

三翻四覆誠懇的說着，滿面眼淚和汗水交流，到後來索性掩面大哭起來。我看他如此激動，真是想不到的。即令人捧手巾給他擦臉，婉言安慰之，他在我家同住數日，每天都陪同我到操場溜一盞天，他纔知道我們日常功課即如此規定。這位旅長雖爲土匪出身，但爲人肝胆義氣，到處與辦學校，修橋補路，實在是位善根未泯真誠可愛的入物，要不然他也不會那樣的易受感動。

後來我們出了潼關，任浩敬亭同志爲陝西主席，若氏卸任即任訓練總監之職，負後方教育訓練的總責。那時訓練總監之下，共有十六個學校，如高級教導團，軍官教導團，軍士教導團，騎兵教導團，砲兵教導團，機關槍教導團，輜重兵教導團，交通教導團，航空學校，軍械學校，軍需學校，軍醫學校，警察學校，覺非學校（專教犯罪軍官），軍官學校，政訓班及學兵團等，十六校共有員生八千餘人。石敬亭字筱山，山東利津人，出身第一混成協學兵，前清時曾考秀才，故寫作俱佳，記憶力極強，考試常得第一。民元灤州起義時他在七十九標任排長，第三營張建功出而壓迫，他首當其衝，九死一生，方逃性命，民國成立，他至綏遠任參謀及騎兵營長，以吃苦耐勞，爲徐廷榮所賞識，我停兵靖口時，徐介紹他來我處，歷任差遣及教導團教官，學生無不敬愛，其爲大肝胆義氣，勤勉揚厲，對主管真心實意，處同僚上和和睦，言動有定則，事事都有計

劉、國民軍訓練教育之事，他負責最多，出力最大，功勳是不會泯滅的。後來又任山東主席，舉業於陸大特三期，於戰史一門有特殊心得，真是國家有用的大材。

我們在西安，一面百般設法打破財政的難關，一面加緊訓練部隊，同時積極籌劃出兵潼關、劉菊村和熊哲民三位代表將先生來西安，與我共商鄭州會師大計，劉熊二位在我處多年，同甘苦患難，皆陸大畢業，學識很深，劉足智多謀，長於打算計劃，熊則沉默寡言，深思遠算，那時正值桃花盛開，念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語，覺得機會可貴，乃同攝合影，以留紀念。當時軍事形勢，大略如下：平漢路全線都是奉軍盤據，張學良率部駐信陽南北一帶，隴海路直到洛陽亦爲其勢力範圍，萬福林即駐洛陽。孫傳芳張宗昌部隊在南京九江安慶一帶，長江下游及津浦線全爲他們所有。北伐軍從廣東出來，直到長沙，一路勢如破竹，極是順利。惟武昌費了很大氣力，左右圍攻，方始攻下，從此一掃進攻南昌，孫傳芳等部集結南昌以西以南相背敵。因爲攻下南昌，九江即垂手可得，九江下，安慶即易得手。南昌爲一重要戰略據點，故直魯聯軍與孫傳芳部拒守甚力，這邊左攻右攻，饑饉甚大。然而北伐軍銳不可當，又以政治宣傳做的好，深得民心，人入惡惡軍閥之橫暴，對北伐軍極力幫助，攻南昌終亦攻下，不久就打到了南京，凡此都有史書詳載，這裏不必細說。

至於潼關內外的情形，吳佩孚在河南鞏縣兵工廠中住着。劉鎮華軍出潼關後，退至陝州度夏。

一帶，據聞得有某方源源接濟，槍械彈藥，都有擴充。當直魯聯軍在蘇皖邊境與北伐軍激烈爭奪時，奉軍亦已決定南下；同時吳佩孚殘部又謀與四川某部及駐鄂北的張柳陞聯合，企圖直襲武漢，傾覆國民政府。潼關以外形勢如此險惡；陝境以內則有麻老九盤據同州朝邑，田玉潔佔據三原涇陽，黨拐子佔據鳳翔興平一帶；這些部隊，既不能把他們歸入軍閥集團，另一方面亦始終不肯打起鮮明的革命旗幟。他們沒一方面不派代表前去接洽，要錢要官要槍械，但事實又不聽任何一方面的命令。他們一直趨度曖昧，其目的只爲竊佔一個地方，只知吳虫一樣，死死咬住不放，拚命的吸食民血。若在平時，他們的部隊缺乏訓練力量有限，即算發動起來，亦不足爲我們的大患。但是我們正要出潼關作戰，爲貫徹此計劃，必須肅清後方，使無後顧之憂。故派部分頭子以解決。我軍以餉項無着，又受當地農民協會的擾亂，軍事進行，甚爲艱苦。其中方叔平圍同州攻麻老九部，因爲物價過於困苦，常常發牢騷。方爲真正與士兵同甘共苦的革命將領，每逢宴會，見到一盤菜，亦不免想到士兵的苦狀而難過落淚。

當國民軍敗退時，岳西峯被山西方面所囚，及至我到長安，數經交涉，纔恢復了他的自由。他回陝北老家住了些時候，即來信請在我處同住。我約其前來共事。因他爲豫督二年，氣憤大變，我希望他懺悔自新振作努力。然而他受他方挑撥，並未能做到我所期望的地方。我委他南路軍總司令之職，請他收集二三軍舊部，出荆紫關，下南陽，以截擊吳佩孚。最初，在紅城前面廣

場每日朝會，他都參加，表示得極爲真誠坦白，可是數星期後，他卽溜走，給他的任務，全不理睬，一再催促他率部開往南陽，他總不肯動身。那知他受人唆使，對我已另懷叵測之心。我明白這個，也就不再指望他了。

劉鎮華駐在陝州。堵着我們的出路。我卽派人與之磋商，老實告訴他說：

「你若願意參加革命，望快作鮮明表示；若不然，就遠遠讓開路，免得妨礙我們，兩條路你都不走，那我們沒有辦法，只有派隊伍再與你周旋」。

他接到此話，甚是作急，馬上派了代表王鴻恩來，隨後又運着數次來人，都是痛苦流涕的說明他的心跡，自認過去路子走錯，從此誓必改弦更張，聽我指揮，共爲革命而奮鬥；並請我製送青天白日旗前去，又請我派人爲他組織政治部，以加緊部隊的政治教育，我當他是真心好意，卽派令任右民到他那裏。任右民是湖北穀城人，曾在武昌外國語學校畢業，爲人發奮好學，富有革命性。我駐兵常德時他來我處，後來在信陽，曾爲我之代表送信到孫中山先生那裏。這次他到劉鎮華那邊爲政治代表，實在費了很大的精力，冒了很大的危險，卽爲劉在當時一頓腳踏着數隻船，始終未拿穩主意。他的左右，五顏六色的人物全有，有王老五蔡老八之類的綠林朋友。也有各方軍閥的說客。任右民在那裏住着，從劉相待的態度上卽可測知我軍勝敗的消息。我們若打了勝仗，劉卽對之十分恭敬，請他一塊兒吃飯，飯菜特別講究，招待特別殷勤。如我們那一路戰事

不利，或是張吳的說客爲他另外設謀定計，劉即倨做怠慢，茶水沒人照管了，飯菜也大大減少了。製好送去的青天白日旗，也是隨風而轉，一回兒張掛，一回兒扯起來。任右民住在那裏，時時可爲座上客，也時時準備着作階下囚，不知受了多少罪。劉如此朝三暮四，我出潼關的計劃勢已不能延擱，乃決定派孫良誠方叔牛由潼關出陝州，和柳周旋。我到清關檢看沿途所駐部隊，兇孫良誠、孫連仲、劉汝明等都雖都在困苦不堪之中，但都生氣勃勃，極是整齊。我一七召集講話，並以所繕「革命精神書」及「九一七新生命」等書送發官兵，以鼓其氣。途過臨潼，帶便觀覽各處，并題字以留紀念。那時我尚未用功研習白話文，所題文詞恐怕都有些粗拙不大清順。其中題一溫泉名香凝池，題橋名狂橋；又刻石，於軍閥罪惡痛加揭露，於本軍中之不努力上進者亦多有譏刺。不久之後，有些人藉口修築溫泉，將所題文字一一毀去。——這都是閒話不題。

那時樊鍾秀在河南荆紫關一帶與于學忠部激戰，以于部力量雄厚，而樊鍾秀部缺乏良好的訓練與紀律，不能勝，屢次來電乞援。我原派岳河峯由此路出擊，岳既不肯奉命，我乃調馮治安孫連仲韓德元三部由藍田武關出荆紫關以援樊軍。這次學動，在道義與戰略上都是必要的。就道義言，樊是同在「一條革命戰線」上的友軍，他在困難之中，我自當盡力相助；就戰略言，若樊部不幸潰敗，則于學忠無後顧之憂，即可騰出力量封鎖潼關，以阻我會師鄭州之計劃。基於這兩個觀點，此次派兵援樊，完全出於我十二分的誠意。然而我們處境亦殊不容易，我必得通盤籌劃後，



方可派兵，總不能冒失從事，於人於己都無益有損。那知樊部被敵軍圍困甚急，望援之心過於迫切，只希望援軍到得愈快愈好，打得愈猛愈好，可是忘記了我們部隊自南口敗退，繞道五原寧夏，轉戰數省，直到陝西，喘息未定，困苦萬狀。馮治安孫連仲各部並非例外，他們以疲敝之師，接到援樊的命令之後，槍彈的補充是必不可少的；他們行軍的速度不能如當事者所希望，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然而樊鍾秀不能諒解，等他發于學忠戰敗的時候，他即把所有憤恨都推到我們身上。爲將領者往往以功歸己，以過諉人，而不能厚於責己，薄於責人，我對樊也無法解釋。

因爲進援樊鍾秀，孫連仲部險遭不測。原在老河口方面駐有張聯陞部。張爲大個兒，河北省籍，自民二以來卽爲老河口鎮守使，向來是個老老實實做官的人。當我們正面軍孫良誠，方叔平各部推進至陝州，將劉鎮華軍擊退，續向隴海線進展，而與奉軍萬福林部交戰，正打得激烈的時候，張聯陞卽派孫良誠的表兄爲他的代表，前來我處請委，願受指揮。其日爲三月十八日，我卽予以三十八軍的番號，仍在襄陽駐防。其時，武漢方面接濟我們自軍需品，由襄河上運，都得經過老河口。孫連仲卽此時援樊，卽須與張聯陞接頭，而後將十彈分發各部補充。不料他處和劉鎮華的作風一樣，看見我們此次前線無進展，回頭又受了吳佩孚的命令，將我們軍用品全部扣留，把我們的人員盡行捆囚，突然翻過臉來，對孫連仲加以猛攻。我接到這個消息，憤恨之餘，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只有令正面部隊積極前進，以爲應援。

我於五月一日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之職，六日即到潼關督師，這時我們派遣的正面軍孫良誠、方叔平、鄭大章等部已由閿鄉東進，靈寶、陝州、觀音堂、瀾池等地都入第為我們佔領，劉鎮、退向鐵門新安一帶，獲得奉軍援助，構築了堅固陣地，預備作最後掙扎。方叔平於二十三日進至礮澗，奉軍萬福林部五旅之衆，又結令張治公等部，已在娘娘廟楊家溝一帶築了三道堅固陣地。奉軍武器精良，砲火極為猛烈，二十四日激戰一整天，沒有得手。二十五日孫良誠以石友三為右翼，方叔平為左翼，派第一二師繞襲敵方右側和後路，以鄭大章騎兵抄襲洛陽以東和偃師一帶，二十六日拂曉開始總攻，戮力鏖戰，劉軍大潰。孫良誠、方叔平部冒着彈雨爬入新安城。佔領了這一個重要據點。萬福林亦支持不住，狼狽潰退。此役繳獲槍枝三四千，俘斬無算。我軍於飢寒疲敝之餘，竟能攻下這樣堅城，獲得這樣的大勝，實在難能可貴。這一下，把自南口敗退以來的頹氣完全振作起來了。

同時，從武漢北上的張發奎將軍所部，亦在信陽鄆城一帶與張學良部激戰。奉軍受日本幫助，器械除濟陽自造者外，尤多日本出品。從他們的司令部直到團部，都聘有日本顧問，為之謀劃一切。可是張發奎部紀律嚴明，戰鬪力強旺，素有鐵軍之譽，又處處得到人民之援助，每次戰役，奉軍在何處開砲，鐵軍即前仆後繼的向何處猛撲，必將其陣地連同大砲一并奪得，而後甘心。結果使得奉軍連砲也不敢放，雖有精良武器和日本顧問，亦都無法能起作用。激戰多時，奉

軍終被擊潰，退回鄭州。

在黑石關改經一次激戰。我軍以騎兵越過靈縣，向汜水，鄭州方面攻擊，方叔平漸，由靈縣小道抄經靈縣，北伐軍亦同時在平漢線向鄭州壓迫。奉軍四面楚歌，恐慌萬狀，分作東北二路潰退。我軍遂於三十日佔領了鄭州。

我軍乘勝追擊，亦分兵東北二路：北路萬福林部節節後退，過了黃河，將靈橋炸燬，使我軍不能渡河進擊，可見我們頗有鐵路工人相助，他們真有辦法，被毀鐵橋，急切不能修復，即用木料置於河中淺處，不數日即成堅固橋樑，追擊各部全數安渡過去。（若無民衆相助，萬萬不能過河。）東追部隊於六月廿一日亦將開封佔領。騎師中原的計劃，至此已完全實現。

「自從潼關出兵以至佔領開封，這一段軍事調度指揮，均由孫良誠負責。故第一功勳應屬之孫良誠，其次方叔平出力最多。那時處境艱苦，實非筆墨所可盡述，他們能克服困難，立此功勞，實在不是容易的事。」

我們既得勝利，原來的投機取巧，首鼠兩端之徒，都紛紛前來輸誠，劉鎮華部於退出新安即已潰不成軍，張治公制憲入勸來要求改編或是繳械。最可笑的是張聯陞，他看著我們連獲大勝，知道勢頭不對，乃又輾轉轉舵，頓向河我們，立刻將我們人員釋放，所扣械彈如數送還。那時吳佩孚被逼，不能在靈縣立足，經過老河口奔向荊州。張聯陞即隔河予以猛烈砲擊。此舉出吳

外，死傷至慘。吳秘書長發煌言，亦被打死，吳夫婦九死一生，狼狽逃出性命。張聯陞即以此次功勞，作爲向我們表示懺悔的進見之禮！這等人不明是非，不知道義，一心一意只要謀富貴，保妻子，那邊失勢，就打擊那邊；那邊成功，就傾向那邊。我覺得中國大半就是壞在這等人身上。

這期間，在長安也有一些可記的瑣事，帶便在此一述。

在長安的期間。爲了公務的必要，和我過從最密的要數于右任先生。那時于住省長公署改造的省政府內，我常大早起來，到那邊找他談話。每次總在街上買一種糯米紅棗豆子的類合熬名爲「京糕」的食品，隨身帶了去，和于先生一塊兒吃，每人各吃一斤，作爲早餐，此糕又美味，又富於養料，算是平民的燕菜。往來城中東北與西北的角上，沿途所見，最觸目的就是骯髒污穢。陽溝往往深達一二丈，垃圾與臭水填得滿滿的，其中最多的是牛羊骨頭。我以爲這是有用的東西，至少燒成灰，也可以肥田，何至棄在溝中腐爛，爲害公共衛生？我說了多次，因在用兵之時，誰也無暇注意。西門北首空地中還常見有一種雁羣，比家鴨爲大，形狀甚是美觀，往往羣三二十隻。看見人走近了，牠們才慢慢飛開，在別處從未見過。據本地人談，卽是詩經上「關關雉鳴」篇之所謂雉鳩。

由於城中街市的不清潔，急要提倡掃除，以重衛生。此事得各方面贊成；俄顧問談及他們國內凡公益之事，無論男女老少人人參加，收效較多。我贊成他所說的，於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亦

都出馬。我們倆同抬垃圾筐，滿街清理，人家見我們如此，也都熱心的動手。這樣的大掃除曾舉行數次，我的希望是將街上垃圾污穢搬入田中作肥料，化有害爲有用，一舉兩得，並人人經常辦此，可是後來看見臭水溝和店鋪裏後院，依舊污穢堆積，並未因此而保持長久的清潔。這也許是我們計劃不周，辦法不好，也許是我國社會積習太深，不易革新的緣故。

長安被圍之時，軍民各界餓死的人太多，有的已埋，有的則仍停柩房中，或暴棺野外。乃與于先生商議，築一大墳，將暴露的棺柩悉行掩埋，共有二三千具。又將昔日第十師義地擴大範圍，將國民聯軍此回因守城及解圍而陣亡的官兵一一入土。同時開一盛大追悼會，宣傳打倒軍閥與帝國主義之事。以後每逢紀念日，卽往祭祀；清明節我親率官兵上墳添土，以示生共患難死不相忘之義，又建一大碑，說明西安解圍的經過。本來還打算建座祠堂，曾在城外看定李先生祠的附近地基，價亦已講好，只以經濟拮据，軍事亦太緊張，終未得償願。

有一位胡蘭生大夫，原在上海行醫，他是我的朋友浦化人牧師的老同學。在五原誓師的時候，醫藥方面過於缺乏，浦化人和我談及，說胡先生內外科都好，願自備盤川並攜醫藥器物，到我們部隊中來隨軍服務。對此至仁至義之舉，我極表歡迎，當卽電約。及至胡先生趕到包頭，不巧正碰上張作霖對韓復榘「送客」的時候。他人地生疏，躲無可躲，逃無可逃，結果把所攜醫學器具，完全丟光，長途步行，來到西安。因爲勞頓過度，一到西安，卽患傷寒病，熱度極高，鼻

孔流血，臥在醫院中，我常常去探望他，每次總以鮮花相送，以表敬佩掛念之忱。胡先生真是一個偉大的醫生。他爲獻身革命，效忠祖國，不惜破家蕩產，萬里遠道相投，不爲名，不爲利，定要和我一塊兒來受罪，當其脫險到軍之初，猶力疾每日爲官兵診病，及至病得沉重時候，日夜嚶語，仍是掛念着官兵的傷病，這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現在已任中央軍醫署署長之職，當更能爲國獻其所長了。

又從前曾爲我參謀長的蔣鴻遇先生此時亦病在西安，住西北城角一蒙古喇嘛廟中養息。他在民元革命時，曾爲雲南護國軍營長，速成三班學生。此次因乘火車在大同撞車，受了震動，自此患病，忽輕忽重，醫治無效。我於公務之餘，每星期去探視他兩三次，見面握手長談，極是親熱。蔣爲人有骨氣，可稱國家大材，惜未能使其大大施展，想起來真是對不起他。

有張鳳翽者，民三時我過此，他正爲陝西督軍，曾爲陝西議員，是一位老革命家。這回我到西安，特意訪請他出來，給以高等顧問名義，希望他可以爲地方出些力。那知他住了數日，卽不辭而別。（某日約同閱兵，找之已走），潛赴山西運城。我想定是受政客們的挑撥，以我們這裏爲太左太紅，背地裏拿話恫嚇他，使他不安之故。以他一位革命家，我竭誠請他出來，而他竟如此溜走，使我無法向他解釋。

甘肅省黨部一面和當地的軍政互相磨擦，一方面他們自己內部亦互相水火，分出所謂胡派汪

派，左派右派的名目，彼此掣肘搗亂，糾紛層出不窮。我在西安時，他們常來告狀，我惟有下工夫爲之調處。把甲方請了來，談一回；又把乙方請來，談一回，總是勸他們消釋偏見，以大局爲重。有的還以我的話爲然，有的則當着面就和我辯駁起來，說什麼鬪爭到底決不妥協的話。我說對敵人應當鬪爭到底，不能妥協；對自己人爲什麼不可以讓步？他們把原則完全用錯了，徒爲意氣之爭；然而他們總不悔悟。

隨着軍事的進展，黨派的糾紛，已經普遍地從內部的醞釀，而日益表面化。當我離開西安之前，一日接到武漢方而來電，說他們發現西安共產黨部發出的宣言，問我是否知道此事。我並不知道西安有所謂共產黨省黨部，很覺得納罕；把省黨部的負責人請來問問，他們也不知道。在陝西省黨部中，劉伯堅是共產黨，于右任先生是國民黨，我也是個剛上跳板的國民黨。黨部裏面種種明爭暗鬪，我雖不明白其複雜錯綜的具體情形，但我知道顯然有此事的存在，而且我也知道像那樣鬧下去，將來必定會出大亂子，而影響整個的國民革命的完成。我方時時刻刻以此爲憂。不久省黨部與所謂西安共產黨部，各發宣言，都說的亂七八糟。我一再的勸告，我說中央並沒有叫我們這樣做，若鬧出事來，該誰負責；我以爲黨員的行動，應以中央的命令爲準繩，中央無此命令，而輕舉妄動，自起糾紛，即無異替軍閥們做了工作。一天，又聽到許多青年朋友大唱其國際歌。青年們到外國一趟，即將其所見聞的新奇東西搬回本國來，却不問於中國是否適合。英美留

學生搬了些瓷盆瓷馬桶、鋼琴、沙發回來，蘇俄留學生搬不着這些物質的享用，即把國際歌之類搬來。我的顧問烏斯馬諾夫和我說道：「我是第三國際代表，我來中國，上面給我的命令是幫助中國完成國民革命。中國的國民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革命，不是階級鬭爭，亦與第三國際無關。」一再的要我查明事實真相，禁唱此類歌曲，免得對他起誤會。人家真正第三國際的代表對我們的革命是這樣的態度。而我們一知半解的青年，却定要那個幹法。烏斯馬諾夫的話，我極其佩服。我將這番意思一再的告訴大家，但也無效。

在潼關會議的時候，忽然有人提出倒蔣的口號。同時街上也貼滿此種標語。最先提出這口號的是唐孟藩先生的代表。此人曾在蘇聯東方大學讀書，口才頗佳，他長篇大論講演，言詞富於煽動力。許多朋友都從而附和。我總覺得不是味道。剛剛還是一致擁蔣，轉過臉來，就是倒蔣，到底是怎麼回事？再說，目前正是軍事緊急的時期，我們的唯一目標就是打倒軍閥，完成國民革命；所有力量。都當集中於此，不容分化。現在孫、張、吳、褚之類還保有着他們的實力。奉軍在平漢、隴海線張牙舞爪，急圖捲土重來。我們境况如此之困，反動勢力尚是如此強大，我們革命陣容內就競業業，團結一致，猶虞不足，豈容再有分裂？於是我與他們說：「我和蔣先生，不如你們和他的關係深，歷史久，但你們昨天還是擁護蔣總司令，今日忽又翻臉要打倒他，究竟是什麼道理？你們說出了道理，我也贊成，否則，你們打倒他去，我還是照常幹我的。同時薛子



昆等也依照我的意思與劉伯堅等力爭。唐先生的那位代表看見我們態度如此，沒有再開口，不久就走了。

國共分家開始了，武漢方面的清黨運動也雷厲風行的展開了。這事波動到我們這邊，人人都感覺不安。比如黃少谷，原是李大釗先生介紹來我處的，他就極力表明，說自己雖是李所介紹，但並不是共產黨，請我相信他云云。我就向大家宣告，軍中當聽主官的話，不可隨人作主，也不要輕聽謠言，自己撥亂自己，此事關係太大。萬不可輕舉妄動。我們必得明白了底細，而後再作區處。如此三翻四覆的說，人心纔稍稍安定。

那時我正住在潼關。指揮前方軍事。並檢閱陸續開拔的部隊。一日在野外對部隊講話，我力說此時大家當精誠團結，萬不可自己搗亂云云。散後我即回文廟中批閱文電。此時我們總司令部中人員都在廟中另一邊聚會。一位青年在那裏講演，對我剛才野外講話的意思大發議論，有幾句話刺進我的耳朵，他說：

「我們是一致要求倒蔣。可是有一個人現在庇護他。在今天，庇護他的就是軍閥，就是反動……」

我慢慢走到那邊去，看見那位青年朋友大約十八九歲，不過初中畢業的程度，也是政治部中職員。他還繼續講他的，肆意詆毀，熱心和勇氣真是有的。他說：

「我們定要倒蔣，誰不贊成，誰就是反動；我們就連他一塊兒打倒！」

我忍不住的說道：「我已經一再的和大家講過，我們不要輕舉妄動，隨聲附和，等事情弄明白了，我們自有主張。你現在又說這些話做什麼？你要倒蔣，你倒你的去，我們還不到時候！」

那青年就激昂慷慨的和我頂起來，還滿口唱些：「自由」「平等」的高調，說我不應當以自己的地位，來「專制」「高壓」云云。我以為軍中紀律必不可破壞，當即令人予以逮捕。後來劉伯堅等向我說好話，方把他釋放。這樣的青年兄弟，不知道什麼叫做軍隊的紀律，什麼叫革命的紀律，完全憑着血氣之勇和一知半解的知識，胡衝亂闖。真使我難過痛心。翌日在文廟外空場中舉行朝會，官兵以及全體政治工作人員都在場，我於講話時節着重於解釋所謂「平等」兩字的意義。我說：

「一個兵身高四尺，另一個兵高有五尺，是否應當截長補短，以求平等？（有些兵們不明白意思答曰「應當」！）騎兵騎馬，步兵步行，輜重兵還要擔馱東西，你說怎麼辦？是不是應該把馬賣了，一律步行，或是大家都該騎馬，以求平等？（兵們也答道：「對的」！）長官用腦，日夜策劃，士兵一到地方。即可休息，你說怎麼辦？是應該都用腦策劃，是應該都要休息？職責所司不同，團體必有紀律，革命不是作亂，不可以平等之類名詞挑撥感情，不然，什麼也不要想幹！」

前方軍事既已進展到鄭州，武漢方面的部隊亦陸續到達。政府及中央黨部許多朋友亦多到了鄭州，派劉菊村和熊哲民二位到潼關約我前去會晤。此時我已調宋哲元石敬亭來西安主持後方。石時爲參謀長，爲人能耐苦實幹，任勞任怨；宋亦忠誠實在，能夠擔當。（後來西安鬧的很多麻煩，多賴石宋二位調處，未出亂子。惟三原涇陽各部隊，不聽命令，麻老九，黨拐子等時時相機擾亂，宋明軒步步予以收拾，亦得安度過去。）我卽由潼關出發鄭州，從靈寶乘火車前往。我們自在包頭撤了火車，走了數千里辛辛苦苦的路到了陝西，此時聽到火車的叫聲，人人覺得歡喜高興。在軍廂一路大唱其打倒軍閥帝國主義的歌，聲震天地，真是熱鬧。同行者有何其羣。我在車中做出師表文調，擬一調和寧漢分裂的文稿，拿給何看；何只說好好好，不置一詞。想來必是我那文作的不通，沒有評改的價值，而他又不肯明言，所以如此表示。我受此刺激，卽立下決心，要發奮學寫文章，以求明白寫文章的甘苦與方法。後來在汾陽在秦山，曾請許多朋友爲我講文改文，自恨天資魯鈍，進步太慢。但我定時時要做小學生，時時抱一重新學習之志，努力不懈，我如今年六十，比之先賢梁灝，我尙是個青年呢。

在新安，下車看驗工事。自靈寶至新安，看古代戰場，楚霸王攻秦，坑秦師二十萬，信陵君統六國之師攻秦至函谷關等等，都在這一帶地方。在洛陽亦曾下車走看。其地有芒山，卽邙山，滿山皆古代墳墓，曾經多次發掘，百姓亦結爲發掘隊，掘得古物，出售於外人。上有司馬懿墓。

又距洛陽城南不遠，有開帝塚，有謂塚中只埋一頭，又有謂只有一身子，沒有頭，都會去憑吊一番。開帝塚南爲伊闕，兩山相對，望之如闕，水經注稱爲大禹疏以通水者。洛水由此經過。石壁上有些許多大佛像，都少鼻缺腿，毀損不全，不知何人所爲，說是樵夫砍壞的，我看他們不見得有這個工夫。也許是因爲魏晉各代以佞佛亡國，後人故恨而毀之，以爲他們並無靈驗，自身都不能保，怎麼能保佑人民？不知這個猜度對否？其他滿壁皆刻字，卽所謂龍門十二種的便是，筆畫斜歪，如修腳刀形狀，甚不方正，然以其是晉字或魏碑，人多爭購搨本，以資臨摹。王鐵老甚不佩服這等字，以爲不過當時工匠的手筆，說他們不一定識字，那會寫的好字？後人泥古，總以爲古代的就是好的，值得模仿的，其實可笑。我以爲鐵老的話不爲無見。

我從潼關動身時，鄧演達先生曾來，聽說也是爲活動反蔣。因有人告訴他我們的態度，故未對我開口。此次途中同行，因爲沒有人爲我們介紹，所以也未深談。及至到了鞏縣，我去參觀兵工廠，又遇到鄧先生。聽他對工人講話，態度懇摯，言詞有條有理，很可佩服，工廠中實行八小時制，沐浴及其他衛生設備，都頗有真正的改進，絕非徒尙空談者可比。

車到鄭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許多軍隊與人民團體。汪精衛、徐季龍、顧孟餘、譚組安、孫哲生、唐孟藩等先生亦都親來歡迎。這情形出乎我的意外，覺得實在愧不敢當。我揹着把雨傘，穿着一身棉布褂褲，束一根腰帶，下車一一握手。自十月十一日開始，連續開了幾次會議，商量

組織河南省政府並設立開封政治分會的事，軍事方面。解決蘭海路以北，平漢路以東的敵軍，都由我們二集團軍負責肅清。唐孟藩所部一軍，一律撤回武漢，藉以養頓休息。

此次得與張發奎將軍晤面。爲最可高興之事。張將軍爲人誠摯爽快，人品學識都是第一等的，真是黨中忠實同志，軍中有作爲的將領。哲生李龍兩位先生和我詳談武漢的情形，指出許多方面，令人看不下去。第一是誇張的宣傳。例如每一次的開會，總說到了二十萬人，或是十多萬人，而實際到會的人衆連一萬也不夠。第二是社會秩序的紊亂。只以商店一項來說，就有百業俱廢的趨勢。他們在衣舖定做兩套衣褲，過了約期，老是取不到手。質問老板，老板說，我們現在都是處在打而不倒的境地。工人每天出去遊行示威，工作連天的停頓着，他們僅僅回店來吃飯。吃完飯，又出去開會或是遊行。我們本要停止營業，可是停業又要受工會的處罰。現在勉強開着，事實上等於停業。你們做的衣服不要說兩個星期不能交貨，就是再過兩個月，還是不會做的出來。市面上情形如此，其他方面可以想見。第二、各機關團體依舊不脫舊時散漫泄沓的惡習。比如開會，僅是十幾個人的一個會議，召集起來也不容易。往往規定兩點鐘開會，四點鐘還不能到齊。會桌上水果點心擺得滿滿的，西洋點心，美國橙子，一切都是窮奢極華，舊官僚的習氣全都學會了。他們從未想及自己正在幹的是什麼事，人民百姓過的什麼日子，前線上拚血肉的弟兄們吃的什麼。他們說的這種種情形，都無半點誇張；因爲我此回到鄭州，連開會議，亦有同

樣情形。汪精衛就多次不會出席。我忍耐不住，因編一副對子，給他寫好送去，那聯文是：

「一桌子點心，半桌子水菓，那知民間疾苦；

兩點鐘開會，四點鐘到齊，豈是革命精神。」

對聯而外，再加一張橫批，是「官僚舊樣」四個字。這雖未免過於刻薄，但確是當時革命政府官吏的寫實。聽說汪對此甚爲惱恨，在許多朋友前面罵我。

又得見何雲樞先生，承談湖南情形，也是精成一團。兵們帶了三元五元或十元二十元回到家鄉，當地農民協會就要對之收稅：甚至加以拘禁，說大家都是無產階級，私人不當隨意受用此錢。連長營長的父母兄弟，都被農民協會拘捕，當土豪劣紳懲辦。何先生所都是湖南人，此時駐在河南，時刻懷念家鄉，不能安心，急着要回湖南老家去。何先生家的親屬亦有被拘押者，何先生亦很氣惱。這都是當時的事實。

寧漢兩方意見越鬧越深，但真實內幕畢竟如何，我一點都不清楚，此次參加鄭州會議的朋友，有的曾共患難，有的爲我素所欽敬。他們都是個中人，我正想乘着會議完畢的時候，和大家詳細的談談，把各項問題討論討論，商量一個辦法。可是想不到他們突然間說走就走，怎麼也留不住。我到車站送行，問他們何以來去如此匆忙，都說武漢有要緊事亟待料理，故不能擔擱。我心裏是有點納悶。後來纔知道是因爲陳某拍給他們一個電報，說我已與蔣先生勾結好了，此次要

在鄭州扣留他們。唉！這話那裏說起！會參的母親方在織布，有人告訴他說，會參殺人了，會母不肯相信；第二個人又來說，會參殺人了，會母覺得可疑；說到第三次，會母竟相信會參真的殺人了。謠言之可怕，有如此者，此事至今想來，一方面我以為是許多朋友那時恐怕還不真認識馮玉祥是個什麼人；一面我也要承認自己的過錯。我的錯誤在那裏？就是這個老粗太老實，太坦白，不會周旋應酬。我若是能隨和隨和着請請客，說些好聽的門面話，使大家——其中汪精衛一人最有關係——心裏痛快痛快，當也不致如此。我一生吃虧就在此類地方，老毛病恐怕總改不掉了。

我在鄭州，住一所教會的空屋子中，有一位濟洋學校校長史愛禮來見我，史爲美籍，個兒與我相似，大眼睛，話語緩，很是溫和典雅。民十一時我們結識，算是一位老朋友。他在地方熱心公益，很得人民愛護，教務之暇，致力於畜牧之事，在他學校中養着許多牛羊鷄鴨，牛和鷄都有「種牛」「種鷄」和「肉牛」「肉鷄」之分。「肉牛」「肉鷄」專供人們吃的。對於配種之事，極是考究。比如以一種矮牛，和高牛交配，所生小牛品種即特別優良，價錢也大。羊和鷄鴨也都注意擇種。我對這種生產事業，素感興趣。我說，農家若能經營此類副業，即可增加收入，否則將益見貧窮。他又拿出許多畜牧雜誌給我，各類家畜的飼養與選種之研究，都各有專刊，各有專題。人家對於事業真肯實實在在的用心研究，殊值得我們學習的。他又談在彰德有一外籍牧

睡，亦喜畜牧，一日坐樹下看書，冷不防被自己養的一頭牛，一頭頂過來，竟被頂死。這也是從未聽見過的事。那時我常和他談自己想到歐美各國去讀幾年書，他極是從惠，並要我製辦西服，把他的西服拿給我試穿，教我穿用和打領結等等。我就常穿他的西服見客。後來到北平，曾自製西服，穿着總覺得不慣。我覺得西服有兩個大缺點，一是領子太硬，又用釘子釘，用帶子縛，不但繁瑣，也太不合衛生；工費材料手工都太貴，非一般平民力所能勝。此外還有一個小缺點，就是全身都昇零碎布塊拼湊而成，若衣服破舊了，連一塊整布也找不着，我素不喜中國的長袍大褂，以為使人萎靡懶怠，必須改良。常聽說高麗人喜穿長袍坐在樹蔭下喝茶談天，緩游終日，全國如此，結果亡國，若說高麗之亡，即亡在穿長袍上面，自然過當，但穿長袍養成懶惰習性，却是真的。而且用布也太不經濟，剪掉下擺的布，以送甘肅同胞，有多好？何苦多此下擺，精羅布料，又妨礙行動。記得南京舉行第一次國民會議，討論衣服的問題，一位朋友說，我們男子又無月經，何須此下擺蔽人眼睛？覺得這話真有意思。但我以為亦不可定要模倣西洋衣服，那也太繁文縟節。我常穿日鄉農底短布褂褲，我自己覺得極好，但人家總以為奇怪。中山先生提倡的中山服，今日已漸盛行，這才是中西兼長，至美至宜的服裝，我真佩服極了。

津浦線上的北伐軍此時已經佔領徐州。蔣先生和胡展堂、李德鄰、白健生、張靜江、李石曾、吳稚暉、李博和等各位先生都將陸續到那裏約我前去會晤。我亟欲藉此機會對前漢之間的



紛爭，盡一番調停之力，所以欣然前往。車到歸德，看見站上滿滿的數列車隊伍正要向北開行，派人打聽，知道是湖北某某兩部分的部隊，此刻已爲高某所收編。高爲二軍朋友，資格實在不老，而所收編的兩部將領，都比他資格老得多。我在鄭州時，高曾來見我，談到收編的事，我就老實和他說：「你的能力和志氣都是很可欽佩的，不過你的資格都不及他們，若他們意在利用你以爲掩護，將來你必後悔。」我的話說得太坦直，太露骨，當時他很不樂意，但後來我的話果然證實。所收編的兩部至重要時忽然叛變，臨走時還說：「吃孫鵬孫不謝孫，不要你性命就算人情了。」一個人做事，若不揣度別人，衝動自己，也不慎察環境，到頭不得良好結果，是當然的事。

我們的車子過了礄山——距徐州還有一站——遇着蔣先生親自乘着車子前來相迎（那時蔣先生爲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地位甚高，而猶如此謙下，如此周到，真是從學養中得來。我於此等處往往疏忽，非我存心驕傲怠慢，實是想不周到。）這是我們第一次的會晤。見其丰采及言談態度，無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見恨晚之情。我們同坐一車，且走且談，一直到了徐州，許多朋友都來見面。他們都住花園飯店，大家聚談，討論的就是北伐和清黨的兩個主要題目。我是堅持團結一致完成北伐的主張的人，故仍本着平素態度，極力說我的調和清漢的意見，以爲分則必致功敗垂成，軍閥及帝國主義者時時巴望着我們分裂，我們必得以大局爲重，竭力相

忍爲要，又舉太平天國之事爲例，左說右說，全是我心坎中的話。當時頗蒙大家贊同。吳稚暉先生十分高興，便自告奮勇地替我擬了一個通電的稿子。我仔細看了數遍，改了數處，因爲此時我的立場應該站在當中，說話無偏無倚方妥，而吳先生代擬之稿，則不免稍偏南京，有些地方太不像調停者的口氣，這個電稿左改右改，唯恐把事情弄糟，直到自以爲十分妥當，而後發出，但汪精衛仍是極不高興。等我回到鄭州，他即來電報罵我。後來我才知道汪的脾氣，凡事都要佔個第一，若不恭維他是第一，不說他應高高站在蔣胡之上，叫蔣胡全受他的支配，則他必不高興，必要相罵。這就是所謂「領袖慾」。這毛病不但可毀自己，亦可毀國家。我當時旨在調停紛爭，故對於他的電罵，亦祇好含忍不理而已。

次日承許多朋友在花園飯店開一盛大歡迎會。我講演的題目是「南赤北赤交流。」因爲張作霖，吳佩孚等軍閥都說我們赤化，南赤就是蔣介石，北赤就是馮玉祥，我說、誠如所言，我們是赤化了，那裏赤化？就是赤心赤胆，流血以救赤子；除此而外，我們何處赤化了？接着吳稚暉先生也以「紫氣東來」爲題，說了一回歡喜高興的話，當即與蔣先生聯名，共發一個堅持北伐的通電。

此時我看清了一點，就是奉直魯以及孫傳芳等軍閥依舊保有相當實力。正虎視眈眈的窺伺着我們。倘若得到帝國主義者的援助。趁着寧漢分裂的時候，重振旗鼓，大舉襲來。則我們國民黨

命的前途必受巨大打擊。因此我一面趕着從徐州回返河南，作一切必要的佈置，一面仍繼續通電勸告冀漢兩方，消釋意見，團結努力，以完成北伐的大業。

## 第三十八章 豫東大戰

我從徐州回到河南，武漢方面的清黨運動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我到鄭州的時候，接到蔣精衛從廬山來的電報，通知我鮑羅庭即將由漢口經過鄭州回俄，請我把他扣留並殺之。我心裏想的說，你要殺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漢下手？他顯然學的曹操的作法，想殺蔣衛，自己却不下手，把蔣衛送給劉表，劉表又借手於黃祖而殺之，可是我決不是黃祖。等鮑羅庭到了鄭州，我特去接他，留住幾天，談話數次，而後派了張允榮和李連山二位具辦了一點禮品直把他由滄關釋蘭州西送至庫倫，使他平平安安的回返蘇俄。昨天同在一個桌子會議，今日無緣無故就要關廬相害，這等事我是萬萬做不到的，和鮑羅庭同車到鄭州的，還有鄧演達先生，想必也是聽見什麼謠言，發我懷了疑忌之心，竟扮作鮑羅庭的汽車夫，以爲我們就不認識。我覺得這也是不認識我的地方，大可不必如此。我何主聽從汪精衛的話，來加害於他們！

在河南以及~~在~~我們二集團軍中的共產黨人員，用一軍車向武漢送走，劉伯堅等許多位半途跳下車他去。顧問烏斯馬諾夫我也送他回俄。源先他曾向我說：「聽說你也贊成分共，你的意思怎樣？」我就把鄭州會議時，聽徐李龍，孫哲生，以及何雲樵諸位先生所談的事告訴他：我自己所

親歷親見的許多情形也一一和他細談，他說這都是幼稚病，是革命的過程中所免不了的。我說蘇聯是我們最忠誠的好朋友，這回我返國參加革命，幫助我許多槍械，派來幫助我們革命的朋友至誠至懇的努力，犧牲性命的也有，我等豈有不感激之理。但是就事論事，許是由於對中國情形隔膜，第三國際的許多辦法，實在也有不妥當的地方。我把一些主觀的意見都約略吐談。他亦不能置答。

有一位朋友清化人牧師，是我爲陝西督軍時認識的，爲人富於熱情，堅毅果敢，同我共處甚久。在張家口辦一學校，亦頗有成績，五原誓師時，我派鹿鍾麟到蘇俄考察，他亦隨鹿同去。他到莫斯科後，竟以一聖公會牧師而加入了共產黨，成爲一個忠實活動的共產黨黨員，可是我並不知道。不久他隨鹿等回國，鹿任河南代理主席，我即發給他三千元，派他和另一位名董賢武的朋友，負責辦理鐵路工人的福利事業。一天他忽留一字條給我，悄悄離開鄭州，所領款項亦不報銷。我不相信他會做攜款潛逃的事，派人查問，纔知道他把錢這個三十那個四十的散給了窮苦工人，他自己並未取用分文。他的出走，也是爲分共的問題對我誤會而然。民國十七年在南京的時候，他的老太太託人來見我，說願變賣家中田產，以清償此款。我說：「那錢他都散給了勞苦的工人們，並無一文入了他的私囊。這還要賣田賠償作什麼？」民國二十年我到上海，曾與浦先生見面，那時他爲商務印書館編輯。二十五年我在南京，他由獄中寫信給我，請我替他設法保釋，

我即拿着他的信去見蔣先生，把他的出身爲人以及一切實在情形一一詳告，蔣先生說查一查，沒什麼事即可釋放。後來終由憲兵司令部審查數次，交請鹿瑞伯保釋出獄。

我從徐州回來，先到開封，派薛子良爲代理主席，負責一切政治事宜；而後即到鄭州，致力於軍事的調度。此時甯漢正鬧着意見，革命陣線爲之動搖，大江一帶甚至有爆發戰爭的醞釀。奉直魯軍間時刻耽耽而視，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來一個大規模的襲擊，我爲了鞏固河南，乃集中部隊，由鞏縣渡河，對立足未穩的奉軍施行襲擊。萬福林等不支，被孫良誠吉鴻昌部如風捲殘雲一般，一直打向新鄉潰退。彰德，衛輝，懷慶，所謂河北三府的人民亦羣起對奉軍截擊，斬獲無算，各該重鎮均次第爲我克復。經此大捷，河南局勢暫告穩定，但我深知道軍閥必不甘休，未來的大戰將緊隨而至；乃積極整頓內部，將若干動搖的部隊予以收編，藉以應付即在目前的暴風雨的襲來。

劉鎮華自從陝州及新安潰敗，退到禹州一帶，勢窮力蹙，屢次派人前來輸誠。我爲免得他們再和張作霖等勾結，即予收編，給以第八方面軍番號，令負由曹州推進濟甯的任務。他們的部隊多蔡老八王老五之數的烏合之衆，無所謂紀律，無所謂訓練，接奉命令後泄泄沓沓，花了一個多月的時光纔慢慢開拔完竣，後來從他的駐區中訪察，知道此時他們仍和軍閥方面不斷的接頭。並沒有放棄投機取巧的企圖。

一天，劉鎮華爲領餉項及委令率到鄭州來見我，我和他暢談革命的意義和愛民爲國，努力鞏固軍隊等問題，那天我們同吃飯，飯很簡單。水餃而外有鹹菜一盤，想不到他便不勝感想，嘆我道：

「你何必這樣自苦？這樣的飯，怎麼吃的來呢？」

我笑道：「我也贊成吃好的，穿好的享樂生活；不然的話，還要革命做什麼，可是有一點我要說明白。我說贊成享樂，可不是指個人享樂而言，我是指民族社會普遍的享樂，人民大眾個個都過自由幸福的生活。你看看現在百姓吃的什麼？士兵吃的什麼？我們自命爲革命軍人，到底幹什麼的。我們縱有珍羞羅前，可以下嚥嗎？」

他說道：「您說這話，我倒要勸勸您。你老是百姓如何，士兵如何，難道百姓是人，我們就不是人嗎？我們只應該想着百姓和士兵的利益，就不能爲自己的利益設設想想嗎？」

我告訴他說，社會的構成，主要的是人民大眾，不是軍人或政客。我們不應當把自己視如特殊的人物，整個的社會是分工合作，各司所職。工人爲社會建造生產，農人爲社會供應糧食，我們軍人的責任就是爲社會剪去賊民肥己的強盜。打倒出賣國家爲害民族的軍閥官僚。於是他又跟着提出一個問題，說是我們性命只有一條，若是爲人民爲國家犧牲了，豈不就完結了嗎？我就說，我認爲個人生命小，社會的生命大，犧牲個人的生命而保全社會的生命；犧牲少數的生命，

保全大多數的生命，就叫做成仁取義。這是人生最崇高的意義和目的；即是就個人言，亦可爲自己留下榮名，傳之萬代而不朽，則其人肉體雖死，精神永生，俗語說：「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也就是這個意思。他遲疑了半晌說道：

「一個人死就死了，還管什麼名不名做什麼？就是死了遺臭萬年，他本人反正是知道了，有什麼痛癢！」我吃驚他會說出這種話。我說：「你有這個見解，那就太高明了！人死了失去知覺，後世的唾罵，固然與他本人無關；但儘管如此，一個活着的人，除非他喪心病狂，總是愛惜名譽，想做好事裏做，誰也不會甘心願意的要做一個受人鄙視，遭人唾罵的敗類及惡徒。比如一個姓岳的和姓秦的在一起。彼此問起先世，姓岳的總願意說自己是岳武穆之後，可是姓秦的却決不肯承認自己是秦檜的子孫，他甯願說是秦叔寶的後裔。岳飛和秦檜都早已死了，但他們留給後人的印象却如此其不同。我們活着的人還不該知所警惕麼？」

這一天我和他談的很久，最後我問他部下現有多少人，他說有八萬多人，我說：「你尚有這許多人是值得高興的事，將來開上去與張吳等軍閥作戰，即是很大的一分力量，但有一點不可不注意，即是必須是八萬能同生共死的弟兄才好；若是八萬個自己的仇家就糟了。什麼是仇家？你不好好訓練他們愛護他們，就變成你的仇家了」。他很注意我這番話說：「我一定本着總司令的意思盡力去做。我一定要做一個爲社會謀幸福，爲國家爭光榮的好軍人」。說完之後他就回到考



城他的部隊中盡了。

我從潼關出陝的時候，靳雲鶚就派了代表與我接洽，表示願意歸我指揮。我和靳雲鶚相識，是在民國九年我在信陽駐防的時候。那是他任第八混成旅旅長，駐鄭州，一次他來信陽，我約請他參觀我們部隊的體操和各項特殊訓練。他很是贊美。不久我以餉源問題與趙倜武，他亦對我表同情，那時期我們過從很密，他也有許多地方對吳佩孚不滿。末後我由豫赴陝，臨別他十分誠懇的規勸我說：

「你們部隊，紀律嚴明，處處能獲得人民愛護和好感，只是所駐之地，總要破除迷信，把泥菩薩毀去，把廟宇改做學校或工廠，這在你原是好意，可是百姓不了解，往往以此類事引起人們的不快，我知道你是主張信教自由的，我覺得還是聽百姓自由信教好些。」

他這種坦白的忠告，使我非常的感激，民十一我們在鄭州同打趙倜，又共了一次患難，彼此之間的感情顯得更進一步。不過因為那次沒有償他當河南督軍的心願，不免常常不高興。同時又因其胞兄靳雲鵬身為國務總理，他驕驕盈得意，一天天的向官僚腐化的路上走去。最出名的就是懶惰。由於煙癮太大，早上總起不來，常常有約會，到時却不起身，弄得副官在臥房門口跺腳，他還是不動，這次他派人對我如此表示，我以為曾共過患難的老朋友，而今能站在一條線上來是很可喜慰的，故即接受了他的誠意。此時他為河南保安司令，駐郟城。一天到鄭州來見我，談起

防務的事，我和他說：「這時候你最好能帶你的部隊去進攻山東方面，你若需用什麼東西我可以設法接濟。」

看他的意思，不願意擔負這個任務，他一開口便向我要一百萬元的開拔費。我們那時艱苦萬狀，我到那兒弄這一筆大款子去？他返防後即無音信，令其進兵山東，總不理會，只顧今日向我要三十萬，明日要五十萬的強索，得不到手乃背後亂罵。張學良一次要來見我，他勸止他不要來，說馮某人天天叫窮，簡直六親不認，「我到他那裏，連一餐像樣的酒席也沒有，只教我吃青菜餛飩，我是死也不到他那裏去。」這是張學良來見我的時候告訴我的。大約他想着他來了，我應當請他吃大餐，打麻將，設煙燈，弄些響姐兒來給他胡纏，結果沒有這一些，他就恨了我。

寧漢兩方愈鬧愈僵，訴諸戰爭的空氣已愈益濃厚，這時，龐炳勛從湖北來。他原是國民三軍的將領。又是多年老朋友，我便直截問他：

「你到這裏來怎麼個意思呢？」

他說：「武漢的軍隊馬上就要打南京，我鬧不清他們鬧些什麼，我決不參加他們的戰爭，我願聽總司令的指揮，請你答允我。」

我就很高興的說：「這好極了，你快把部隊開過來吧。」他回去之後，便把部隊三列車三列車的運了過來，我令其開往歸德歸鹿鍾麟指揮。

楊虎城亦由陝西來電，要求出關殺敵。我說，這很好，可是餉項彈藥目前不能接濟，只好你自己設法。他回電說，什麼都不需要，只需要出關的作戰命令，死也死在前方，決不能老在後方耽着。我乃撥車把他及其部隊接了出來，亦交鹿鍾麟指揮，此外呂秀文王金鈺及趙倜舊部常好仁等部亦予改編。張聯陞，秦建斌及閻得勝等部，也從豫南開來，我即把他們分別撥歸韓復榘石友三孫連仲指揮。

我在鄭州住着手辦以下幾件事：第一是製造軍械；一方面令鞏縣及開封兵工廠日夜加工，儘量趕造機關槍迫擊砲並修理歷次戰役所俘獲的軍械，派王某陳某和吳老西向得勝等數位負責；一方面令河南各縣趕造各項鐵器分發各部以濟彈藥之窮，令吳樹榮等數位負責。第二補充兵員，着手須在河南各縣招募新兵，申令負責者注意兩點：一須多派宣傳人員向人民宣傳三民主義，二辦事者謹慎自愛，與地方接觸時萬不可到縣府受款，或作些佔人便宜的事，同時派人嚴查追究。這次韓復榘石友三孫良誠各部都補充到二萬四千人左右，總計第二集團軍所轄各部約有二十四萬人。第三除槍械而外，被服糧秣則派賈玉璋傅正舜魏宗晉等負責。亦都準備停當，使無匱乏。第四編印多種小冊，有的關於主義的宣傳，有的關於教條的說明，由參謀處秘書處及政治部人員如曹澗森秦德純簡又文黃少谷孟憲章等分配辦理，並令各部加緊政治訓練。第五各路防務重作調度，令鹿鍾麟部開到豫東，孫連仲部開到豫北。孫良誠馬鴻逵等部則集中開封鄭州以爲諸路策應。

這時候我們的處境很是危險，黃河北岸到大名一帶皆奉軍勢力。自歸德等地爲我們佔領，一般人民受反動宣傳，信了什麼共產共妻的謠言，以致紅槍會四起襲擊車站。在那邊任政治工作者爲前又文，一次在彰德工作，紅槍會忽起，嚇得躲入一店的錢櫃中，幾乎遇害。簡先生完全學者，光明正直，熱誠不苟，而不知機巧，故遇此變，於此足見宣傳之重要，若於部隊未到以前作一次普遍深入的宣傳，當不致有此等的亂子。在東面，徐州外圍以及碭山，曹州一帶，都是張宗昌褚玉璞和孫傳芳軍隊環繞着。在我們內部，劉鎮華不奉命令，遲延不動，袖手觀變。靳雲鵬對我不滿，暗中與孫傳芳張宗昌及當地紅槍會勾結，企圖趁機攫取河南以償宿願。張聯陞及王學忠則在鄂北豫南亦對河南瞪着眼，不知道打些什麼主義。樊鍾秀因上次請援事對我誤會，一直沒有消釋。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東路敵人動了，直魯聯軍徐源泉、王棟、褚玉璞、袁家驥、方永昌、等部約十餘萬人大規模進犯歸德，鹿鍾麟率楊虎城龐炳勛王金韜常好仁呂秀文等部約五萬人在楊集與馬牧集一帶與之對抗，戰爭極其激烈。我方軍力顯得單薄，有些人便說：「這是緊要關頭，馮總司令爲什麼不把基本隊伍調上去？」他們只知道空口說白話，可不會想到我們此時不只東路一面受敵，劉鎮華等給我的後顧之憂，亦必須顧到，孫良誠等部隊萬萬不能開赴前方的。我的謀並未落空，不久劉鎮華部姜明玉等，趁前方緊張的時候，相繼叛變，與敵軍劉志陸、潘鴻鈞等部會合，將柳河李斯集等處佔領，切斷我們前方部隊的歸路，這一下使我打了意料兒的敗仗。

龐鏡賢、侯向太、康栢城一帶撤退，剛剛退回，鐵路即已斷絕，當他過馬牧集時，幾乎被澤鴻鈞所俘。潘太聰明，每佔一城，與各方面勾結，今日勾劉，明日勾孫，此次即乘人之危，心懷不測，龐炳勳、楊慶城不能支持，退向安徽潁亳，他們受人煽惑，總想着馮某人、不派嫡系部隊打前鋒，這是每心裏犧牲我們雜牌部隊。故龐楊皆在那邊和第一集團軍接洽，結果，只揚虎城接洽成功。我的老朋友戴金聲，時爲劉鎮華第八方面軍副總指揮，駐劄部姜明玉處，此次竟被姜明玉等擄劫而去，解送張宗高處獻功。

在同一時候，孫傳芳進攻徐州，第一集團軍不能支持，亦向後大退，徐州重復失陷。李組紳先生從鄭州來見了我，痛哭流涕說我何不救援徐州，以致一敗如此，恐怕馬上就踏踏太平天國的覆轍去了。李雖爲商人，但與政治頗密切，爲人厚道穩重，熱心有爲，只是不免有點神經過敏，我就安慰他說，我們處境如此，稍有疏忽即有被消滅之虞，事實上是自顧不暇，那有力進援徐州呢？但我們當勝不驕敗不餒，只要再接再厲，勇往直前，沒有不成功的，俗語說：一話是開心鎖，至此，他方了解我們的苦衷，轉憂爲喜。

此時孫連仲、馮治安、韓德元等部駐信陽，監視靳雲鶚的行動。乃再由黃河北岸調回孫良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靳雲鶚猛烈夾擊，一戰大敗之，把他驅出郟城，靳率殘部向項城上蔡一帶退去。當我們東路部隊紛紛退却的時候，我正在信陽檢閱駐軍，蔣先生此時派駐武虛的代

表方肇濤（字蔚松）先生爲一大軍事學家，亦約請他同檢閱。方先生爲革命會多次受傷，臉上亦有許多創疤，後來數次任軍長總司令之職，身體吃了大虧，但精神依然充足。這次檢閱在野外舉行，我怕他不宜於步行太遠，要替他僱轎子，他堅決不肯，走得滿臉大汗，我將部隊細加檢閱，最後檢驗擔架隊，我自己坐一抬子，試驗木床和繩子是否牢靠。事後方先生向我談他對於此次檢閱的感想，誇許我雖臨危境，而頭緒毫不慌亂，猶能從容自在的處處留心，同時說我們部隊精神振發，個個如鐵打的一般，無半點頹喪氣象，故相信我必能給敵人吃一次大虧，很快的挽回困局，轉敗爲勝。

我乃派孫良誠率同馬鴻逵部關向杜良察及杞縣一帶，以右翼倚杞縣，左翼倚黃河，構築陣地，以解決姜明玉並反攻直魯軍。方聲濤先生見了孫良誠同志許爲一員大將。孫說：「你不要太誇獎我，若誇得我打個大敗仗，我只有跳黃河了！」這方面佈置完妥，同時豫北方面，奉軍已在彰德附近活動起來。我即趕回鄭州，一面派部增厚豫北防務，一面連電閻百川先生，促其趕緊出石家莊，以抄奉軍後路。山西所派代表崔文玉，也是一個小心謹慎先生，我請他幫助催閻出兵，可是所得結果，仍是持重不發。

黃河北岸的敵軍愈逼愈緊，我只有接二連三的打電報給孫連仲、韓復榘，限令趕速去擊退彰德方面的奉軍，俾可抽調兵力應付東路大戰。孫韓乃努力銜擊，這回張學良所部受一重大打擊，

後退一百多里。孫韓追擊一陣，迅速退回，連夜構築了非常堅固的陣地以冀守禦。

東路馬鴻逵方面連電告急，我打電話問孫長誠前方情形究竟如何，回答說還能支持一個月，我說：不一定要一個月，只須能守得七天，就有辦法。那時我所擔心的是東路張、褚和北路奉軍同時動作，幸而他們連繫得不好。當孫傳芳南攻第一集團軍，張褚進攻河南的時候，奉張却不協同進攻，已經錯過機會；此次奉軍在北路動作，東路敵軍又不能協同。我從容將張學良擊退，回頭即趕着抽調韓復榘，石友三部到東路，僅以孫連仲留守豫北。時鐵路司令許驥雲，我鄭重告訴他，這次戰爭關係的重大，我們萬事俱備，只缺火車，必得預備足夠的車輛，每隔三點開出一列車，使豫北部隊迅速調上東路前線，則必獲大勝。若有貽誤，定當軍法從事，許驥雲便去通知鐵路督辦王儒堂先生，不想他不知高低，冒冒失失的向王督辦說道：「我們能不能獲勝，全看鐵路的調度，若不能完遂命令，一定把你槍斃！」當面說了又說，回頭又下一便條送去。

王先生久居尊榮，那裏受得了他這一套？後來戰事告一段落，王先生即將許驥雲的庸突冒昧的事告訴我，並將字條交給我，我給他解釋，完全因許是一軍人不懂禮貌，請他原諒，王先生原極氣惱，經我陪了許多不是，說了許多好話，方心平氣和。

北路部隊按照既定計劃，一列車一列車迅速的連向東路。韓復榘到了鄭州來見我。我怕他們關上前線，自己內部各爭雄長，指揮不能統一。因鄭重向韓道：

你到前方去是願意聽孫良誠指揮，還是叫孫良誠聽你的指揮。」韓復榘毫不遲疑的答道：「我一切都聽孫良誠的。」他到了前方把此話通知了孫良誠，孫即派他和石友三開在杞縣西南方埋伏作爲預備隊。杞縣位於隴封東南，當龐軍右翼之後，孫良誠作此佈置，是因當時直魯軍精銳部隊多已集中到鐵路正面作戰，後面頗爲空虛，故特將韓石埋伏杞縣，準備在一個適當機會，來一個右翼包抄的戰法。這樣孫良誠日夜向敵軍緊逼，鬧了三天三夜，看敵方主力，都已加到前線，自己疲敵不堪，當即於夜間下令派韓存兩部全數開出，分作六路，五里一站，向敵方抄襲，敵軍是沿鐵路設陣，那段鐵路由隴封斜向開封，於此處拐一大彎，攔出一條大尾巴向東南而去，韓石正好向此段突出的部位施行截擊，直魯軍猝不及防，被打得首尾不能照應，於十月三十日全部潰退。正面孫龐諸部乘勝迅速出擊，把敵軍打得落花流水，柳河歸德等重鎮均次第爲我收復，石友三直追過馬牧集，騎兵則追到礮山以西。此役不但姜明玉等部完全解決，由閩來的劉志陸一枝部隊也被消滅。連日所俘直魯軍共計不下三萬餘人，獲槍兩萬餘枝，鋼甲車六列，大砲四十餘門，實在是一次空前的大勝利。

此次韓復榘於大勝之餘，自以爲所向無敵，仍要向敵軍窮追，屢來電話向我請求，我說前面就有孫傳芳部隊之遠不知道他們的陣地設在何處，我看還是穩紮穩打的好，不可鹵莽，韓復榘說：「我這回追擊，若中途出了危險，亦決不前來請援，我不放心，令劉汝明隨後趕去，韓一



直追到徐州附近，沒法再打，反被敵軍所圍，勢極危殆。劉汝明因輸在松遼，有那一段不光彩的事，對之素不服佩，我群爲勸說，幸得劉能識大體，不記前怨，慷慨相助，到了蕩山，一下車即猛烈出擊，敵方沒料到變而揮來一枝硬軍，倉皇無所措手，復大敗潰退，解了韓復榘之圍。若非劉汝明援救，韓此次必全軍覆沒。鐵甲車等軍兵器多是此時繳獲的，韓復榘連年戰功，皆壞在一個貪字，又在得勝之時，不免得意忘形，故出此岔子。若非劉汝明應援解圍，前功盡棄矣。

跟着第一次的大勝，重新佈置第二次前戰役，因爲此次直魯兩軍，雖遭重大打擊，但依舊保持着相當實力。我必須再予重創，使之暫時不能振作，方可掉頭從容應付黃河北岸的嚴重局勢。因此鹿鍾麟一部留守彰德，其餘東路各軍，悉令退回關封附近廣陣地。意思是要誘敵深入，而後出而聚殲之。張宗昌看見我們兩方部隊突然回撤，以爲我們內部發生了什麼問題，立刻重調大軍十餘萬，分作三路，追蹤過來，其中左路張敬堯，中路褚玉璞，因在新敗之餘，氣沮志喪，不敢勇猛竄進，而其左路劉潘等部，氣餒依舊很高，絲毫不懷遺憾，向我方猛撲過來，即在堽城一帶發生激戰，我偵知敵方陣線或前或後，甚不齊整，乃採取個別擊破的戰法，令孫良誠率吳鴻遠劉鎮華等部，首先將劉潘部擊潰，韓復榘對發王復於鐵路正面圍將敵軍中路擊潰，鹿鍾麟仍留守部隊同時出擊，亦於麥提嶺，馬頭棗榆兩鋪一帶擊潰敵軍左路，乘於是王奕大敗又獲全勝，敵軍三

路先後退去，張宗昌褚玉璞孫傳芳兩路敗軍都集中徐州，乃乘其喘息未定，與第一集團軍相約，隴海津浦兩線同時再作一次夾襲，此役於十二月廿四日展開，我們這邊派韓復榘、石友三、鹿鍾麟分任中左右三路指揮，率軍向徐州方面挺進。敵軍顧此失彼，其向南反攻的一部，被鹿鍾麟所抄襲，同時各路猛烈進撲，激戰不到一晝夜，敵軍已不敵支，即於十五日向北狼狽潰退，徐州遂為第二集團軍克復。

正當這邊進行兩次大會戰的時候，黃河北岸我方，軍力很是單薄，我時時刻刻記掛着。因調國民三軍孫二哥的舊部梁壽愷部渡河北，派令他由曹州進攻濟寧，俾可牽敵軍之肘，不料梁壽愷不聽命令，渡過黃河以後，擅自作主，去攻大名，攻了多天不能得手，反被褚玉璞所敗，由大名退到衛輝，又退至新鄉。北路陣線都被影響，長垣、封邱、原武、陽武等縣，都先後為敵及當地會匪所佔領，同時張宗昌的部隊敗退後，稍事整頓，亦開向大名一帶活動。如此一來，豫北形勢已顯得非常嚴重，實已不容坐觀的地步。因此徐州攻下之後，即將攻徐各部調向北路，留韓復榘一部駐鄭城漯河許昌一帶以防備樊鍾秀的異動，其餘鹿鍾麟劉鎮華各部及鄭大章騎兵等分道渡河，會同原駐豫北，孫連仲等部，向敵軍猛攻。自二月初旬主力接觸，直打到二月二日攻克衛輝，才算將豫北敵軍掃蕩清楚。

這次梁壽愷不聽命令，自作主張，弄壞了全局，無論按軍法或按革命紀律，均當予以嚴格處

分，然以隸屬關係，怕孫二哥不得諒解，只得隱忍，仍須送糧秣送彈藥給他，祇因他鴉片煙癮太大，很不可靠，乃以韓復榘代理他的職務，須等他煙癮戒除以後，再許回防。梁這次離軍，受許多磨折，到北平即戒了煙，身體也好起來，「不受折磨不能成佛」，這句話真有教訓，但因此三軍朋友總說我手段太辣，而不肯明察內容。平心論事，當事者對於旁聽者的風涼話是毫無辦法的，唯有聽之而已，後來將此事經過詳細函告孫二哥，孫二哥倒頗能了解。

至此東北兩面，都暫時平靜無事，河南全局轉以安定，

這連着幾次的戰役，實在都夠激烈的。就物質方面而言，敵方有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助，武力遠勝於我方，他們空中有飛機，陸上有坦克車鋼甲車，在後方有豐富的餉源，在前方有充足的彈藥，這些我們一件都趕不上。可是精神方面的劣點，却成爲他們的死症，他們紀律太壞，所至之地，肆意騷擾，使百姓苦痛不堪，深深地認識了軍閥的罪惡。他們的官長嗜好多端，生活腐化，身體精神都不足以擔當重任。他們官兵生活懸殊太大，官長太富，士兵太窮，官長太舒服，士兵太困苦，同時又無所謂政治訓練，也沒主張信仰的維繫。因此之故，他們縱有優越的物質條件，却沒有強旺的戰鬥意志。

敵人的物質優點，我們都沒有，同樣我們精神方面的優點，他們也沒有。我自治軍以來，兢兢業業的所注意的就是部隊的訓練與紀律。此次五原誓師，各部隊成立政治部，於官兵的政治訓

練，軍民間的聯絡，無不致其全力。每天三翻四覆，口說筆寫的，都是關於民族的危狀，民衆的痛苦以及此次國民革命的意義與價值。士兵時刻呼吸着這種濃厚的革命空氣，每個人都知道他們吃苦拚命，不是爲了一派一系或任何人的利益，而是爲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專制，爲了爭取國家的自由，解除民衆的痛苦。是爲了實現三民主義，完成神聖的國民革命。官兵俱有這種明確與深刻的認識，故能不避艱苦，勇猛前進，同時愛護百姓，嚴守紀律，勤勞刻苦，堅強清正，同仇共苦，有口皆碑。又都是日日三令五申，官兵俱存不離天經地義，因此之故，我們的物質雖極艱苦，但精神方面可以克服之，戰鬥力的堅強往往使敵人爲之胆寒。

在實際戰鬥上，我們頗知避去自己所短，而儘量利用我們的所長。比如每次戰役中，我們總是利用夜襲，利用狂風暴雨的天氣出擊。天色越黑，愈是我們作戰的良機，天氣越惡劣，愈於我們作戰有利。這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官兵的身體強壯，戰鬥意志旺盛，而敵方官兵體弱志惰，受不了辛苦。在武器方面，此時他們的飛機大砲都不易起作用，而我們的大刀短鎗却恰好能夠發揮威力。我們又善於防禦，每人都帶一把大鐵鎗，官兵皆善用，官長能在前爲兵表率。每築一個陣地，必是盡心竭力，又迅速又堅固。敵方以其優越的武器，費兩三天的工夫攻破了我們一個寨子。我們不過退三、四里路，立刻又深溝高壘，拚命抵禦。所用設備是新式壘溝。當敵人進攻的時候，我們清清楚楚的看見敵人，而敵人却看不見我們。他們每攻得一個村寨子，大約傷亡五

六百，（我傷亡一二百）致受重大犧牲，弄得胆喪氣沮，不敢續進。牠們攻陷常用坦流軍，寨門一碰即開，等其進了寨子，我們即盡擁上去，圍而攻之，坦克車兩輛三拐歪入溝中，故所俘甚多，使其再也不敢用此。又我們確守射擊軍紀，不見敵人不放槍，不隨準不放，三百公尺以外不放，故能射擊準確，彈不浪費。而敵人方面恰恰相反。（夜間我們只派一二人放槍數響，敵方即密放一整夜，簡直不知射擊軍紀為何物）。他們雖有充足子彈，亦非我們所畏。

我們部隊雖艱苦奮鬥，而屢得勝利，但並不是說，我們能以精神超越一切，而不受損失。相反的，每次會戰，我們都有壯烈的犧牲。這就因為一則敵方武器精良，我們是憑血肉相拚。敵方有日本顧問之類的幫助，我們只憑自己將士的能力。彰德附近之役，鹿瑞伯任指揮，敵方飛機成天猛炸，使我們部隊陷於十分困苦之境，鹿只好躲在一個小地洞中，盡力以電話調度一切，那時左翼單薄，令張凌雲師增補，却無法開上去，他帶着人馬二三十人一大行列，察看進兵路線，不料為敵方望遠鏡發現，立刻掉過大砲向該路猛擊，使我們人馬死傷甚重，連張師長自己也幾乎遇難。曹州府一戰我們亦受很大的損失，師旅長如曹福林孫桐萱等均受傷。豫南兩次會戰，只孫良誠一部，就陣亡一萬多人，輕重傷兵擠滿了開封醫院，旅團長受傷者達數十位。

在這個悠長的激戰期間，我除調度部隊指揮作戰外，更要籌辦救慰傷兵掩埋陣亡官兵，獎賞有功各部，以及人馬槍彈糧秣被服補充等的事，每天隨身帶着二三十副電話機，與前方各都

斷聯絡，不是這個軍長來電話說，子彈沒有了非趕急補充即無法支撐了，就是那個指揮官說傷亡已經精蕩，再不設法趕運救治，就要發臭了。此外，還要各處奔走，一會兒要去開封，一會兒又到鄭州，一會兒察看東路，一會兒又察看北路，在各城各地，一方面與各級官長接頭，一方面須對士兵講話，同時還得對民衆宣傳，一天到晚，黑天白日，生活老是如此忙迫。神經老是如此緊張，一直繼續了數月之久。

一天我到東路督戰，在蘭封南門城外，召開民衆大會。正講着話，敵方三架飛機出現在上空。民衆沉不住氣，都四散逃避。那三架飛機擲下幾個炸彈，距我們不過百十公尺遠近，等到飛機去遠，大家重又集合。我向民衆慰問一番，知道沒一個人受傷。我就說，飛機投彈並沒有什麼可怕，比如天上的飛鳥比飛機多得多了，但天上飛過的鳥幾曾把屎撒到我們頭上，（大家聽這比喻，都笑得前仰後合）。我這樣的說，不過爲聽衆取笑，以減輕他們對飛機的恐怖心理而已。不想會沒開完，飛機重又掉回頭來，在會場北面的路上，連投炸彈數枚，炸了數個四五丈深的坑，徜徉而去，這回民衆再沒有逃的，都能鎮靜不害怕了。於是和父老們談談問問地方情形。那時張宗昌部隊剛被我們打走，地方被其蹂躪，人人怨苦，一位老農人說，他家裏牛羊都被宰盡，甚至狗子亦被殺了吃掉。另一位說：他家裏專以養鷄爲生，可是張宗昌軍隊一到，先來要蛋，蛋吃完了，又要雞，弄得鷄種也絕了。又有一位帶我去看他的住屋，他家住在鐵路北面，曾被張宗昌的

白俄軍隊曾住數日，那些白俄故意糟塌百姓，把蒸饅用的蒸籠裏一層一層都拉些糞，燒鍋不用柴炭，把門窗燈桌一一劈毀，作爲燃料，像這類的見聞太多，不必細舉，我會將他們的暴行作爲詩歌，刊之報端。受害人民之過於窮苦者，並設法子以相當救濟，使能重理生業。

俘虜中有白俄五六百人，多半連同鋼甲車一併俘來。他們都是直奉軍閥僱用的，只爲吃飯掙錢，別的都無所謂，其中多機械技術人員。解到後方，弄些好吃的款待款待，派了幾位善俄語的人與他們談談。他們高興得不得了，歡天喜地的唱歌跳舞，以爲娛悅。其歌舞有的很是粗鄙，有的很文雅。又上次在衛輝附近俘白俄甚多，亦予優待，令其各獻所長，隨軍服役。

其他所俘之敵軍官兵，亦妥爲安置，決不加以殺害。其中有劉志陸一部官兵，皆粵桂籍，解除武裝後，撥車送至漢口而後給資遣散，官長每人五元，士兵每人兩元，以爲他們路上盤纏，原籍山東河南者則講話後就地解散。所俘傷兵，都送入醫院爲之治療，和本軍官兵待遇相同。我以爲這並非作慈善事業，而是盡我們的義務與責任，因爲禍國的只是軍閥，士兵們是完全無辜的，他們一樣也是良民，只因生活驅迫，（這也多是軍閥所賜）始應募當兵，變成軍閥爪牙，我們不但不願加害於他們，並且應當寄以同情的。兩國交戰，俘虜且須優待，方算文明，更何況我們是內戰？這意思曾向首領三令五申，故辦理甚佳。

經過這次大戰，直魯奉以及孫傳芳軍一概不振，暫時再離向河南進犯，同時第一集團軍自從

徐州南退，因為內部發生了些問題，蔣先生表示消極，下野避赴日本，而甯漢之間的衝突亦已訴諸武力。革命的友軍們，發生這樣分裂，使我因處河南，亦無法單獨前進，因此在會戰結束後，我除盡力關懷寧漢之爭，促請蔣先生出山，並催促山西方面發動軍事而外，就埋首於自己內部的整頓。第一，就是肅清後方奸黨。第二，就是加緊整飭吏治，以使內部得以健全與鞏固。

我自十六年夏間出兵潼關，以至奠定了河南全局，這其間我們是以全力向前進展，未暇顧及後方。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陝，甘，豫境內的軍閥殘餘，最使我們感到不安。其中麻老九據同州，黨拐子據鳳翔，田玉潔據三原，涇陽，張兆甲部散居甘陝邊境，他們騷擾地方魚肉百姓，無所不用其極，而同時任何人的委任都肯接受，任何方面的命令全不肯聽，種種情形，前面已經說過，這種後方的隱患，是絕不能漠視的。因趁此前方軍事靜止的時候，命宋哲元劉汝明等率部分別一一剿除。這些么魔小醜，力量雖甚有限，可是因為在地方盤據太久，根深蒂固，剿除時頗費了一些氣力。其中麻老九為劉汝明所解決，黨拐子田玉潔及張兆甲的殘部韓有祿黃得貴等，則被宋哲元張維璽先後消滅。

吳新田駐漢中甚久，因聞其搜刮地方，騷擾淫佚，置正事於不顧，以致所部敗壞不堪，（我認識他時，他才十八九歲，為人精明幹練，實心實意的要望好處走，後來陞大畢業，受很完全的教育，只以環境毀人，經不起官僚腐化空氣的薰染，弄到這步田地真是可嘆）我想把他部調來鄭



州加以整頓，一方面使其不致沉淪不返，一方面亦可使我們軍力上有所增益。我和他通電數次，他滿口答允。可是開到老河口，其部屬即全體譁變。後來費盡精力終也沒有收拾得起來，吳新團爲陸大畢業學生，學識能力都有可觀，然受社會惡劣薰陶，竟致如此下場。我真爲他可惜！

河南還有一種叫做「妙道會」的民間組織，原是一種宗教團體，爲領袖者以刀不入，子彈不過等等邪說，以爲號召，愚民無知，受其迷惑，紛紛加入，頗能震動一時。到後來人數加多，胆子也大了，同時軍閥們又加以收買，他們公開截劫火車，搗亂地方，乃令張自忠負責解決之，經捕獲黨羽很多，據他們招供，是與吳佩孚有關。

關於政治和吏治，在我們覺得比軍事難辦的多，第一因爲革命正在進行，軍事階段，尙未結束，而軍閥連年蹂躪搜刮，地方糜爛，人民困苦，達於極點，一直不能使之蘇息，在這樣的時期，要想整理地方政治，不免處處覺得矛盾與棘手。第二我個人是個軍人出身，我們的團體，也是以軍事爲中心的團體，關於人才的羅致與訓練，亦向來偏重此方面，政治人才的缺乏，是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在這樣的客觀與主觀條件之下，要使政治與吏治都能納入軌道，實在萬分的困難。甘肅主席，仍由劉郁芬充任，陝西是宋哲元爲代理主席，河南代理主席原爲薛子良，繼由鹿鐘麟任之，後來戰事緊張，鹿率所部忙於作戰，無暇兼顧，乃又調鄧哲熙充任。三省之中，因爲河南地位特殊，故尤注意河南政治的調整。爲補救人才的缺乏，我特留請王儒堂先生爲隴海鐵路

督辦，兼鄭州市市長。凌濟冬先生爲河南大學校長。〔後來與黨部鬧意見，學生鬧起驅逐校長的風潮。經多方勸導，又復迎凌先生回校。〕又由上海敦請江恆源和陶行知等幾位先生前來幫同籌劃一切。經詳審當前實況，並參照民十一我督豫時的施政大綱，製定了河南政治大綱。舉凡一切設施，悉按照此大綱進行。江問漁先生後即留省政府爲教育廳長。省政府還羅致了幾位地方人望，張鴻烈爲建設廳長，張鈞爲民政廳長，張鈞原爲吳佩孚舊人，民三時曾爲漢中鎮守使。我那時用人的方針，是只重人才，不問派系。故張之出處雖有不合，但亦舉而用之。可是用人與辦事畢竟不是容易的事，後來河南人民對於張鈞並無良好之批評，江問漁先生亦以事辭職他去，不會好野地施展其才具。

治豫大綱中所規定的重要事項，就是剷除匪患，普及教育，澄清吏治，禁賭戒煙，提倡國貨以及崇尚節儉等項。關於剷匪由趙守鈺韓多峯兩位負責辦理民團，趙老成持重誠篤勤勞，多少年來始終如一，身軀精神尤其壯健。韓則熱誠愛國，不辭勞苦，在河南辦理民團極有聲譽。禁賭戒煙等項，辦理亦有成效。提倡節儉一項，軍政人員又能以身作則，那時公務人員真正儉勤勞節儉四個字的教條，不但腐化官僚習氣大加洗除，卽日常生活，亦儘量的平民化，除非萬不得已，不得購用一文錢的洋貨，衣服都是布製，吃飯都是一菜一湯，上下一律。建設方面，因在軍事時期，地方上過於窮困，所以還談不上，只以許多民房破爛過甚，簡直不能居住，故在開封鄭州建

築平民住宅，使一般貧民得免風雨浸淫之苦，車站附近所建尤多，這也是因為地點適當的緣故。又特別注意一點，即通令軍政各機關執法人員，嚴禁刑訊，因為酷刑之下要人家招供甚麼，人家只好招供什麼，任何人處其境地，亦無法自持，尤其像火銃等等酷刑，簡直喪盡天良，滅絕人道，開明的社會，必不許有，故查知有用刑訊者，即嚴懲不貸。後來開封鄭州二地爲此事作一大運動，頗爲收效。此外還有一些枝枝節節的改革，不必細述。最重要的還是吏治的問題。人選方面尤使我感到痛苦，縣長是親民之官，一切政治設施都得通過縣政府，方能達於人民。從前我左右的縣政人員，都是鄧鑑三，薛子良一類人，他們人品方正辦事老練，故能勝任盡職，少有弊病。此時所分發的各縣縣長，却不能如此整齊。他們認真不苟與勤勉清廉方面，原也是可以相信得過的。但一個縣長，只能認真辦事，只是清正不苟，還是不夠，他們更須具有相當的學識，與足夠的經驗才行。而此時縣長人才，就多缺乏這些重要條件。現在舉幾件事實說一說，以見當時情形的一斑。

鹿鍾麟代理河南主席時，分發了一批縣長。有一天我問他，他們在地方辦事，成績如何？鹿就將所知情形，一一詳告，其中多是能喫苦耐勞認真作事的。如賈德潤於民十一年會爲淮陽縣長，處處實作，深得民心。有一次土匪攻城，他親率縣隊，光着脖子與土匪抗拒，終將土匪擊退。此時仍令他爲淮陽縣長，兼行政專員及民團司令。辦事極是努力，可是存心雖好，却以經驗不

是，不知民情，不免有些操之過急的地方。比如對地方土豪劣紳嚴加約束，不給面子，又常常出去捉賭，有一次在淮陽一個廟會上拘捕賭徒，得罪了不少的地方人，後來竟被人民假扮土匪將他打死。又有李國沙，曾爲本軍團營長，爲人極是潔身自愛，處處想盡好裏面，此次任他爲縣長，八個月後，他回開封逃職，問他地方政情，他說：「我這一縣的人民素來以好訟出名，可是我到任以後，一件官司也沒有！」。

「你怎麼辦到這樣地步呢？」

「到任的第一天，就有兩個兄弟爲家務糾紛來打官司，兩個人在公堂上各執一詞，互相爭辯，使人無從判斷是非曲直，我就說：『不管你們誰有理，你們以親弟兄，竟也要打官司，就是好訟，就是不友不弟，也就是不孝，我要先辦你們這好訟和不孝的罪！』於是各打一頓軍棍，使之背臉跪在縣府門前，同時對圍看熱鬧的人講了一番話。本縣長最厭惡好訟的風習，若有人來打官司，我就先打他二十軍棍！這一下把人民弄怕了，故八月之中，無一件訟案。」

陝西鳳翔縣縣長劉硯金。也有和這位爲民「息訟」的李國沙相同的作法，他在任內，最注意衛生清潔的推行。每天早晨起來，就赤着脚，褲筒捲到膝彎上，手裏拿一根棍子，親自到街上去查清潔，誰家門前有污穢垃圾，他就抓出家長來，用手裏棍子大打一頓。他每天要走遍滿城的街道，滿城的住民都有挨打的危險。他問案的時候，也是光臂赤脚，把脫下的褂子搭在肩上，蹲據

在公堂椅子上面，宛如竇爾登的派頭，誦訟者三句話沒說的好，他就給他一頓棍子，打得人民含冤莫伸，敢怒不敢言。

李劉兩個縣長是辦事鹵莽，好打百姓，河南新安縣更有一個縣長，因為辦事不通情理，反挨了百姓的一頓打，那時陝、甘、豫、各地都厲行放足運動。各縣設有放足會，勸導婦女分期放足，第一期爲準備期，第二期爲實行期，第三期爲檢查期。每期三個月，這也是治豫大綱上面所規定的辦法。這位新安縣長到任的時候，正值檢查期，他親自出外檢查。走到街上恰好遇着一個纏足的新娘子，還沒有遵令解放。縣長一怒之下，就迫令他在街上立刻解除纏布。這事引起觀衆的反感，人人憤慨難制。於是羣起用磚塊瓦片把他痛打一頓。時鄧哲熙爲代理主席，當即把他撤職，那時我在新鄉指揮戰事，這位縣長即跑來見我，以爲我是極力提倡放足的，他正是照着我的意思辦事，如今受了撤職處分，未免覺得冤屈，我告訴他說：「像你這樣鹵莽滅裂的辦法，不但應該撤職，而且應該監禁！」從前鄧鑑三先生爲湖南臨澧縣長，也有過挨家挨戶勸人放足的事，但他却辦的合情合理。第一他在任日久，與百姓已有良好的感情，第二，他勸人放足，先把人家父母請出來，和他們詳詳細細的痛說纏足的害處，慢慢說得父母們都心動了，而後再令自動實行。第三，他在檢查的時候，也只是好言勸說，決定不直接去和少年婦女交涉——他以一個年老的人，勸到十七八來歲的小姑娘放足，也決不致於引起人們的側目。我把鄧先生的例子詳細告訴

了這位縣長，爲他把天理人情國法三者，反覆詳論，使他明白自己辦法的不當，他才恍然大悟了。

此外還有一位李相寅，亦在河南爲縣長，後來升到專員，辦事頗能認真，可是私行不檢，他在任上竟戀愛了一位女教員，使本地方父老大大爲不滿，於是亦只有把他撤差。

上面所舉的幾個例子，都是用心很好，而辦法太壞，毛病就在於學識不足，經驗缺乏。這原也難怪他們本人，他們多是軍人出身，年紀又青，叫他們去做縣長，根本就不合情理。（原是做廚子的，不叫他做菜做飯，却叫他做衣服，豈不是大錯而特錯）我常常和薛子良等談此，以爲是我們自己不可掩飾的錯誤，真是對不住國家，對不起人民，但是除了這些半路出家的縣政人才而外，我們的政治幹部在那裏呢？這必須早有預備才行，決不是空口說白話所可奏效的。

總司令部政治部自劉伯堅走後，即由郭春濤簡又文担任正副部長，總部黨務由凌勉之擔任，宣傳處長由孟憲章擔任。總部秘書長原爲何其鞏，後何請假他去，即以黃少谷繼任。鄭州會議後成立開封政治分會，顧孟餘、徐季龍諸先生，均爲分會委員，實際負責人則爲鄧飛黃，亦中央派來。有朋友在我面前說：鄧好用私人，對其不滿，我倒覺得不然，我說鄧先生二十來歲，剛從學校出來，認識的人不是同學，便是朋友，不用同學或朋友，另外再沒有熟識的人。所以我常常和朋友們說：我終天忙於治軍，你們有適當的人才，請多多的介紹前來，我們是極端歡迎的。

爲了補救行政幹部的缺乏，特利用上述的政治機構舉辦了幾個訓練班，政治分會成立了一個政治訓練班，由鄧飛黃專主其事。省政府成立一個縣長考試委員會，由王鐵老爲委員長，專門考核並訓練縣政人員。又由薛子良余心清辦一訓政學院，李世軍主辦一農村訓練班。這些訓練教育的機關，都辦的有相當成績。經此一番振作，基層政治的推行，雖不能說從此就盡善盡美，但比較以前總算進步得多了。

訓政學院的辦理，因薛子良余心清悉心努力，所以顯得很有勇氣，那時我常到學院中參觀，看看學生的生活，談談規定的課程，有時找我講話，我即在操場上和學生們談幾句，學生們都很活潑。除功課以外，於身體的鍛鍊，亦甚注意，他們的運動器具，都是西洋的一套，和普遍的新式學校完全相同，這個我總覺得不妥。我常常發狂論，以爲新式運動，好是很好，只是所用都是洋貨，比如踢足球，球是外國貨，鞋也是舶來品，打網球，網、拍子、無不是美國來的，排球、棒球亦無不如此。打球我一點也不反對，我只反對這樣瘋狂的爲外國人鎗貨。這也是運動，可實在是少爺小姐敗家子的運動。要活動身體，劈刀不行嗎？舞劍不行嗎？摔跤打拳不行嗎？中國的十八般武藝，沒一件不足以使我們出一身大汗，活動全身血脈筋骨。你說：那些玩藝太陳腐了，可不知道西洋的一套田徑運動，也是從希臘羅馬時代傳下來的。我們既不能好好繼承古昔遺產，而發揚光大其精神，又不能按照民族本色，另外發明些新鮮活潑的玩藝，一味的只是盲從西

洋，忘記了自己是個破破爛爛的農業社會的農業國家，想起來這真是我們的大恥辱。

李世軍主辦的農村訓練班，隸屬於總政治部，一日政治部副部長簡又文來見我，氣憤憤的要求辭職，說政治部裏出了不名譽的事，使他無法處理。經我一陣追問，他始說出李世軍和部中一位女同志有曖昧關係，晚間，李常到那女同志屋中去睡，已經鬧得不成體統。我聽簡又文如此說，不禁笑了。我說：「這事好辦的很，如果李世軍是強迫的行爲，那女同志勢必向你申訴，你自然應當按法辦理。如果是兩相情願，出於自動，那你又何妨成人之美？除此之外，你認爲此事有礙部紀，那你把他們記過也可以，申斥訓戒也可以，甚至開除也無不可，自己責任內的事一樣都不辦，就要跑來辭職，豈不是和我爲難嗎？那又何必呢！」

經此一說；簡先生方回去查問去了。那時前方戰事正緊，他們却在後方鬧這些麻煩，真是可笑的很。



## 第三十九章 豫北大戰

經過十六年前後豫東，豫北的幾次血戰，河南局面，雖暫告安定，但長江流域和冀，晉原野，都燃起了連天的烽火，寧漢間的局面時弛時張，意見迄不消釋，而親痛仇快的戰幕不免終於揭開。幸而變化微妙，急轉直下，干戈忽又化爲玉帛，跟着是要人下野，黨部改組，上海發生了特別委員會的組織，直到甯漢政府合併，南京組成國民政府，共推譚組庵先生爲主席；這期間一天一個變化，一天一個新的局面，都有別種記載可查，這裏不必細說，同時，在北京僭稱大元帥之名的張作霖，自從攻豫失敗，積極重振旗鼓，添聘了許多日本顧問，備辦了充足的軍火，另新發動了攻晉攻豫的戰爭，山西以傅作義駐涿州，被奉軍重重疊疊的圍困起來，傅作義堅毅沉着，守着涿州後，與奉軍死抗，奉軍左攻右攻，受了巨大的損失，仍然未把涿州撼動分毫，在這個長時間的涿州縣城爭奪戰中，傅作義將軍的英名轟動了全國，而我方平漢路軍事全局，亦因以獲得很大的便利。

閻百川先生就任了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督師討奉以後，我的駐晉代表李子晉從太原回到鄭州，見了我，說了許多的拐彎話，我和他說：

「我的性情素來直率，不善應酬，你們在外邊爲我代表，必須替我彌補這個缺點，盡力的隨和隨和，說些好話，以便與各方感情日臻融洽。若你們也到處得罪人家，那便不是我的本意了。」

他聽了我的話，很表示他抱屈；半晌才說：

「我本有許多話要向你報告，現在你既然這麼說，我就不必說了。但有兩件事實還是說一說，請你記着：第一，張學良盤據彰德的時候，山西本就要發動，打算出兵石家莊，抄襲秦軍的後路以與我們呼應，收夾擊之功，可是張學良事先聽到風聲，即請乃父張作霖備辦大量禮品，送了過去，向對方表示好感，並請山西方面一塊兒先把青天白日旗製好，容給他們三天考慮的時間，這個要求，對方竟然答允，那知道是秦張的緩兵計，三天過去了，不但未曾踐約易幟，反把他們的砲兵開了過來，對之猛轟，吃了這一個悶心虧以後，才決定發動。這是自誤誤人的一個事實，很值得記住的。」第二，我在山西多時。一直沒聽見一句肺腑中的實話，只有一天，我們談了五六個鐘頭，直到夜深兩點鐘，當時越談話越多，越說越高興，俗話說「言多語實」，一天我聽到兩句實話，我永遠都不忘記，他告訴我他的處世秘訣就是：話說得越澈越越好，事做得越不澈越越好！他把話說出了口，馬上就自悔失言，我心裏也感覺得很不痛快。我們彼此匿着眼，很久沒有再開口。這兩句話是極可珍貴的，因爲確實是他肺腑中的真話」。

這位李先生的眼睛生得有點斜，我就只好開玩笑似的和他說：「你是眼斜心不正！好話你記不牢。偏偏記牢了人家的壞話！」

現在回憶當時情形，仍然使我想起李先生那些話而生無限感歎。

在那時，平津爲軍閥勢力的大本營，那方面的動態情報是我們所最關心的，張敬輿先生時居天津，於此項工作極是出力，他以五千元辦一無線電台，請丁春濤負責，專與我們聯絡情報，一天之中發幾次電報，另外他自己又設法與我們傳遞書信，數日一次，此事張先生熱心幫忙，花了不少的錢，費了很多的心力，後來張作霖偵知，一日請他吃飯，即在宴會席上將張先生殺害。公公道道的說：張先生實爲革命最忠實的朋友，他身冒危險，大量的墊錢，什麼也不圖，只要助成北伐革命，張先生之死，係爲革命犧牲，他的功績是值得紀念的。在北京，也有一個朋友幫着做情報工作，也冒了許多的危險。

軍閥們在他們的防區內企圖消滅革命勢力，簡直無所不用其極，對於革命黨員固然大肆捕殺，卽普通人稍爲有一點與革命有關的痕跡，亦都加以拘捕。北平街上受我們拖累者甚多，有某布店因本軍某團專在他家買布，竟被罰款數萬元，又有一家米麵店和一家藥舖因與本軍有買賣關係，老板亦被捉去壓積子打鞭子，弄得九死一生，結果仍是罰款釋放。試問商家買賣，何來仇恨，又有什麼政治關係，真是黯無天日。有位朋友王弼臣，在保定府住家，因爲他在客廳中懸掛過我

的一張相片，便成爲了不得的大罪，被軍閥們的爪牙捕去，待之如江洋大盜，手上腳上都給戴鐵鍊，百般的勒索訛詐，結果罰了一萬多元，鬧得傾家蕩產，一家幾十口都沒飯吃。住在北平的國民軍官佐的眷屬被拘捕的更多，也有父母入獄，也有兄弟被捕的，甚至一個會在本軍當過伙夫的平民也被捉去一打二罰，走頭無路。本軍將領之中，劉菊村做過北京兆尹，張之江做過察哈爾都統，李鳴鐘做過綏遠都統，鹿瑞伯做過北京衛戍總司令，我們的部隊，自成立左路備補軍第一營，直到此刻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止，除開短期在浦口常德和譚家磯駐防外，其餘的時候，大都駐在華北一帶，華北幾省無論城市或鄉村，到處都有革命軍的親故，到處都有國民軍的朋友，他們受我們的拖累，遭殃被禍的真是不少，萬想不到軍閥暴虐無道，一至於此！說軍閥所在的防區即是人間地獄，實在一點不假。

在山東方面，我們派去做秘密工作的朋友被張宗昌殺害的也很多，其中有一位王君，曾充本軍旅團長，住在山東，爲我們常常通信，後來即遭槍殺之慘。張宗昌在豫東蘇北戰敗，回到濟南，一肚子氣忿無處發洩，遷怒所及，橫施虐殺，鄭金聲被姜明玉叛變劫獲，即被解赴濟南，同時被押的尚有田瑞霖及一位從安徽捕去的馬君，此時他爲發洩氣憤，便把他們三個人提出來，想着加以處置，見了鄭金聲，立刻迫令下跪，鄭不跪，怒道：「你要槍斃我，請趕快下手，不要多虧。我爲三民主義爲中國國民革命奮鬥，什麼都不怕！」聞者均爲之落淚，張宗昌改變態度，

許子大官，鄭金聲即清口「土匪」，「賣國賊」，對之痛罵，張儻養成怒，把他們三人同時槍決了，（其中田瑞霖爲陸大速成班第一期畢業，河南沈邱人，爲人熱誠勇敢，隨段先生任事時爲最敢言之人，故有「田大砲」的別號，學識能力實爲國家有用之材。）後來三十二年鄭繼成刺殺張宗昌於濟南車站，便是爲他的叔父鄭金聲報仇，張宗昌禍國殃民，落得如此下場，想來還有點死有餘辜。

豫東之戰，我們在考城方面獲獲張宗昌部十幾尊大砲，運到後方查驗，發現每尊大砲的彈膛都已炸毀，大家猜度原理，究竟是他們退却的時候自己故意炸壞的呢？抑是另有他故呢？許多人都莫測玄奧。我知道從前袁世凱曾特意令兵工廠製造一種爆炸性的槍彈及砲彈，專門用來炸毀敗退時不及搶走的槍砲，以免資敵，我想莫非張宗昌也備有這類的砲彈麼？後來打聽，纔知道滿不是那回事，原來那完全是兵工廠裏的工人作弄的把戲，他們痛恨軍閥，同情革命，故意仿製了爆炸性砲彈雜於普通砲彈之中。及至運到前方應用，好好的大砲多在開火後炸壞，無從發生作用。

蔣先生自徐州退却後下野，悄然遣赴日本，不久即經各方敦促，返國到滬。那時我在關封，聞知蔣先生已回，極是高興。即與閻百川先生電商，請共同擁護蔣先生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俾北伐大業得早完成，連同電稿一併擬好附去。當蒙閻先生覆電，簽字贊同。於是共發三告全國同

馮的通電。說明當前大勢及我們襟懷；同時並致電蔣先生，表示我們的誠意，請於早日回職，蔣先生接受了我們的意思，即回京就職。當時經過，無庸細述。不久蔣先生親自和馬雲亭同到鄭州。送給我一個譜帖，與我約爲盟兄弟，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義，他的懸壺之意，很使我感動，亦即具一帖，寫道：「爲完成革命實現主義，我願以至誠跟你一起奮鬥到底。」

和蔣先生同在鄭州盤桓數日，接着又到開封，時敵方增兵北路，冀晉一帶戰爭尤烈，乃共商繼續北伐的任務分配。那時還有些內部的問題，蔣先生很是掛念；一天，我們同在開封各處走走看看，蔣先生對河南情形很說了些誇獎的話，當時他提及他所懸心的一些問題，我勸他說：

「這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先賢教訓，是儘管人家疑惑我們，我們不能疑惑人家！儘管人家不容我們，我們不能不容人家！苟能持此原則去做，前面都是康莊大道。」

因詳述漢高祖封雍齒的故事，把自己的管見都坦白說出，以供參考。商談了一個大略，他即回返南京。

這時要繼續北伐，必須要將徐州奪回。乃與第一集團軍聯絡由蚌埠、揚山、歸德進兵，兩面夾攻，敵軍不支，退出徐州，於是商妥：蔣先生率第一集團軍分三路沿津浦線向北推進，賀耀組在鐵路以西爲左路，陳調元在鐵路以東爲右路，蔣先生自爲中路；我們這一邊，以方叔平爲右路，與第一集團軍左翼賀部相聯絡，方部左翼則接孫良誠——孫部取道曹州直攻濟甯。許長林與

石友三兩部，都留駐開封一帶，爲預備隊。北路方面劉鎮華在大名，孫連仲和韓復榘在彭德一帶由黃河北岸向北推進。當時的部署，大致如此。

豫北彰德的戰事最先爆發，孫連仲率部向敵猛攻，敵方陸上用坦克車衝擊，空中用飛機狂炸，戰況非常激烈，孫連仲多次受險。孫連仲爲人有膽識，好讀書，謙下和平，（真能有功歸人，有過歸己，故雖然年輕，而人多願與協同作戰。）勇敢善戰，尤其是特長。共同作戰的還有韓復榘部亦全力挺進，犧牲很大，傷者頗多。他們在鹿瑞伯指揮，劉菊村策劃之下，不取巧，不懈怠，同心戮力，與敵人勇猛拚殺，全體官兵，在千辛萬苦，衣服彈藥極端匱乏的境況中，能抱定有我無敵，有進無退的決心，以愈困之軀與敵人的坦克車大砲機關槍搏鬥，他們沒有懦弱不前的，沒有不嚴守紀律的，沒有不愛護百姓的。這次會戰，我們連死帶傷約有一萬人之多，沿途各車站上都擠滿了死屍和傷兵，犧牲之壯烈，寫上數次會戰尤甚，但是他們的犧牲是有價值的，他們終於擊潰了敵人，他們鮮紅的熱血，寫出了一頁頁光榮的戰史！

當戰事正在猛烈進行的時候，有一天，劉菊村從湯陰打電話給我，說：

「目前前頭的情形很不好，你能不給總司令報告……」

「菊村……」不等他說完，我就截住道：「你的話我明白。我們正是來找不好的。若是要找好的，應該到止海租界上去，幹嗎在這兒呢？我們是革命，一切全憑犧牲，什麼都不顧惜！」

劉菊村聽我如此說，就沒有再開口。過了一會，鹿瑞伯又來電話，說前方缺乏子彈，勉強支持着，死傷太大了。我告訴他，彈藥的補充目前實在沒法可想，只好勉強撐着。他就說：

「既然如此，我們可不可以把部隊往後挪一挪，免得吃虧太大？」

「你的意思要往後撤退，是不是？」我不等他回答，便繼續說：「我們是來革命的，我們只有前進，沒有後退——這是敵我不兩立的時候，不是保存實力的時候，我們不怕犧牲，我們就要找犧牲！你們要退，你們退去，我是不退的；我這裏已經預備了一枝手槍，兩顆子彈。敵人若來，我用一粒子彈打敵人，一粒留着打我自己！無論如何，我決不能退。我到前方來，根本就沒有打算後退！你們誰要退，請誰先把我打死！」

「好了！好了！我有辦法了！我有辦法了！我一定遵照總司令的意思做去！」瑞伯與我同事多年，我深知道任何沒辦法的事，他有辦法，任何委屈，他能容受得了。我聽見他說話的聲音，堅決而沉着，我知道他實在已經拿穩主意了。

鹿放下電話，立刻就召集軍官會議，將我的話向大家申述了一番，說明唯有咬牙前進才有出路的意思。大家得此激勵，個個人拋去了後退的念頭。重新帶着部隊一鼓氣地往前衝殺，同時與韓復榘部會合，以鄭大章抄敵之後，將敵人手彈給奪全數焚燬。當時韓部以轉載過於疲敝，子彈又不敷用，每次衝了上去，擋不住敵方炮火太猛，又復後退下來。韓復榘着了急，即臥地大打其



據說：「我們現在的情形是只有前進，否則總司令必定槍斃我，我與其被槍斃而死，不如即死在此處！」這樣一鬧，人人都激動起來，鼓起勇敢衝殺上去。鏖戰了三四天，敵人終於不支，住後撤退了三十里，接着就一潰不可收拾。

當戰事最激烈，情況最緊急的那幾天，我在車道旁一個散兵壕裏躺着，那土溝深闊各三尺，秦德純，曹浩森，黃少谷幾位都同在一起，他們覺得住處風吹雨淋，未免太苦了，就和我說：

「我們既是露營，還是搭一個帳棚好罷？」

我說：「官兵們正在槍林彈雨之中，拚着性命，一分鐘內不知道有多少死傷，我們能有這樣的住處還滿意麼？我們做帳棚心裏能安嗎！」

就在這夜兩點鐘的光景，前方的報告來了，說敵方陣線動搖，已經有撤退的模樣。隔了半點鐘，又來報告，說敵人已經向後退了三十里。再過一會兒。說敵人的左翼也撤退了。我一面下令追擊，一面將「我困難時敵更困難」的意思切告各部。

這回的會戰。我們這樣的取得了勝利。最後五分鐘的苦撐，關係如此其重大！當初若是實行後退的計劃，則結局又當如何？過後我聽奉軍將領說：在此次戰役中，深深體會到國民軍的陣線真如銅牆鐵壁一樣堅固。我們雖不能當銅牆鐵壁之譽，但是全體官兵的一種前仆後繼堅持苦撐的精神，實在是不容易搖撼的。

在大名方面，由於敵我力量的懸殊，劉鎮華和韓德元等部無法抵禦，十里二十里地不住往後撤退，苟不增派援軍上去，實難挽回頹勢。此時電調駐滑州的張維璽部已經開到，即令開赴大名增援；張維璽這部分隊伍，器械很不整齊，倒是訓練有素，戰鬥力頗強。當時加到劉鎮華的左翼，向敵猛烈反攻。經寇校生力軍一鼓作氣，全線官兵都精神百倍；敵方出乎意外，不能支持，很快就往後潰退了。

這時，蔣先生來了幾次電報：說我在新鄉，他在徐州，兩下相距過遠，於聯絡上頗感不便，希望我挪近一點。我即發電說：「即移蘭封」。當即離開新鄉，在圍封汴門外一家百姓家找得一個臨時住處。在院子裏搭起一個帳棚，作為我的會客辦公之所。這時候方振武得到蔣先生的委令，我又送去一些餉項，剛由南陽信陽方面把部隊一批一批地開拔出來，他自己到蘭封來見我，我親去車站歡迎，同到我的住處，我就同他坐在那個帳棚裏接談，我很懇切地對他說：

「這次北伐，是神聖的革命事業，是我們軍人獻身為國爭光一時的機會。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努力，為國家民族建功業；不然，將來北伐完成，我們無半點體面，談到那裏去躲藏呢？我是一個直率的人，不會說好聽的話，我以為我們是革命軍人，我們應該澈底洗除利祿觀念，有功歸人，有過歸己。勝不爭功，敗不諉過，切切實實的為國家為人民獻出全力，至死才能罷休。我們是多年共患難的朋友，今天幸得見面，我就贈給你這幾句話，請你不要見外。」

他聽了我這番話，很以爲然，卽把隊伍迅速的開赴前方。當時他所擔任的是曹縣金鄉一路，緊接着第一集團軍賀耀組部。當方軍沿微山湖以西前進，過了曹縣的時候，我們鐵路正面部隊和孫良誠部都正與敵人發生激烈的戰鬥。敵方不能同時後顧，因將其圍攻金鄉的部隊停止前進。敵人方面，在鐵路正面的張宗昌部，其右翼與我方賀耀組孫良誠部對敵的是孫傳芳部。孫傳芳所部戰鬥力甚強，賀部一與接觸，卽感不利，孫傳芳見該路獲得勝利，卽留小部應付孫良誠部，以其主力向賀部猛攻。賀部不能立足，自濟寧起一再轉移陣地，眼望着快要到離徐州只幾十里的黃口、羊架一帶，已至危急之時。此時，李興中在第一集團軍那邊爲兵站長。他來電囑給我說：「這邊敵人已經迫近，我們此刻都上了車，準備退却了！」

同時我連，接到蔣先生的幾個電報，說形勢危迫，問我尙有預備隊沒有。我趕緊覆電，說我這裏尙有預備隊一萬五千人左右，可以全數開上，請其萬萬不可後退。立刻就派第六軍石友三部前去增援，每隔十五分鐘一列車，加急向東開運，他們開到礪山以東，卽與敵方接觸，這一下出敵不意，把孫傳芳部壓迫得不能支持，不得不向後退却，徐州方面始得轉危爲安。

孫傳芳部雖被石友三擊退，可是損失並不算大，而且當其退却時頗能保持秩序，有計劃的分作五路，陸續退向西北與口北各處，一面並伺機打擊我部。時孫良誠正攻濟寧，孫傳芳卽調其退却部隊之一路助孫良誠之後。幸而事有湊巧，他們退却的計劃及偷襲的企圖均被孫良誠於事發

偵悉，早已作了準備，使敵方不能售其計；於是孫良誠分兵截擊，堵其後路，同時，席掖池的騎兵已將兗州東西兩車站完全佔領，孫傳芳部和直魯軍弄得進退失據，再也不能掙扎，立即大敗潰竄。孫良誠遂進佔濟寧，這回孫傳芳的五省聯軍總司令的關防印信也被馬鴻逵部擄獲。

自石友三預備隊調往徐州方面增援，繭封這邊已經空虛不堪，除一連手槍隊，一連參謀隊，一連將校隊而外，再無其他兵力。這時總部裏參謀秘書等人員，看着防務空虛到這個地步，都覺得危險；他們以爲我把隊伍一股腦兒都調走，假設此時後方發生意外，將如何應付！我就和大家說，革命陣線是整個的，不應該分出彼此，第一集團軍的危急，就是我們的危急；他們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他們失敗即我們失敗，成功即我們成功。我們救人之急，拯人之危，也就是救己之急，拯己之危。目前徐州形勢事實上已經十分危迫，我們若不派人增援，致徐州失守，整個戰局都受影響，我豈不知後方空虛的危險，只是出於萬不得已，有什麼辦法？於是我每天就把手槍隊參謀隊和將校隊都集合在操場上，從早到晚地劈刀打拳，從事訓練，教外面人看着好像後面還有重兵駐守着一般。其實全數不過三百人，演的是道道地地的「齣空城計」。

方振武部圍着金鄉，一直不曾猛攻，孫良誠希望他可以不願犧牲，向前挺進，而方不能，兩下又鬧起意見來。孫良誠對方說：

「你們爲什麼老在城外停着？是和敵人打呢？還是預備打我們自己呢？」孫的意思以爲遠

是緊急關頭，必須以敏捷手段，向前猛進，俾能早早渡過難關，而在方振武方面，因見賀耀祖部此時正節節敗退，故而持重不發。

及至石友三開了回去，把孫傳芳的部隊擊退，石乘勝追擊，直到快近濟寧，方振武亦將金鄉張宗昌部擊潰，隨後追進。此時石友三一切輜重接濟都隨行進，恰巧金鄉突圍而走的張宗昌軍經過石軍後方，方振武追敵的部隊趕來，便把石友三的後路糧秣彈藥一齊截劫而去。石友三見方振武忽然截其後，大吃一驚，猜不透究竟是什麼用意。石友三的軍需長給我詳細報告始末及損失，我知道這個誤會不易解釋，惟恐他們因此發生衝突，而壞大事，乃趕緊致電石友三說：

「這次損失的一切東西都由我賠償，你開個詳細單子來，損失了多少，我賠償多少，你不要再計較了！」

這場說不定會起劇變的風波，這樣才算平息。我以為我們作戰，對於敵人自當損敵以利己；對於友軍，則必須損己以利人。凡於友軍有利者，要我什麼，就拿出什麼；抱定「爭利不先，取義恐後」的決心和「我死，你不要死」的襟懷，而後才可以和衷共濟，同心戮力。所謂「公正光明」，所謂「識大體明大義」，就得從這等地方確實做起。軍人無此道德，無此認識，無此操守，則事業詳有不失敗者！

前方戰事正在這個緊張的時候，樊李等一般反動份子忽然接受了軍閥的委命，趁我後方空

盧，向長安，洛陽，潼關，鞏縣等地方分五路襲擊，這次事變的發動，確是張吳等軍閥唆使的。他們派人在上海用大款子買通樊李，令他們趁我們一二集團軍北進之時，撥我後方，以遂其陰謀。他們是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策動這事，決不是偶然而發的。事先早就有此謠傳，但我們都不甚深信，因為他們已加入革命陣線，走上光明大道，何至於再入岔路，鑽回黑暗中麼？那知他們竟未脫土匪習氣，一切只憑胡幹。我們原先的想法，實是把他們看得太高了。當時各處告急的電像雪片似的向我飛來，一會說叛軍已經迫近了鞏縣，一會說洛陽已經發現了叛軍便衣隊。此時駐守鞏縣的只工兵一連，在洛陽祇是教導團同婦女培德學校，官佐子弟學校的學生，簡直談不上有什麼防務。我接了各地告急電報，心裏十分不安，一方面趕急給蔣先生打電報，一方面即直接致電石友三，調他晝夜回來，以應急變。石友三率部已經快到濟寧，接到我的電報，立刻掉回頭，以一天一夜的工夫，強行軍趕柳河。我預先準備好了火車，部隊隨到隨上車，大家須於上車後再睡覺。因此在路上官兵不會有冷眼打盹的時間，石友三自己也是上了火車之後才睡覺的，當即迅速趕到鄭州，在鄭州以西二十里的地方與樊鍾秀部接觸。全體官兵抖擻精神，向敵猛撲，從滎陽、汜水起，完全以無敵的姿態，一直打到鞏縣，敵部措手不及，無處立得腳跟。同時宋哲元亦已率部由陝西趕到洛陽，兩下取得聯絡，前後夾攻，把樊鍾秀打了個落花流水。經過三晝夜的激戰，河南後方的變亂完全平定。

與樊同時叛變互相呼應的是李雲龍，他率部襲擊長安和潼關，企圖一下攔得整個陝西。這時潼關守軍爲馬鴻賓部，全數不過五六百人，可是人數雖少，却一個個都是好槍手。他們都是西北同胞，長於行獵，射擊技術特別高妙，使用的是一種「插子槍」，距離口約尺許之處，置二鐵籤，不用時繫在桿上，射擊時掙下來，插在地上，如兩隻腳一樣，穩穩的站着，槍口描準，即免搖晃不定之弊，又他們在遠距離沒有把握的時候，決不發槍，既經發槍，一打就着，真是彈不虛發，又加馬鴻賓爲人極有深心，沉毅堅忍，帶着四五百個健兒，以一當百，死守着潼關，李部一上去，便要被他打死幾十，連攻多次，吃虧極大，只得退到雒南以南地方。圍攻長安的叛軍爲數甚衆，時鄧錕三爲代理主席，同過之翰，旅長周得勝部與之死拒，文武官員都上城頭督戰，百姓亦都繼起，上下一心，叛軍圍攻了數晝夜，沒處下手，迫朱哲元解了洛陽之圍，趕了回去，方把那些小醜一一肅清。

像樊李這般反動份子，真是國家的害蟲，人民的盜賊，說他們是軍閥，他們却打着革命的旗子，說他們是革命的友軍，他們却依舊保持着建國軍的名義，只要有官有錢，那一方面亦肯與之勾結，革命陣營裏讓他們鑽了進來，得不到半點裨益，反倒埋下許多危機，添了內顧之憂，事實上他們是比真正的敵人更要可恨，更要可怕。這次若不是有石宋各部行軍迅速，士卒用命，說不定會使陝豫地方大受糜爛，革命前途亦受打擊，影響所及，真有不堪設想者！

## 第四十章 完成北伐

帝國主義者，尤其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一貫政策，就是竭盡智謀，用盡手段，阻礙中國的統一，把中國造成割據的局面，在中國掀起長期的內亂，它們就可以爲所欲爲的攫取利益，實現其侵略與併吞的野心，它們仇視革命政權，必設法壓迫之，打壞之，破壞之，使其永遠不能抬頭，永遠不能成功。一部中華民國史，寫滿恥辱，塗滿血跡，無論翻開那一頁，都可以看見它們碰碰的鬼影。在這裏，中國的軍閥，被其挑撥離間，受其指使與操縱，做了它們的最忠實的鷹犬。它們最初是願意躲在它們背後的，借給款項，供給軍火，支持他們的政治生命，使中國一步步入於其彀中。但一旦軍閥統治崩位，發生動搖，軍閥本身的力量不足以自存自衛的時候，它們就不惜把猙獰醜惡的面目完全揭露出來，親自出馬，給對方以破壞與打擊，而使之消滅。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在中國演出多次，郭松齡反戈討奉之役，功敗垂成，就是一個現成的實例。這次革命軍北伐，全國振奮，節節勝利，眼看着軍閥們已經一個個入於潰敗滅亡之境，當革命軍從新團結力量，繼續北進的時候，於是閩中內閣下令出兵，阻軍革命的北上；這回索性公然挑釁，不像破壞郭松齡那次的躲躲閃閃了，結果乃有十七年五月三日濟南慘案的發生。



津浦沿線經過幾次滅滅戰，我方追奔逐北，使敵兵不能立足，都向黃河北岸敗退。蔣先生到了山東，一連拍給我兩個電報，邀我到濟南會見，商談各項軍政要事，我在動身前，把隊伍略加調度，命石友三駐防洛陽，孫運仲韓德元共駐潼關，其餘各部仍舊，處置妥當，即乘火車赴約，到了徐州，忽然又接蔣先生一電，說：「濟南有事，請暫中止前來。」我不知道什麼事，很是納悶。車子停了，我細細想想：若是發生兵變，蔣先生不致還有給我電報的餘暇，若另有什麼危險之事，則思難生死必當相共，我更無半途而返之理，乃令車子繼續前行，到了泰安，打電話探問，方得到濟南被日軍佔領的消息，又知道蔣先生和外交部長黃膺白先生此刻都在黨家莊，既已明白這一確實情形，我益發覺得非去不可。我的左右都勸我聽從蔣先生的電告，暫不前去，蔣先生那邊接連打電話阻我前行，以為黨家莊距濟南太近，恐遭日本人不測之禍，我都沒有聽從，令車子一直開到黨家莊。在黨家莊車站一所清真寺裏，我和蔣先生黃膺白先生見面。這禮拜寺很高大，很潔淨，平常日子無人進去，這天特意開了門，讓我們入內坐談，想不到這小地方有如此規模的建築，當時蒙蔣先生黃膺白先生給我詳談這次事變的情形，知道我方各部以連得勝利，不覺心滿意足，有點懈怠疏忽，他們一進濟南城，便忙着各去找樂兒，大官兒上大館子請客，小官兒下小館子喝酒，有的洗澡，有的買東西，有的各去閒逛。這些部隊本很複雜，如此一來，弄得滿街人來人往，熙熙攘攘，秩序紊亂。這時日本兵已經陸續開到濟南，就在街上向我們擄掠，兩下發生

了衝突，賀耀祖與方振武部都拚死與日兵對戰，一時戰況很是激烈。

結果我們有一部份部隊被日兵繳械，城中建築有多處被毀，軍政人員及百姓受害者頗多，最慘的是我們外交特派員蔡公時先生，被日本兵捕去，百般污辱，終於被凌遲而死，日本軍閥的獸性，可謂發揮無餘，蔣先生和黃膺白先生幸虧防範的周密。不然亦難免受險。

當下蔣先生問及我處置此事的意見，我說：

「對於這事，各人有各人的身份立場，我一個革命軍人的身份立場說，我主張不顧一切，拼命和日本鬼子幹一幹，馬上給他一個反擊，先把濟南日兵消滅，讓他認識認識中國的革命力量，不是可以隨便欺侮的！我們革命，是為民族求自由，為國家求獨立，絕不能因為他的壓迫，我們便放棄了革命，我這是說的一個革命軍人的本色話，至於為免軍事衝突，從外交方面與他交涉的辦法，也許較為妥穩，但這是應該是策士或外交家的主張，我不應該提出來說。」

黃膺白先生接着說：「從實際着想，我們現在是不是有這股力量對日本開戰呢？這是要考慮的。」

商量的結果，決定這回事件從外交方面着手辦理，蔣先生暫回南京去主持一切；軍事方面，各部隊全交由我指揮，撇開濟南的路線，繼續北伐。

這天夜間，我和蔣先生黃膺白先生同在車站旁露營，我們躺在地上，滿懷悲憤的情緒，久久

不得入夢，仰面觀着天空，盡如靜海，上面綴滿着閃閃的繁星，看見天空之大，宇宙之不可思議，覺得自身渺小，簡直不如一隻蟲豸。我們談了一會應付寇的辦法，又討論一會北伐的戰略，直至夜深，方始睡去。第二天一早，我就轉回河南了。

我從開封到了新鄉，接着又由新鄉轉到道口，心裏說不出的難過，到各地都集合官兵，詳談濟案經過，并作五三國恥歌，印發各部習唱，隨即在道口住下，與朱培德，陳調元，方振武，孫良誠各部接頭，當即下令各部向前挺進。他們接奉命令，有的立刻前進，有的却遲遲不前，好像讓日本兵在濟南鬧了這一陣，就不免有點心灰意阻，以前那種勇猛無前的精神已經喪失了似的。在平漢路上，自鹿鍾麟攻破張學良以後，此刻韓復榘已經一直打到石家莊。想到閻百川先生會關照我，彰德以北的事我不須管的話，我怕韓復榘繼續前進，會引起誤會，即致電令其停止待命，但須隨時準備，以便於必要時可以迅速地進援山西部隊。

我到道口不久，蔣先生在南京會議畢事，來電要來看我。我出道口相迎，乃在柳河晤面。他以人員更替的事徵問我的意見，我說一切都請你主張；又商談了一些軍事問題，臨走時他很誠懇的對我說：

「目前外交正在緊張的時候，我還得回南京去主持，所有隊伍仍都歸你指揮，我已經電令各部關照了。」

這時津浦線上張宗昌部隊尚在德州附近，我方陳調元部正向此方前進，惟動作頗嫌遲緩。平漢線上，張學良部退到保定正定之間。又第二次進攻晉閩，當初山西方面若早出兵，奉軍絕不能到石家莊，將省却許多麻煩。可惜錯過機會，致石家莊爲奉軍所據，及至韓復榘拿下石家莊，又關照我們不許過彰德，韓乃聽我命令，停兵不進。可惜奉軍二次進攻，勢仍猛銳，山西方面處有不支，又派人來請我出兵。我說遵守你們的約言，所以不敢出兵相助。來人說：這次是求援，以前的話不提了。我覺得與人相處，真不容易，只得令韓復榘前進，與奉軍接觸。張學良部隊經不住左右夾擊，遂即潰退；鹿韓兩部進駐南宮，津浦線也攻下滄州，直魯各部潰不成軍。張作霖看着大勢已去，於六月二日夜間乘車逃出關外。張的行蹤，沿路都有天津的無線電台報告。先說張作霖離開北平了，繼說到了天津了，又說已經出關，接着就接到消息，說他到皇姑屯附近被炸而死，是日本人埋的炸彈。

張作霖分明是被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多年的鷹犬，這次爲什麼對他下此毒手？據說是日本要求張作霖履行二十一條件，而張作霖沒有踐約之故。本來二十一條的提請履行，是那次日本代奉張攻擊郭松齡的交換條件。及郭松齡既被喬裝的日本兵消滅，日本即要張實踐諾言，張當時含糊其辭，只說待到了北京而後實行；及至到了北京，張又藉故推諉，遲延不肯踐約。日本帝國主義雖不如願。但還懷着希望。這次見奉張兵敗出關，一脈已難再振，看透他不但沒有履行二十一條的

憤憤，事實上也沒有履行的力量了。憤恨之餘，便決心把他炸死。賣國媚外，甘爲日本帝國主義鷹犬，到頭落得如此下場，恐怕張作霖到死都沒料想到吧？

我得到張作霖炸死，奉軍退出關外的信息後，忽然病倒了。渾身發燒，咳嗽頭痛，上吐下瀉，四肢無力，眼睛看東西一片模糊，兩手麻木，連執筆寫字也不能夠，終天什麼東西也吃不下肚，只是吃藥發汗，熱沒退清，又忽受風，於是又得發汗，後來躺在床上，沉睡不醒，雖用手推大聲喊我也不知道。有時偶而一醒，眼睛總睜不開，隨即又沉睡如故，宛如完全失了知覺一般。我想到我這次臥病的原因，實在就在張作霖和奉軍身上。這長時期以來，我是不分日夜，無時無刻不在緊張與繁忙之中，生活又過於沒有秩序，有時整日不吃飯，有時一頓吃八九個饅頭，身體精神，早已到了疲敝不堪的地步。但因責任在身，大事來了，精神有所灌注，我仍然能夠一天天照常工作，而不覺其疲殆。現在張作霖一死，奉軍潰退，關內宣告統一，我這方面的任務已大半達成，千頭萬緒的心願都化爲烏有，於是緊張的心身立刻鬆弛，長時期日積月累下來的疲勞病困一時全部發作起來了。我這一病整整的躺了六天不曾起床。後來多虧一位楊大夫憑代我診治，才慢慢痊復。

病好之後，我接到孫二哥禹行去世的訃告，使我非常震悼，我整整哭了一天，而後開了一個追悼會，以表我的悲悼之忱。孫二哥一生致力革命，尤其在天津，在南口，直到隨軍西退，以

至五原誓師，都與軍閥殊死拚戰，不稍妥協；現在張作霖已倒，革命大業剛剛見了曙光，他使溘然長逝了。連收復華北後的情形，他也不能親見。他爲人慷慨好義，有膽有識，愛國愛民的熱忱，尤其叫人敬服。這樣一位大有作爲的人物，竟於此時逝世，真是令人傷痛！想着我們半生厚誼，想着多年同患難的經過，不由我越想越難過，當開會之日，我一面講話，一面哭泣，至三四個鐘頭之久，終於不支，暈倒了過去，抬入室中躺下，又復沉睡多日。

奉軍既倒，關內軍閥都已縮首斂翼，無所作爲。爲了處理這個新出現的統一之局，蔣先生特來北方，找我們商談一切。我原準備到開封和他見面，不想止從鄭州上車，車站附近忽然失火，彈藥房亦被波及，爆炸聲不絕，建築被毀甚多，亦頗有死傷。軍民忙着救火，剛剛把火撲滅，蔣先生即到鄭州，同來的還有邵力子先生和宋美齡夫人。邵先生我們是舊識，蔣夫人那時還是第一次見面。

那次見面，我們談話很多，記得蔣先生曾問及我對於軍區問題的意見。我對這個問題本沒有特別研究，當時只根據直感所及，說了幾句，以爲我國幅員廣大，最好還劃作幾個軍區，較爲適合。但每個軍區亦不可太大，漢清沿襲明制，多以兩省爲一軍區單位，如兩廣，閩浙，陝甘，兩江等是。民國來每個軍區亦不過五省，此事可按實際情形斟酌定奪，我當時說話，毫無成見，只不過把個人意見隨口談出來，給他做個參考罷了。

從這裏蔣先生前去石家莊與閻先生會見，我派馬雲亭與劉子雲等二位陪着同行；回來，我們又在新鄉與道口之間的一個車站上見面，談及擬將河北省並北平，交給閻先生，徵詢我的意見，我問談：

「只要軍閥賊窟除淨盡了，我便已經十分滿足；別的事怎麼辦都可以，還是請你酌奪吧。」

蔣先生因又請我駐軍天津。因天津實爲北方唯一重鎮，我的意思以爲革命告一段落，政治應使之真正統一，此時大家都當解除兵權，交歸中央，同在政府中辦點大事或小事，不可仍舊各霸一方，形成割據之局。且山西軍駐河北，我們駐津，部屬之間恐亦不易處得好，因此覺得不合適。這回商談二三小時，所談大致如此。

當時我從道口移到新鄉，借住道清路段長的屋子，那房子有一個寬大的院落，養着不少的花草。我往常和外國朋友閒談，他們總說中國只有村莊，不見花草，我告訴他們說，中國不是沒有花草，中國的花草都是養在私人家裏，不會種在公共的地方。他們對這種習俗，很覺奇怪。我也覺得這是自私的辦法，實不合理，因此我有意要在各處添設公共花園，以爲社會倡導。這回我令手槍隊院外的大坑填平，將院中花草移植過去，在中間設一小型圖書館。又置辦木馬槓子等運動器具，以爲平民游覽憩息之所。後來鄧哲熙亦在開封辦設幾處，只是數目還嫌太少。

從新鄉我又移住百泉，其地在衛輝北門外，泉水甚多，故有此名。附近山有「噓台」，爲晉代孫登讀書講學之址，又有邵康節先生的「安樂窩」，本地姓邵的很多，據說都是康節後人。西邊有個邵公祠，現在還保存着。從邵公祠南行，有孫夏峯先生的祠堂。孫夏峯先生原是直隸容城人，因明末清初時曾在此間講學，故立祠以爲紀念。離祠堂不遠的半山腰裏，有個大墳，石碑上寫着「餓夫墓」三字，我不知道來頭，覺得奇怪，就向本地人探問原委。後來查閱志書，纔知道：這所謂餓夫，名彭了凡，明末直隸黎縣人，當滿清入關之初，他與孫夏峯先生等幾位志士結合，到處倡導反清復明的運動。曾發動幾次義兵，都未成功。當最後一次失敗後，彭先生便跑到此地來，找夏峯先生商議再度舉義的大計，不知爲了一個什麼問題，彼此意見不能一致，鬪起口來，彭先生便負氣走了，夏峯先生以爲一定是往他處活動去了；那知過了幾天，聽說有人在半山腰裏發現一具餓死的屍體，夏峯先生趕緊前去探看，原來便是那次負氣出走的他的摯友彭了凡先生，當時撫屍痛哭，又不敢聲張，卽就屍體所在，掘土掩埋，並經立碑題字，以垂久遠。我看這段民族英雄的故事，心裏不勝感動，曾作了一篇三百多字的墓序紀其始末，卽於墓旁崖石上勒刻，使這段可悲可泣的英雄志士的事蹟不致泯滅。

百泉地方有一池子，周圍約百步，池子東西各有一所祠堂：一是共姜祠，一是元相耶律楚材祠，耶律楚材是一個投降蒙古的漢奸，祇因他爲元相，六阻元兵虐殺，人民感激，乃立此祠紀



念。我以為他雖然是個好漢奸，但畢竟還是個漢奸，實在不配後世的奉祀，因此把他的牌位移到旁邊去，這池子中心還有一個清輝閣，為乾隆時所建，閣前面有乾隆行宮，那閣子曾經徐世昌修葺，仍然完整（徐在此地有別墅），距這裏不遠，有編方的墳墓。我寫了一首紀念國恥的詩刻在亭內石柱上面。

百泉地方有幾個特點：一是蠟子出奇的多，長達二三寸，俗名大青蠟，可作涼藥，每晚可捕到二三百頭；二是池中產魚甚豐，味道特別鮮美，想是水質好的緣故；三是每逢廟會，出賣藥材的最多，都是在別處少見的。我在這裏閒住着，每日游覽讀書，又辦些零碎雜事。我在那乾隆行宮的廢址，建築了幾所屋子，作為軍政人員夏令會聚之所。後來韓復榘又用這屋子舉辦村治學院。袁世凱在這一帶有不少的田產，我都把他充公，交給一位魏某負責改辦苗圃，後來頗有成績。地方隨處都有泉源，掘地數尺，即得泉水，但百姓不知利用這種泉水來灌溉土地，我乃和梁式堂先生帶着一團弟兄，察看地勢，着手掘泉開渠，以為百姓講求水利之倡導。

我在百泉正忙着督隊掘渠，蔣先生來電報約我到鄭州會晤。我到鄭州的這天，蔣先生也到了，同家的還有吳稚暉先生等數位。下車後大家到候車室談話，吳稚暉先生很高興，說了許多妙趣橫生的話，他為革命兩個字下一種通俗定義，說是：

「因為張作霖這些軍閥的辦法不好，所以我們起來打倒他們，我們來幹。這可用八個字來說

明，就是：你不好，打倒你，我來！」

我笑道：「這還不夠，我給你補充一下好不好？」

「好的——好的——請你補充！」

我說：「你不好，打倒你，我來。」只是「我來」不行，必須是「我來幹，」加一個幹字；加了幹字還不行，必須再加一個好字：「我來幹好。」我來了，不幹不行，幹不好也不行！」

我說完了，大家都哄堂大笑。

蔣先生這回是經過鄭州保定到北平去，當時他們約我同行，我因有事料理，須稍遲幾天再去，這時韓復榘部隊已到達北平，繳奉軍餉械之械後已奉命由南苑退到冀都，（當時各路革命軍雲集北平，秩序頗亂，故令其退回待命。）同時又電阻鹿瑞伯軍繼續北進，鹿部也就暫駐正定望都一帶。

過了幾天，我從鄭州到保定，先到我的父母的墳上掃墓。墳上的樹木都被砍伐，所立碑碣，都被挖倒，墳頭也被挖了個大窟窿，這都是張作霖吳佩孚幹的事。他們於潰敗之餘，無由洩恨，竟遷怒於我父母的墳墓，真是心勞日拙，愚妄卑鄙之至了。聽說他們當時本要把墳完全掘毀的，幸虧本地思羅醫院幾位美籍朋友，看見他們的舉動過於荒謬，激於義憤，一直跑到墓地對挖墳的

人力爭，末後說：「你們若定要扒這個墳，你們就先把我打死了。」經他們這樣的極力阻止，他們無可奈何，只好罷手。

從前唐朝郭子儀奉命討賊邊疆，立功回朝，家裏祖墳亦被火掘壞，皇上和朝臣以及地方官吏都覺得對他抱歉，郭子儀道：「我帶兵多年，轉戰各地，對部衆定有約束不到，注意不周的時候，尤其挖溝築壘，恐亦不免有損及人家墳墓之罪，現在我家祖墳被掘，正是不足爲奇的。」我想到這故事，以爲自己連年對軍閥作殊死戰，此時父母之墳被人掘壞，亦正是應當的事。

我在墳上鋪了點草，略加整理修葺，整整的在那兒住了三天。此時細思民國以來軍閥官僚政治的主要弊病，就是秉政者盡力排除異己，不能開誠佈公，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都是這個作風，結果貽誤國家，禍害人民，造成數十年爭權奪利的內亂之局。這一次北伐革命告一段落，我們萬萬不能再蹈此覆轍，必須真正的天下爲公，真正的精神團結，才有希望建設真正的三民主義的新國家。我把這番意思發出一個通電，籲請大家都交出兵權，使成真正直屬國家的人民底武力，不可再有私人的軍隊存在。政府對於各軍，須糧是糧，餉是餉，通盤籌劃，一視同仁云云。

我在保定發出這個電報，因爲病未復元，本想再住十天半月，藉稍養息，只因蔣先生以及許多朋友都先後到達北平，再來電促行，說已定好日期，在西山謁祭孫總理靈寢。我在保定即未久留，提前趕赴北平。我在北平西直門下車，許多朋友和軍隊都來歡迎。我自從民國十四年一月

間離開北平，不覺三四年的光陰已經過去，這回轉了一個大大的圈子，重又來到此地；眼看著黃國軍團已經打倒了，國民革命告一段落了。可是這個瘡痍滿目，積重難反的國家，是不是能夠從此就走上軌道，循着三民主義的國策一天天向前發展邁進呢？……我一路走出車站，許多感想都湧上心來。

那天在西山碧雲寺祭靈，蔣先生謁見總理遺容，哭得不能抬頭，大家都不免百感交集，空氣又是悲壯，又是嚴肅。蔣先生哭了很久，還不停止。我走上去如勸孝子一般，勸了多時，他始休淚。接着，我就到南口舉行國民軍聯軍陣亡將士追悼大會，軍政各界朋友多來致祭，一時人山人海。這時我仍嘔吐腹瀉，渾身發燒，早前的病都沒有脫體。

當追悼會進行的時候，看見被收編的張作霖，孫傳芳和張宗昌的部隊，三三五五，潮水似的向張家口宣化一直開去。我想如此粗心大意，假若他們有何動作，我們都會成爲俘虜，那時大局方定，秩序甚亂，紀律亦弛，情形多如此類，把一種莊嚴肅穆的革命氣氛也破壞了。

這時候我深感軍人讀書的重要，當北平攻下以後，我曾通令各級官長，重新努力讀書，重新改造自己，乃購置新書數十大箱，其中史地書籍最多，分送各部，令以打仗精神來讀書。有些人頗能接受此意，亦有人以爲革命成功了，爲何還要讀書，我自己亦深感學識不足之苦，心心念念只想找個地方埋頭讀書。希望國內有個大學允許我作一個旁聽學生，我的興趣是在歷史和文學方

面，以爲惟有讀書是重要的事；要讀書，必須入學校方纔得益。可是許多朋友却說出種種理由，勸我不要作此打算，我的入校讀書的計劃既然不能實行，於是又想到歐美各國去看看，學學，當時立下決心，擬在美國和德國各住兩年，俾可增長些見識，學些東西，可是朋友們又三番四次的勸阻。把我的計劃完全打消。我想我當初若能遂行其志，則今日必有一些長進，或有小助於國家，至今思之，尙覺悔恨。

接着便開湯山會議。

（完）

# 我的生活

(第三本)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  
作  
人

馮  
玉  
祥

發  
行  
者

三  
戶  
圖  
書  
社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地  
書  
店

土  
白  
報  
報  
紙  
紙  
本  
本  
實  
價  
國  
國  
幣  
幣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八  
月  
再  
版

重慶市圖書館審查處審查證世圖字第三四七〇號